



目 录

俄罗斯外交与国情

- 3 雷建锋 / 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37 赵鸣文 / 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
63 葛静深 / “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
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

中亚问题研究

- 95 施 越 / “分而治之”还是“自下而上”
——再议苏联初期的中亚民族划界
123 王鸣野 / 中间地带的通道政治与中间地
带国家的国际行为——以吉尔吉斯
斯坦玛纳斯空军基地为例

俄罗斯商人与东正教

- 157 赵小华 / 莫斯科商人文化赞助活动内在
动因探析——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
180 王 帅 / 基里尔任牧首十年来俄罗斯东
正教会的发展研究——传承、转型
与挑战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王海燕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 年 6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9 年第 3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Лэй Цзяньфэн

Статус государства-преемника импер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3)

Чжао Минвэнь

Общ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мощь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татус России (37)

Гэ Цзиниэнь

«Север России»: анализ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конструиров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татуса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державы»..... (63)

Ши Юэ

«Разделяй и властвуй» или «снизу вверх»: Пересмотр вопроса о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и этнических групп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 ранних стадиях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95)

Ван Минъе

Политика прохождения в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х зонах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стран в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х зонах: на примере авиабазы «Манас»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123)

Чжао Сяохуа

Анализ внутренних причин культур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осковских купцов-меценатов---В период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19 века до начала 20 века (157)

Ван Шуа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перв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патриаршества Кирилла — наслед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и вызовы..... (180)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9 年第 3 期 (双月刊)

Contents

Lei Jianfeng

The Status of Empire Inheritor and Russia's Diplomacy (3)

Zhao Mingwen

Russi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37)

Ge Jingshen

"Russia's North": An Analysis of Academic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s "Great Arctic Power" National Identity..... (63)

Shi Yue

"Divide and Rule" or "from Down to Top"? : Another Analysis of National-Territorial Delimitation in Central As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oviet Union..... (95)

Wang Mingye

Passage Politics of Intermediate Zones and International Behaviors of Countries in Intermediate Zones: A Case Study of Military Air Base at Manas in Kyrgyzstan (123)

Zhao Xiaohua

On Internal Causes of Moscow Merchants' Cultural Patronage Activities: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157)

Wang Shuai

On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in the Decade under Patriarch Kirill I: Inheritance, Transition and Challenges (180)

俄罗斯外交与国情**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雷建锋**

【内容提要】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俄罗斯则来源于“苏维埃帝国”。“帝国”继承国的特殊国家身份从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外交：一方面，苏联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遗产，也留给了俄罗斯比普通大国更多的外交“包袱”，使其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另一方面，苏联留下的丰厚遗产使西方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影响与雄心，继续沿用看待苏联的眼光审视俄罗斯外交。分析俄罗斯外交，既要分析作为国际体系“单元”的俄罗斯自身特性，也要分析不同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和体系性质变化导致的俄罗斯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还要考察俄罗斯自身和外部世界对俄罗斯国家身份认知这一重要因素。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物质结构体现出一种历史惯性的力量，对俄罗斯外交有很大制约。未来俄罗斯会对西方采取进攻性的防守姿态，争取有利条件下的妥协。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战略未来会更加平衡。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以及中俄彼此认知，决定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是可期的。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 俄罗斯国家身份 俄罗斯外交史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3-0003-(34)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之周边大国外交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3162018YKBO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提出的建议！文责自负。

** 雷建锋，外交学院副教授。

一、帝国继承国：新的分析路径

本文的写作有两个缘由：就实践价值而言，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研究俄罗斯外交行为表象之下的潜在机理，并基于这种机理前瞻性地分析其未来走向，对维护我国家利益和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益。就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研究而言，大国外交中俄罗斯向来特立独行，风格明显，关于其外交的研究已经很丰富，然而已有的理论或者分析似乎并没有完全阐释以下问题：

首先，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发展，没有双方之前期待的那样平稳，俄罗斯也未融入西方；相反，中俄关系却稳健发展。

俄罗斯独立后，昔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但是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一直起伏不定，甚至不如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俄中关系却稳步发展。自苏联解体以来，美俄关系经历了四次“重启”过程，双方最初也都真心希望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并付出了实际努力，但最终都“被雨打风吹去”^①。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双方仍希望改善关系，事实上却剑拔弩张。按照建构主义分析逻辑，国际体系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建构了具体国家的观念，这种经过建构的观念又建构了国家利益，进而决定了国家对外行为^②。然而从美俄关系的实际情况看，现实和理论显然相悖。在观念或文化对俄罗斯外交影响的研究路径下，学者们具体分析俄罗斯国家定位和国家荣誉观对其外交的影响^③。这种研究突出了观念、文化和民族精神等非物质性因素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但是太过强调俄罗斯的特殊属性，经常将一般大国的共有特性当作俄罗斯的独特性，而且如果将这些因素当作不变因素，那么不同

①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

③ 刘军：“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帝国到面向欧亚的民族国家”，《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4期，第5-10页；[俄]安德烈·齐甘科夫：《国家关系中的荣誉：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关贵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限于篇幅，关于俄罗斯外交的几类研究的文献只择要举例。

时期俄罗斯外交又差别很大。这种解释显然乏力。问题在于这种研究没有考虑物质性因素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以及物质性因素变更导致的观念性因素的变化。

其次，冷战后俄罗斯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国际政治中的突出事件，如果按照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结构分析法，国家对外行为是由国家在国际权力等级体系中的能力决定的理论逻辑^①，就不能解释俄罗斯在实力明显不如中国的情况下，为什么面对西方压力和威胁，反而显得从容和自信。依照现实主义研究路径，学者们多从外部世界与俄罗斯的实力对比来分析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的原因^②。这种研究的局限首先在于机械唯物主义特征明显，更大的局限是非本土学者容易用本国的外交评判标准去评价俄罗斯的外交：中国学者经常认为俄罗斯外交不知韬晦，定位过高；西方学者的结论往往是，只有真心“皈依”西方才是俄罗斯外交的正途。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没有关注俄罗斯（国际体系中的单元）的特性，只注重了国际体系对俄罗斯的影响，因此缺乏解释力。

最后，冷战后关于俄罗斯外交的研究时段经常从俄罗斯独立开始，缺乏长历史视角。其结果往往限于就事论事，不能从历史的纵深透视当下，预测俄罗斯外交的未来。

鉴于既有解释的局限，本文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和假设：

笔者认为，一国外交政策是观念（本国自身和国际体系观念）和国际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自身特性与外部环境互动的产物。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太多关注物质性结构的作用，而忽视单元的特性，导致解释力不足。建构主义又过于重视非物质性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也有局限。分析具体国际问题时需要将物质性因素与观念性因素统一起来，将国家特性与外部环境相结合，而不能偏执一端。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② 俞邃：“北约东扩以来的俄罗斯外交”，《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7期，第1-5页；Jeffrey Mankof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Vidya Nadkarni, Norma C. Noonan (eds.), *Emerging Power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e of the BRIC Countries*,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引入帝国继承国这一视角，将对俄罗斯独特性的分析与国际体系对俄罗斯的影响结合起来，从俄罗斯自身认知与国际社会对其国际身份的认知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大历史观总结俄罗斯的“帝国基因”，分析俄罗斯自身与外部世界对其帝国继承国身份的认知与影响；进而使用体系分析法，分析不同时代国际体系的性质和这种性质变化对俄罗斯外交的外部制约，最后在权力结构和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俄罗斯外交发展逻辑和未来走向。

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俄罗斯帝国继承国的国家身份，根植于其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实力资源，也是同外部世界互动的结果。这种身份建构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塑造了俄罗斯的对外行为。因为俄罗斯作为帝国的继承国，它有不同于一般大国的特性，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建构也不同于一般大国。

二、俄罗斯从帝国继承了什么？

“帝国”是一个很富争议的术语。古罗马时期帝国意指至高无上的权力，包含战争指挥权和行政官执行法律的权力。迟至 18 世纪，“统治权”都是该词的基本含义。此术语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历史，与罗马帝国文化密切相关。但自罗马共和国时期开始，它就已经开始被用来描述拥有广大领土的政体^①。俄罗斯帝国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认为，“帝国的定义并不适合历史上已存在的所有帝国，或者甚至是所有重要的帝国。由于大多数伟大的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并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很大，因此帝国的一个定义往往难以涵盖甚至是实际上的某一个帝国”^②。

列文的帝国定义非常简单，他认为，帝国必须首先是在一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留下了持久印记的非常伟大的大国，同时也指统治广阔领土和众多人

① [英] 安东尼·派格登：《西方帝国简史：迁移、探索和政府的三部曲》，徐鹏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年，前言第 13 页。

② Sally N. Cummings, Raymond Hinnebusch (eds.), *Sovereignty after Empire: Compare the Middle East and As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5.

口的政体，因为空间和多样性的管理是帝国伟大的永久困境之一。^①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定义非常超前，他们全球化时代主权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组织在一个单一的规则逻辑下联合而成。这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就是帝国^②。这种帝国不像传统帝国那样依靠军队、行政官员和神职人员，而是依靠市场、国际金融机构和各种民间非政府组织来管理。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提供了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共识性的帝国定义，即“帝国是一些政治社会对其他政治社会有效主权的控制。帝国不仅包括正式吞并的领土，而且包括所有形式的国际不平等关系。帝国主义就是建立和维持一个帝国的过程”^③。多伊尔的定义抓住了帝国的本质，即两个政权同时存在安全与经济上的等级制这一根本特征。戴维·莱克（David Lake）则根据这种等级制，做出了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的区分：正式帝国中，附属政权不拥有国际法律人格，也不拥有名义上的独立政府；而非正式帝国的附属成员国拥有国际法律人格，即使屈从于另外一个国家的权威，但仍能保留自己的国际权利，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国际协议，以及以完全和平等的成员国身份加入国际组织。其次，在各个非正式帝国中，附属国名义上拥有独立的政府。^④

俄罗斯学者亚·伊·弗多文（А.И. Вдовин）认为，“毫无疑问，苏联曾经有过大量的缺陷，但是终归不是帝国。这一概念只适用于古代世界和近代的那些君主国”。^⑤显然弗多文是以正式帝国的标准评价苏联的。按照莱克的分类，沙皇俄国与同时期的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类似，是正式帝国。作为沙皇俄国继承者的苏联是非正式帝国。英国帝国史专家安东尼·派格登（Anthony Pagden）认为，“从领土来看，苏联当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①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xi.

②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reface, p.xii.

③ Michael W. Doyle,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9.

④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57-58.

⑤ [俄]亚·伊·弗多文：《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族人》，郑振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6页。

虽然其中大部分没有人居住”。^①美国学者则称苏联为“苏维埃帝国”。^②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有许多人认同苏联是帝国的观点，例如相关表述：“华约解散、经互会解体，作为对抗西方的‘苏联帝国’由此崩溃。”^③由于幅员和地理等不变因素的存在，大部分国家无法改变角色。二战后的美国不可能扮演二流国家的角色，法国也不可能成为两大集团任何一方的领袖，大国对环境做出的任何不同反应，都表明身份是重要因素。^④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俄罗斯则立足于苏联的丰厚遗产之上；作为帝国的继承国，其特殊国家身份塑造了当今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和坚决的外交风格，从这些风格中隐约可见前帝国“基因”。分析这些俄罗斯继承的“基因”，就可以发现影响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可变因素和不变因素。

国际关系学者关于国家身份的演绎，来自于心理学与哲学关于个体身份的定义：国家身份是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国家所具有和表现出的关于其个性和差异性的形象。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国家身份即国家是什么和代表什么。与个人身份一样，特定国家的国家身份，一般在其与他国（可能还有国际组织）的关系和互动中形成和改变。国家内外环境的文化和制度因素，也有助于构建国家身份。与个人身份一样，国家身份不仅是对某国特性之描述，也是一种社会 and 关系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对他国存在方式和身份的反映。^⑤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研究认为，国家身份是国家行为的重要根源之一。身份指行为体是谁或者是什么样的内容，表示社会类别或存在状态；利益指的是行为体的需求。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机力量；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⑥

① [英] 安东尼·派格登：《西方帝国简史：迁移、探索和政府的三部曲》，前言第 13 页。

② [美]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

③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二卷（1990-199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第 39 页。

④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9.

⑤ Kuniko Ashizawa, “When Identity Matters: State Identity,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8, Vol.10, No.3, p.575.

⑥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89-290 页。

国家身份是利益的先决条件，利益则是对外行为的路标，国家身份是由国家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等级地位和它与国际主流文化的关系——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共同建构的。由于幅员和地理等不变因素，大部分国家不易改变国家身份。由于身份的相对稳定性，俄罗斯的“帝国基因”无疑影响其当下外交及未来走向。

彼得大帝的统治开启了俄国历史的帝国时代，该时代持续了约两个世纪。北方大战胜利后，在为庆祝和平而举行的一个庄严仪式上，参议院说服彼得一世接受了“大帝”头衔，俄罗斯正式成为帝国。^①这场战争将俄罗斯带入了欧洲国际体系，并经过拿破仑战争使俄国成为欧洲国际社会的一员。沙皇俄国在维也纳会议后的一百年里，一直扮演着欧洲协调的主要建构者和维护者的角色。从俄国自身角度考察，比较沙皇俄国、苏联和俄罗斯，我们会发现从沙皇俄国到苏联的帝国特质，以及这种特质对俄罗斯的影响。

第一，帝国内在地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伟大的政治家。帝国要为其子民提供秩序、安全和资源。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传统的缺乏，使民众容易将希望寄托在彼得大帝式的君主身上。正如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言：“……在我们意识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人民永远需要沙皇老子，或另一个被赋予了沙皇权力的人。……我想强调指出，把历代沙皇及其现代同类者奉若神明的做法，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心中。”^②从彼得大帝到普京，俄国历史呈现的规律是，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领导人，国家就能获得稳定和发展，相反则是混乱和倒退。与英法等欧洲帝国相比，俄国是一个人格化的国家，制度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相对较弱。这种特性也容易让西方国家将俄国称为专制国家，而非民主国家。

第二，与西方帝国相比，沙皇俄国和苏联的强大建立在领土兼并和扩张的基础上。1914年挪威的极地探险家南森计算出，俄国以平均一天约55平

①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美]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8-221页。

②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69-70页。

方英里的速度迅速扩张了超过四个世纪。^①几百年来，俄国在一个几乎跨越不同气候和文明的大陆上不断扩张，只有当需要调整国内体制以适应庞大的新疆土时，扩张才会暂时中断，之后又卷土重来。从彼得大帝到普京，扩张节奏惊人一致^②。帝国都会扩张，但是俄国的领土扩张极其突出。俄罗斯帝国和后来的苏联，领土面积超过 850 万平方英里，比整个北美大陆还大。庞大帝国对今天的俄罗斯产生久远的影响。首先，无论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对昔日的辉煌充满自豪，希望获得昔日所受到的尊重和国际影响；当境遇不佳时，则容易心怀怨愤，无论对本国政府还是外国政府。其次，帝国就意味着信仰、文化、民族差异，意味着人口迁徙。有些迁移是出于自愿，而有些迁移则出于强制（例如斯大林时期对车臣人的强制迁移），加上成为帝国组成部分（即被兼并）的时间不同，子民对帝国的认同自然相差很大，认同较低的民族更希望独立。从苏联解体中也可以看出，帝国崩溃先是帝国的势力范围——东欧剧变，摆脱苏联控制；接着是对苏联认同较低的原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宣布独立；最后是一些对苏联有较高认同的国家被迫宣布独立——中亚的共和国。苏联解体后很多原加盟共和国中俄罗斯族成了少数民族，他们在新独立国家中地位迅速恶化。帝国时代掩盖着的民族矛盾凸显，这成为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国家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另外，独立前加盟共和国在苏联大家庭里有产业分工，资源互补，各共和国的经济本来联为一体，互相依存。苏联突然解体后，这些经济、文化、社会联系不可能突然断裂。直到现在，中亚国家仍需要通过俄罗斯的输油管道出口本国石油，需要俄罗斯石油企业在中亚国家生产的石油。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则需要乌克兰提供战舰发动机。因此，各共和国关系出现危机，对彼此经济发展都会产生严重损害。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建立是为了维持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同安全和经济发展，从倡议到发展，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符合俄罗斯和其他有关国家的利益。但是这些情势往往被西方国家解读为俄罗斯重建帝国的表现，而且提

① [英] 安东尼·派格登：《西方帝国简史：迁移、探索和政府的三部曲》，前言第 13 页。

② [美]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52 页。

出了应对的方法。布热津斯基认为，“只要保持对乌克兰的控制，就是失去波罗的海和波兰，俄罗斯依然可以设法成为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导者”^①。欧盟东扩、北约东扩，事实上人为造成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联系的中断和利益的切割，俄罗斯的奋起反击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又造成了与西方关系的恶化。

第三，俄罗斯帝国作为大陆性帝国，以军事征服的领土兼并和控制为主，而英国这样的自由海洋型帝国，则是以殖民掠夺、远洋贸易和远洋海军为特征的商业霸权。因此，俄罗斯帝国的基础是军事。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就曾坦言：“俄国只有两个盟友——它的陆军和海军。”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开疆拓土，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国。苏联的建立及其势力范围的形成和巩固，主要依靠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突出贡献和强大的军事斗争能力。为了维持帝国，苏联在欧亚大陆建有多处军事基地，以保持对势力范围的控制和对盟友的支持。苏联解体后，其在越南、东欧、古巴等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基地很多都被关闭了。但是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还有多处军事基地，在其他地区的个别国家仍然留有军事基地，它们是苏联留给俄罗斯的军事“遗产”。维持和巩固这些遗产，一方面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象征，也是俄罗斯保持一支大国军队所必须的，俄罗斯势必坚守这些遗产。这样，俄罗斯与原苏联共和国和西方就难免产生矛盾。乌克兰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事关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安全，而叙利亚的塔尔图斯军港是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的唯一栖息地。这也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产生矛盾，在叙利亚问题上不能后退的重要原因。因此俄罗斯在军事上投入一直是大国中比例最高的（参见表 1），这样俄罗斯必然难以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无力保持军事的高投入。普京在 2000 年上台时承诺，到 2020 年将投入 6500 亿美元用于军事。目标是到那个时候，按照全球标准，所有武器和系统的 70%将是最现代化的。这种大规模投资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在许多方面继承的东西仍然看起来像苏联的军队。2016 年普京已经有了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无论单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p.92.

兵装备还是大型装备，都接近北约水平。^①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危机中俄军的表现——无论专业素养还是技术装备，均让西方同行震惊。

表 1 2012-2016 年各大国军费占 GDP 比重 (%)

	俄罗斯	中国	印度	巴西	美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德国
2016	5.4	1.9	2.47	1.32	3.29	1.84	2.26	0.93	1.19
2015	4.86	1.95	2.41	1.36	3.3	1.88	2.27	0.94	1.19
2014	4.1	1.9	2.5	1.33	3.51	1.97	2.23	0.96	1.19
2013	3.96	1.85	2.47	1.33	3.83	2.09	2.22	0.95	1.23
2012	3.75	1.84	2.54	1.38	4.24	2.21	2.24	0.97	1.31

资料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br.html>

第四，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从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看，俄国一直是经济体系中的半边缘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核心区是集中高利润、高工资、多样化生产（核心竞争）的集中区域；边缘地区是低利润、低技术、低水平、较少多样化生产的地区；还有半边缘地区，它们是核心区的周边地区，以及一些周边地区的核心国家。^②俄国就是这样的半边缘国家，即它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作为列强之一，其社会经济状态与马克思所描绘的工业革命时期的早期资本主义更加相似，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情形相去甚远。^③自从十八世纪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来，俄国一直是该体系的半边缘国家。其政策设计均寄望于从边缘走向中心，最终都失败了。19 世纪资本主义在欧美高歌猛进之际，使英、美、法得到革命性改造的时候，沙皇俄国却没有跟上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步伐。虽然资产阶级也有发展，但是力量弱小。十月革命后出于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列宁被迫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然而时间非常短暂。斯大林上台后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经济的市场经济成分荡然无存。

① Mark Galeotti, *The Modern Russian Army 1992-2016*,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17, pp.34-36.

②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97.

③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sixtieth-anniversary expande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138.

后共产主义时期，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休克疗法对经济的严重损害，原先政治经济结构中难以适应急剧变革的因素，对西方期待落空后对西方外交的强硬政策；西方为了防止俄罗斯崛起的欧盟东扩、北约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一体化的引起的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迅速崛起综合作用，凸显了俄罗斯的半边缘身份，甚至其半边缘国家地位都受到挑战。当代俄罗斯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走向核心国家集团，而是在半边缘国家的阶梯上继续往下走。^①商业传统的缺乏、经济结构的限制和对市场机制作用认识和使用能力的不足，也限制了当代俄罗斯的经济的发展。普京也承认，“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要知道，在改革开始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且有着笨重和畸形的经济结构的体制中实施市场机制。这不可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②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经济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消费品生产不足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也缺少有效的市场运行的制度框架和完备的法律体系。所以尽管俄罗斯依然是核大国，但不是综合实力型国家，这限制了俄对外行为的手段。

俄罗斯继承的以上帝国“遗产”或“基因”，从内部塑造了今日俄罗斯的独特国家品质；俄罗斯还继承了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太友好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从外部影响着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和对外行为。

沙皇俄国曾是西方国际社会的一员，而 1917 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1922 年前是苏俄）与西方世界长期对抗，结果是双方非常容易以冷战时期的眼光看待对方，有分歧时则更加强烈：西方惯于将俄罗斯的不合作看作苏联“遗风”使然，俄罗斯也更习惯于从西方孤立和遏制其发展的角度解释彼此矛盾，双方均不由自主的“寻找历史的一致性”。这种思维之下建构的俄罗斯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就是修正主义国家——俄罗斯和维护现状国家联盟——西方的充满猜疑和不合作的关系。这个体系下，北约持续东扩构成了对俄罗斯安全上的挑战；欧盟东扩和美欧日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限制

① Paul T. Christensen, “Russia as Semi-periphery: Political Economy,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System”, in Neil Robe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ssia*, Plymouth: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pp.170-171.

② 《普京文集（2000-200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4 页。

了俄罗斯经济发展。苏联解体后的市场转型，俄罗斯经历了大规模去工业化，生产质量下滑，生产结构全面简化。其消费品、科技和复杂产品高度依赖进口，对主要出口商品价格波动敏感，受制于许多其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① 在一个不友好的全球分工体系下，俄罗斯的经济缺陷就被放大。按照普京的说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应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这个体系的主要力量中心及其格局，是在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甚至是在与苏联对抗的情况下形成的。发达国家筑起重重市场壁垒来保护本国利益。技术标准差异则是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的另一个问题。”^②

以上是俄罗斯从帝国继承下来的“遗产”和帝国“基因”，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俄罗斯的大国基础，是其大国地位的依托；另一方面，俄罗斯为了保持对这些“遗产”的继承权，也同外界发生冲突，帝国“基因”从内部塑造了俄罗斯独特的国家个性、外交行为和对外关系。苏联留给俄罗斯的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外在约束着俄罗斯的对外行为。两者共同塑造了俄罗斯的帝国继承国身份。俄罗斯外交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惯性特征。

三、对俄罗斯身份的认知差异与影响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通过共有知识（shared Knowledge）构成的。它建构国家身份和利益，身份和利益决定国家的对外行为。因为国家身份一方面取决于国家个体属性——不依赖外部条件而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是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共同建构的。^③ 虽然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成为 21 世纪的突出国际现象，但是西方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的主导者，西方和俄罗斯自身对后者身份的认知差异，以及这种认知之下的互动，塑造了俄罗斯外交。

（一）俄罗斯与西方关于俄罗斯国家身份与双边关系的认知差异

1. 独立之初的俄罗斯与西方对双方关系有太高期待，幻想破灭后更激

① 《普京文集（2012-201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 年，第 26 页。

② 同上，第 25 页。

③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7-227 页。

发了俄罗斯的大国意识

自成为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来，俄罗斯在与西方关系中遵循了三种路径：一是与西方结盟，反对它认为从欧洲内部或外部挑战欧洲秩序的国家，如神圣同盟、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反恐战争等，都是例证。二是在国内复兴和国际联盟中寻求平衡，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时期的俄罗斯外交和斯大林二战前的外交政策是代表。三是诉诸强硬政策，如克里米亚战争、2008年俄格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苏联对西方政策。^①总体而言，俄国与西方合作时期占绝大多数。从“长历史视角”看，苏联解体是俄罗斯重新回归西方。独立之初的俄罗斯精英和普通民众大多理想化地认为，只要改变政治经济制度，西方自然对俄罗斯友好，会履行以前的援助承诺，帮助它渡过难关。

叶利钦时代的早期（1996年前），自由派观点是俄罗斯外交思想的主流。叶利钦希望通过与西方合作，换取西方对俄罗斯“国家利益和国家自豪”的尊重和经济援助。西方也确曾予以援助。以圣彼得堡为例，1991年秋天，“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向美国总统老布什、德国联邦总理科尔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求援，请求他们援助。第一批援助1万吨粮食从位于联邦德国的美军仓库中运来。1992年冬天和春天，人道主义船只从德国、美国、法国、英国甚至日本驶出来。仅仅从列宁格勒的姊妹城市汉堡就邮来了几十万包裹。”^②但是西方认为，援助只是辅助手段，俄罗斯问题还得靠自己解决。而且，西方的“慷慨”援助是建立在对“被招安者”的优越感心理之上的。

俄罗斯与西方对彼此失望，俄裔美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梁赞基诺夫斯基说得很明白：“事实上，90年代有数十亿美元贷款给俄罗斯——主要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但俄罗斯的挫折感仍然存在。许多俄罗斯人感觉受骗，因为他们期待的是大得多的援助。克林顿承认援助的效果是有

① [俄]安德烈·P·齐甘科夫：《国际关系中的荣誉：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关贵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1-265页。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王晓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限的，是‘40 瓦的灯泡放在一片漆黑之中’。”^①

期待的幻灭重新唤起俄罗斯的大国意识。1996 年普里马科夫担任外长后，俄罗斯外交转向“强硬”。俄罗斯独立初期与西方彼此理想友善的形象和友好行为，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俄罗斯对苏联时代超级大国地位的怀念和对西方的警惕和戒备。许多俄罗斯人怀疑，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故意让苏联解体。如果苏联对其解体没有责任的话，那么俄罗斯就应恢复其大国地位。^②虽然俄罗斯实力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在其著作中依然认为，俄罗斯对世界安全与战略稳定意义重大：“一个普遍公认的事实是，俄美关系依然是影响世界政治气候的举足轻重的因素……俄罗斯与美国的共同潜力，足以成为保障世界安全与战略稳定的决定性因素。”^③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俄国家杜马议员安德烈·科科申说，“俄罗斯尽管已非超级大国，但仍能影响世界各个角落的国际关系进程……俄罗斯尚未沦为地区性大国。以各种实际指标为基准，俄罗斯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我们如果创造一个先进的经济实体，正确使用和发展‘人力资本’，就一定能保住这个地位。”^④从沙俄到苏联，再到后苏联时代，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统治精英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都把俄罗斯视为全球性大国，视为管理欧洲和全球事务的一个关键成分。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精英的高度连续性，令这种看法越发固化。^⑤

2. 俄罗斯与西方对正常的俄欧关系、俄美关系基础的认知不同

从美国和欧洲的对俄政策和行为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希望俄罗斯处于附属地位，而后者认为与西方关系的基础是平等。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西方

①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美]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46页。

②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8.

③ [俄]伊·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对外政策十年》，陈凤翔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④ Andrei Kokoshin, “What is Russia: A Superpower, A Great Power or A Regional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6, 2002, p.187.转引自相兰欣：“‘9.11’以后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努力”，《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1期，第6页。

⑤ R·萨科瓦：“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2期，第47-48页。

与俄罗斯一道消解苏联解体的遗留问题，与俄罗斯领导人频繁会见。这种情势使后者误以为西方平等相待，也希望与西方真诚合作，保持这种关系。从叶利钦自传中对其参加八国集团活动的心情描述，可以感觉到俄罗斯期待和珍惜其作为西方一员的身份：“俄罗斯确定了自己作为平等的政治伙伴的地位……在声明中，各国首脑都强调，在该‘俱乐部’享有同等权利的成员一共八个，而不是七个。”^①而《华盛顿邮报》却如是说：“自从两年前俄罗斯被邀请成为‘八国集团’完全平等的成员以后，其他领导人就像与一位穷亲戚见面一样和前超级大国总统聚会……”^②

为成为“最发达的八个工业国家”一员，俄罗斯做出了太多让步。虽然对西方发动科索沃战争不满，叶利钦还是接受美、英、法三国的意见，对南联盟施压，迫使米洛舍维奇同西方进行谈判，做出重大让步。然而战争甫停，俄罗斯就在八国集团会议上被责难。叶利钦终于认清了西方对双边关系的定位：“说到底，他们是想孤立俄罗斯。”“北约组织的北大西洋战略就是要该组织变为施压的工具，他们暂时并不考虑俄罗斯民族的利益。”“今天，西方不顾一切代价，企图断绝独联体国家同俄罗斯的联系，使他们摆脱俄罗斯的影响，而且还努力吸引这些国家同北约保持密切的关系。”^③

然而，俄罗斯民族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安德烈·齐甘科夫就特别指出，现实主义所认为的权力、安全和威望只能部分解释俄罗斯的对外活动，尽管其决策者也常以这些目标为其国家行为正名，“但对他们行为的最好解释是荣誉概念，俄罗斯的荣誉观包括国家的对外属性和对内属性，例如与西方的特殊关系、大国威望、对国内制度的自豪感”^④。但是叶利钦的妥协让西方国家以为俄罗斯甘当西方的小伙伴。然而，俄军占领普里什蒂纳机场的军事行动表明，即使是叶利钦这样的亲西方领导人，也不甘心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不会为了维护同西方的关系而损害其大国地位。而普京则为俄美关系的

① [俄]鲍里斯·叶利钦：《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曹曼西、张俊翔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95页。

② 转引自[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204页。

③ [俄]鲍里斯·叶利钦：《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第396、399、400页。

④ [俄]安德烈·P·齐甘科夫：《国际关系中的荣誉：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第265-266页。

发展设置了前提条件：“总的来说，在俄美关系上我们愿意同美国发展更加长远的关系，取得更具实质性的突破，但是条件是美国方面必须切实遵守平等与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原则。”^①同样，“9.11”事件后，普京对美国反恐积极支持，但是阿富汗战争以后，双方关系迅速变冷。2014年乌克兰危机刚刚爆发，西方七国就断然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这些事实表明，西方不愿意平等地对待俄罗斯。

3. 西方和俄罗斯根据需要，突出俄罗斯国家身份的某些特性

需要弱化俄罗斯国际地位与影响时，西方就突出俄罗斯的资源型经济的落后，将它归为非民主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强调其在技术和市场上对西方的依赖，暗示后者不应该追求世界大国地位，而应该顺乎情理地接受作为西方小伙伴的地位和事实上的不平等。美国更希望俄罗斯能像其西方盟友一样，接受其领导。在涉及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时，美国甚至不屑于做做样子，假装把俄罗斯当作一个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当然美国会讨好普京，以求得他的支持。然而如果得不到的话，美国人不会因此却步。^②当需要强调俄罗斯威胁时，西方就突出俄罗斯的幅员、人口、军事实力和敢做敢为的外交政策，以及沙俄和苏联以往的扩张历史，夸大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方面也选择性地突出自身国家身份的一些特性，而有意淡化另一些方面。两百多年的帝国历史、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地位，自然使俄罗斯精英和民众愿意接受其超过一般大国的国际身份：强国、对国际事务有独特贡献、世界一极等等。而这个大国地位更和其历史上的军事胜利有关：十八世纪独自挫败了欧洲最强大的瑞典军队，十九世纪战胜拿破仑法国，二十世纪击败了纳粹德国。在俄罗斯眼里，英、法两国靠美国援助才赢得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德、意、日则是美国的手下败将，所以这些国家接受美国的领导在所难免。目前俄罗斯依然拥有与美国相匹敌的核武库，军事实力依然远超其他大国，因此它没有理由成为美国的小伙伴。虽然俄罗斯人也意识到自己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不足，但是在追求其国家对外利益时，总是同其第

① 《普京文集（2012-2014）》，第117页。

② [英]安格斯·罗克斯伯勒：《强权与铁腕：普京传》，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95页。

二军事大国地位挂钩，而不考虑其虚弱的经济。西方的压制更使俄罗斯本能地突出自己的军事能力。

（二）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的怪圈

因为历史、文化、经济和地缘政治等原因，俄罗斯有权利继承苏联留下的丰厚遗产，这是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西方的漠视，甚至有意的忽略，导致双方关系跌宕起伏。

首先是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俄罗斯认为本国与这一地区是特殊关系，将这些国家看作“近外国家”（near abroad）。普京坦言：“应该坦率地说，我们把独联体地区看作我们的战略利益范围。我们还认为，对独联体国家来说，俄罗斯也是它们的国家利益范围。”^①俄罗斯将加强与独联体国家关系视为其外交重点。为维持这种特殊关系，在政治经济上对这些国家不得不做出许多让步。但这些国家对俄罗斯应尽的义务往往名不副实。它们与俄罗斯签订了名目繁多的协定，却很少真正落实，对俄罗斯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②俄罗斯认为它在独联体国家拥有特殊利益，希望本地区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努力。西方却认为俄罗斯推动后苏联空间一体化是重拾帝国梦。西方没有认识到俄罗斯与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联系，对于俄罗斯以及这些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的积极意义，因而对俄罗斯的一体化努力往往负面评价。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要稳定与西方社会的关系，取决于四个层面关系的稳定：一是俄美关系和俄罗斯与大西洋的关系，二是俄罗斯与“新欧洲”国家的关系，三是俄罗斯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四是俄罗斯和位于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后苏联空间西部地区国家的关系。第四层面的情况现在最为复杂，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他层面的关系。^③虽然俄罗斯对北约在中东欧国家加强影响、增加军事基地，非常敏感，但是对于这些，俄罗

① 《普京文集（2002-2008）》，第32页。

② Angela E. Stent, *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 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8.

③ [俄]米·季塔连科、[俄]弗·彼得罗夫斯基：《俄罗斯、中国与世界秩序》，栗瑞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5-236页。

斯的态度相对克制。然而在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则毫不妥协。乌克兰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俄罗斯希望乌克兰加入其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而欧盟则希望将乌克兰纳入其东部伙伴国计划。这样，彼此便将对方争取乌克兰的行动视作威胁。

其次，关于国家安全的军事遗产。如果说俄罗斯在推动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方面与西方尚有妥协余地的话，涉及安全问题，它则退无可退。苏联为俄罗斯留下了很多外国军事基地，其中一些因为俄罗斯经济衰退而关闭之外，相当一部分得以保留。乌克兰危机就与俄罗斯军事安全有关。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军港是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如果乌克兰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黑海舰队就失去了栖身之地。布热津斯基曾说，从地缘政治上看，失去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可能自信地充当欧亚帝国的领袖，其欧洲化色彩将逐渐减弱而更趋亚洲化。^①因此，北约和欧盟对乌克兰的拉拢，被俄罗斯视为对其安全的严重威胁。2016年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构想》中明确指出：“欧洲大西洋地区过去二十五年累积的系统性问题，是北约和欧盟追求的地缘政治扩张以及拒绝实施关于建立欧洲安全合作共同框架的政治声明。”^②但是乌克兰危机侵害了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引起美欧对俄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同样，因为叙利亚问题，俄罗斯与西方面临直接军事对抗的风险。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如果俄罗斯对于格鲁吉亚对南奥赛梯的镇压和统一做法无所作为，无论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难以接受。但是俄格冲突后俄罗斯承认南奥赛梯独立，则严重侵犯了格鲁吉亚主权，违反国际法，影响了国际声誉，恶化了同西方的关系。

苏联的“遗产”成就了今天俄罗斯的大国基础，同时也让它时常进退两难：维护“遗产”继承权经常恶化与西方关系；放弃则有损国际威望和国民期待，使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损害。

西方与俄罗斯关于后者国家身份的认知错位，使西方容易夸大俄罗斯对西方的威胁，降低双方信任，引起对立。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92.

②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by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Vladimir Putin on November 30, 2016, p.17.

客观而言，目前俄罗斯相比西方，无论军事还是经济都处于绝对劣势，并不对欧洲和美国构成威胁。相反，从戈尔巴乔夫到梅德韦杰夫，都提出了融入欧洲、成为西方大国一员的计划，但是西方没有真正接纳俄罗斯。西方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使俄罗斯更倾向于以强硬的方式应对西方。俄罗斯历史与文化上介于欧亚之间的境遇以及西方对待俄罗斯的方式所导致的俄文化与安全的脆弱性，塑造了普京的思维模式，使其采取了“好斗”的外交政策，克里米亚事件表明他愿以高昂的代价维护国家利益。^①

自 2014 年以来，北约在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军事演习不断加强，持续向俄施压。2017 年 9 月 11 日开始，瑞典开始举行为期近三周的“极光 17”军事演习。超过 1.9 万名瑞典军人与来自丹麦、挪威、芬兰、法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美国等国的 1500 名军人共同参演。虽然瑞典国防大臣胡尔特奎斯特表示，军演是瑞典自己的安排，而非来自北约的倡议，但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瑞典媒体表示，瑞典与北约安全密切相关，合作军演对双方大有裨益。2017 年 9 月 14 日至 20 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联合军演“西部-2017”举行。参演的部队人数达到 12700 人，包括 7200 名白俄罗斯士兵和 5500 名俄罗斯士兵。俄方表示，此次演习纯属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国家。因为俄罗斯与美国的核平衡依然存在，双方均不敢贸然进攻对方。然而双方对现实的虚构的感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对对方的威胁都有夸大，促使每一方都采取措施以求遏制另一方的“帝国行为”，而这些措施又正好印证了有关各方头脑中最初所虚构的解释。这些大国于是陷入了恶性循环。^②在这样的情形下，日益增强的敌意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双方根本利益冲突的结果^③。面对西方威胁，2018 年 9 月，俄罗斯在远东进行了自 1981 年以来最大的军事演习。

俄罗斯认为继承苏联“遗产”是其合法权益，根据历史、文化和经济联

① Kari Roberts, “Understanding Putin: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Geopolitic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7, Vol.72, No.1, p.55.

② Hans J. Morgenthau and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p.82.

③ Kenneth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9, Vol.3, p.130, quoted in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75.

系，保持与后苏联空间和传统的友好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是其合理的国家利益和现实关切。而西方认为这是“帝国行为”。身份认知的差异是双方矛盾的重要根源。

四、俄罗斯外交的体系制约及影响

国际体系结构类似于经济市场结构，体系中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就像市场上的大公司，既受制于环境又影响环境。^①俄罗斯特殊的国家身份既是自身与外部世界主观认知的结果，更是其国际体系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及其与体系互动的结果。以往研究要么只关注俄罗斯与外部世界观念和认知因素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要么侧重体系权力结构的影响。实际上，一国外交是观念与权力相结合的产物。

（一）沙皇俄国是欧洲国际社会一员，但不是核心国家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和欧洲国际体系形成的标志。随后的18和19世纪，在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塑造和主导了全球国际体系。俄罗斯帝国是欧洲国际社会和西方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虽然它是欧洲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但是俄罗斯在历次大战中力挽狂澜，很快成为该体系的主要塑造者。北方大战是近代欧洲的重要战争，它将俄罗斯带入了欧洲国际体系。17世纪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获得绝对胜利，加上军事统帅查理十二的天才指挥，其军队成为欧洲最令人敬畏、最强大的军队。瑞典先后让丹麦、波兰和萨克森屈服。“战争旷日持久，查理十二对俄国的入侵达到高潮，其规模之大、雄心之胜，足以与拿破仑战争和希特勒的‘闪电战’媲美。”^②然而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决战中，俄国获胜，瑞典战败求和。俄国在波罗的海站稳了脚跟，打开了通往欧洲的窗口，取代瑞典成为北欧支配性大国。大战使沙皇俄国成为欧洲政治中的新因素，但是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134.

② Simon Sebag Montefiore, *Titans of History: the Giants Who Made Our Worl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2, p.269.

它仍然被视为一种外部威胁。在西方国家眼里，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不是欧洲大陆政治的主流。^①彼得大帝也没有将欧洲国际体系当成其对外政策的中心。然而，18世纪末期，俄国已经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主角之一。

1812年，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已臣服于法国，俄国却挫败了后者的称霸野心，扶欧洲国际体系于将倾，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者。战争造就了重大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力量格局的变迁，使列强权势向欧洲两翼聚集：一是成就了英国的全球霸权，二是使得俄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势远超欧陆其他国家。^②1815年后的一个世纪，欧洲大国第一次尝试在和平时期通过会议制度建立国际秩序，这也是大国第一次明确尝试行使控制权。^③维也纳会议建立了欧洲大国协调制度，确立了六大原则：任何大国的决定或行为如果影响了其他大国的荣誉、地位、利益或权利，采取行动前，必须和其他大国协商；任何大国没有集体同意或首肯，不能侵犯其他大国利益；一国或多国具有否决权；不能将任一大国排斥在协商之外；与任何大国敌对的小国不能被邀请参加会议协商；只有大国能决定当时的重大外交问题，小国在协商会议上虽无否决权，但是它们的权利有权得到保护，它们的利益在关键时必须被考虑。^④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仅在奠定战后秩序的复杂均势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而且他和他的后继者还在随后几十年里，把维护这一国际秩序当作首要任务。^⑤欧洲协调时期俄国与欧洲国际社会的关系非常紧密，是欧洲国际社会的主要塑造者和维护者。然而这种身份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一去不返了。

① [美]罗伯特·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6-157页。

② 时殷弘：“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和国际政治的变更”，《欧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11-12页。

③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7, p.221.

④ K.J.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ance: Polyarchy in Nineteen-Century Europe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1.

⑤ [美]罗伯特·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第161页。

（二）苏联（俄罗斯）是西方国际体系一员，但不属于西方国际社会

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作了明确区分：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际社会就出现了。国际社会以国际体系的存在为前提，但国际体系不以国际社会存在为基础。处于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可能通过相互交往与互动关系影响对方的思想和行为，但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或价值观念，也不认为自己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或者为构建共同制度进行合作。^①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与西方互相敌对，西方国家对苏维埃俄国进行了残酷的联合军事干涉。苏联和西方多年处于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和军事对抗状态。1918年的苏俄宪法载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和争取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的胜利。”直到1977年苏联最后一部宪法才取消了世界革命的主题。^②以此观之，沙皇俄国与西方同属一个国际社会，苏联和俄罗斯是西方国际体系的一员，但不属于西方国际社会。因为双方大多数时间缺乏同属一个国际社会的共同体意识和共同利益观念。虽然在二战期间有短暂合作，但战后苏联又成为西方遏制的对象。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当代俄罗斯。

一个国际社会的形成及其对成员身份的确认是非常严苛的。只有一个区域国际社会的成员均认为域外国家“符合所规定的文明标准之后……通过这种‘考试’的国家”^③，才能被接纳为该国际社会的一员。土耳其很早就是欧洲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但是直到1856年才被欧洲接纳为欧洲国际社会的一员。当一国身份在它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被确定后，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苏联多年来一直是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挑战者。虽然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共同欧洲家园”的概念，希望重回“欧洲大家庭”，但未得到后者的积极回应。为了重新回归西方，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瘸腿走路，伸手

①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Third edition)*, London: Palgrave, 2002, pp.9-10.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410页。

③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p.32.

乞讨”，“为了让西方国家将俄罗斯视作强国，我们的总统做了一切让步，以便让俄罗斯能‘以平等的身份被承认’和吸收进‘强国’俱乐部”。^①但是它始终没有成为西方国际体系的核心一员。尽管俄罗斯同西方关系曾经有一年多的（1992-1993/1994年）的蜜月期，但是双方很快便分道扬镳。西方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的身份，不会随着苏联解体而烟消云散，西方习惯用打量苏联的眼光审视俄罗斯，防止它重圆帝国梦。不友好的国际体系使俄罗斯不得不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制约了经济发展。

（三）沙皇俄国和二战前的苏联面对的是多极体系，冷战后的单极体系凸显了衰落的俄罗斯的势单力孤

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面对的是多极国际体系；十月革命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苏联所处的也是多极体系。多极体系扩大了沙皇俄国和苏联外交的选择空间。多极体系下各方努力保持体系均势，均反对任何可能成为霸权的行为体或者联盟。为了保持均势，即使发生了大国战争，也不会以消灭一个行为体为目的，以免影响体系的稳定。多极体系的性质，使大国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通过谈判消除分歧。这样，对于沙皇俄国和苏联这样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后进国家而言，由于自己实力弱于西方核心国家，自然不能成为潜在的霸权国和体系的挑战者，而成为体系中其他大国拉拢遏制霸权国家的对象。虽然落后，社会制度也与其他国家不同，沙俄和苏联依然有机会摆脱孤立，冲破封锁，甚至成为新秩序的主要缔造者。拿破仑战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俄打破西方外交孤立、二战中英美与苏联结盟就体现了这种逻辑。

然而“二战”后全球权力分配变化之大远超以往，两极体系代替了多极体系，美国开始追求世界霸权。杜鲁门政府在1945年至1953年间将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颠倒了过来——单方面主义让位于多边主义。美国全球化时代起航^②。虽然只有美国和实力仅次于美国的苏联能够在国境之外发挥重要影

①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41页。

② George C. Herring,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595-596.

响，但苏联面对的不仅是实力处于绝对优势的美国，而且还有它领导的西方国际体系。苏联遭遇的国际体系压力是多极体系下的沙俄不曾承受的。如果说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苏联还可以和美国一较高下，但在经济领域，苏联则处于绝对劣势。美国战略家认为，除了私人投资者的利润动机之外，对美国外交而言，攫取世界权力和经济优势压倒一切。美国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将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集团孤立，建立关贸总协定，扩大西方国家之间贸易，加强与盟友的经济联系，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扩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影响^①。随着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国家纷纷加入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真正的全球性体系^②，这一制度赋予美国空前的结构性权力。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同样的不友善的西方国际体系，它比苏联更加势单力孤，因为此时的国际体系是单极体系。单极体系下，首要大国建立和实施规则并掌控军事和经济手段，解决二流大国之间的争端。特别重要的是，首要国家抵制二流国家获得独立或者更大自治的企图，可能逐步削弱或者消除二流大国的自治权。^③单极国际体系严重限制了俄罗斯的外交空间和回旋余地。苏联时代，虽然处于劣势，但是凭借自身实力，是“两极”之一，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即使在中苏同盟破裂、中美关系缓和的情况下，苏联凭借自身实力仍能保持两极体系“天平”的大体平衡。所以，苏联对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和影响力远非当下的俄罗斯可比。而且，当美国相较于俄罗斯和其他大国处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时，俄罗斯难以找到可以联手制衡美国的力量，这在苏联解体后的前二十年表现得尤为明显。普京认为，“苏联解体后 20 年间所形成的体制（包括单极格局）的终结，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原来唯一的‘力量极’已无力维护全球稳定，新的影响力中心则羽翼未丰”。^④事实确实如此，虽然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

① 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New York: Pluto Press, 2003.

②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p.358.

③ John T. Rour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e*, New York: McGraw-Hill, 2012, p.94.

④ 《普京文集（2012-2014）》，第 8 页。

落是大势所趋，但是单极体系的性质仍未改变。单极体系加重了俄罗斯面对的压力，这从特朗普上台后西方对俄罗斯的联合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便可见一斑。为了反对西方的挑战和安全威胁，在其他物质手段相对缺乏的情况下，俄罗斯只能频频动用其仅存的军事优势进行反击。这种情势更授予西方将俄罗斯定义为“帝国”的口实。

总结国际体系与俄国的互动关系会发现以下事实：首先，俄国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但从未成为首要大国，而且是首要大国长期压制的对象。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沙俄是英国压制的主要对象之一；20世纪，苏联则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其次，俄国不是综合实力型国家，国家权力要素发展很不平衡。俄国大国地位的基础是军事而非强大的生产力，其国际地位经常大起大落。最后，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对苏联的压力远大于沙俄时代俄国面对的体系压力；而在单极世界里，俄罗斯面对的西方压力又远甚于苏联时期。这种体系与俄罗斯关系的性质，强化了后者的帝国继承国身份。

五、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的未来

国家身份是国家自身属性和外部世界共同塑造的结果，既有建立在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物质性内容，又有观念认知建构的成分，一旦建立，则具有较长的稳定性。而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内在地决定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呈现出一种历史惯性的力量。作为帝国的继承国，这种惯性表现在俄罗斯还会沿着自己独特的对外模式实现本国国家利益。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有不少例子说明，在根本性的革命、深刻的社会内部政治转型条件下，对外政策和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基本目标和国家利益的继承性。典型的例子是，尽管与俄罗斯帝国的外交传统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但是苏联的科学依然没放弃继承性。虽然当前俄罗斯外交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直接继承，也不是对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的机械恢复，但是三个时期的继承性明显^①。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防范这个帝国继承国重新崛起问题上也会表现出很

^① [俄]伊·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陈凤翔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2-13页。

强的政策连贯性。“国际政治的某些结构性因素，预先限定了事态的发展方向”^①。对俄罗斯外交的未来应该在这种逻辑中去寻找。

（一）俄罗斯会运用可资利用的帝国“遗产”，维护其对帝国“遗产”的继承权

帝国留给俄罗斯的遗产很多是独一无二的：除了世界第一的领土和极其丰富的资源、世界第二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其他大国也许再也没有机会赶上的核力量这些物质性实力资源外，帝国三百年来留给俄罗斯民族的自信和追赶一流的国民士气和国际抱负，则是其他大国更难企及的。所以俄罗斯有继续发挥重要国际影响的物质基础与精神财富。苏联解体前后对西方的一步步妥协、2005年俄罗斯改变对西方政策前对西方的幻想，随着西方一步步紧逼，让俄罗斯明白，必须利用自己的优势，为本国安全和发展争取空间。摩根索曾确定外交的四项任务：（1）外交必须根据实际和潜在的可用于追求目标的实力确定自己的目标；（2）外交必须评估他国目标以及实际和潜在的可用于追求这些目标的实力；（3）外交必须确定这些各不相同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彼此相容的；（4）外交必须采取适于目标的手段^②。对俄罗斯而言，作为帝国继承国，其外交目标定位必然远超一般大国。而其实行目标的手段，则是帝国遗留的军事遗产和丰富的能源。

1. 以军事手段回应西方威胁，保证在后苏联空间的领导地位，维护在其他传统影响地区的影响力

大国走下坡路的本能反应是将潜在资源从“投资”转向“安全”^③。军事是俄罗斯帝国、苏联和俄罗斯对外行为的首要工具。为了保持军事实力，俄罗斯军费开支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即使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制裁之下，依然保持高军费水平（参见表2）。就后苏联空间而言，一方面俄罗斯会继续通过提供市场、经济援助、能源优惠等方式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合作；另

① [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② Hans J. Morgenthau and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pp.563-564.

③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London: London: Unwin Hyman Limited, 1988, p.xxiii.

一方面也会继续军事威慑，保持对亲西方独联体国家可能加入欧盟和北约的牵制。面对北约的威胁，俄罗斯会加强军备，提高新型武器研发投入，加强军事演习，提高军事能力。2018年9月，俄罗斯举行了自1981年以来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应对北约在俄罗斯周边的军事演习。对传统的盟友，俄罗斯会继续支持，维护国际影响。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也说明，俄军依然是能够遂行俄国家战略意志的支柱。俄罗斯支持伊朗的强硬态度，也说明其依然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表2 大国经济与军费开支（单位：%）

2016年各国军费占GDP比重									
2016	俄罗斯	中国	印度	巴西	美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德国
	5.4	1.9	2.47	1.32	3.29	2.2	2.26	0.93	1.2
2014-2016年大国GDP增速（%）									
2016	-0.6	6.7	6.8	-3.6	1.6	1.8	1.2	1	1.8
2015	-2.8	6.9	7.9	-3.8	2.6	2.2	1.3	1.2	1.5
2014	0.7	7.3	7.2	0.5	2.4	3.1	0.6	0.3	1.6

数据来源：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br.html>

根据国家硬性能力——军事和经济水平，影响范围和他国认可，国家可分超级大国、大国、地区大国或者中等强国。超级大国具有压倒性机动军事能力和必要时使用武力的意愿，并能同时将权力投送到全球范围。大国虽有超越其临近地区发挥影响的实力和兴趣，却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具有压倒性优势，也没有能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承受军事冲突的代价，但它们具有在全球范围内行使影响力的能力和愿望。地区大国传统上被视为中等国家，处于大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位置^①。参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战争中，还是处理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果断、坚决、有力，掌控局势能力之强，均超过国际社会原先的想象。帝国留下的物质性实力资源、精英与民众的大国意志和勇气，依然是俄罗斯未来外交中难得的财富。

^① Vidya Nadkarni, Norrma C. Noonan eds, *Emerging Power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e of the BRIC Countries*, Bloomsbury, 2013, pp.6-7.

2. 利用能源工具，分化西方国家，打造欧洲国家身份

虽然在西欧人眼里，俄罗斯仍然没有达到西方民主基本标准：经济上更多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而非公平的市场原则和法律思想，治理是由依附主义和个人关系而不是信仰理性的官僚主义，^①然而，双方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依然是俄欧关系可能改善的主要动力（参见表 3），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欧洲不可或缺的。即使在经济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下，欧盟依然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使双方经济损失严重。联合国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伊德里斯·贾扎里，2017 年 4 月底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6 次会议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称，欧盟因对俄制裁每个月损失 32 亿美元，俄经济 3 年来则因制裁损失 550 亿美元。报告指出：“制裁会使欧盟与俄罗斯遭受总额高达 155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却无任何明显的正面影响。”“3 年的经济制裁可能是导致 2014-2016 年俄罗斯联邦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下降 1% 的原因。”全球石油价格的同期下滑，也使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制裁还导致俄罗斯贫困人口的增加，由 2013 年的 1550 万人上升到 2016 年的 1980 万人。但贾扎里表示，俄罗斯对此已经完全适应。^②

随着制裁的“双刃剑”效应的持续，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意识到良好的欧俄关系符合欧洲和德国的利益。虽然没有参加 2015 年 9 月 9 日的红场阅兵仪式，但是 10 日默克尔访俄，以示“补救”，表明德国不希望因为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关系持续走低。2018 年 4 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与法国、荷兰、奥地利、德国多家能源公司签订协议，共同推进“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和压力，在对俄制裁的情况下坚持与俄罗斯签署协议的事实表明，俄罗斯的能源战略依然有效，今后依然是俄罗斯外交的有力工具。同时，俄罗斯也努力打造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认同。普京明确表示，就根本性、文化来讲，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发展同欧盟的多层次关系是俄罗斯的根本选择。俄罗斯打算在条

① Anton Steen, *Political Elites and New Russia: the Power Basis of Yeltsin and Putin's Regimes*,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167.

② “联合国报告称欧盟对俄制裁导致双方损失上千亿美元”，中国网，2017 年 9 月 14 日，<https://item.btime.com/37gdqc8gudk8h38f9ln5n0j4mhq>

约基础上和战略伙伴原则上建立同欧盟的关系。^①今后俄罗斯会对美欧区别对待，继续利用能源工具分化西方。

表3 2016年俄罗斯主要商品贸易伙伴（单位：%）

	出口		进口	
1	欧盟（28 成员国）	45.8	欧盟（28 成员国）	38.2
2	中国	9.8	中国	20.9
3	白俄罗斯	4.9	美国	6.1
4	土耳其	4.8	白俄罗斯	5.2
5	朝鲜	3.5	日本	3.7
6	其他	31.2	其他	26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数据整理 <https://www.wto.org/>

（二）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战略会更加平衡，更加重视新兴市场国家在其外交中的地位

21 世纪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拓展了俄罗斯外交的回旋余地和借重空间。独立三十年来，俄罗斯认识到西方并不能真心接纳俄罗斯，不能承认俄罗斯的平等地位。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东方经济论坛，是俄罗斯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合作的主要机制和平台。从战略角度考虑，俄罗斯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是应对西方压力的需要。从民族心理角度考虑，中国与俄罗斯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希望建立平等相待的新型大国关系。俄罗斯可以从中国这里获得西方不能和不愿给予的大国尊严和威望。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对中俄关系定位偏低。当时俄对发展同中国的伙伴关系也有日益增长的热情，但那只是为了平衡西方霸权和单边主义。^②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并且保持着自身特性，发展对华关系无论是从扩大俄外交回旋余地还是提高俄国际地位、发展本国经济都有重要意义。2013 年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为夯实中俄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俄抓住这一契机，将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

① 《普京文集（2002-2008）》，第 422-423 页。

② Jeffrey Mankof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p.26-27.

新的利益增长点和动力。^①另外，中俄经济互补性强，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参见表4）。

未来，中国在俄罗斯外交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中俄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美国联合俄罗斯遏制中国的企图不能实现，不能将目前的中美俄关系与冷战期间的中美苏关系类比。一则，冷战期间中国与美苏实力不在一个层级，中国国家安全是国家第一需要，因此，只要能实现国家安全，中国会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去应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安全威胁。当前俄罗斯与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远没有当年中美苏三国悬殊，作为帝国继承国，俄罗斯国家安全可以自己得到保证。而“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下，俄罗斯与美国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中国也是）——美国阻挡俄罗斯崛起，这是零和博弈；另外，由于俄罗斯的出口商品是以能源为主，而美国页岩气开发后对外能源依赖减小，美国不会成为俄罗斯主要贸易伙伴。因此美国既不会给予俄罗斯期望的大国尊严，也不能给予俄罗斯出口商品广阔市场。而这两个方面，俄罗斯会从中国逐渐得到或者部分实现。

表4 2015年大国出口商品构成（单位：%）

	农产品	制成品	燃料和矿业产品	其他
俄罗斯	8	22.3	67.4	2.3
中国	3.2	94.3	2.4	0.1
印度	13.2	68.4	15.7	2.7
巴西	41.9	36.1	19.1	3
美国	10.7	74.8	9.5	5.1
英国	7	72.3	10.5	10.2
法国	13.6	73.9	5.3	1.8
日本	1.6	87.2	4.3	6.9
德国	6.5	86.5	4.9	2.1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官方网站数据整理 <https://www.wto.org/>

^① 关于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中俄罗斯外交的意义，可参见雷建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下的中俄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第146-153页。

（三）俄罗斯与美国斗争力保斗而不破，争取实现在对自身有利情况下的妥协

俄罗斯的转型还远未完成。发展国内的民主政治是俄罗斯经济稳步发展的政治基础，也是获得西方国家认同的关键点之一；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俄市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也是提高俄国际竞争力、改善国际形象的重要方面。早在 2001 年，普京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外部安全环境”。^①普京也强调，“只有将经济和民主制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②俄罗斯意识到其发展离不开西方的市场、资金和技术，这就决定了俄罗斯不可能一直执行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对抗的政策，其执行的是以斗争求合作的战略，而非主动挑战西方。事实上，自独立以来，面对西方挑衅，俄罗斯一直处于守势。格鲁吉亚战争、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的作为，也一直是一种进攻中的防守。

冷战后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四次重启的事实表明，俄罗斯希望在得到美国尊重的条件下发展俄美关系。奥巴马后期美俄关系冷淡，普京期待美国新总统上台以后俄美关系有所改善，特朗普也希望缓和美俄关系，然而美国的反俄势力使特朗普总统采取了比奥巴马政府更加强硬的对俄立场，迫使俄罗斯强力反击。但是俄罗斯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与美国全面对抗，它始终表明其对美外交的大门是敞开的。俄罗斯对美外交的战略是主动出击式的防御，谋求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与美国妥协。

六、结语

国家身份决定了国家对其利益的认知，而对于利益的认知塑造国家的对外行为。因为国家身份是国家自身属性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旦形成，则会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惯性力量，使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沿着这种惯性力量作用的方向前进。“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帝

① 《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50 页。

② 同上，第 6 页。

国特性’。它贯穿于 18-19 世纪的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也以独特的方式折射出它的印记。”^①俄罗斯作为帝国的继承国，这种身份是由其继承的苏联遗产——物质和观念遗产，以及国际社会观念结构和体系结构所决定的，要改变这种身份尚需时日。从自身角度看，历史上的帝国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准确找到自己的位置。法国在“一战”后衰落，直到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才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定位。英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辉煌不再，但仍希望保持世界大国的地位，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重回欧洲，确定了自身的国家身份。俄罗斯民族还需要时间来确定自己国家身份。

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目前仍处于协调之中。西方希望俄罗斯处于从属地位的期望必将受到俄罗斯的强力抵制。孤立和遏制俄罗斯，不能压倒这个具有几百年帝国历史的国家。由于自身实力所限，俄罗斯对西方外交呈现出一种进攻性的防守姿态，但绝非势不两立。进入 21 世纪，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俄罗斯的外交提供了回旋空间和借重力量。俄罗斯外交更会在东西方之间寻找平衡。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言，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和权力结构都有利于中俄关系的发展。只要真正做到平等互利，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是可以期待的。

【Abstract】 Just as the Soviet Union was the inheritor of Tsarist Russia, contemporary Russia has its roots in the “Soviet empire”. Russia’s particular identity as an “empire inheritor” impacts its diplomacy in two ways: on the one hand, the Soviet legacy both empowers and burden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us often leaving Moscow in dilemmas; on the other hand, Russia’s influence and ambition invite cautious watch of Western observers, as they view Russia through the same lens they used to view the Soviet Union. To analyze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t no doubt requires identifying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 as a uni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also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aking is as predominantly determined by the

① [俄]伊·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陈凤翔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年，第 26 页。

nature and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at different time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Russia's self-identity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outside world regarding Russia's international identity. The conceptional structure as well as material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reate a sort of historical inertia, which places limits on Russia's policy options. It is expected that Russia would adopt a strategy of proactive defense in the near future and seek accommodation if offered favorable terms. A more balanced "double-headed eagle" strategy would emerge. It is also argued that in light of the conceptional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mutual cognition of China and Russia,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ould be lasting and stable.

【Key Words】 Russian Diplomacy,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Russian Diplomatic History

【Аннотац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является наследником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а Россия произошла от "Совет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Особо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России как преемник «империи» влияет на её дипломатию в двух аспектах: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совет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усиливает и обременяет российскую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что часто ставит Москву в тупик;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богатое наслед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лияет на то, что Запад не может игнорировать влияние и амбиции России и продолжает смотреть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через тот же объектив, который использовал для просмотр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ля анализ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собствен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России как «единиц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а также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изменения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вызван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природе и системном характер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разные эпохи. Кроме тог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нимать во внимание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ю России и восприятие внешнего мир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и

матер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отражают силу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инерции, которая сильно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 российск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В будущем Россия примет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ую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ую стратегию против Запада и будет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компромиссу при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Появится более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двуглавый ор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труктура вла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и взаимное познан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определяют перспективность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

赵鸣文**

【内容提要】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苏联解体陡然衰弱,再到普京时代逐渐恢复、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19世纪,俄国作为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走上欧洲政治舞台。二战期间,苏联以世界性大国身份参战,并在冷战期间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苏联解体意味着俄罗斯不再是世界级强国,原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不仅黯然失色,其在诸多关键领域也丧失了与西方的竞争力。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迄今,俄罗斯在许多方面仍无法与美国等一流发达国家比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连续多年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速支撑下,俄罗斯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大大增强,重新成为维系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关键因素和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力量。

【关键词】俄罗斯综合国力 俄罗斯国际地位与影响 俄罗斯国际战略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3-0037-(26)

综合国力系指一个国家拥有的所有资源相互作用形成的对内和对外整体实力的总和,也是国家制定和确立内外中远期战略目标的重要参数和基础,它既包括政治、军事、科技、人力、资源禀赋和治国能力等硬实力,也包括民族凝聚力、对外运筹、世界影响和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综合国力各要素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强大的外交和军力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

*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双重大课题项目——“新世纪国际格局与中国外交战略”(项目批准号:2015MZD065)的阶段性成果。

** 赵鸣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作支撑，也需要不断更新的现代化创新技术来维系，而技术力和创新力的提高则离不开受到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包括政府的高效管理、法律和制度保障等先决条件。经济力的提升更是需要强大外交力来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足够军力保障以及科技创新力的不断推动。

俄罗斯是近 500 年来出现的公认的 9 个世界大国之一。充满荣耀的历史造就了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优越感和尊重强者、敬佩英雄的彪悍性格。^①还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领导人就声称，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然是大国，但这一说法直到现在才成为公认的事实。相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称俄罗斯只是地区大国，而今，这一“谨慎的”观点“甚至在美国国内都遭到嘲笑”。^②

一、综合国力的快速恢复

苏联解体后头 10 年，俄罗斯综合国力急剧衰退，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趋下滑。普京出任总统后，一直将捍卫俄罗斯领土完整和恢复世界强国应有的地位作为其历史使命。2000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连续数年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恢复。2006 年，俄罗斯综合国力跃居美国和英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三位。^③2014 年，俄罗斯综合国力甚至上升至世界第二位，^④重新成为一支维系国际战略稳定的重要政治力量。

（一）经济提前好转

新世纪以来，得益于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企，俄罗斯经济连续保持近 9 年的 7% 左右年均增长，走出了财力长期受制于西方、没有世界银行

① 胡晓光：“‘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俄全国共识’在俄罗斯感受中国影响力”，《参考消息》，2018 年 1 月 8 日，第 11 版。

②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аким был 2017 год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27.12.2017.

③ 《社科院黄皮书：中国综合国力排名第 6 日本第 7》，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1/05/content_4012616.htm

④ 《2014 世界各国综合国力排名前 10》，百度文库网，2014 年 6 月 8 日，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8kk-TMIyUhbjo-BV9vgX0XqRjpl3FP5VfCIT-vG9uVDI58V360emm8Z6230nNljDTpt2Zqpyz3Ykk8119fhdcckBlqbwUyGwB8o_SnYMO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其预算就青黄不接的窘境。2006年，俄罗斯的GDP达到9119.55亿美元，经济总量首超1990年苏联解体前水平，从根本上克服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灾难性下滑所造成的后果。2007年，俄罗斯的GDP首破万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1.30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十一位。俄罗斯不仅还清了苏联所欠的1600多亿美元外债，还使黄金外汇储备增加至411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2008年，俄罗斯的GDP增加至1.76万亿美元，首次跻身世界前八强，人均GDP首破万亿美元，达到1.16万美元，外汇储备实现创纪录的5000亿美元，所持美国国债1160亿美元，成为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五大国之一。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俄罗斯的GDP回落至1.23万亿美元，退居世界第十二位，人均GDP降至8693.80美元，排名世界第58位。然而，2010年，俄罗斯经济率先复苏，其GDP迅速增加至1.52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1.06万美元。2011年和2012年，俄罗斯的GDP分别达到1.86万亿美元和2.01万亿美元，重回世界第八大经济体，人均GDP上升至创纪录的1.3197万美元和1.389万美元，首次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提前实现1999年末普京出任代总统时提出的用15年时间，使俄罗斯达到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中等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目标，甚至已接近大多数发达国家。2013年，虽然俄罗斯的GDP同比仅有1.3%的增幅，但仍达到2.10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1.46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就其经济总量来说，俄罗斯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①即便是在欧美制裁导致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其2016年的平均家庭收入依然达到10344美元，比2000年的2935美元多出3倍还多。当年俄罗斯的粮食产量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印度，位居世界第四位。2018年，尽管面临欧美旷日持久的持续打压，俄罗斯多项经济指标还是创下新的历史纪录：全年预算盈余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为近7年来首次；央行黄金增持量达到92.2吨，黄金储备突破2000吨，在全球储备总量中占比达到18%，跻身全球黄金采量首位；外债总额仅为5250亿美元，远远低于美国（超过21万亿美元）、英国（7.5万亿美元）、法国（5万亿美元）和德国（4.8万亿

^① Россия вошла в пятерку в мировых лидеров по ВВП// Республика Армения. 19 июля 2013г.

美元)等欧洲主要大国的外债水平。俄还前所未有地生产了 5.56 亿吨石油和 7250 亿立方米天然气,对欧洲出口的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 2017 亿立方米,超过欧洲需求的一半以上;小麦出口仅次于美国(3680 万吨)位居世界第二位,达到创纪录的 3660 万吨,同比增长 30%。俄罗斯在彭博社的发展中经济体排行榜中排位从第 7 名跃升至第二名。据世界银行计算,俄罗斯的 GDP 规模已超韩国,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俄罗斯力争到 2024 年真正跻身世界五大经济体行列。^①

(二) 科技重现优势

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连续出台《2002-2005 年俄罗斯联邦国际科技合作国家政策构想》、《俄罗斯联邦至 2010 年及更长期科技发展政策原则》、《俄罗斯联邦 2020 前后科学技术发展政策原则》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创新活动和国家创新政策法》等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在此背景下,2003 年,俄罗斯各类科研机构恢复到 3797 个,各类科研人员 85.85 万,科研队伍规模和实力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2008 年以来,在全球 102 项前沿尖端科技领域,俄罗斯有 77.45% 的研究成果位于世界前列,其中 52 项处于全球主导地位,27 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在标志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实力的 100 项突破性技术中,俄罗斯有 17-20 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在 50 项对世界发展前途或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方面,俄罗斯有近 20 项处于全球领先地位。^②俄罗斯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地区丹尼索瓦洞穴对古人类指骨化石的发现,被美国《科学》杂志称为可与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相提并论。^③俄罗斯的物理学家在兆赫波段高温超导、超敏航天传感器和安全系统等领域堪称世界翘楚。在返回式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方面,俄罗斯与美国保持同步甚至超出美国的水平,能够制造出顶级的火箭发动机和高

① Наталья Дембинская. Десять рекорд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2018 году// РИА Новости. Москва. 27 декабря 2018 года.

② 郭力:“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技术要素流动客观性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 年第 11 期。

③ 10 громк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науч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Огонёк. 2019. №.3. С.29.

质量的科技产品。^①2010年俄罗斯启动的核动力推进装置研发项目，全球没有先例，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在载人太空飞行方面，自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具备把人送入太空并从轨道上接回地球的技术，而且，美国宇航员一直是乘坐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迄今，美国仍试图获取俄罗斯国际空间站的统一气密舱制造技术，并只从俄罗斯进口RD-180和RD-181火箭发动机，哪怕对俄罗斯制裁一再升级，美国也没有中断与俄罗斯的这一贸易。在2028年前，五角大楼都将不得不继续使用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来发射本国火箭。^②而且，俄罗斯还向法国供应运载火箭，用于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卫星。2017年5月，俄罗斯自主研发的新型MC-21中程客机首飞成功。俄罗斯希望借此振兴本国处境艰难的民航业，挑战主宰国际民航市场的空客和波音等大企业，同时，其还试图追赶美国，拟于2019年再次发射火星探测器，在月球计划中探测月球的两极，准备用自己的力量改造国际航空站，使其变为俄罗斯的轨道空间站。俄罗斯还打算在2021年发射“月球-25”号登陆器，2023年发射“月球-26”号轨道飞行器，2024年发射“月球-27”号登陆器，2032年后，陆续把四部总重达近5吨的自动化操作太空设备送往月球，2034年动工兴建月球基地。

（三）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随着经济的快速复苏，俄罗斯越来越受到国际投资市场的青睐。2006年，俄罗斯在世界投资吸引力排行榜的名次从2002年的第17位跃升至第6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投资地之列。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其他因素影响，2010年，俄罗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对183个国家经商便利度评估报告中的排名从上年的第116位下滑到第123位，但其商业环境总体仍呈改善趋势。2012年5月，普京签署的《关于国家长期经济政策》提出，俄罗斯力争在2015年和2018年将其在世行营商环境排行榜的名次从

① 1997年美国与俄罗斯签署采购价值约10亿美元的101台RD-180火箭发动机采购合同。随着新一轮的俄美关系恶化，美国国会先是禁止在2019年后继续使用俄罗斯产发动机，随后又取消禁令，因为美国在未来几年都无法造出类似的发动机。

② WSJ: США будут нуждаться в космиче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двигателях РФ до середины 2020-х годов - Некоторые источники указывают, что та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продлится до 2028 года// ТАСС. 5 Сен. 2017г.

2011 年的第 120 位分别提高到第 50 位和第 20 位。尽管这一目标没有如期实现，但是，2013 年，俄罗斯却在美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发布的对全球 143 个经济体的创新指数（GII）排名中上升了 13 位，位居第 49 位。2017 年，俄罗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由上一年的第 40 位升至第 35 位。2018 年，俄罗斯在该《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的年度排行榜中升至第 31 位。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 营商环境报告》中，俄罗斯的“营商便利度”又上升 4 位，全球排名第 31 位。

（四）军事大国地位得以巩固

新千年伊始，俄罗斯军力尚未恢复，很难从拥有 130 万人的武装力量中挑选出 5 万有战斗力的军人。^①为尽快提高军队应对未来战争的作战能力，2003 年 10 月，普京总统正式批准《俄罗斯军队现代化方针》。2009 年，“梅普政府”提出要尽快提升俄军适应现代化战争作战任务的能力，决定从 2011 年起，大幅提升陆海军现代化军备水平，到 2015 年，这两个兵种的新武器配备率要达到 30%，2020 年要达到 70%-80% 的标准。^②2017 年 7 月，普京总统签署的《2030 年前俄罗斯联邦海洋军事活动国家政策基本原则》强调，俄罗斯海军活动的优先方向是“努力确保俄罗斯海军战力的世界第二位置，不允许他国海军对俄罗斯海军拥有巨大优势”，而“现代化武器和军事装备的配备率”是鉴定落实这一原则的最重要指标。因为，“这关乎俄罗斯海军战力是否能始终保持世界第二位的的关键”。^③2017 年以来，俄罗斯武装力量“抖去”昔日陈旧装备上的“灰尘”，在编人数增加至 189.8 万人（其中 101.3 万名军人），现代化武器装备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各集群和部队中的现代化武器配备比例达到 61.5%，2019-2020 年，这一保有率还将

① Путин: 15 лет под грузом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7 мая 2000 года в Тронном зале Большого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дворца принес присягу новый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ТАСС. 7 мая 2015 года.

② 赵鸣文：《普京大外交：面向 21 世纪的俄罗斯对外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18 年 12 月第一版，第 508 页。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с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Кодекс. 20.07.2017.

提高到 67%-70%的水平。可以说，“当今世界（除俄军外）的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具备如此之高的（武器）现代化水平”。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军队能在现代化武器和作战技术装备配备率方面与俄罗斯相提并论。^①为此，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认为，俄军已在现代化武器的能力方面超过美国。^②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惊呼，俄罗斯海军已是全球最具威胁性的舰队之一。俄罗斯精英更是信心满满，称“全世界似乎都认可俄罗斯（具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实力和能力”。^③此外，俄罗斯还一直保持全球武器出口第二大国的地位，其武器销售占国际军火市场份额的 27% 左右。2017 年，俄罗斯向 52 个国家出口了总价 450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2018 年，俄罗斯在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公布的全球最强武装力量排行榜上继续保持第二位。在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的《2018 年全球存在指数》报告中，俄罗斯的强大军力将其“全球存在”排名提升到了第七位。可见，俄军已重新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并以此为依托，不断“巩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重要地位”。^④

二、发展水平尚不均衡

无论从广袤的国土面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方面，还是从军事实力和航空航天以及核工业基础来看，俄罗斯都足够强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各项指标既不均衡，也不稳定。俄罗斯精英也不否认，这些年，“站起来的”俄罗斯实力实际上在迅速下降，既包括军力，也包括政治外交力。^⑤

① Иван Петров. Войска на зависть - Шойгу назвал армию России сам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в мире// Столичный выпуск. №.290(7753). 24.12.2018.

② Mark Perry, “The U.S. Army’s War Over Russia”, *Politico Magazine*, May 12, 2016.

③ Daily Beast: Флот России вышел из спячки и бросил вызов ВМФ США// ИноТВ. 28 декабря 2015 года.

④ Dmitri Trenin, “The Revival of the Russian Military-How Moscow Reloaded”,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

⑤ “这些年站起来的俄罗斯实力实际上在迅速下降，这既包括军事实力，也包括外交影响。现在莫斯科只是在前苏联地区有这种影响，而且在这里的影响也决不会加强。”参见 Александр Храмчихин. Россия может получить «Большую двойку»//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01.2009.

（一）政治外交力有限

虽然俄罗斯具有世界性大国的某些特征，但是，苏联的解体不仅使其在单极世界的建立进程中失去两极格局下的地缘政治分量，也失去了将来成为独立的地缘政治主体的可能性。^①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是世界政治的“主轴”，但这一关系在 21 世纪虽然重要，却已不是全球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俄罗斯试图改变冷战结束给其带来不公平结果之际，世界已发生深刻变化，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已不再是最重要的国际议题。俄罗斯极力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和军事手段对全球和地区事务施加更多影响，可这一优势也十分有限，俄罗斯在安理会的作用只局限于对美国等西方议题的否决。由于无法在西方提出有说服力的倡议，俄罗斯不得不常常支持欧洲、中国和美国的议案，而自己的建议却常常被搁置在议题之外。^②对美国政客来说，俄罗斯精英亲美还是反美这对华盛顿来说已不重要，他们的立场仅影响美国使用什么方式达到目的而已。美国不与俄罗斯分享世界，不是因为美国憎恨俄罗斯，而是俄罗斯没有那种能力。由于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等方面的看法与西方格格不入，加入“八国集团”后，作为“板凳队员”的俄罗斯一直被排除在七国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和有关议题机制之外。从俄罗斯始终未能改变在 G8 富国集团俱乐部中的不平等身份，却欣然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身份加入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来看，其也谈不上是一个十足的“世界级强国”。

事实也是如此。这些年来，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倒来倒去，一会儿和美国交好，一会儿又开始批评它。一会儿宣布北约及其支持者是俄罗斯的敌人，一会儿又想要实施难以实现的地缘政治计划”。^③就连俄罗斯精英也不否认，俄罗斯是一个逐渐走下坡路的大国，与美国、欧盟和其他国际玩家对中亚事务的影响力相比要逊色得多。^④俄罗斯只在前苏联地区还有些传统影响，而且在那里的影响也很难加强。经济实力不济使俄罗斯无法在这些国家拥有最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Дугин. Конец мечты о многополюсном мире// Газета Известия. 11 октября 2002.

② Татьяна Становая. Россия развивает восточный вектор// Политком.RU. 22.06.2009.

③ Алексей Кива. Больше че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ошибк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2.2019.

④ Александр Воробьев. Не один путь: интересы КНР и РФ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Expert Online. 3 July, 2017.

大的影响力，包括那些欢迎俄罗斯施加影响的国家。“由于粗暴施压（天然气和剩余的军事力量——原注）成为当今俄罗斯与邻国对话的唯一风格，独联体国家都想离俄罗斯远一些”。^①尤其是“为了谋求重塑世界大国形象和国际舞台上确立世界大国的地位，俄罗斯正有意无意地模仿恰恰是使美国世界形象受损的那些外交战略模式：尝试以强硬手段巩固势力范围，运用经济杠杆和制裁手段对‘不结盟者’施压，惩罚‘叛徒’，忽视国际组织，更喜欢采取单边行动和达成双边协议。结果不得不承认，俄罗斯越是起劲儿尝试宣扬自己的大国主义，它在世界上的形象就越糟糕，其遇到的阻力就越强大”。正是俄罗斯的“老大哥综合症”令前苏国家对莫斯科敬而远之，可靠的伙伴一直在减少，势力范围日益缩小。^②在“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失败”、美欧制裁持续升级、欧亚经济联盟等独联体机制未能“充分补偿俄罗斯与欧美关系变糟的消极影响”的情况下，“俄罗斯事实上只剩一种国际定位，即被称为‘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和‘南方’一员”。^③基于客观实际，无论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都只能更多地关注本国事务，对外只是应对有损于本国重大利益的一些问题，不想也没有能力提出或解决更多的国际事务的议程。因此，俄罗斯学者早就提出应给俄罗斯一个现实而非浮夸的定位，即将其定位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中心和伟大的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并拥有实力的国家，而不要定位为超级大国。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也认为，由于军事实力下降、经济薄弱、科学发展停滞、工业基础遭到破坏和人口危机，俄罗斯不再追求超级大国名分是“理性务实”和对当前形势“清醒认识”的结果。^④2016年10月，俄罗斯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就其连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的秘密投票中仅获112票，败给了匈牙利（144票）和克罗地亚（114票），未能如愿连任。

① Александр Храмухин. Россия может получить «Большую двойку»//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01.2009.

② Доктрина «мирного подъема»-Китай отверг 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концепцию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ости, а Россия копирует ее//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29. 07.12.2006. С.8.

③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Сможет ли Россия стать равной странам Востока// Ведомости. 05.07.2015.

④ Fyodor Lukyanov, “Kremlin's Imperial Ambitions Ended in 2010”, *The Moscow Times*, Dec.23, 2010.

（二）治国力不足

俄罗斯是当今工业生产增长落后于GDP增速的唯一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年，俄罗斯的发展战略变来变去，“劳民伤财”，缺乏长期发展战略，“没有把国内发展放在首位”。前些年利用高油价积累的庞大外汇储备被用来偿还（甚至提前偿还）外债、解决长期拖欠的养老金、建立社保体系等民生方面和增加国防开支，却没有用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在能源价格和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约7%的时候，石油天然气领域的领导坚信这将是一个常态，而且认为油价还会进一步上涨。政府高层的想法则是：既然能源像高科技一样对世界经济如此重要，那么，俄罗斯就可以用一种商品来换另一种商品。这使得工业经济向原料经济转变的趋势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被强化了。^①俄罗斯管理层将希望“寄托在国际（油价）行情的顺风顺水上”的心理，无疑“是治国软弱无力的表现”。^②

由于对经济的政治干预过多，市场化管理不足，政府缺乏经济发展长远战略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导致俄罗斯的人力潜能利用率不到10%，工业生产利用率不足40%，落后先进国家5-10倍，尤其是在航天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九分之一。俄罗斯发展的最大瓶颈还在于“制度不完善”和司法不独立，而且又存在“监管过度”问题。鉴于遵守类似税务、消防等部门制定的大量规定成本太高，企业不得不违反某些规定。而这些缺陷极大地制约了所有行业特别是科技部门的发展。迄今，俄罗斯没有铺设哪怕1条现代化高速铁路。虽然俄罗斯是能源生产和能源出口大国，但天然气普及率仅为65.4%，每年新扩大的规模只有0.1%。照此速度，22世纪初俄罗斯才能实现完全天然气化。尽管俄罗斯石油公司不断兼并一切可能的石油资产，其市值却从2006年的747亿美元跌至2015年的340亿美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市值也从2008年的3690亿美元缩水至565亿美元。由于被寄予厚望的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濒临破产，国家不得不拿出逾万亿卢布来拯救。《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承认，俄罗斯存在着腐败温床、

① Алексей Кива. Больше че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ошибк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2.2019.

② 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 Державное бессилие: каковы итоги 16-летне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РБК. 12 янв 2016.

抵御风险能力差、国家经济调控效率不高等问题。^①2009年8月，在韩半岛先进化财团与《朝鲜日报》联合制作的对“G20”国家的综合国力排名榜中，俄罗斯的国情国政能力和对宏观变化的应对能力分别位列倒数第2和第3位。2015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行榜（140个经济体）中，俄罗斯的制度建设排名跌至第130位。这也导致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梅德韦杰夫“政府下课以谢天下”的议论甚嚣尘上。为此，正值中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约有40%的俄罗斯在华工作记者和企业家向联邦政府谏言，俄罗斯应该向中国学习，制定长期连续的国家发展战略。

（三）科技复兴尚需时日

俄罗斯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仅为美国或中国的二分之一。^②俄罗斯难以大幅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瓶颈在于金融资源不足、法律基础薄弱、企业创新积极性不高。2009年，在韩半岛先进化财团与《朝鲜日报》联合制作的对“G20”国家的综合国力排名榜中，俄罗斯的科技实力位居倒数第6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编写的《2013年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报告》中，俄罗斯的创新力由上一年度的第51位下滑至第62位。由于俄罗斯的微电子技术水平较低，其没有西方技术的支持几乎研发不出性能可靠的火箭。^③一个时期以来，像“质子”系列火箭这样历来很可靠的俄罗斯产的运载火箭不断发生事故，甚至一天里接连两次点火升空后爆炸。然而，即使这样，俄罗斯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不增反降，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8%。无论从比例还是绝对值来说，俄罗斯与西方发达国家都有相当大的差距。随着欧美制裁和油价持续低迷导致经济衰退，俄罗斯政府已将2015-2025年的国家航天预算缩减至2150亿美元，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16年一年的开支便高达1930亿美元。俄罗

①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0 года//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3.05.2009.

② Анастасия Башкатова, Китай вступает в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ую схватку с США-КНР даст России мастер-класс по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ю в сфере ноу-хау//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3.04.2018.

③ Андрей Борисов. Не догоняем - Насколько Россия отстала от США// lenta.ru. 30 мая 2016.

斯的问题还不仅仅在对航空航天领域投入的资金不足上，而是出在整个行业的生产现状和决策者的专业水准及奉公守法程度上……^①而且，俄罗斯的航天生产精致化水平也远未达到西方航天企业装配工人穿着密闭服工作的严格程度，从事研究和制造航天设备的人员只是在上级官员来视察时“才象征性地披上白大褂，就算是‘保持清洁’了”。另外，美国航空航天集团可以为火箭选择最好的企业订货，但俄罗斯则没有选择，其宇航员搭乘的火箭还是科罗廖夫能源火箭航天集团制造的，军方并不需要技术设备一丝不苟、无懈可击地工作：对他们而言，数量可以代替质量。^②为此，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曾坦言，基于经费短缺和在航天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俄罗斯即使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 50% 的生产率，也无论如何赶不上美国。俄罗斯专家也承认，俄罗斯的产业结构畸形，尖端武器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机械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却严重落后，加上对科技研发投入不足，缺乏创新产业，导致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十分漫长。当世界进入 21 世纪的高科技时代时，俄罗斯在科技创新领域已处于劣势，甚至落后于先进的发达经济体约 40-50 年。俄罗斯在电子学、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光学等领域也滞后许多，机械制造业衰落，机床制造和应用科学几乎完全被丢弃。^③“更要命的是，俄罗斯的原料经济让科学变得不被需要，在用原料资本购买西方技术和装备的同时，俄罗斯的科学家再次流向发达国家”。^④自 90 年代初以来，约有 15 万名科学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离开俄罗斯，其中高级数学家和高级物理学家分别约占 70%-80% 和 50%。^⑤仅 2016 年，就有 4.4 万名科学家离开俄罗斯，是三年前的两倍多。^⑥

虽然在过去的 10 年里，俄罗斯创建了一些经济特区和“创业孵化器”

① Звездная болезнь - Почему Илон Маск побеждает «Роскосмос» с явным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м// Газета.Ru. 31.03.2017.

② Мария Пази, Саша Васильева.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проигрывает космическую гонку// Expert Online. 20.10.2018.

③ Марат Селезнев. Спасение утопающей - Упавш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попробуют приподнять антикризисным планом на 830 миллиардов// Lenta.ru. 10 февраля 2016.

④ Алексей Кива. Больше че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ошибк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2.2019.

⑤ Безмозглая Россия - Почему наши учёные уезжают на Запад// Версия. 16.05.2016.

⑥ Почему из России стало уезжать в два раза больше ученых - “Ощущение, что эмигрируют вообще все, кто умеет что-то делать”// URA.RU. 31 марта 2018.

等基础设施，然而，俄罗斯依然处于科技创新的最早期阶段。西方专家普遍认为，从科技实力来看，相对于科技强国的美国和科技大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俄罗斯只是中等科技大国。2016年，俄罗斯未能进入全球最具科技实力国家排行榜的前10名，仍位居科技实力5个级别中芬兰之后的第三级中等发达国家行列。2017年11月，俄罗斯在东方航天发射场实施自该发射场启用以来的第二次“联盟-2.1b”火箭发射，结果遭遇失败，未能将所搭载的1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而坠入大西洋。在美国不久前成功发射首枚可回收火箭的背景下，这次火箭发射失败无疑给俄罗斯的航天工业造成巨大打击。俄罗斯曾是太空开发的先行者，但如今却难以企及苏联时代的水平。由于管理不善和生产者的疏忽，导致当年为“质子-M”火箭生产的70台发动机全部报废。俄罗斯沃罗涅日机械制造厂生产的本批次所有发动机皆被召回。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之一便是：一切由国家 and 国有企业大包大揽，国家给钱，巨额资金却被某些人中饱私囊。剩下的有限资金利用效率也不高。^①迄今为止，俄罗斯在轨运行的150枚卫星中，只有一枚在轨射电天文科研卫星。事实是，俄罗斯联邦“政府越来越不重视航天科研项目，为满足军方需求，不断推迟和拖延推迟具有全局性质的国家科研项目，甚至包括载人航天项目。”自2011年起，俄罗斯接连发生7起联盟号运载火箭发射事故。2018年10月，“联盟-FG”型运载火箭发射失败，未能将搭载国际空间站考察组的“联盟MS-10”飞船送入轨道，火箭在天空仅停留两分半钟。人们开始对俄罗斯的太空事业忧心忡忡，担心俄罗斯领先的航天业是否会随着联盟号的坠毁而走向崩溃。^②2019年1月，俄罗斯唯一的太空望远镜“光谱-R”（“射电天文”项目的组成部分）再次出现故障，无法接受来自地面的指令。^③一年多来，卫星一直靠第二备份接收发射装置工作，而它也可能出

① Звездная болезнь - Почему Илон Маск побеждает «Роскосмос» с явным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м

② Мария Пази. Саша Васильева.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проигрывает космическую гонку.

③ “光谱-R”是一枚载有直径10米的射电望远镜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射电天文”项目的关键环节。该项目将部署在地面和太空的射电望远镜融合在一个巨型的虚拟圆形无线电天线上。得益于此，“射电天文”项目可实现高达7微角秒的角分辨率，从而能看清银河系的中心，甚至看到黑洞的“影子”。“光谱-R”太空望远镜由拉沃齐金科研生产联合体制造，2011年7月18日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2012年1月“光谱-R”与地面射电天文望远镜组成天线直径22万公里的虚拟射电望远镜。

问题。如果与卫星的通信不能恢复，“射电天文”项目将被迫终止。^①

（四）经济缺乏后劲

俄罗斯幅员辽阔、土地肥沃，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资源禀赋大国。然而，在产业现代化方面，俄罗斯却大大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是大国中为数不多的资源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经济总体处于国际产业链下游，科技密集型产品仅占国际市场的 0.3%，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世界的 0.2%。《俄罗斯联邦 2020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承认，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仍以原料出口为主要模式，主要经济领域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行情，竞争力下降。^②而且，俄罗斯也没有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动作迟缓，甚至坐等世界经济复苏。2011 年，普京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重新实现 GDP 6%-7% 的增长，力争 5 年内真正进入世界经济五强。但此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却连续下滑：2012 年增长 3.7%，2013 年增长 1.8%，2014 年增长 0.7%。在 2015 年经济萎缩 4% 的情况下，2016 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速跌至 0.3%，黄金外汇储备跌破 4000 亿美元，为七年来首次，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跌出世界前十强，仅为 1.28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 12 位。俄罗斯在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排行榜中的名次，从 2012 年的第 51 位陡然跌至第 71 位。排在其前的不仅有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还有像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波兰这样的前苏东国家，甚至包括经历了粮食危机的委内瑞拉。据此，俄罗斯联邦政府预测，俄罗斯经济将会持续萎靡 20 年，在最好的情况下，其 GDP 的年增幅也不会超过 2%。^③尽管 2017 年和 2018 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了 1.6% 和 2.3%，创 6 年来的最高纪录。但有国际金融机构预测，2019 年俄罗斯的 GDP 增幅将再次放缓，或降至 1.5%，甚至 1.3%。在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 2018 年可持续经济发展评

① Ученые потеряли связь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космическим телескопом "Спектр-Р"// РИА Новости. 12 января 2019 года.

②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0 года//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3.05.2009.

③ Анастасия Башкатова, Россия потеряла 20 позиций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рейтинге МВФ-За четыре года ВВП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 сократился почти вдвое//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9.11.2016.

估指数排行榜中，俄罗斯在 152 个国家中位居第 59 位，落后于哈萨克斯坦（57）和白俄罗斯（52）。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21%的人认为俄罗斯已属于最落后国家之列，越来越多的国民认为，俄罗斯在居民收入 and 经济发展指标方面已沦为三流国家。^①世界银行也认为，即使欧美制裁提前结束，俄罗斯的经济前景依旧黯淡。何况，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丝毫没有停止迹象。由于难以摆脱持续的不利外部环境，俄罗斯的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漫长且又艰难的过程。在学术界颇有声望的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更加悲观，认为即使在有利情况下，俄罗斯也不可能几代人的时间内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②而短期内不能改变资源型经济的发展模式特点，则决定了俄罗斯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深度十分有限。

（五）竞争力不强

长期以来，俄罗斯既没有多少全球品牌，也缺少像美国硅谷那样的让人相信可以做任何事情的“扶持环境”。虽然俄罗斯在航天航空领域占有相对优势，可是在支持卫星广播、出售卫星获取信息以及卫星平台和航天设备生产市场等方面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即使将出口的火箭发动机和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出售“联盟”号飞船席位的收入算在内，俄罗斯在全球航天市场的份额也不超过 1%。俄罗斯在火箭、飞船和发动机等方面“不再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除了某些甘愿冒着卫星不可靠风险、贪图便宜的第三世界国家外，实际上俄罗斯并没有航天设备的销售市场”。^③因此，俄罗斯在全球顶级商学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IMD）对有关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榜上，一直在第 43-54 位间徘徊。^④2002 年，在 IMD 对 49 个经济体

① Анатолий Комраков. Россия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оцениваю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траны - Хрущевский лозунг "Догоним и перегоним Америку" может трансформироваться в "Не отстанем от Белору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3.01.2019.

② Марат Селезнев, Спасение утопающей - Упавш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попробуют приподнять антикризисным планом на 830 миллиардов// ЛЕИТА.RU. 10 февраля 2016.

③ Андрей Борисов. Не догоняем - Насколько Россия отстала от США// Lenta.ru. 30 мая 2016.

④ 1998 年第 43 位，1999 年第 46 位，2000 年第 47 位，2001 年第 45 位，2002 年第 43 位，2003 年第 54 位，2004 年第 50 位，2005 年第 54 位，2006 年第 46 位，2007 年第 43 位。

的评比中，俄罗斯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位居第 43 位。2009 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 133 个国家营商情况评估后公布的《2009-2010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俄罗斯排名较前直跌 12 个名次，降至第 63 位。2013 年，俄罗斯在全球经济竞争力的排行榜中下滑至第 64 位，在金砖国家成员国中垫底。2014 年，俄罗斯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中首次升至第 38 位，可 2015 年，俄罗斯却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再次退回到第 45 位。2017 年 1 月，俄罗斯在彭博最具创新国家排名榜中直落 14 名，降至第 26 位。在世界经济论坛（WEF）编制的 2018 年版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尽管俄罗斯在 140 个经济体中的排名由此前的第 45 名上升至第 43 名，但仍没有进入前 40 名。由于一些工厂只有三分之一的生产设施在运转，而且，其中的一半还是老旧设备，迄今，俄罗斯工业产能的平均利用率只有 66%。^①2019 年，俄罗斯在彭博最具创新力国家排名中，又从 2018 年的第 25 位退到第 27 位。尽管俄罗斯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上升到了第 31 位，但仍未能实现俄罗斯在《关于国家长期经济政策》中提出的 2018 年要使其在世行营商环境排行榜的名次提高至第 20 位的目标。俄罗斯的“营商便利度”不及格鲁吉亚（第 6 位）、阿塞拜疆（25 位）和哈萨克斯坦（第 28 位）。为此，俄罗斯精英也认为，迄今，俄罗斯“还没有克服经济、社会崩溃和教育、卫生、科学水平降低造成的影响”，其使用的“几乎所有复杂机械、设备和技术等都是从西方国家购买的”。^②

（六）军力发展不平衡

虽然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可核武器只能确保其免受生死存亡的威胁，在现代战争的许多冲突中用不上。从理论上讲，俄罗斯拥有庞大的武器库，在某些武器装备上甚至领先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可真正能够投入实战使用的却不到 50%。即便是 2008 年 8 月的“俄格五日战争”，对俄罗斯来说，也算不上是一场完胜的战争。面对一个武器装备落后、没有战斗力的对手，

① Ольга Соловьева.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рост уходит в минус - Ожив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похоже,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11.2017.

② Алексей Кива. Больше че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ошибк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2.2019.

俄军没能轻而易举地取得预想的胜利。由于军事预算长期短缺，武器装备得不到及时保养，俄军有约三分之一的武器装备达不到战备要求，运输航空兵的120多架飞机中只有约56%可以使用，海军舰队仍是一支正在恢复的海上力量，其潜艇编队规模太小，只有前苏联潜艇编队的约五分之一。^①俄罗斯在一些海域方向上的力量只有瑞典和芬兰以及土耳其的二分之一、德国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在远东的水上舰只数量仅是日本的三分之一。^②基于经济发展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俄罗斯整体军事实力的可持续性发展受到极大制约。俄军不但没能完成在2012年恢复其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的长期“战斗巡逻”计划。而且，此前的“战斗巡逻”大多使用的也是攻击型核潜艇，很少是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巡逻的范围也“大多情况下没有远离俄罗斯沿海水域”。^③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影响了军队现代化改革进程，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因素。2016年，俄罗斯国防开支削减了5%，有关在喀山恢复图-160轰炸机的生产计划被搁置，研发携带洲际弹道导弹的机动列车作战系统受到影响，海军及空军的若干“烧钱”现代化项目也大多停工。在此情况下，俄罗斯海军作战潜艇和水面舰只从苏联时期的657艘减少到172艘，空军航空团由281个减到102个，飞机保有量仅有3600架左右（1998年，俄罗斯仅在欧洲部分就部署了6611架各类飞机和1338架攻击直升机），装甲运兵车、步兵战车、伞兵战车和侦察巡逻装甲车等也由此前的6.39万辆坦克和9.75万辆装甲战车减至1.8万辆（实际能使用的只有2867辆）。牵引火炮、自行火炮和齐射火箭炮由苏联时期的3.3万门、9000门、8000门分别减少到2155门、2646门和3500门。^④

俄军现有的加油机数量也不足，只有一个配有15架伊尔-78和伊尔-78M加油机的空中加油机团，极大地制约了空军的战略机动性，不能满足

① Dave Majumdar, “The Rise of Russia’s Milita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ne 19, 2018.

② 赵鸣文：《普京大外交：面向21世纪的俄罗斯对外战略》，第505页。

③ Surface Forces: “Russia Faces A Fleetless Future”, *Strategy World.com*, February 3, 2015.

④ Александр Шарковский. Втор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уже началась - Наша страна увеличивает армию и все же втягивается в гонку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7.06.2016.

未来战争的需要。^①前所未有的“东方-2018”大规模战略军演更是暴露出俄军机动性方面的不足。大部分参演部队是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到后外贝加尔边疆区的，甚至 6000 名空降兵也是搭乘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前往演习地区的。“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西伯利亚大铁路会遭到敌方先发制人的精确打击，所有部队将无法再使用这条铁路”。除了军事运输航空兵的力量薄弱外，军用直升机同样存在问题。俄军装备的世界最大的米-26 直升机只有 41 架，到 2020 年，米-8AMTSh 直升机才有可能达到 200 架。^②此外，俄罗斯战机频发事故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遏制。2006 年至 2007 年，苏-24 轰炸机接连发生 18 起恶性事故，致使 12 名飞行员丧生。由于米格-29 战机连续发生机毁人亡事件，其中 200 架已无法升空。^③2016 年以来，米格-31 战机、米格-29K 舰载机、图-154 飞机、卡-52 “短吻鳄”武装直升机、图-22M3 轰炸机、苏-34 战斗轰炸机等接连不断发生坠毁事件，战机恶性事故已成俄罗斯空军的突出问题。2016 年 10 月，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航母冒着滚滚浓烟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叙利亚的窘况令俄军颜面扫地。2018 年 10 月，俄罗斯西北部的世上最大浮式干船坞 PD-50 突发事故沉没，更是给俄罗斯军备现代化战略造成沉重打击。俄罗斯不仅无法如期维修和保养“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航母，而且，直到 2030 年前也“难有再建造现代化航母的经济实力”。未来的俄罗斯海军舰队将不得不“主要在近海活动”。^④也就是说，由于俄罗斯海军已停止使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舰艇，其造船业又没有能力建造足够的新舰艇，未来 10 年内，俄罗斯海军的远洋水面舰只所占比例也将显著下降。^⑤

① Илья Крамник. Недозаправка: дефицит танкеров подрывае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ВВС России-Оснащение Воздушно-космических сил самолетами - заправщиками отстает от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Известия. 26 декабря 2018 года.

② Владимир Мухин. Маневрам "Восток-2018" не хватило мобильности-Переброска войск с запада на восток прошла по устаревшим лекалам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3.09.2018.

③ 赵鸣文：《普京大外交：面向 21 世纪的俄罗斯对外战略》，第 504 页。

④ Никита Коваленко. Что Даст Росси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Калибра»// Взгляд. 8 января 2019 года.

⑤ Илья Крамник. Поближе к берегу: как изменится состав ВМФ России - Доля крупных кораблей в составе ВМФ России рискует сильно сократиться// Известия. 12 сентября 2018.

尽管普京说“先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进入战斗值班后，俄罗斯就能在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中与美国比肩甚至超越它，可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的分析家汤姆·罗根认为，“没错，这个系统超过了美军的任何高超音速系统。但就目标导引设施、物质技术和组织保障以及攻击能力来说，俄罗斯都大大逊色于美国。俄罗斯弹道导弹潜艇噪音太大，战略轰炸机太过老旧，俄军的职业性也很令人生疑”。^①在西方军事专家看来，即使俄罗斯拥有了“高超音速武器也不会使美国丧失在全球军事力量啄食顺序中的最高地位”。^②因为，即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力扩充军备、特朗普政府的2018-2019年度国防预算大幅增加至7160亿美元的情况下，俄罗斯2018年的国防开支还是缩减至460亿美元。^③不用说，俄罗斯先前计划为增加现代化武器投入7000亿美元的雄心无疑是天方夜谭。在美欧制裁的打击下，俄罗斯的国防生产将因国内缺乏高技术产业而受到束缚，有时甚至会出现令人难以想象的情况。例如，现代战斗机和“阿玛塔”坦克要大量使用液晶显示屏来向其机组成员或坦克组成员传递信息，可俄罗斯国内没有液晶显示技术产业。^④

（七）人力资源萎缩

苏联解体不仅使俄罗斯丧失了23.21%的国土，还使其锐减了超过一半的人口资源，加上出生率和男性死亡率居高不下，人口在逐年递减，已出现没有外来移民其经济就难以为继的严重状况。2008年6月，时任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坦言，俄罗斯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即是人口问题：未来3年，俄罗斯的劳动力人口将比2007年减少100万。《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也提出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因为，2010年的俄罗斯人口已由2002年普查时的1.452亿减少到1.429亿，8年间减少了230万人。

① Владимир Добрынин. Западные СМИ реагируют на «Авангард» со страхом и завистью// Взгляд. 27 декабря 2018 года.

② Yuri Raitasalo, “Hypersonic Weapons are No Game-Chang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5, 2019.

③ Сергей Фадеев. Большая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 2018 - "Пусть потом не пищат": главны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ТАСС. 20 Дек. 2018 г.

④ Kyle Mizokami, “Russia’s military: Don’t believe the hype”, *The Week*, January 4, 2016.

据联合国预测，2025年，俄罗斯人口甚至会减少至1.21亿-1.36亿，到2030年时或只有1.15亿。虽然2013年以来俄罗斯的人口连续两年出现自然增长，2014年较预测多出800万，接近1.44亿，2015年的人口增幅达到0.17%，但是，其人口下降的总体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遏制。2017年，俄罗斯的新生儿从上年的189万降至169万，出生率下滑幅度超过10%，跌至2008年以来最低值。与此同时，20岁至29岁的女性人数下降了34%，预计到2035年，俄罗斯全国的育龄女性人数会再降28%。为此，美国人口学专家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俄罗斯是当今和平时期正在衰亡的唯一大国，其所面临的不仅是广泛的人口危机，也是影响深远的人力资源危机。

三、维系和影响国际战略平衡的关键变量

尽管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指标既不均衡，也不稳定，但就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可独立采取重大外交和军事行动来讲，俄罗斯仍属于仅次于美国的可影响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的世界性大国。退一步说，“俄罗斯或许是一个长期衰退的大国，可它仍具有为西方制造大麻烦的能力”。^①

（一）具备独立应对内外挑战的客观条件

首先，俄罗斯政局空前稳定。一方面，总统制的联邦国家体制确保了普京总统能够实施垂直和高效领导。另一方面，虽然反对派对普京执政路线存有非议，可在野党既没有可与普京比肩的领军人物，也拿不出破解外交困局的更好方略，这使得普京的执政地位始终坚如磐石。即使是2014年以来欧美对俄制裁不断升级，俄罗斯陷入旷日持久的内外困境，普京的支持率也依然不降反升，对其内外路线认可的不仅来自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和广大民众，还有相当数量的在野党和超党派人士。国家杜马中的议员甚至无视党派属性而代表“普京派多数”，即如果杜马选举结果中“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者人数不足，需要在其他政党中寻找普京方针的支持者，那么，未来的

^① Steven Pifer, “Pay Attention, America: Russia Is Upgrading Its Military - The Kremlin’s forces are in the midst of a historic overhaul”,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3, 2016.

杜马将会全是无视党派属性的亲总统议员。普京的功劳与力量在于他没有沦为精英操纵的傀儡、充当精英的领袖，而是选择了一条最难走、但却是正确的道路，即直接诉诸普罗大众。俄罗斯公民社会发展基金民调显示，尽管普京向叙利亚派兵作战受到质疑，来自西方制裁的压力加大，国内社会和经济形势恶化以及发生了其他与总统有关联的一系列国际和国内不利政治事件，但普京的支持者人数仍旧稳定，82%的受访者认可普京的工作，84%的人可能在未来大选中投他的票。^①正如俄罗斯前副总理、现总统助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所言，俄罗斯国家现有的模式始于信任，亦靠信任加以维系。这也是其与传播不信任和批评的西方模式的根本区别所在。俄罗斯远比欧洲媒体所想的更加长治久安。“新世纪，我们的新国家将在新世纪谱写持久和光荣的历史。俄罗斯不会垮，它将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在地缘政治博弈的超级联赛中赢得并保持前三地位。所有要求俄罗斯‘改变行为’者迟早都会接受这样的现实”。^②俄罗斯专家也普遍认为，即使在普京离任后，俄罗斯同样能够高效运作。因为，普京的思想和经验“已嵌入国家最高权力的运作机制当中，现代化的俄罗斯国家管理模式已然出现”。倘若未来的最高统治者延续普京的路线，那么，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只会稳定，而且还能不断地自我发展与完善。^③

其次，俄罗斯具备应对来自外部施压的“自给自足”条件。俄罗斯人口占世界的3%，自然资源却占全球的40%，位居全球第一；森林面积多达8.09亿公顷，是西方发达国家的3倍，占全球的20%。俄罗斯还是全球水系最为丰沛的国家之一，仅贝加尔湖的淡水储量即占世界的五分之一，煤炭储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俄罗斯也是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世界的40%和45%。俄罗斯还是全球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2015年，俄罗斯出口粮食3500万吨，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成为全球粮食市场上主要的出口大国之一。由于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有的能“自给自足”的大国，

① Ирина Нагорных. Сторонники Путина ждут 2018 года - Чтобы вновь проголосовать за него// Коммерсантъ. №.77 от 05.05.2016. С.3.

② Политолог предположил, как статью Суркова воспримут на Западе// РИА Новости. 11 февраля 2018.

③ Петр Акопов. Путин создает новую модель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згляд. 11 февраля 2019.

具备抵御自然界和人为的外来压力的客观条件，就连西方政客也不否认，俄罗斯可能正在衰落，可它依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大国。^①

（二）拥有参与全球治理的实际能力

冷战结束后，除继承苏联享有的一些国际和地区组织资格外，俄罗斯还先后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东盟区域论坛、七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国际和地区组织机构。新千年以来，俄罗斯更是成为参与多边舞台事务的十分活跃的大国之一，常常成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行强权政治难以逾越的障碍，并在国际反恐、伊拉克危机、伊核问题、朝核六方会谈、中东和平进程以及叙利亚危机等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2001年6月，俄罗斯与中国和中亚四国共同成立上合组织。2002年5月，俄罗斯与北约建立其拥有部分权力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RC）。2008年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提出，未来俄罗斯将力争成为能够影响国际秩序新构架的中心之一。^②2009年6月，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和巴西创建金砖四国机制。2011年12月，俄罗斯成功加入世贸组织。通过上述多边合作平台，俄罗斯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2013年以来，俄罗斯先是不怕得罪美国，在国际上鲜有国家对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避难给予回应的情况下毅然为其提供政治避难场所，而后又“以化武换和平”方式成功阻止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图谋，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有关各方共同斡旋，成功促成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就“伊核问题”达成全面解决协议。倘若说20世纪90年代无人倾听俄罗斯在解决世界诸多危机问题上的声音，如今情况已然不同。正如俄罗斯前副总理苏尔科夫所言，俄罗斯作为世界性的大国地位已经得到显著恢复，“终于停止了分崩离析，开始恢复元气并日益强大起来”。俄罗斯在国际舞台“被赋予的角色不再人微言轻”，因为，历史“不允许我们从舞台退场或在跑龙套中沉默”，俄罗斯已是先前未曾经历过的新型国家，其独特性与生命力已

① Thomas Graham, Matthew Rojansky, “America’s Russia Policy Has Failed—Here are seven things the next U.S. president should do to put Washington back in the driver’s seat”,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3, 2016.

② Татьяна Становая. Россия развивает восточный вектор// Политком.RU. 22.06.2009.

得以彰显。^①其实，在决定出兵叙利亚、与美国“共同”调解一系列与叙利亚冲突有关问题的行动中，“俄罗斯就已重新赢得了具备第二大全球力量 and 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②可以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目的之一便是迫使美国承认俄罗斯是一个世界大国”。因为，“除了美国或其盟国外，还没有哪个国家敢如此大动干戈”。^③就连西方主流社会也对俄罗斯的变化刮目相看。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承认，自本世纪头 10 年中期起，俄罗斯为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付出了“巨大”努力。俄罗斯“恢复了外交影响中心的地位”，与美国共同领导了叙利亚问题的国际和谈。法国《费加罗报》刊文称，俄罗斯通过干预叙利亚的行动摧毁了冷战后的欧洲秩序，使其重新跻身外交舞台一流行列。在 2016 年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编制的“软实力”排行榜中，俄罗斯在“全球事务参与度”的排名已位居第 8 位，被认为具有“超强的外交”力和能够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而开展的对话”中发挥主导作用。^④

（三）维系战略稳定的关键因素

进入 21 世纪以来，俄罗斯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经常对美国等西方霸权主义和干预行径说“不”，成为世界多极化中举足轻重的“一极”和牵制美国和北约推行全球干预政策的重要制衡力量，也是维系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关键“变量”。用俄罗斯精英的话讲，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还戏言“俄罗斯是由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统治的国家”，那么，今天任何一个俄罗斯人（或者外国人）都清楚，“莫斯科可以在任何一个国际或内政问题上不同意华盛顿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首都的意见而坚持己见，且不会招致任何不良后果。如今，世界上能有这种过分之举的大国为数不多”。^⑤而普京执

①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 О том, что здесь вообщ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02.2019.

② Петр Акопов. Операцией в Сирии Россия закрепила сво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згляд. 15 марта 2016.

③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Артем Кобзев. Для США Россия - забияка, терроризирующий свой околоток// Lenta.ru. 7 июля 2016.

④ Антон Крылов. «Мягкую силу» России придает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дипломатия// Взгляд. 14 июня 2016.

⑤ “专家：俄罗斯作为世界主导国家地位得到恢复”，<http://news.cjn.cn/gj/200803/t581674.htm>

政的这些年，也正是俄罗斯作为有自身独立立场的强国崛起的时期。2008年，俄罗斯对萨卡什维利政府武力收复南奥塞梯举动的果断军事干预，大大动摇了美国一超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格局。2014年，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出其不意地兼并克里米亚更是极大地冲击了西方主导的冷战后国际秩序。事实证明，虽然俄罗斯的这些干预行动与苏联时期经常采取的大规模行动有着天壤之别，但客观事实是，俄罗斯已能够重新阻止任何其他大国的一些行动。为了自身利益，俄罗斯必要时可以向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有效投射兵力。2015年，俄罗斯史上首次直接武装干预中东地区事务，派出数十架飞机进入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IS）和其他反巴沙尔政权的武装组织，彻底打破了其只在前苏疆域内投射兵力的原则，进一步动摇了冷战结束后只有美国才拥有的在全球使用武力的地位。俄罗斯干预叙利亚事务的目的在于“力图学会有效利用自己在全球的军事力量，以实现其成为一个与中国和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的诉求”，即“普京寻求巩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重要地位，作为一个旨在结束这场战争、推进外交进程的主要倡议者及作为随后政治解决的保证人角色……”。在经历25年的军力孱弱不堪后，俄罗斯军队重新成为欧亚大陆一支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而且，也具备了阻止任何其他大国或集团独揽国际和地区事务大权的能力。^①用俄罗斯外交官的话说，如今，俄罗斯已完成恢复昔日“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进程”，成为与美国和中国并驾齐驱的三个力量中心，并“在全球玩家中鹤立鸡群”。^②

结语

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其享有的对应国际地位和影响相匹配。强大的综合国力是赢得重要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首要条件，即一个国家拥有什么样的国际地位取决于自身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否，与其在国际关系中所处位置及在与各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和作用中形成的整体国际影响力

① Dmitri Trenin, “The Revival of the Russian Military - How Moscow Reloaded”,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

② Андрей Глебович Бакланов. КАРТ-БЛАНШ.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упердержавы-Рос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вторитета бесит Вашингтон//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04.2014.

相关，也体现着一个国家融入世界进程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

然而，就脱胎于苏联的俄罗斯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来说，却不能简单地用综合国力的各项指标来确定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尽管俄罗斯仍处在“乍兴还弱”的复兴阶段，综合国力各项指标并未全部达到世界性强国的标准，经济金融基础薄弱，科技创新不足，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和国际传播力及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均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政治力和军力也算不上绝对强大，可是从衡量发达国家的重要指标——重工业、航空航天以及核技术领域等来看，俄罗斯却始终位居世界前列。何况，就政治力和军力而言，俄罗斯一直是与美国势均力敌的战略对手，尤其是近年来俄罗斯在国际舞台屡有建树，重新成为可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世界性大国。2018年3月，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副议长彼得·托尔斯泰郑重宣布：普京总统向联邦会议（议会）成员发表的国情咨文，“标志着全球政治新时代的开始，俄罗斯正重返世界强国之列”。^①

【Abstract】 Russi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has changed from a sudden weakening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o a gradual restoration and constant strengthening in the Putin era. In the 19th century, Russia, as an important power against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entered the European political arena.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Soviet Union joined as a world power and became a superpower, which kept pa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meant that Russia was no longer a world-class power. Russia's original ideology and social system was eclipsed, and it also lost its competitiveness against the West in many key areas. After great efforts in over 20 years, so far Russia, in many ways, has been unable to compete with such leading developed countries as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s of around 7% in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Russi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t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has

① Послание Путина обозначило начало новой эпохи, считает Толстой// РИА Новости. Москва. 1 марта 2018 года.

increased greatly. Accordingly, it has again become a key factor in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balance and stabili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orce nee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Key Words】 Russi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Russia's Strategic Balance and Stability, Domestic Political Forces in Russia, Russia'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

【 Аннотация 】 Общ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мощь России претерпела изменения от постепенного ослаблени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к постепенному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и постоянному укреплению в эпоху Путина. В 19 веке Россия, как важная держава, боровшаяся против буржуаз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ышла на европейск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арену. Во Вторую мировую войну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ступил как мировая держава и стал сверхдержавой, которая шла в ногу с Соединё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во врем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значал, что Россия больше не была державой мирового класса, изначаль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не только затмились, но и Россия потеряла свою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ь с Западом во многих ключевых областях. После более чем 20 лет напряжённой работы Россия во мног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так и не способна конкурировать с такими ведущими развит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как США. Однако нельзя отрицать, что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темп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около 7%, впервые в 21 веке в течение 10 лет общ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мощь Росси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возросла, её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укрепились, и она вновь стала ключевым фактором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баланса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важ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л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й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Общ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мощь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равновесие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внутрен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илы Ро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статус и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崔珩)

“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

葛静深**

【内容提要】与北极相关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现阶段俄罗斯海洋战略、北极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北方研究”，是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围绕北极空间开展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北极正在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正在被塑造为一个“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北极大国”。而以北方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北极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学术界通过不断重复使用“俄罗斯北方”这一核心概念和基本话语，采取用“北方”代替“北极”的策略，从而获得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然、精神空间范畴，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北方话语体系”。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与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一起，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维度共同建构俄罗斯北极大国的国家身份。

【关键词】俄罗斯北方 俄罗斯国家身份 俄罗斯北极战略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3-0063
(32)

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濒临巴伦支海、白海、喀拉海、拉普捷夫海、东西伯利亚海和楚科奇海，北极地区集中了俄罗斯国土最为漫长的海岸线。以北冰洋为界标，俄罗斯可以被称为位于世界北方的最为独特的海洋大国，也是北极圈内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寻求扩大其在北极地区的

* 感谢俄罗斯研究编辑部以及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 葛静深，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影响力。如 2014 年 3 月，联合国海事委员会确认了鄂霍次克海中部面积 5.2 万平方公里的高地为俄罗斯大陆架部分。2015 年 8 月 4 日，俄罗斯重新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递交了申请拥有 120 万平方公里北冰洋大陆架的报告，其中包含俄罗斯近年来在北极科考活动中搜集到的最新数据。如果北极地区所有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均获得支持，俄罗斯将获得约 45% 的北极领土。^①

尽管俄罗斯是公认的自然地理意义上北极圈内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但在国家身份的自我与他者认同上，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②的国家身份仍然处于建构过程之中。与北极空间有关的身份建构问题是当代俄罗斯海洋战略、北极战略顺利实施的核心议题：对外政策需要身份话语，对外政策话语需要突出某种身份，以强化相关政策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而对外政策的选择与制定也依赖、受制于既有的身份话语。因此，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的持续提升，俄罗斯正在不断将“北极大国”身份话语推向其国家话语体系的中心位置。奥尔加·赫鲁晓娃 (Olga Khrushcheva) 等曾指出，俄罗斯北极地区人口稀少，在多数俄罗斯民众的认知中，对于北极并无明确的归属感；俄罗斯领导人需要创建一个“叙述”，向俄民众解释北极对于俄罗斯的极端重要性，并通过话语建构俄罗斯国家身份同北极地区之间的独特关联。^③因此，俄罗斯“北极大国”国家身份的话语建构过程，是一个明显而复杂的“意义争夺”^④过程。争夺的参与者，既包括国外的“听众”，也包括俄罗斯国内的“听众”。

当代俄罗斯学界围绕着北极海洋空间，开展了丰富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围绕着“俄罗斯北方” (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 和“北极”两个概念展开。其中涉及“北极”概念的研究多贴近现实，最为典型的就是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区域历史研究、区域经贸研究等；这里的“北极”区域概

① R. Kefferputz, “On Thin Ice? (Mis)interpreting Russian Policy in the High North”, *CEPS Policy Brief 205: 1-10*, 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2010.

② I. Medby, “Arctic State, Arctic Nation? Arctic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 Post-Cold War Generation in Norway”, *Polar Geography*, 2014, Vol.37, No.3, p.253.

③ Olga Khrushcheva, Marianna Poberezhskaya, “The Arctic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Russian leaders: the national pride and economic ambition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6, Vol.32, No.4, pp.547-566.

④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 年，第 264 页。

念由诸多具体的“北极地理范畴”组成，如巴伦支海、白海、科拉半岛、摩尔曼斯克等；^①而涉及“俄罗斯北方”概念的研究则更为多元，包含着北方社会、民族、移民等社会科学研究，也涉及大量的文化、哲学、信仰、仪式等精神领域的人文科学研究。^②笔者认为，这些研究的学术文本所构成的学

① 俄罗斯“北极”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考 Ушаков И.Ф.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3 т.: Историко-краевед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Т.1: Кольская земля. Мурманск, 1997; Т.2: Кольский Север. Мурманск, 1998; Т.3: Кольская старина. Мурманск, 1998; Попов Г.П., Давыдов Р.А. Мурман.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рая XIX – начала XX в.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9; Адров Н.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Баренцева моря за 1 000 лет: Ч.1: От начала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до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Мурманск, 2002; Филин П.А. Традиции морского рыболовства поморов Терского берега Белого моря в XV–XX вв.: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М., 2002; Лайус Ю.А. Развитие рыб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Баренцева моря: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науки и промысла, 1898-1934 гг.: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М., 2004; Циркунов И.Б. Арктический корабль науки. Мурманск, 2006; Киселев А.А. Мурманск в истории улиц и площадей. Мурманск, 2006; Сухановский А.Ф., Слободянюк И.Ю. Арктическая Россия. М: СК-Россия. 2007; Сорокожердьев В.В. 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в Заполярье. Мурманск, 2007; Ципоруха М.И. Мор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ктики. М: Дрофа. 2008; Орехова Е.А. Колонизация Мурманского берега Коль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в.: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СПб. 2009; Зонн И.С., Костяной А.Г. Баренцево море: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2011; Соловецкое море: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альманах/ гл. ред. Матонин В.Н. Архангельск; М., 2014; Федоров П.В.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словарь Кольского Севера. СПб., 2016.

② 有关“俄罗斯北方”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参考 Коротаяв В.И. 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 в конце XIX–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ека.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экологии. – Архангельск, 1998; Терехин Н.М. Лукоморье. Очерк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теософии и маринистики Северной России. Архангельск, 1999; Дубровин Г.Е., Окорочков А.В., Старков В.Ф., Черносвитов П.Ю.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орусског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я. СПб., 2001; Попов Г.П., Давыдов Р.А. Морское судоходство на Русском Севере в XIX–начале XX в.–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Архангельск, 2002; Терехин Н.М. Метафизика Севера: монография. Архангельск, 2004; Базарова Э.Л.[и др.]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их поморов: опыт систем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Научный Мир, 2005; Окунев Ю.П. Динамика культуры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в услов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октора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М.В. Ломоносова (МГУ). Москва, 2007; Море–наше поле.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данные о рыбных промыслах Белого и Баренцева морей XVII–начала XX в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Вып. 1 / Р.А. Давыдов, А.В. Крайковский, В.О. Мокиевский и др. СПб., 2010; Культурный ландшафт примор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евер России: сб. ст./отв. ред. Е.Ю. Терещенко. Мурманск, 2012; Галимова Е.Ш. Специфика северного текст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ак локального сверхтекста. Вестник Северн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2012. №.1. С.121-129; Мосолова Л.М. Поли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ультур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а России. Кн. V/науч. СПб. 2013; Семиотика единства и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го многообраз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материалы X Поморских чтений по

术话语，同官方政治话语、媒体话语等一起，共同参与了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国家身份的话语建构过程。其中，学术话语在对内促进俄罗斯民众“北极大国”国家身份的自我认同方面尤其重要。

相比“北极”，“俄罗斯北方”是一个更具民族文化意味的概念，指称一个特殊的、象征性的俄罗斯空间。在很多学术文本中，这一空间被认为既是俄罗斯北方边界的物理空间（即北极空间），也是一个独特的民族、社会、文化空间。^①因此，“北极”概念多出现在当代俄罗斯对外话语中，而“俄罗斯北方”概念则更为频繁地出现在对内话语中，在俄罗斯国内学界的学术话语叙述策略中更是处于核心位置。在本研究中，笔者将俄罗斯学界有关北极地区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简称为“北方研究”^②。

一、国家身份，学术话语与北方研究

北极国家政府经常采用与“北极”这一特殊符号相关的身份建设政策，争取在国际社会竞争中获得对北极这一资源丰富地区的优势地位。^③近十余年来，北极也逐渐成为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的核心要素之一。

身份是一个复杂的多维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大众话语中可能有着不同的内涵^④，与文化、历史、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密切相关。身份由自我

семиотике культуры, 19-22 июля 2014 г./ отв. ред. проф. Н.М. Терехин. Архангельск, 2014.

① Пермиловская А.Б. Деревянные часовни в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традициях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и арктики. Вестник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Свято-Тихонов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5: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и теор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2017. №.27. С.69-88.

② “北方研究”概念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在本研究中指称广义的俄罗斯北极地区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时，在海洋文化学术视角下，北方研究可以指称俄罗斯学界围绕北极海洋空间展开的区域海洋文化研究体系。其主要依据为当代俄罗斯北极地区区域人文社会科学和海洋文化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北方”(Север)和“俄罗斯北方”(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概念。“俄罗斯北方”概念同时表象了俄罗斯国家的北方边界、北极空间，以及一个独立且具有特殊价值的民族文化空间；与“北极”概念相比，“俄罗斯北方”概念的内涵、外延更广泛，更多元。

③ I. Medby, “Arctic State, Arctic Nation? Arctic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 Post-Cold War Generation in Norway”, pp.252-269.

④ J.Dittmer, K.Dodds, “Popular Geopolitics Past and Future: Fandom, Identities and Audiences”, *Geopolitics*, 2008, Vol.13, No.3, pp.437-457.

持有的观念和他者持有的观念建构而成，^①国家身份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自我认定问题，而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②，是一种在对外交往中形成的自我感觉。^③建构主义认为，“任何‘自我’身份只能在与‘其他者’的关系中加以定义。”即“只有当我们不是谁，而且经常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反对谁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④

而后结构主义则进一步认为，身份与对外政策均具有行事性（performative），二者是相互建构的关系。鉴于语言的本体作用，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认识论意义，认为可以通过话语来分析身份与对外政策，通过研究话语来认识身份与对外政策的形成及演变过程。^⑤身份本身具有行事性，体现关系性、话语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特征，通过表象出与他者不同程度的差异而建构出一种“我他关系”（self-other）^⑥，突出自我的身份与他者的身份有何不同，有何关联。

后结构主义的核心假定是表象和身份相互建构，在话语上相互关联；身份和对外政策之间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建构的关系，话语在其中起媒介或载体的作用。孙吉胜指出，后结构主义的这一研究路径开启了一个以身份和政策的互构以及二者在政治话语内如何联系为中心的研究议程。^⑦而本研究认为，这一研究议程不仅仅被框定在政治话语范围内，而可以在更广泛的“话语”范畴内展开。

话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跨学科概念，很多研究领域均借用了“话语”这

①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②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③ 张学航：“俄罗斯国家身份定位与认知视角下的俄美关系困境”，《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5期。

④ [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⑤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58页。

⑥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12.

⑦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第260页。

一概念并将其置于各自理论的核心位置。在政治学领域，话语是“一系列的、包含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语言实践和修辞策略”^①。在国际关系领域，话语是维护国家利益，维持、巩固或改变国家地位及权势关系的重要手段。^②在传播学领域，话语是“语言或表达系统，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而产生并传播某个重要话题的一系列连贯意义。这些意义服务于话语产生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从意识形态上试图使这些意义自然化成常识”^③。费尔克拉夫（N. Fairclough）^④、沃达克（R. Wodak）^⑤采用后结构主义视角，把话语视为一种社会实践和再现社会现实的方式，它不仅协助实现社会权力和实施控制，而且也建构着社会文化和现实。在他们看来，话语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它确立、维持并改变着权势关系，继而构成、维系并改变着世界。^⑥

基于话语的社会实践观，沃达克把话语界定为围绕某一宏观主题展开的陈述。这一定义比较适合界定围绕某一议题而产生的系列话语。^⑦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北极话语”表述为围绕“北极”相关议题而产生的话语，北极话语体系研究应该包括所有与北极相关的话语表达、话语内容、话语传播以及话语接受。根据话语生产主体，北极话语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和学术北极话语。^⑧

从互文性的角度看，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如声明、讲话和采访等）是存在于一个更大的文本网络之中的。这个网络不但包括其他政策文本，还涉及

① K.Litfin, *Ozone Discourses: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

② 梁凯音：“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

③ J.Fiske,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10, p.14；王晋军：“国外环境话语研究回顾”，《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④ N.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researching language in the new capitalism: overdetermination, transdisciplinarity and textual analysis”, In C. Harrison and L. Young (ed.) *Systemic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Continuum, 2004.

⑤ R.Wodak, “What CDA Is about---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AGE Publications, 2001.

⑥ 王晋军，“国外环境话语研究回顾”。

⑦ 赵秀凤，“能源话语研究的体系与范畴”，《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⑧ 同上。

新闻报道、学术作品、流行的非虚构作品，甚至还包括一些虚构作品。^①把身份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作为核心研究议程的后结构主义，是通过把身份理论化为一种话语的、政治的、关系的、社会的产物来直接研究政策。因此，在具体研究中，官方政治话语应该被置于一个更宽泛的话语范围来理解，^②不同文本之间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开放网络，这一网络中不同话语之间构成一种互文关系。在互文性语境中，有关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建构与相关战略、政策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议程，应围绕着由官方政治话语与更广泛的社会话语组成的多维话语网络展开。本研究认为，身份与政策这一互构关系的媒介和载体包含各种类型的话语；在官方政治话语、媒体话语、企业话语之外，学术话语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代俄罗斯学界围绕着北极空间，开展了丰富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即“北方研究”。俄罗斯一些学者指出，北极沿海地区并不是俄罗斯文化空间的“边缘”，而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储藏室”；历史悠久的俄罗斯民族文化遗产在这一地区被集中在一起并完整保存，留存了“原初”的俄罗斯气质。^③21世纪以来，俄罗斯学者在多学科框架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北方研究，产生了大量的北方研究学术文本（包括学术论文、论著、研究报告和学术会议发言等），这些学术文本均可被认为是典型的“学术北极话语”。本研究将重点探讨当代俄罗斯北方研究学术话语的内涵、特征，及其在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国家身份的生成、巩固，以及相关国家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本体性作用。

二、俄罗斯国家身份重构的学术话语策略

“大国”概念是表象俄罗斯国家身份的不变因素之一^④。在帝国时期和苏联时期，没有任何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使用“民族”作为国家身份的核心因

①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70页。

② 同上，第269页。

③ Шабасев Ю.П., Жеребцов И.Л., Журавлев П.С. «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 Культурные Границы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Смыслы// Мир России: Социология, этнология. 2012. Т.21. No.4. С.134-153.

④ V. Tolz, *Russia: Inventing the Nation*, London: Arnold, 2001.

素。俄罗斯的历史以及多民族现状，使得利用民族要素建构国家身份的战略选择不具备现实可行性^①，而“大国”的概念则成为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的第一选择。“大国”的愿望来自于过去俄罗斯“伟大”的记忆（帝国时期以及苏联时期），特别是上世纪苏联的超级大国形象，牢牢地扎根于俄罗斯的集体记忆中。^②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陷入了所谓“负面国家身份”之中，外部族群（西方）不再将俄罗斯视为国际事务的“强有力行为体”，而这一“强有力行为体”的形象，正是内部族群（俄罗斯）长期习惯并追求至今的理想国家身份形象。^③

因此，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领导人均致力于为俄罗斯构建一个“积极的身份”，以重新获得“大国”的地位。叶利钦专注于谴责过去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主流价值观，尝试接受西方价值以获得理想身份认可；梅德韦杰夫强调与西方的密切合作^④；而普京则更明确地倾向于用传统的历史文化来创造俄罗斯伟大和独特的叙述。在这一叙述中，西方经常被塑造为“他者”（“the other”）：一直试图破坏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并威胁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⑤以社会身份理论的身份自主建构战略视角，普京的策略更接近于一种社会创造策略，即选择或新建对本群体有利的评价标准和比较维度，以实现自我重构的身份在群际比较中的价值优势：行为体经常采取创新概念（比如北方研究中的“俄罗斯北方”概念）的策略，将关注的焦点引向自己设定的议题框架，以产生对己有利的社会比较的评价标准。^⑥

麦德比（I. Medby）曾在其研究中提出，北极国家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倾

① P. Duncan, “Contemporary Russian Ident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Historical Journal* 2005, Vol.48, No.1, pp.277-294.

② A. Clun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ssia's Resurgence: Aspirations,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A. Evans, “Ideological Change under Vladimir Putin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Demokratizatsiya*, 2015, Vol.23, No.4, pp.401-426.

④ Ibid.

⑤ Olga Khrushcheva, Marianna Poberezhskaya, “The Arctic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Russian leaders: the national pride and economic ambition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6, Vol.32, No.4, pp.547-566.

⑥ 陆伟：“身份建构战略与日本‘和平宪法’制度化规范的退化——一种关于日本去战后体制化的新解释”，《日本学刊》，2017年第3期。

向于使用“北极性”（Arcticness）概念^①，近年来俄罗斯官方政治话语和媒体话语中也不断使用“北极性”概念，北极正在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的核心因素之一^②，承担了建构俄罗斯国家身份独特性的任务，成为当代俄罗斯重获“大国”身份的关键。在这一语境中，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以及未来将要实施的国家战略，均或多或少和北极联系在了一起。

当代俄罗斯的“北极大国”国家身份，离不开其“北极话语体系”的话语建构过程。从话语生产者角度出发，北极话语体系包括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和学术北极话语。官方政治北极话语是北极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倾向于从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因素建构俄罗斯的北极身份，并涉及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合作等议题。^③媒体北极话语主题更加多元，除国际合作、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宏观议题外，还涉及很多具体议题，如极地旅游、教育、气候、能源等。^④企业北极话语则主要包括参与北极事务的企业（如Новатэк公司、Атомфлот公司等）的发言人话语、企业报告文本等，多数与能源、航运、国际合作等具体议题直接相关。

与以上三种北极话语不同，学术北极话语的议题更加广泛，涉及实践层面和精神层面，且包含大量针对某些议题的持续性、大规模的深入研究。从国家身份的话语建构角度出发，俄罗斯当代学术北极话语不仅参与了话语突显、话语关联与框定、议程设置等具体环节，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其他北极话语，学术北极话语创造了一种多元的、完整的、与北极相关的自传体叙述。

① I. Medby, “Arctic State, Arctic Nation? Arctic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 Post-Cold War Generation in Norway”, pp.252-269.

② M. Light,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Ideology”,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2003, Vol.19, No.3, pp.42-59; O. Malinova, “Obsession with Status and Ressentim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the Russian Discursive Identities Construc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47, No.3-4, pp.291-303.

③ 参见 Olga Khrushcheva, Marianna Poberezhskaya, “The Arctic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Russian leaders: the national pride and economic ambitions”, pp.547-566.

④ 参见 Elana Wilson Rowe, Helge Blakkisrud, “A New Kind of Arctic Power? Russia’s Policy Discourses and Diplomatic Practices in the Circumpolar North”, *Geopolitics*, 2014, Vol.19, No.1, pp.66-85.

从话语操控的角度出发，当代俄罗斯官方的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更倾向于将“北极”设置为国家议程上的“热点问题”，有利于引导与北极议题相关的舆论导向，作用于俄民众有关北极议题认知图式的“短期记忆”；而以北方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北极话语，则更有利于创建一种稳定、长期、深入的北极叙述，作用于俄民众的“长期记忆”，影响其理解俄罗斯北极国家行为的背景知识和情感偏好。

正如温特所言，行为体身份是靠族群的集体记忆、神话叙述、风俗仪式等内在的历史现象而的。^①在俄罗斯围绕北极所进行的身份建构实践中，对于俄罗斯北极地区的集体记忆、神话叙述、风俗仪式等历史现象的话语建构，以及北极空间与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价值的关联过程，以北方研究为代表的学术话语发挥了关键作用。北方研究实现了在空间和时间层面对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民族、信仰、宗教等多方面的深入考察，并与整个俄罗斯国家、民族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关联，突出了北极地区对于俄罗斯的独特性与极端重要性，进而增强全俄民众对于“北极大国”身份的认同感。

与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中频繁使用“俄罗斯北极”这一概念的论证策略^②不同，北方研究学术话语更倾向于使用“俄罗斯北方”（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概念。通过不断重复使用“俄罗斯北方”这一核心概念和基本话语，用“北方”代替“北极”，从而获得一个更为广泛的空间概念。这一空间概念既包含自然空间范畴，也包含精神空间范畴。从当代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的角度来说，“俄罗斯北方”这一概念主要涉及两方面内涵：首先是自然地理内涵，具体来说就是领土因素，即俄罗斯国家的北方边界及北极空间；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因素，指称一个独立且具有特殊价值的民族文化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

在学术语境中，“俄罗斯北方”与俄罗斯大陆文化空间以一种历史的、复杂的方式连接在一起，这种关联性需要通过多维度的北方研究来进行深入挖掘，以明确俄罗斯“北极大国”国家身份在历史文化、民族价值等层面的

①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第210页。

② Olga Khrushcheva, Marianna Poberezhskaya, “The Arctic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Russian leaders: the national pride and economic ambitions”, pp.547-566.

具体内涵，并唤起广大俄罗斯民众对于这一文化传统与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俄罗斯北方研究学术话语极为注重“我-他关系”的建构。

首先，北方研究注重通过商贸史、移民史、民族志等研究视角，从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经贸往来等多方面建构俄罗斯同挪威、芬兰等其他北极国家的共同“北方身份”。如帕拉马尔丘克（М.Л. Паламарчук）从历史过程和国家政策的角度出发，详细梳理了挪威北部沿海的芬马克地区和俄罗斯北部沿海的科拉半岛北部地区，在古代、冷战时期以及巴伦支海区域合作时期的海洋贸易合作史；指出沿海的边界区域是国家整体的代表和缩影，是不同国家不同空间的关键联结因素，巴伦支海地区对于俄罗斯和挪威两国均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区域；并通过对于两国 21 世纪在巴伦支海地区的合作现状的介绍，展望了未来北极地区的国际经贸合作发展趋势。^①博德罗娃（О.А. Бодрова）指出，“俄罗斯与其他北极国家成功开展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构建一个共同的**北方身份**”。这一共同身份的基础就是共同的自然气候条件（严酷的气候，脆弱的环境），远离国家中心、低人口密度的客观情况，历史与经贸联系，甚至是民族、人种方面的亲缘关系。^②

另外，“独特性”是俄罗斯北方研究中着力突出的一个基本话语，这一“独特性”包含俄罗斯对北极的独特性以及北极对俄罗斯的独特性两方面。第一，与其他北极国家相比，俄罗斯对于北极来说是独特的。在空间、时间维度上，俄罗斯是北极空间内最庞大且独特的存在（“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在亚北极地区经历漫长发展阶段：从原始、传统社会发展至今的区域性大国，也是今天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北极大国”^③）。第二，北极对于俄罗斯来说具有独特地位，影响着俄罗斯民族关于自身文化的基本认知（如“基于俄罗斯北部沿海地区（Русский Помор）与南部地区的自然地理差异而产生的

① Паламарчук М.Л. Баренц-помор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как феномен культуры//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ци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электронный научный журнал). 2012. №.11. С.1.

② Бодрова О.А.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й облик коль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в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х печатных изданиях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журналов постперестроеч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Труды Коль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РАН. 2015. №.1(27). С.29-46.

③ Фёдоров П.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 культурных ландшафтах коль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Арктика и Север. 2014. №.16. С.179-183.

一种无法消除的对于俄罗斯文化起源的独特性的认识”^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北方”概念与“俄罗斯”概念合二为一,北极赋予了俄罗斯独特的“北方气质”,北极是俄罗斯的北方,而俄罗斯是整个世界的北方,这一“北方神话”成为当代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中最为常用的政治隐喻之一。通过这一“独特性”叙述,俄罗斯北方研究学术话语实现了俄罗斯与其他北极国家身份的“区分”过程,从而推进俄“北极大国”身份的独特性叙述。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通过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中“北方”这一概念的使用,北极地区的空间范围得到了扩展,不再局限于北极圈的地理限制,将更大区域的俄罗斯领土划入了“北方”的范围,扩大了这一区域在俄罗斯民众认知中的影响;而不断使用的“俄罗斯北方”这一概念,则在共同的“北方国家”身份的基础上,实现了俄罗斯在这一区域与其他北极国家的区分。甚至,通过精神层面相关研究的论述,北方研究已经非常成功地将“俄罗斯北方”塑造成一个民族文化空间,在精神层面使其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内涵,覆盖了整个俄罗斯的“精神疆域”。通过精神层面“北方大国”的身份塑造,完成了现实层面“北极大国”的身份建构。

三、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学术话语建构的实证分析

俄罗斯列格努姆通讯社(REGNUM)副总编辑伊戈尔·巴甫洛夫斯基(Игорь Павловский)在2018年10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尽管《2020年前俄联邦北极地区发展与国家安全保障战略》^②明确阐述了有关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6个优先发展领域,但该战略并未解释为什么俄罗斯“需要在北极做这一切”;俄罗斯政府没有对“俄罗斯为什么要发展北极”这一问题做出清晰的解释,中央和地方的媒体也并没有较为有效地参与到俄罗斯北极战略的推进进程中;这将有可能导致俄罗斯政府对内无法

① Галимова Е.Ш. Специфика северного текст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ак локального сверттекста// Вестник Северн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2012. №.1. С.121-129.

②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звит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http://government.ru/info/18360/>

清晰地解释北极在国家政策中的优先地位，对外也无法清晰表述俄罗斯自己的北极议程及其在北极地区的利益诉求。^①

巴甫洛夫斯基的观点体现了现阶段俄罗斯国家身份与其北极战略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俄罗斯北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其“北极大国”身份的不断建构。当代俄罗斯北极战略的推进迫使其必须明确、深化、拓展各领域内的“北极话语”，完善当代俄罗斯的北极话语体系。这一过程需要俄罗斯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学术界等多方面的深度参与，而本研究聚焦的“北方研究”，可被认为是俄北极话语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核心组成部分。

俄罗斯北方研究主要沿两条基本路径进行：实践范式研究和精神范式研究。从学术话语的视角出发，根据北方研究学术文本关注的主题，可以将这些学术文本置于特定的话语链（“以话题为主题的话语流”^②）中。基于对俄罗斯后苏联时期，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北方研究学术文本的考察，本研究确定了“历史研究”、“民族、宗教、社会研究”和“文化、哲学、符号学研究”三个北方研究基本学术话语链。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北方研究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很多北方研究学术文本均包含多个“话语片段”^③，因此可分属多个不同学术话语链。

（一）历史研究

历史事实能够直观反映出不同历史阶段俄罗斯在北极空间的参与实践活动，是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建构的最直接的方式。相当部分的俄罗斯北方研究均属于历史研究范式，许多俄罗斯学者采用历史编纂学、历史比较法等，延续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俄罗斯海洋文化研究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传统，包括航海史、海洋军事与海洋商贸活动史、北方海航道的开辟史、海洋科技史以及沿海地区海洋相关经济文化史等。

俄罗斯北方研究学术话语，倾向于从历史维度直接建构其“历史性北极

① 参见Игорь Павловский. Аркт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Для кого Россия осваивает Арктику? <https://regnum.ru/news/society/2506275.html>

② S. Jäger, F. Maier,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Foucauldia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Dispositive Analysis”, In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ted by R. Wodak and M. Meyer, London: Sage, 2nd ed. 2009, pp.34-61.

③ Ibid.

大国”的身份。通过这些学术性北极话语，叙述俄罗斯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领域在北极海洋空间以及沿海地区的参与实践活动，并通过这些叙述，将当代俄罗斯联邦与帝国时期、苏联时期的“伟大记忆”进行关联，强调俄罗斯在北极地区航海、科考、商贸等历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如，强调摩尔曼斯克自由港制度在 20 世纪上半叶北极商贸活动中超然于国内外政治、军事环境的重要战略地位。^①

最为典型的研究，包括了对北极地区海军舰队、海洋商贸活动、破冰船队，以及北极地区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史等多方面的研究。如，有关俄罗斯海军舰队的研究，包括佐洛塔列娃（В.А. Золотарева）的《俄罗斯国家舰队史》^②，库津（В.П. Кузин）和尼科尔斯基（В.Н. Никольский）的《1945 年至 1991 年苏联海军舰队史》^③，普济廖夫（Е.П. Пузырев）的《俄罗斯旗帜下：商船舰队的诞生与发展史》^④；以及布林诺娃（В.М. Блинова）的《列宁破冰船：第一艘原子破冰船》^⑤和《原子破冰船：历史与现状》^⑥中有关俄罗斯北极破冰船队的历史。

海洋经贸活动史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如捷列克和摩尔曼斯克海岸的海洋经济文化的历史研究，在《15 至 20 世纪捷列克白海海岸的渔业传统》^⑦、《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前 30 年的科拉半岛摩尔曼斯克海岸的移民活动》^⑧以及《巴伦支海渔业研究的发展：科学与工业的关系，1898–1934》^⑨中得到了深入的探索。《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 30 年的俄罗斯北方：现代化与社

① Порцель А.К. Российско-норвежская мор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на кольском севере в 1914–1920 гг//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11.№.2. С.80–90.

② Золотарева В.А. История фло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 2 т. Т.1: 1696–1941 гг. Москва: Терра, 1996.

③ Кузин В.П, Никольский В.Н.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Флот СССР 1945–1991 гг. СПб., 1996.

④ Пузырев Е.П, Скугарев В.Д и др. Под флагом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зарожд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морского торгового флота. М.: Согласие., 1995. – 568 с.

⑤ Блинов В.М. Ледокол Ленин: Первый Атомный. Москва: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издания, 2009.

⑥ Блинов В.М. Атомные ледоколы: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 Кн 1: Стрелка компаса показывает на север. М.: Мурманск, 2014.

⑦ Филин П.А. Традиции морского рыболовства поморов Терского берега Белого моря в XV–XX вв.: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М., 2002.

⑧ Орехова Е.А. Колонизация Мурманского берега Коль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в.: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СПб., 2009.

⑨ Лайус Ю.А. Развитие рыб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Баренцева моря: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науки и промысла, 1898–1934 гг.: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М., 2004.

会生态问题》^①探讨了特定历史时期俄罗斯北方地区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问题，《海洋，我们的领域》^②则发表了关于白海和巴伦支海海洋工业历史的跨学科项目的成果。

有关北极地区的海洋学史、海洋科考史以及造船史的研究，对于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也有着直接的建构作用。通过北极航海、北极探险、北极科考等史实的叙述，有助于将北极这一“偏远”的、远离国家中心的地区建构为俄罗斯从古至今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现在以及将来俄罗斯在北方海航道、北极科考等领域的主导作用提供历史依据。同时，基于北极地区与俄罗斯长期的、多元的历史关联的事实，俄罗斯政府有机会在其北极地区对外政策方面设立这样的语境：其他对北极地区感兴趣的國家，现在以及将来在北极地区的参与实践活动，需要协调与俄罗斯國家利益的关系。较有典型性的研究成果包括普拉霍特尼克（А.В. Плахотник）的《20世纪中叶前的俄罗斯海洋科学研究史》^③，以及安德罗夫（Н.М. Адров）的《巴伦支海研究1000年》^④等。造船作为社会生活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集体专著《俄罗斯北方造船史》^⑤收集了非常全面的造船方面历史、考古学的独特数据。记录“关于俄罗斯早前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英雄事迹的《海洋中的秘密》^⑥、《他们在北极战斗》^⑦等，也是北方研究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文化景观也是北方研究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研究视点，通过文化景观和文化遗产，建构俄罗斯与北方空间的历史关联。如费奥多罗夫（П.В. Фёдоров）的专著《科拉半岛北部的文化景观：结构与历史变迁》，从历史

① Коротяев В.И. 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 в конце XIX –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ека. Проблем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экологии. М.:Архангельск, 1998.

② Давыдов Р.А, Крайковский А.В, Мокиевский В.О и др. Море – наше поле.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данные о рыбных промыслах Белого и Баренцева морей XVII – начала XX в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Вып. 1. СПб., 2010.

③ Плахотник А.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морей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учеными до середины XX в. М.: Наука, 1996.

④ Адров Н.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Баренцева моря за 1000 лет: Ч. 1: От начала тысячелетия до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Мурманск, 2002.

⑤ Дубровин Г.Е, Огороков А.В, Старков В.Ф, Черношвитов П.Ю.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орусског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я. СПб., 2001.

⑥ Сорокожердьев В.В. Тайну хранило море. Мурманск, 1996.

⑦ Сорокожердьев В.В. Они сражались в Заполярье. Мурманск, 2007.

的角度对俄罗斯北极地区科拉半岛的文化景观作了深入探索,指出“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在亚北极地区经历漫长发展阶段,从原始、传统社会发展至今的区域性大国,也是今天世界上当之无愧的北极大国”^①,概括了俄罗斯北极地区文化景观以及海洋文化的总体特点,并分析了俄罗斯南方大陆文化与北极地区其他国家的文化对于俄罗斯北方文化景观以及地域文化的影响,突出了北方空间文化景观的“俄罗斯性”。

需要指出,俄罗斯北方历史研究有着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如19世纪韦谢拉戈(Ф.Ф. Веселаго)的《俄罗斯海洋史纲要》^②,以及苏联时期的《北方海航道发现与发展史》^③等。在苏联时期,北方地区已经成为俄罗斯海洋文化研究的核心范畴,并且受时代背景和苏联当局开辟北方海航道的现实需求的影响,在北极地区的造船史、航海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北方历史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尤其对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北极活动的历史进行了多角度的全面论证。

总体来看,北方历史研究的基本脉络可以被描述为,通过对不同时期(尤其是苏联时期)俄罗斯“北方记忆”的重现(如“20世纪,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业层,经济活动规模远超其他北极国家”^④),在空间上赋予“俄罗斯北方”于俄罗斯整体的存在感与独特意义;在时间上赋予“俄罗斯北方”以历史厚重感,强调这一地区在俄罗斯历史中存在的持续性。从而建构并增强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稳定性,唤起俄罗斯民众对于北方空间的“伟大记忆”和归属感,增强对其国民身份和国家身份中“北极性”的认同。

(二) 民族、宗教、社会研究

在民族、宗教、社会研究这一主题之下,俄罗斯北方研究学术话语倾向

① Фёдоров П.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 культурных ландшафтах коль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Арктика и Север. 2014. №.16. С.179-183.

② Веселаго Ф.Ф. 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мор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Пб., 1875.

③ Белов М.И, Пинхенсон Д.М. История открытия и освое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в 4 т. М., 1956-1962.

④ I.I. Melamed, M.I. Avdeev, V.I. Pavlenko, S.U. Kutsenko, “Russian Arctic zon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Власт*, 2015, No.1.

于弱化这一地区自然状态下的多民族状况（如有学者认为：“在民族历史和文化概念的范畴内，俄罗斯北方是一个稳定的民族文化概念，是俄罗斯民族心理的载体，这一空间占据了俄罗斯文化地图上最重要的位置之一。俄罗斯北方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区，但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移民历史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使其成为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保护区。”^①），直接建构这一地区北方居民的“俄罗斯身份”（如“17世纪，在这一地区的中心，一个俄罗斯社群形成了，即俄罗斯北方群体，而周边地区则是芬兰-乌戈尔族群体。直到今天，这一地区的民族地图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因为在17世纪，这一地区传统的区域名称就已经不再被使用，所有本地人都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俄罗斯身份。”^②）

东正教传统也成为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苏联解体以来，有关俄罗斯北部的东正教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成果，如格里高利耶夫（А.Б. Григорьев）的《舰队神职人员史》^③等。奥布霍夫（Я.В. Обухов）对1930至2000年俄罗斯北部沿海地区社群的宗教团体进行深入研究，将苏联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北部沿海地区的萨阿米人（原住民）的信仰传统、以及东正教在当地的传播，放在统一的研究框架下，认为对于俄罗斯北部沿海地区的宗教问题研究在未来仍需要进一步深入。^④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俄罗斯北方”（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视为一个相当独立的精神文化单位，注重研究其在保存东正教传统、仪式以及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作用。^⑤

① Пермиловская А.Б. Деревянные часовни в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традициях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и арктики// Вестник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Свято-Тихонов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5: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и теор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2017. №27. С.69-88.

② Пермиловская А.Б. Деревянные часовни в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традициях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и арктики. 2017. №27. С.69-88.

③ Григорьев А.Б. История флотского духовенства : С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я и при участии епископа Мозырского и Туровского Петра: сборник. М.: Андреев.флаг, 1993; Доценко В.Д, Клавинг В.В. Морские храмы России. М. Logos, 1995.

④ Обухов Я.В.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коль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1930-х - 2000 гг// Труды Коль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РАН. 2014. №.2(21). С.180-189.

⑤ Камкин А.В. Сельские 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приходы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Религия и церковь в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Киров, 1996. Т.1. 164 с; Пулькин М.В. 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приход и власть в середине XVIII - начале XX вв.: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Олонецкой епархии) / Пулькин М.В., Рос. акад. наук, Карел. науч. центр, Ин-т яз., лит. и истории. Петрозаводск: КарНЦ РАН, 2009.

有学者指出，17 世纪开始，在北方地区，“俄罗斯”和“东正教”成为可以互相替代的同义词。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两个词语开始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即民族、身份和宗教意识开始融合在一起^①，东正教带来了“希望”，一种文化乐观，一种强大的文明驱动力。^②北方条件下人类生活的细节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态，得到了东正教的支持。北方精神的特点是它包含了俄罗斯北方文化的遗传密码，通过文化传统代代相传。^③俄罗斯北方当地的东正教教区也被认为是最稳定的宗教组织，在一些历史时期，尤其是 18 至 19 世纪，对于维护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宗教规范和行为方式，生活价值观和态度以及习俗、仪式等）有着特殊的作用，为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研究提供了研究文本。一些研究通过对宗教文化历史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强调“俄罗斯北方东正教与古斯拉夫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特殊联系”。^④

经过民族、宗教层面的身份建构过程，北方研究学者还通过对原住民、俄罗斯移民等方面的历史研究，不断强化北方居民的“俄罗斯身份”（如谢苗诺夫（Д.Г. Семёнов）对 1933 至 1941 期间俄罗斯北部沿海地区的军事建设活动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这一历史阶段大规模的军事相关人口的流入和工程建设活动，引发了当地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和新的地区社会文化的产生，进而深刻影响了之后“俄罗斯北方”社会变革的进程。^⑤）；并通过北方居民的“俄罗斯身份”建构，进一步建构北方地区以及区域文化的“俄罗斯身份”（如强调“俄罗斯北方沿海地区（Русский Помор）的文化”就是“北部白海沿岸及周边地区由当地原

① Власова И.В. К изучению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и самосознания севернорус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по источникам XII-XX вв.)//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и культура севернорус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М., 2006. С.177-187.

② Панченко А.М. Я эмигрировал в Древнюю Русь. Россия: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работы разных лет. СПб., 2008.

③ См.: Пермиловская А.Б. Русский Север---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й код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амяти// Куль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2016. №.2. С.155-163.

④ Бернштам Т.А. Приходская жизнь рус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Очерки по церковной этнографии. СПб., 2005.

⑤ Семёнов Д.Г. Воен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на кольском севере 1933-1941 годах: соци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 Вестник Северн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2012. №.6. С.19-22.

住民和全俄各地的移民建立起来的文化的总称”^①），进而将“俄罗斯北方”建构为一个属于俄罗斯的民族文化空间。强调“北方文化”中包含了俄罗斯基因，并且将北方地区升华为一个纯粹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民族文化贮藏室。如，“俄罗斯北方对于俄罗斯来说极为重要，因为很明显，俄罗斯人几个世纪以来追寻的精神、道德、社会文化符号意象，都浓缩在俄罗斯北方的文化之中。”^②

俄罗斯当代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中的民族、宗教、社会研究，总体上倾向于从“人”的角度直接建构北方居民的俄罗斯身份，以及北方民族、北方社会的俄罗斯身份；从“人”的角度确立“俄罗斯北方”在俄罗斯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时间存在感和空间存在感，并通过宗教、信仰、文化等因素，强化“俄罗斯北方”作为俄罗斯多元民族文化空间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份。

（三）文化、哲学、符号学研究

历史、民族、宗教、社会方面的北方研究，倾向于从多角度叙述“北极”与俄罗斯之间的“关联”，而文化、哲学、符号学研究更倾向于身份建构的“区分”环节，建构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独特性。在这一类学术话语中，“俄罗斯北方”概念被频繁重复使用，并且，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阐释，尝试将它体系化，创建一个多层次、多内涵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空间，并通过将这一文化空间与俄罗斯整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进行关联，从北方视角进行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叙述。

比如 2005 年出版的专著《俄罗斯沿海地区的文化：系统研究经验》^③ 尝试构建起一个联结俄罗斯北方沿海文化与全俄普遍民族文化的系统理论模型，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俄罗斯普遍民族文化在北部沿海地区的变异过程，并提供了大量的俄罗斯北方沿海地区的第一手经验材料。专著《俄罗

① Базарова Э.Л.[и др.]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их поморов: опыт систем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Научный мир, 2005.

② Пермиловская А.Б. Деревянные часовни в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традициях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и арктики// Вестник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Свято-Тихонов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5: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и теории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2017. С.69-88.

③ Базарова Э.Л.[и др.]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их поморов: опыт систем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Научный Мир, 2005.

苏联联邦多元文化空间：俄罗斯西北部的文化》^①则将西北部地区作为俄罗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区域和俄罗斯多元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了从古代、中世纪一直到现当代的俄罗斯西北部文化、生态景观，对俄罗斯西北部文化进行类型学研究，其中包括了俄罗斯北方沿海地区海洋相关活动的历史与文化学分析。

杰列彼欣（Н.М. Терехин）从考古学、民族学、文化哲学、宗教仪式等多维研究视阈出发，发表了重要专著《北方形而上学》^②，尝试建立起一个“北方文化哲学体系”，并将其命名为“北方形而上学”。俄罗斯北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叙述，在这一著作中被上升到了哲学高度。兹维亚金（С.А. Звягин）^③认为，俄罗斯北方沿海地区作为社会文化空间，形成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北方”就是作为“元系统”的空间与海洋、沿海地区、岛屿等地理概念共同构成的价值-语义负载单位，因此“俄罗斯北方”作为社会文化空间具有了“文本性”特征。俄罗斯北方空间的本质也不仅限于其行政和领土的边界意义，而是由俄罗斯人民在交流和实践活动中对该文化系统意义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的。“俄罗斯北方”作为俄罗斯社会文化空间，在历史和现实层面对于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和俄罗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代表着一种俄罗斯民族共有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是对俄罗斯民族有特殊意义的空间，也是当代俄罗斯极具战略地位的区域。

加里莫娃（Е.Ш. Галимова）从符号学以及语言学的“文本文化”^④概念切入，梳理了俄罗斯符号学界“北方文本”这一概念自2003年产生以来发

① Мосолова Л.М. Поликультур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ультур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а России. Кн. V/науч. СПб., 2013.

② Терехин Н.М. Метафизика Севера: монография. Архангельск, 2004.

③ Звягин А.С. Морское наследие в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русского севера (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ания и концепты)// Вестник Северн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2014. С.47-52.

④ 洛特曼将文化分为两种：语言文化和文本文化，语言文化“研究文本为的是从中提取出语言的机制，并以此产生新的文本”，而文本文化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已经产生的文本上，在不可分割的整体中来理解和体验”。参见 Ким С.К. Осно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твор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Ю. М. Лотмана.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3; 转引自康澄：《文化及其生存发展的空间》，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第18页。

展的历史,指出,“北方文本”产生于俄罗斯文化中的一种“北方神话”,并将这种“北方神话”描述为由于俄罗斯北方沿海地区与南部内陆地区天然的自然地理差异而导致的一种固有的、对俄罗斯文化起源的独特性认识。^①在欧洲和世界语境中,整个俄罗斯都被这一“北方文本”赋予了独特的“北方”气质,与特定的宗教、神话(如世界尽头、地狱边缘等)、历史(流放、刑罚、死亡)等文化认知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俄北方世界图景。^②

笔者认为,在当代俄罗斯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中,俄罗斯学者多倾向于从文化、哲学、符号学角度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北方话语体系”,兼顾空间和时间,兼涉物质实践与精神空间,倾向于对北方空间进行系统性、体系性的叙述。而从具体议题的研究出发,尝试建构“北方民族文化空间”、“北方文化哲学体系”、“俄罗斯北方元系统”和“北方文本”等系统性概念,则可以说是北方话语体系中最为核心且最具理论深度的部分。

四、当代俄罗斯北极语境中的北方话语体系

如前文所述,当代俄罗斯北极话语体系可以指称俄罗斯北极语境中所有与北极相关的话语表达、话语内容、话语传播以及话语接受。这一体系从时间、空间、道义等维度,表象了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多元内涵,并对当代俄罗斯的北极战略和北极政策进行多角度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叙述。本研究发现,在当代俄罗斯北极话语体系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俄罗斯北方”为核心概念的子话语体系,即“北方话语体系”。

首先,北方话语体系是当代俄罗斯北极话语体系的一个子范畴,更确切地说,是当代俄罗斯学术北极话语体系的一个主要的子范畴(除“北方话语体系”外,学术北极话语体系至少还应包括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区域自然科学研究范畴)。在学术北极话语体系中,俄罗斯学者在文化、哲学、符号学等领域,为在精神层面构建一个完整的“北方话语体系”,已经做出了很多有

^① Галимова Е.Ш. Специфика северного текст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ак локального сверхтекста// Вестник Северного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науки. 2012. №.1. С.121-129.

^② Там же.

益的尝试，形成了“北方民族文化空间”等系统性话语范畴；而历史、民族、宗教、社会等主题的大量学术话语，从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诸多角度拓展了学术北极话语体系的边界，丰富了其内容，建构了“俄罗斯北方”概念在物质、精神层面的广泛内涵；围绕着“俄罗斯北方”概念，当代俄罗斯的“北方话语体系”已经形成。

其次，“俄罗斯北方”这一极具活力的概念，赋予了北方话语体系极强系统性、独立性和延展性。“俄罗斯北方”概念同时表象了俄罗斯国家的北方边界及北极空间，以及一个独立且具有特殊价值的民族文化空间；二者分属自然地理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在时间、空间维度上并不完全重合，甚至在一些具体的语境中，“北方”作为一个隐喻性叙述，覆盖了整个俄罗斯的精神疆域。在俄罗斯北极学术话语体系中，“俄罗斯北方”已经成为一个主要话语。通过对“俄罗斯北方”在时间和空间层面的独特性叙述，这一概念与俄罗斯的自然地理、民族历史、社会文化、民族性格等方面建立了关联，逐渐获得了独立于“俄罗斯北极”的地位。从这一角度看，北方话语体系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在当代俄罗斯学术北极话语体系之外，还以“互文”的形式分布于官方政治北极话语体系、媒体北极话语体系、企业北极话语体系中，形成了广泛而丰富的文本网络和意义体系。本研究主要分析当代俄罗斯北方研究学术文本对北方话语体系的意义建构，而存在于其他文本中有关北方话语的互文性建构，则有待更多学者在未来进行更广泛、深入的研究。

根据学科范畴，本研究初步确立了当代俄罗斯北方话语体系的三条建构路径，具体表现为三大话语链。各话语链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均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子话语体系，主要包括北方历史话语体系，北方民族、宗教、社会话语体系，以及北方文化、哲学、符号学话语体系。（见图1）其中，北方历史话语体系以及北方民族、宗教、社会话语体系，多着眼于具体议题，从多角度如北极地区海军舰队活动史、海洋商贸活动史、海洋科考史、北方小民族的民族志书写、移民问题研究、北方地区东正教与古斯拉夫文化传统关系研究等方面；具体化、加深和拓展北方话语体系的内涵与外延，是俄罗斯北方话语体系形成的基石。而北方文化、哲学、符号学话语体系格局更加庞大，

兼涉物质实践与精神空间，倾向于对北方空间进行系统性、体系性叙述，以广泛的、与具体议题相关的北方研究成果为基础，创造了“北方民族文化空间”、“北方文化哲学体系”、“俄罗斯北方元系统”和“北方文本”等系统性概念。三大话语链相互作用，彼此关联，在当代俄罗斯历史文化语境、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间不断的吸收、转化过程，共同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开放的“北方意义网络”。（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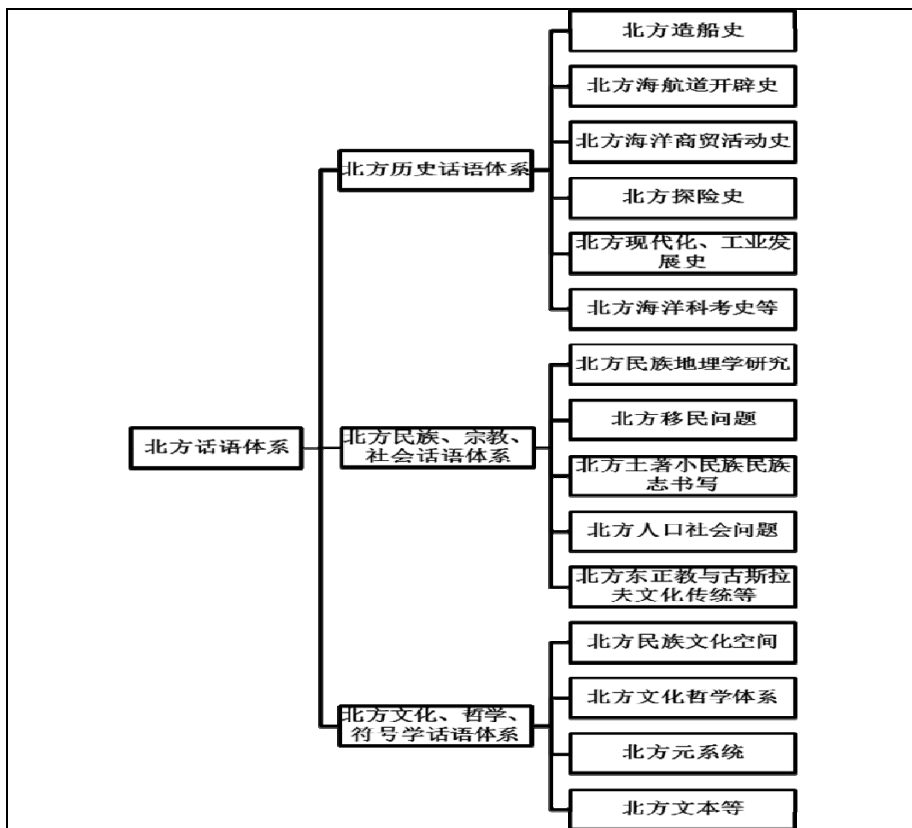


图1 当代俄罗斯“北方话语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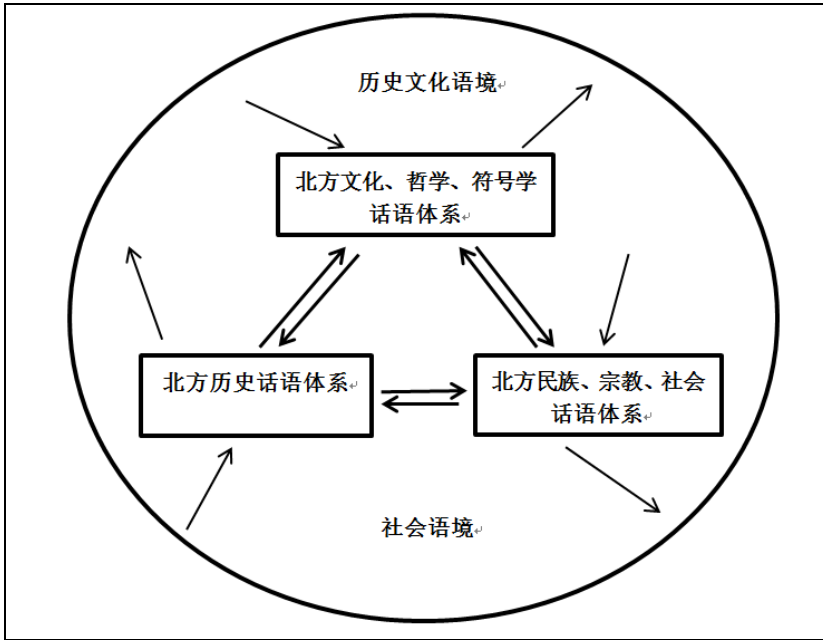


图 2 当代俄罗斯“北方意义网络”

这一北方意义网络，在空间上弱化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北极边界，对这一俄罗斯北方空间进行扩展性叙述：自然空间维度包含北极地区的海洋、岛屿、陆地，并进一步延伸到俄罗斯大陆地区的广义北方；精神空间维度将这一北方空间与俄罗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价值进行关联，形成一个比“俄罗斯北极”更为庞大的、多元的“俄罗斯北方”概念空间；通过这一精神空间的神话性叙述，完成对整个民族文化的起源和散布、对家园感的塑造以及国家边界的界定。^①时间维度上则强调北方空间对整个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之间的联结作用，塑造共同的国家集体记忆，为将来可能的有关“北极大国”身份的自我塑造和愿景叙述提供理据性。北方话语体系及北方意义网络，通过其对当代俄罗斯北极身份的建构过程，持续对俄民众的认知图式产生影响。

①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210 页。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俄罗斯北方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并不仅限于本文讨论的三大话语链。北方话语体系在一些具体的学科、议题上同样极具活力（比如俄罗斯北方小民族的方言研究、语言景观研究、北方神话学研究、传媒研究等等），这些议题有的分布于三大话语链中，形成特定议题框架下的子话语系统；有的可以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建构路径和话语范畴。国家身份的话语建构是一个动态的、不稳定的过程，而北方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同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对当代俄罗斯北方话语体系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更多学者从多学科视角深入挖掘并不断丰富。

北方话语体系深度参与到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建构过程之中，为与“俄罗斯北方”相关的威胁和安全的表象赋予意义，并为相关政策的选择提供合理的说明；通过北方空间将俄罗斯与其他北极、非北极国家进行关联和区分，进行自我和他者的身份建构，并以此为基础选择和制定北极战略、北极政策：首先，北极对于俄罗斯具有显著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体现在自然地理层面，同样体现在民族意识和国家文化层面，尤其是北极与俄罗斯民族价值观之间的关联，因此北极地区应该在俄罗斯国内政策的选择和制定层面享有特殊的优先地位；第二，俄罗斯对于北极也具有显著的独特性，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同北极空间有着特殊的关联，是“最为独特的北极大国”。因此，在国际层面与北极开发、保护、北方海航道等具体议题相关的一切北极事务中，俄罗斯有资格扮演特殊且重要的角色；第三，在身份的区分过程中，通过北方话语体系，与其他北极国家相比，俄罗斯被塑造为北极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区域性大国；与非北极国家相比，俄罗斯则被塑造为最典型、最重要的北极大国；这对于俄罗斯创造北极战略语境、北极制度语境和北极社会语境至关重要，尤其在国内层面。

另外，在北方话语体系中，围绕着“俄罗斯北方”概念形成了一个广阔的语义场，以及与“俄罗斯北方”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北方话语体系的持续传播，有利于建构俄罗斯民众有关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背景知识和认知图式，并在俄罗斯民众的认知中形成习惯性意义。这将对现实层面的俄罗斯北极事务产生显著的影响：战略、政策的官方制定者（言语者）和俄罗斯民众（言语受众）通过北方话语体系，逐渐共享与“俄罗斯北

方”相关的意义体系，缩小二者对于“北方话语”理解的语义差。同时，北方话语体系通过将“俄罗斯北方”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相关联，有利于培养俄罗斯民众对于北极地区的情感认知和认同，进一步促进俄罗斯北极战略、北极政策的顺利实施。

在当代俄罗斯的现实语境中，作为子范畴的“北方话语体系”，与“北极话语体系”之间产生了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并已经在一些特定议程中形成了“意义争夺”的态势。以2019年4月举行的第五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为例，此次论坛举办地的变更以及论坛前后相关话语主体之间的一系列话语互动，均突显了“北方话语体系”在当代俄罗斯现实语境中的重要地位，反映出了其与“北极话语体系”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

2019年1月，在第五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确定由阿尔汉格尔斯克移至圣彼得堡举办后，部分媒体以“如果北极不在北极内发展——那这种发展是什么？”“将北极论坛迁至圣彼得堡不会使其成为‘北极首都’”，“北极问题将在圣彼得堡讨论——为什么不在索契？”等为题，^①质疑圣彼得堡举办国际北极论坛的身份合法性，指出，虽然圣彼得堡在历史上对于北极探索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它并不是“北极城市”，更不可能取代阿尔汉格尔斯克成为“北极首都”。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支持者主要运用“北极话语”，即强调圣彼得堡在地理上并不属于北极城市，因此北极事务的话语权应该掌握在距离北极更近的阿尔汉格尔斯克这里。圣彼得堡方面则更倾向于使用“北方话语”，通过造船史、北极探险史等历史事实，建立圣彼得堡同北极地区的历史关联，并将“北极”概念同“北方”概念关联（如“许多年前，‘伟大的北方探险队’正是从涅瓦河畔出发，行迹遍及整个俄罗斯的北极海岸”^②），通过北方叙述建构圣彼得堡的北极身份。另外，笔者注意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方面也开始注重运用“北方话语”策略，以扩大其影响力，如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长伊戈尔·奥尔洛夫（Игорь Орлов）在2019年1月表示，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曾经是、并且仍然是俄罗斯的北方首都，

① 参见 <https://regnum.ru/news/polit/2556479.html>; <https://regnum.ru/news/polit/2555052.html>; <https://regnum.ru/news/polit/2554617.html>

② Михаил Климентьев. Петербург может стать арктическим центром России – Полтавченко// РИА Новости. 5 декабря 2012. <https://ria.ru/20121205/913471696.html>

我们地区将继续履行其发展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的使命”。^①

2019年4月9日，在第五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的开幕致辞中，普京运用了北方话语，在时间和空间以及现实与文化层面赋予了承办本次论坛的圣彼得堡以俄罗斯“北方首都”之地位（在上一届论坛上，普京则将阿尔汉格尔斯克称为俄罗斯的“北方首都”）：“我诚挚的欢迎各位来到圣彼得堡：俄罗斯的北方首都，一个历史上与传奇的北极探险队紧密相关的城市，一个与这一独特地区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城市，保留着这一地区的自然与文化传统。”并提到：“现在，在这里，就在圣彼得堡，正在建造三艘新的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西伯利亚号’和‘乌拉尔号’。”^②有关圣彼得堡“北方首都”的话语定位以及与历史（如“去年年底，北方海航道的运输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万吨。我想强调的是，这是1987年苏联时期运输量的三倍”）、北方人民生活（如“还应关注北方土著小民族的具体情况”）等议题相关的话语有利于激活“北方话语体系”以及“北方意义网络”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从而在此次国际北极论坛上设置一个具体的“北方语境”。国际场合下的话语沟通都是发生在一定的语境之下，包括历史文化语境、社会结构和言语行为发生的国际背景，还与话语沟通发生的时间、地点等临时环境有关。因此，与“北方话语体系”相关的宏观历史文化语境、社会语境以及来自举办地圣彼得堡（“北方首都”）的微观语境共同构成了此次国际北极论坛的“北方语境”。这一“北方语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此次国际北极论坛中话语议题的产生、各方话语策略的选择以及话语受众对相关议题的认知与理解。

由于北极议题广涉其他议题领域，因此在此次论坛中，普京运用了较为复杂的话语策略进行了多维的关联和框定。首先，作为“国际北极论坛”，“北极话语”在其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如“根据社会经济核心指标，所有北极地区的人民生活质量不能低于全俄平均水平”，“这样的中心将必定会在我们的一个北极区域内建立”，“其中一个挑战是确保经济发展与北极自然

① Губернатор Орлов признал, что Архангельск не потян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рум// ИА REGNUM. 18 январ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polit/2555259.html>

② 有关第五届“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的文本参见：<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0250>。下同。

保护之间的平衡，保护其独特、脆弱的生态系统”等)；同时，通过与俄罗斯即将出台的 2035 年前新版北极发展战略、北纬铁路、北方海航道以及新成立的“远东与北极发展部”等相关议题进行策略性关联，尤其是同时在政策和话语层面将“北极”与“远东”两个宏观战略区域概念进行固定关联(“我们远东发展部的权力得到了延展：现在北极已经成为这一部门职责的一部分”)，普京建构了北极地区对俄罗斯当前整体国家战略的特殊性与极端重要性，并积极塑造一种必须将北极与远东地区一起协调管理或特殊对待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其议程设置的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北极地区”，而是一个更为宏观的、与俄罗斯其他战略区域密切相关的“高纬度地区”(“为了这一地区的综合发展，为了解决高纬度地区独特的、非标准性的任务…”)。因此，普京在此次论坛上有关北极议题的复杂话语策略必须依赖前文所述的“北方语境”。

之后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C. Ниинистё)的发言进一步强化了此次论坛的这一“北方语境”：“在 2013 年的萨列哈尔德和 2017 年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之后，在圣彼得堡举办北极论坛意味着这一论坛正在向北方靠近。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和来自北方国家的同事一起站在台上。”这里，芬兰总统使用了与“北方”概念相关的非常明确的身份话语。他还提到：“与北极有关的主要问题当然是气候变化…在北方，我们是第一个感到变暖的人。”而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Э. Сульберг)同样谈到：“挪威和俄罗斯是邻国，我们一直成功地在北方合作，有共同利益。”

笔者认为，此次将国际北极论坛举办地迁至圣彼得堡这一事件本身以及围绕这一事件产生的话语互动，促使此次北极论坛形成了一个和“北方”相关的稳定语境，而来自芬兰、挪威国家领导人的叙述则反映出了这样的事实：博德罗娃(О.А. Бодрова)所谓的俄罗斯与其他北极国家之间开展合作所必需的“共同的北方身份”^①，在这次国际北极论坛上获得了“他者”的认同，这也可以看作是长期以来俄罗斯语境中的“北方话语体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本次国际北极论坛上的具体体现。

^① Бодрова О.А.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й облик кольского севера в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х печатных изданиях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журналов постперестроеч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Труды Кольск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центра РАН. 2015. №.1(27). С.29-46.

在之后的发言中，普京还运用话语策略巧妙地将更多的国家纳入到北极地缘空间中来，如：“俄罗斯不是北极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在购买力平价和体量方面排名第一……我们现在排在第六位。继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德国之后，我们排在第六位。”显然，在“北极话语体系”中，中国并不是“北极国家”，而是“近北极国家”；但是，由于前文所述的本次国际北极论坛中的“北方语境”的建构以及普京与“北方话语体系”相关的叙述策略，使得这样的话语表述在此次论坛语境中获得了很强的合法性，也为将来俄罗斯可能的与之相关的政策行为提供了理据性。

“北方话语体系”同样被积极运用于此次国际北极论坛期间的相关媒体话语中。比如，在评论谢尔盖·拉夫罗夫有关北极地区安全局势的声明时，列格努姆通讯社（REGNUM）副总编辑伊戈尔·巴甫洛夫斯基（Игорь Павловский）指出“我们的西方合作伙伴担心我们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这是非常奇怪的。只需看看地图就可以知道，北方地区几乎占据了我国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二”，因此“西方需要习惯俄罗斯重返北极的事实”。^①

随着论坛的结束，圣彼得堡与阿尔汉格尔斯克之间的国际北极论坛举办地之争还将继续持续下去。普京在此次论坛上指出将在俄罗斯联邦的“北极区域”内建立研究与教育中心，以支持北极地区的基础科学等方面的发展；而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长伊戈尔·奥尔洛夫（Игорь Орлов）在论坛闭幕后的第二天即表示：“那些了解北极论坛历史的人会明白它的灵魂仍然留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我确信它的身体终将回归灵魂，下一次北极的问题将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被讨论，包括我们热情好客的北方（北极）联邦大学。”^②

笔者认为，随着当代俄罗斯北方话语体系的不断建构与完善，其体系性、独立性将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与特定议题相关的各类俄罗斯北极话语之中。在未来的俄罗斯政治生态中，北极身份的建构过程将越来越多地走出国家层面而进入俄罗斯内部各地方层面。“北方话语体系”和“北极话

① Западy нужно привыкнуть к тому, что Россия вернулась в Арктику – эксперт// ИА REGNUM. 9 апрел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polit/2608206.html>

② 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 губернатор надеется вернуть аркт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ИА REGNUM. 12 апрел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polit/2610605.html>

语体系”也有可能在今后的议程中成为一对竞争性话语体系。北方话语体系将极大地丰富当代俄罗斯的北极话语体系，并赋予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更加多元的内涵。

结语

菲利克斯·布伦斯科特（Felix Berenskoetter）认为，国家的存在是通过自传体叙述，在时间和空间层面进行的自我建构。在时间层面上的自传体叙述包括两个方面，即过去时间和未来时间。对过去时间的叙述表现为国家对集体记忆的塑造，而对未来时间的叙述表现为国家对可能的自我的塑造和远景叙述。在空间层面上的自传体叙述也包括两个方面，即经历过的空间和憧憬的空间。布伦斯科特据此认为，国家的自传体叙述满足了自我连续感的需要，即，“我”作为一种存在，必须具有稳定感以及连续的去、现在和未来。^①

俄罗斯的北方研究，正是一种北极语境和海洋文化学术语境中特殊的“自传体叙述”。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北方话语体系”，在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对俄罗斯当代国家身份的建构，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通过时间层面上对历史实践、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叙述，以及在空间层面上对多元民族文化空间中北方空间的神话性叙述，以北极和北方的视角塑造俄罗斯国家集体记忆，重构俄罗斯的北方身份。由于“俄罗斯北方”作为精神文化空间的边界模糊性，以及将“北方”与俄罗斯整体精神文化进行关联的叙述策略，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以及“北方话语体系”完成了对于俄罗斯北极空间的扩展性叙述。

北极战略是当代俄罗斯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而北极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不断建构，俄罗斯北方话语体系与北极话语体系则是理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及其北极战略的关键。关于俄罗斯北极战略以及“北极大国”身份建构的研究，我们不仅要关注官方政治话语、媒体话语中代表性的首要文本，北方研究学术话语同样值得关注，它们深层次参

^① 孙吉胜：《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10页。

与到了俄罗斯“北极大国”国家身份的话语建构过程之中。作为学术话语，俄罗斯北方研究的主要指向为自我身份塑造中的“过去”维度。而官方政治话语、媒体话语和企业话语则主要参与自我身份塑造中的“现在”维度和“未来”维度，多种话语共同建构了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的国家身份。

俄罗斯官方话语中频繁出现的“俄罗斯北极”概念，以及北方研究中重复使用的“俄罗斯北方”概念，从现实和精神层面框定并强化了北极地区在俄罗斯民众认知中的地位。“俄罗斯北方”这一概念的独特性与内涵的丰富性，使得这一空间成为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的过去、现在、未来维度之间的桥梁。通过北方话语体系，俄罗斯能够完成具有稳定感以及连续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的存在，从而推进其“北极大国”身份的建构进程。

正如德里达所说的所有文本都具有“不确定性”，身份和政策之间通过话语形成的互构关系，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平衡的过程，可能随时因受到挑战而改变。由于北极地区对于 21 世纪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可以预见，随着俄罗斯北极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推进，俄罗斯“北极大国”国家身份叙述将被不断赋予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当代俄罗斯北极语境中的“北方话语体系”与“北极话语体系”，是解读当代俄罗斯国家身份及其北极战略未来走向的核心要素，值得国内学者持续予以关注。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o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ssian Arctic strategy and ocean strategy, the issue of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related to the Arctic has become a core one. “Northern Studies” is a region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rend conducted by contemporary Russian academic circles focusing on the Arctic. The Arctic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when Russia redefines its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Soviet era. Russia is shaped as “the most unique Arctic power in the world”.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academic discourse of the Arctic” within the Northern Studies is key to construction of this national identity. By repeatedly employing such key concepts as “Russia’s North”, and adopting “north” instead of “Arctic”, the academia endows Russia with a wider natural and spiritual space. As a result,

a unique “northern discourse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Academic Arctic discourse, together with official Arctic discourse, media Arctic discourse and enterprises’ Arctic discourse shape Russia’s national identity as “great Arctic power”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Key Words】 Russia’s North,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Russian Arctic Strategy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тро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вязанной с Арктикой, является ключевым вопросом в реализ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океан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и Арк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Север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это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рк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проводимые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российским научным сообществом. Арктик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важ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переопре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ей сво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Россия становится «самой уникальной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державой в мир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аркти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й «северны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является ключевым фактором в построении дан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Повторно используя основную концепцию и базовый дискурс «севера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заменило стратегию «Арктики» стратегией «Севера», тем самым сформировав более широкий спектр природных и духовны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 и создав уникальную «северную дискурсивную систему».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дискурс «севе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месте с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арктическим дискурсом, арктическим дискурсом СМИ и корпоративным арктическим дискурсом создают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державы» «прошлог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и «будущего».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евер Росс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России, северная дискурсивная система, арктическая дискурсивная систем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中亚问题研究

“分而治之”还是“自下而上” ——再议苏联初期的中亚民族划界

施越*

【内容提要】当今中亚的政治版图，主要由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的民族划界工作所奠定。关于该事件性质及其历史影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民族划界首先具有满足中亚各民族自决诉求、巩固新社会制度的意义；其次，俄共（布）中央同时有着对中亚边疆居民分而治之的考虑，即以塑造民族共和国的方式强化民族间差异，消解宗教传统和“双泛”思潮的历史影响。本文在综合各国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档案研究成果，提出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进程可以分为1924-1925年的初次划界和1929年、1936年两次调整。初次划界进程主要由中亚本地各族党员干部提议，并通过反复争论，达成中亚南部划界方案。俄共（布）中央在这一阶段并未对划界进程进行积极干预，所谓“分而治之”的意图在初次划界过程中并无显著表现。但1926年以后，苏联对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三个民族自治单位行政隶属和行政级别的变更，则更多体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意志。2016年末以来，苏联初期民族划界遗留的费尔干纳盆地飞地问题，在乌、吉、塔三国外交关系升温的背景下出现积极变化。

【关键词】苏联中亚 中亚民族划界 乌兹别克斯坦 分而治之

【中图分类号】D73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3-0095-(28)

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在中亚南部开展民族划界工作，将当时该

* 施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地区存在的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БНСР）、花刺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ХНСР）依照民族自决的政治理念，重新划分为若干民族自治行政单位。^①这一进程彻底改变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沙俄征服中亚以降该地区存在的行政区划，为后来中亚的五个民族共和国划定了边界，也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因边界、跨界民族和资源分配而起的纷争埋下了伏笔。作为塑造当代中亚五国边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亚民族划界进程由谁主导？应该如何评价其性质和历史影响？本文将新的史料呈现民族划界进程中地方民族党政精英与苏联中央政权的动态博弈，修正此前关于苏联中亚民族划界乃至民族政策的传统叙事。

关于民族划界的性质和影响，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争论。苏联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为基础，强调中亚南部的民族划界实现了中亚各民族长久以来建立国家的诉求，并将民族平等的原则付诸实践，为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进步创造了条件。^②

而国内一些学者则认为，俄共（布）和苏联中央出于现实主义政治考量，以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组建为由，刻意在中亚南部划出犬牙交错的边界、制造多个加盟共和国，是为了令其相互制衡。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往往强调，十月革命之前中亚各族群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而受伊斯兰教影响较大，进而认为存在着遍及中亚各地的穆斯林认同。苏联初期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的组建则出自联盟中央的指令，有违“中亚各民族自然分布和民族集中居住区域划分”。^③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学者们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划分首

① 本文中使用的“中亚”对应俄文概念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而用“中亚南部”翻译俄文术语 Средняя Азия。区分“中亚”与“中亚南部”，是因为主导1924年划界进程的俄共（布）中央中亚局（Средазбюро）所辖范围被称为“Средняя Азия（本文暂译为中亚南部）”，包含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Бухар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НСР）、花刺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Хорезм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ХНСР）。但并不包括1920年建立的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疆域（即今日哈萨克斯坦的前身）。关于上述两个俄文术语的区别，参见许涛：《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第7-9页。

② 例如 Муминова И.М. ред.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ашкент, 1974; Гордиенко А.А. Созд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1959; Дегтяренко Н.Д. 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Москва, 1960.

③ 前辈学者王智娟教授称民族划界为“办公室的构思和决定”，但其论文中并没有详细

先在政治上削弱了伊斯兰教和近代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影响，以各加盟共和国主体民族的文化淡化宗教的社会地位，有利于消除中亚地区中世纪社会政治残余，稳定苏维埃政权，为后续的社会经济建设奠定基础。但这种在大俄罗斯主义影响下人为制造民族集团的方式，将“本来界限模糊的民族集团造成完整的民族”，强化了民族意识和独立情绪，为苏联解体之后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独立创造了条件。^①

上述观点与冷战时期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遥相呼应。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欧美学者普遍认为，苏联中央在中亚实施民族划界，是企图用塑造若干政治群体的方式防止出现强大的地方民族势力，意在分而治之。其中，美国学者奥尔沃斯（Edward Allworth）的观点流传较广，他认为，民族划界的主要目标是分化势力较大的乌兹别克族，因为在历史上“（乌兹别克人）发挥着同化其他族裔的作用”。^②

但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新近的研究则挑战了这一观点。新的研究通过利用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新开放的档案史料，提出了如下新观点。首先，前人的“分而治之论”并没有实证依据。民族划界过程实际由中

论证该事件是完全在办公室中构思和决定的。参见王智娟：“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东欧中亚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91 页。文中，作者的这一论断仅有德国作者拜米尔扎·海义特（Baymirza Hayit）一篇论文中的一段话作为依据。海义特于 1917 年出生于纳曼干，1939 年毕业于塔什干大学，同年参加红军，驻扎波兰。1941 年他被德军俘虏，后为之效力，成为纳粹突厥斯坦军团（Turkistanische Legion）的军官。战后定居西德，撰写了大量关于中亚近代历史和苏联统治政策的文章和专著。

① 参见王智娟：“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东欧中亚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91 页；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60-161 页；田霞：“苏联对中亚民族的划界及其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第 51 页。国内学界关于苏联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新近出版的著作依然沿用该观点。这种叙事思路与西方学界冷战时期至 90 年代初期的文献论点相互印证，共同认定“这五个民族和五个共和国的划分方案，是在办公室里构思和决定的。”参见左凤荣、刘显忠：《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91-92 页。

② Edward Allworth, *The Modern Uzbeks: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p.196; 类似观点的著作参见 Olaf Caroe, *Soviet Empire: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and Stalinism*,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4; Robert Conquest, *The Last Empire: 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62;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Islam and the Russian Empire: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亚本地共产党内各族精英主导，俄共（布）和苏联中央对中亚民族划界机构上报的方案并未作重大改动，事先也并未布局刻意制造各族党内精英之间的不和。其次，中亚各民族自治单位之间复杂的边界划分，主要是各族干部反复争论妥协的结果。尽管一些地区的边界划分最终经由中央仲裁决定，但大部分的边界由各族干部根据民族构成和经济整合原则讨论决定。^①持上述观点的研究者，尽管指出了地方民族干部在中亚民族划界初期的历史作用，但首先，他们的研究未能系统地呈现该进程中争论的主体和焦点议题。其次，上述观点忽略了 1925 年以后历次中亚民族自治单位的行政隶属和行政级别变更，片面地以民族划界初期出现的情况为整个历史进程定性。

在综合分析前人学者提供的史料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该事件需要细分为两个阶段讨论：1924 年至 1925 年初，第一阶段的民族划界主要由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刺子模三地的本地党员干部提议。具体地区的边界划分也主要通过各民族干部之间的争论达成方案。在这一阶段，俄共（布）并没有主动干预民族划界的细节。第一阶段划界结果实际上有利于当时在中亚地区影响力较大的乌兹别克族党政精英。新成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所辖行政版图，涵盖中亚南部所有重要的农耕区。此前研究文献中强调的分而治之的意图，至少在 1925 年划界结果中体现得并不明显。

而在第二阶段，即 1926 至 1936 年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哈萨克民族自治单位的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变动，则呈现与第一阶段大相径庭的权力运作图景。其中，1926 年吉尔吉斯自治州从乌兹别克共和国^②划入俄罗斯联邦并升格为自治共和国、1929 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从乌兹别克共和国独立并接收

① 持此观点的著作包括 Arne Haugen,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Republic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Francine Hirsch, *Empire of Nations: Ethnographic Knowledge and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Adeeb Khalid, *Making Uzbekistan: Nation, 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USS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将民族自治区域科层化，自上而下主要分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ССР），研究文献中一般称为“加盟共和国”；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Автоном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АССР），简称自治共和国；自治州（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三个行政层级。为行文便利起见，本文中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为“共和国”，如下文将 1924 年成立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为“乌兹别克共和国”；而“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为“自治共和国”。

其苦盖州两大事件，则确定了今日费尔干纳盆地犬牙交错的国界格局。而1936年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则最终奠定了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版图。本文认为，相比1924-1925年的初次划界，1929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和苦盖州并入以及1936年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升格，更多地受到了苏联中央决策的直接影响，其中不排除存在分而治之、压制潜在的地方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考虑。

一、革命、内战与秩序的重建：1924年民族划界的历史背景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震撼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爆发。三天之后，俄国突厥斯坦总督区首府塔什干的苏维埃组织发动起义，并在11月中旬夺取政权，组建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但随着俄欧地区陷入内战，突厥斯坦苏维埃无法得到外援，苏维埃政权的控制范围仅限于锡尔河省、撒马尔罕省和外里海省俄罗斯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和矿区。

沙俄时期保留为帝国藩属的布哈拉埃米尔国和希瓦汗国并未直接受到十月革命的冲击。早在1917年4月，末代布哈拉埃米尔阿利姆汗（Said Alim Khan）^①便在内部政治博弈中将境内的革新知识分子（史称“青年布哈拉党人”）逮捕或驱逐出境。而在希瓦，土库曼部落首领朱奈德汗（Junaid Khan）则在1918年1月发动政变，废立汗王，建立部落军事独裁，并镇压希瓦的革新知识分子（“青年希瓦党人”）。1918年春，突厥斯坦苏维埃曾尝试突袭布哈拉，但行动失败，革命陷入僵局。^②

在费尔干纳省，突厥斯坦地区的本地民族精英组建临时政府，史称“浩罕自治政府（Кокандская автономия）”，与在塔什干的苏维埃政府分庭抗礼。^③尽管该政权因内耗和缺乏外援，在1918年2月被塔什干苏维埃军队消灭，但苏维埃的军事行动和战后清洗行为激起当地居民的反抗。1918年以

① 大多数情况下，本文内容涉及的中亚近代历史人物、地域和机构的译名参考《中亚通史·现代卷》所开先例。波斯文术语采用《国际中东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JMES）》的拉丁转写规范。

② Adeb Khalid, *Making Uzbekistan: Nation, 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USS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63-64, 119-120.

③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71-75页。

后，费尔干纳盆地长期为各路巴斯马奇运动组织所盘踞。直到 1920 年中期伏龙芝领导的红军南下清剿，历时数载，才基本平定局势。^①

布哈拉与希瓦的革命也在南下的红军支援下展开。利用两政权内部势力的嫌隙，以及青年革新派知识分子的协助，红军先后于 1920 年 1 月和 9 月推翻希瓦的朱奈德汗和布哈拉的埃米尔政权，并支持建立了花刺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ХНСР）^②和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БНСР）。^③加上 1918 年 5 月成立的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Туркестан АССР）和 1920 年成立的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Киргиз АССР）^④，中亚各地基本为苏维埃政权所控制。

新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心远在莫斯科的俄共（布）能有效掌控中亚南部的地方局势。革命和内战时期，红军的地方盟友不可避免地持有地方民族主义立场：尽管革命成功后，希瓦和布哈拉的青年革新知识分子均加入了俄罗斯共产党，并成为两地新政府中的高层官员，但他们采取的政策和宣传口径更贴近同时期土耳其和伊朗的世俗民族主义现代化路线。^⑤

此外，权力更迭和激进的社会改革，在一些地区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

①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 115-127 页。

② 希瓦汗国建立于 16 世纪初，因周边为沙漠包围，易守难攻，该政权存活至 1870 年代。1873 年为沙俄军队征服后，希瓦汗国成为沙俄的受保护国。“花刺子模”（Khorezm）一名来自古代阿姆河下游地区的波斯语称呼。12-13 世纪该地区兴起闻名于西亚的花刺子模沙阿（Khwarazm Shah）政权，后亡于西征的蒙古军队之手。

③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 102-109 页。

④ 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均隶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РСФСР）。关于“吉尔吉斯”一词，自十七世纪以降至 1925 年 5 月，“吉尔吉斯”（Kirgiz）为俄文文献中对哈萨克草原和天山山谷间游牧人的称呼，以添加修饰成分来区分具体指代的游牧人群，如“大帐吉尔吉斯（Киргиз большой орды，即今哈萨克族大玉兹）”、“卡拉吉尔吉斯（Каракиргиз，即今吉尔吉斯族）”等。在不添加修饰成分的情况下，1925 年 5 月以前的俄文文献中，“吉尔吉斯”一词一般指代哈萨克族；“卡拉吉尔吉斯”一般指代吉尔吉斯族。1925 年 3 月，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恢复吉尔吉斯（Кыргыз）族名，并宣布吉尔吉斯自治州正式成立。1925 年 5 月 25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恢复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的族名。由此，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两族的族名沿用至今。本文中，涉及 1925 年 5 月以前的事件，笔者均用“吉尔吉斯”和“卡拉吉尔吉斯”；1925 年 5 月之后则改用“哈萨克”与“吉尔吉斯”，以符合历史文献记载。关于 1925 年 5 月族名更改，参见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 156 页。

⑤ 关于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现代化改革政策，参见 Adeb Khalid, *Making Uzbekistan: Nation, 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USS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27-142.

1921年3月花刺子模发生的“三月事变”，正是该时期民族矛盾的具体表现。事件源于花刺子模新政府内部乌兹别克族和土库曼族之间的对立：1920年9月，包括花刺子模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戈奇马梅德汗在内的80余名土库曼部落首领被认定试图发动政变，因此惨遭当局杀害。这一事件引发花刺子模国内土库曼游牧人与定居的乌兹别克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暴力冲突一触即发。为应对局面，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遣特别使团到花刺子模。他们在驻扎当地的红军支持下，改组党和政府机构。为制造舆论，1921年3月，特别使团和红军鼓动花刺子模首府希瓦城内的反政府游行示威，并借此解散花刺子模人民委员会，另立五人组成的临时革命委员会。至1921年5月下半月，花刺子模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希瓦城召开，选举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特别使团初步完成了对花刺子模党政机构的重组。^①

花刺子模“三月事变”震撼了布哈拉地方民族主义高层精英。布哈拉共产党内的左翼开始清洗有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党员，而包括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乌·霍贾耶夫(Усман Ходжаев)和陆军人民委员阿里福夫(Абдухамид Арифов)等右翼人士则与俄共(布)决裂。其中一些人通过阿富汗出逃，另一些则成为巴斯马奇运动骨干，在边境地区组织对红军的袭击。可见，尽管1920年俄国内战结束，但苏维埃政权在中亚南部的统治尚未稳固。地方民族主义势力与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是阻碍政权稳定的主要因素。

1921年花刺子模“三月事变”的另一历史影响，是以民族自治原则建立行政机构这一现象的出现。“三月事变”之后，花刺子模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决议中写入原则：“花刺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每个民族都有权实行具有相应机构的地方自治。”^②与此相应，会后花刺子模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土库曼局和哈萨克-卡拉卡尔帕克局。布哈拉也模仿花刺子模建立人民委员会下属的民族自治机构，吸收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和哈萨克人代表进入政府。而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土库曼人牧区，也于同年划设土库曼州(Туркме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因此，在1924年正式开始重组民族共和国之前，

① 关于花刺子模三月事变，参见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110-112页。

②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28页。

中亚南部各共和国就已经有了以民族自治原则划设行政机构的先例。

1921年希瓦和布哈拉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引起了俄共（布）中央的警惕。为加强对中亚南部的控制，1922年初，布哈拉和花刺子模共和国共产党作为州级组织被吸纳入俄共（布）。^①同年5月19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将原派出机关突厥斯坦局（Туркбюро）^②改组为管辖中亚南部全境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中亚局（Средазбюро ЦК РКП(б)），其成员由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刺子模三国党内高层干部组成。^③1923年3月，突厥斯坦、布哈拉、花拉子模三国代表在塔什干举行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亚局领导下的中亚经济委员会（СредазЭКОСО），其职能是协调三国经济和财政政策。此外，该会议决定将布哈拉与花刺子模两国发行的货币与俄罗斯联邦（РСФСР）的货币相统一，还建立管理外贸、铁路运输、棉花生产、水利灌溉等的工作机构。^④在整合经济活动的基础之上，俄共（布）中亚局逐渐成为中亚南部苏维埃政权的中枢机构，并在1924年领导中亚民族划界工作。

二、1924年民族划界的进程

几乎所有探讨1924年中亚民族划界问题的著作，都会提到1920年列宁对中央政治局《关于俄共（布）在土耳其斯坦的任务》^⑤草案的批示，这意味着早在1920年俄共（布）政治局便关注中亚政治。但是，当时突厥斯坦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320页。

② 1920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九大之后，决定成立俄共（布）突厥斯坦局（Туркбюро），为党中央的地方行省分局。其行政管辖范围对应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疆域，与本地的突厥斯坦共产党配合工作，落实俄共（布）中央的民族政策。参见 Тальская О.Д. Роль Средазбюро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советской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1920–1930-х гг.// Проблемный анализ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ое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е: политолог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2015. No.4. С.107-108.

③ 关于中亚局管辖的地域范围，由于受到中文语境中“中亚”概念的干扰，有的学者误认为该机构有权管辖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境内事务。实际上，下文中对1924年6月4日会议的考察将表明，中亚局的实际辖境仅限于本文中所指中亚南部（Средняя Азия）。

④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320页。

⑤ “土耳其斯坦”是先前一些译者对俄文“突厥斯坦（Туркестан）”一词的翻译。笔者在本文中均译为“突厥斯坦”。关于两种译法的优劣，参见孟楠：《俄国对中亚统治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政局未稳，布哈拉与希瓦的革命尚未完全开展，故草案中涉及民族划界的工作被暂时搁置。在这份批示中，列宁明确写道“将其（土耳其斯坦）分为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①但在6月22日的另外一份批示中，列宁又提出“不要预先决定把共和国分为3部分。”^②秉持1924年民族划界“分而治之”论点的学者，往往以这两份批示为依据，强调俄共（布）中央在划界中的决定性作用。^③但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批示中仅仅提到乌兹别克、吉尔吉斯（Киргиз）和土库曼三个族名，那何以最终划界结果多出吉尔吉斯（Кыргы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卡拉卡尔帕克（Каракалпак）自治共和国？显然，民族划界的过程并非完全由中央预先计划而地方被动执行。要阐明这一点，首先需要回顾中亚民族划界的整体进程。

1923年俄共（布）十二大召开以后，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和花刺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逐渐开始讨论民族划界的问题。1924年1月举行的第十二次突厥斯坦苏维埃代表大会特别强调此事，并在会后向俄共（布）中央提出该问题。1924年1月3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Оргбюро ЦК РКП(б)）会议上讨论中亚民族划界问题，并委托鲁祖塔克（Я.Э. Рудзутак）赴塔什干市召集布哈拉、花刺子模和突厥斯坦的负责人讨论。^④经过动员，布哈拉和花刺子模的党内统一了意见，同意以民族原则将中亚南部划分为若干民族共和国。

1924年3月10日，首次与民族划界相关的重要会议在塔什干市召开，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以及塔什干市部分党政干部出席该联席会议。会议由中亚局委员兼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拉希姆巴耶夫（А. Рахимбаев）做报告，阐述将突厥斯坦依民族原则划分边界的必要性。该会议形成了将突厥斯坦划分为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两个加盟共和国的意见。在经过花刺子模和布哈拉两地党和苏维埃干部讨论之后，突厥斯坦共产党的划界报告上报中央审议。

① 《列宁文稿》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84页。

② 同上，第254页。

③ 王智娟：“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2期，第86-87页。

④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第321页。

1924年4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上述问题。会议责成中亚局草拟中亚民族划界和组建民族自治单位的方案，并准备相关地图资料。因1924年5月即将召开俄共（布）十三大，政治局同时要求中亚南部三国的代表团准备相关资料呈送大会。

在初步研究之后，中亚局与突厥斯坦共产党于4月28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划界事宜，下设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吉尔吉斯等分委会，处理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各自民族居住区的划分问题。

5月11日，中亚局再次召开会议并形成划界草案，包括以下要点：（1）有必要在布哈拉人民共和国、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花刺子模苏维埃共和国按照民族居住区划界。（2）组建：a.独立的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共和国，加入苏联；б.塔吉克自治州作为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部分；в.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г.居住在突厥斯坦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加入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①该草案确定的三个民族共和国加两个民族自治州的格局，成为后来中亚政治版图的基础。

上述5月11日中亚局的草案于6月12日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亚共和国（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刺子模）的民族划分》的决议。与中亚局的草案相比，该决议仅做了一点修改：“花刺子模共和国在划出土库曼人居住区以后，继续保留在原先的边界之内。”^②而这一条修改在9月25日俄共（布）会议的补充决定中被取消，整个花刺子模共和国被列入划界计划。此外，补充决定要求组建新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作为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的一部分；将塔吉克自治州升格为塔吉克自治共和国，依然作为乌兹别克共和国的组成部分。

6月12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民族划界方案的起草阶段基本结束。1924年7月至9月，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和花刺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召开会议，依照政治局决定落实划界的边界细节，确认各边境地区人群的族裔归属，分配公共财产，准备组建新的民族自治单位。同

① Дегтяренко Н.Д. Развитие Таджикиск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1960. С.65. 转引自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152页。

②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152页。

时各共和国的党政机关积极宣传民族划界的政治意义。1924年10月至12月，各民族共和国的临时领导机构纷纷建立，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刺子模三国的权力机关停止活动。权力移交给新成立的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共和国的革命委员会，由后者筹备1925年初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党政机关领导人。

由此可见，1924年民族划界的方案酝酿阶段实际仅持续不到半年（1924年2月至6月）。6月12日俄共（布）政治局会议将中亚局的草案确定为划界的正式方案。此后，除了新组建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和将塔吉克自治州升格以外，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并未对中亚局提交的草案做出明显改动。实质性的讨论、争议和协商过程，主要发生在中亚局与中亚南部三共和国的高层党政干部之间。而最后形成草案的复杂程度，也远非列宁的“一分为三”方案所能比拟。因此，1924年中亚民族划界并非俄共（布）中央“办公室的构思和决定”。对此进程更好的描述是，俄共（布）中央顺应当时欧亚大陆盛行的民族主义潮流，以民族划界为契机，通过建立民族自治单位来巩固边疆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并为以后的土地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基础。因此，在具体的民族划界过程中，俄共（布）中央退居幕后，由中亚局的领导人担任仲裁者，在中亚南部各族党政干部的划分方案中取折中路线，最终交由中央批准。这一情形充分反映在1924年6月4日中亚局下属划界专门委员会的会议中。下文将以对该会议的考察重新阐释1924年中亚民族划界的性质。

三、1924年苏联民族划界的微观分析 ——以6月4日专门委员会会议为例

1924年4月5日中央政治局授权中亚局起草组建民族共和国的草案之后，中亚局于4月28日联席会议上成立划界专门委员会讨论划界方案。受到苏联学者戈尔季延科（А.А. Гордиенко）著作的影响，先前的文献往往只关注5月11日中亚局提出的方案，而无从知晓方案提出前后的会议讨论。^①所幸，塔吉克斯坦学者玛索夫（Рахим Масов）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刊布了

^① Гордиенко А.А. Созд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Госюриздат, 1959.

从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ГАСПИ）抄录的档案，其中包含 1924 年 6 月 4 日划界专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全文。^①该会议触及几乎所有 1924 年划界中涉及的重要争议，而且进行了四轮具有实质意义的投票。鉴于该会议日期距离 6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之间仅有不到一周的时间，笔者认为，此次会议的决议与中亚局最终呈递给中央政治局的草案基本一致。因此，该会议记录全文对于了解 1924 年民族划界有着重要的意义。

1924 年 6 月 4 日划界专门委员会会议由中亚局副局长卡尔克林（О. Карклин）主持。与会代表（主持人在内）共 18 人，包括当时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拉子模三国的各族最高级别的党政干部（主要成员参见表 1）。^②这些成员在 6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后，分赴各地领导组织新成立自治单位的工作，并在 1925 年各自治单位成立后成为其党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此次会议为专门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③会议记录开篇主持人的发言暗示，第一次会议已经审议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吉尔吉斯^④三个分委会^⑤提出的划界草案。第二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一个相对成熟的草案为基础，综合其他代表的意见，形成具有决议性质的草案。主持人卡尔克林在开场白中就确定，会议以乌兹别克分委会的草案为讨论基础。根据乌兹别克族代表拉希姆巴耶夫的陈述，该草案包含以下要点：

（1）建立独立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其领土包含布哈拉乌兹别克人居住区（不包括查尔朱伊和克尔奇）、花刺子模乌兹别克人居住区、撒马尔罕乌兹别克人居住区（不包括吉扎克县的五个游牧乡）、费尔干纳乌兹别克人居住区（不包括卡拉吉尔吉人所在山区）、塔什干乌兹别克人居住区（包括

① 会议记录原件保存于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参见 РГАСПИ ф.62, оп.2, д.100, л.9-39. 转引自 Масов Р.М. Таджики: история с грифом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Душанбе, 2014. С.166-200.

② 但从会议投票情况来看，并非所有发言的代表都有投票权。

③ Масов Р.М. Таджики: история с грифом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С.166.

④ 会议记录中的“吉尔吉斯”一般指 1924 年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吉尔吉人（即 1925 年后的哈萨克族），主要分布于锡尔河州和七河州。

⑤ 中亚局成立的划界专门委员根据中亚南部的民族构成，最初下设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分委会、后增设卡拉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卡拉卡尔帕克分委会。

塔什干县和米尔扎楚尔县)；(2) 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建立塔吉克自治州；(3) 应该建立土库曼共和国，包括土尔克明尼亚(Туркмения)、布哈拉和花刺子模的土库曼人居住区；(4) 应该建立卡拉吉尔吉斯的自治组织，将七河州、锡尔河州、费尔干纳州的卡拉吉尔吉斯人合为一体，但这个问题应该由卡拉吉尔吉斯人自己决定；(5) 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共和国都应该直接加入苏联，且相互之间保持经济联系；(6) 坚决反对建立中亚联邦(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表 1 1924 年 6 月 4 日划界专门委员会与会主要代表^①

姓名	族属	时任职务	驻地
卡尔克林 (О. Карклин)	拉脱维亚	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塔什干市
伊斯拉莫夫 (Р. Исламов)	乌兹别克	突厥斯坦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	塔什干市
拉希姆巴耶夫 (А. Рахимбаев)	乌兹别克	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	塔什干市
费·霍贾耶夫 (Ф. Ходжаев)	乌兹别克	布哈拉部长会议主席	布哈拉市
霍贾诺夫 (С. Ходжанов)	吉尔吉斯	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书记；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人民农业委员	塔什干市
雷斯库洛夫 (Т. Рыскулов)	吉尔吉斯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东局副局长	莫斯科市
阿卜杜拉赫曼诺夫 (Абдурахманов)	卡拉吉尔吉斯	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责任书记	塔什干市
阿塔巴耶夫 (К. Атабаев)	土库曼	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布哈拉部长会议副主席	布哈拉市
艾塔科夫 (Н. Айтаков)	土库曼	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	塔什干市
阿金纳耶夫 (К. Адинаев)	花刺子模乌兹别克	花刺子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希瓦市
阿卜杜萨拉莫夫 (Абдусалалмов)	花刺子模乌兹别克	花刺子模共和国驻莫斯科全权代表	莫斯科市

会议记录文件中没有记载吉尔吉斯族代表霍贾诺夫和土库曼族代表阿塔巴耶夫关于其分委会草案的陈述。但通过综合讨论部分与会代表的发言，

^① 本表为笔者对会议记录中所见代表个人信息的整理，参见 Масов Р.М. Таджики: история с грифом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С.166-200.

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吉尔吉斯分委会和土库曼分委会草案的要点。土库曼分委会的草案提出，要求成立独立的土库曼共和国（包括突厥斯坦、布哈拉和希瓦的土库曼人居住区）并加入苏联。在经济方面，因担忧主要由牧区构成的土库曼共和国难以自立，草案要求加强新共和国与中亚南部其他行政单位的经济联系。土库曼分委会草案争议较大的诉求，是将阿姆河右岸的游牧区也并入土库曼共和国，这一点遭到一些乌兹别克族代表的反对。但会议过程中，该议题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因为乌兹别克分委会和土库曼分委会的草案中，大部分要点是相互兼容的。

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吉尔吉斯分委会提出的草案。该草案独树一帜，提出一系列争议极大的议题，主要包括以下论点：（1）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吉尔吉斯人居住区（主要是七河州与锡尔河州）并入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Киргизская АССР，其辖境包含今日哈萨克草原大部分地区）；（2）塔什干市及其周边的塔什干县、米尔扎楚尔县吉尔吉斯人口占多数，应该一并归入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且塔什干市定为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首都；（3）中亚各共和国应中止民族划界，以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和花刺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身份组建中亚联邦（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上述三点提议中，第一条与乌兹别克分委会的观点基本一致。第三条则遭到除吉尔吉斯族代表外几乎所有代表的反对，成为此次会议的论战焦点。中亚联邦的概念主要由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族党员霍贾诺夫（Султанбек Ходжанов，1894-1938）提出。他认为，中亚各行政单位（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布哈拉和花刺子模共和国）应参照 1922 年成立的外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联邦（Закавказская СФСР）组建一个覆盖整个中亚的中亚联邦，以维系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①霍贾诺夫明确表示，以民族原则划分共和国会造成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该观点同时遭到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和卡拉吉尔吉斯族代表的强烈反对，因为三族党内精英均将建立民族共和国作为各自草案的基本诉求。因此与会代表以 9：2 的投票

^① A.A. Muratuly and T. Hazretaly, “S. Khojanov and the Phenomenon of National Communism in Central Asia and Kazakhstan in the 20-ies. XX Century”, *Asian Social Science*, 2014, No.2, p.97.

结果否决该提案。否决该议案的九位与会代表中，除主席卡尔克林（拉脱维亚族）以外，有四位乌兹别克族代表、两位土库曼族代表，以及唯一的一位卡拉吉尔吉斯族代表。^①

吉尔吉斯分委会的第二点提议（关于塔什干市及周边地区的行政隶属）则遭到会场中乌兹别克族代表的一致反对。尽管乌兹别克分委会草案中支持将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吉尔吉斯人居住区划为自治区域，且没有反对该区域并入当时以奥伦堡为中心的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但乌兹别克族代表坚决反对将塔什干市及其周边县域划入吉尔吉斯人居住区。双方代表一度为塔什干市及周边的塔什干县和米尔扎楚尔县的族群人口比例争论不休。^②最终投票时，乌兹别克一方的观点以 6: 2 的票数占优势，会议同意塔什干保留在筹建中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内。显然，一部分与会代表在这一问题上选择了弃权。可能是作为补偿，在决定是否将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吉尔吉斯人组建为民族自治单位时，相关提案以 7: 0 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即无人反对。

此外，该会议还就是否成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和塔吉克自治州进行了投票。两个提案均获得多数票通过。会上，花刺子模共和国的代表提出，在划出民族自治区域后，保留该共和国建制。该提议被会议主席忽略，并未付诸表决。但 6 月 12 日和 9 月 25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解决了这一问题。

从事后角度看，对比乌兹别克分委会、土库曼分委会和吉尔吉斯分委会

① Масов Р. М. Таджики: история с грифом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Душанбе, 2014. С.187. 尽管会议记录没有记载具体投票情况，但在讨论中，至少有以下代表明确表示反对该提案：卡尔克林、伊斯拉莫夫、拉希姆巴耶夫、普拉托夫、赫尔曼、毛希丁诺夫、萨哈特穆拉托夫、梅日劳克、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如上述发言代表均有投票权，那正好对应否决该议案的 9 票。

② 塔什干市内乌兹别克人口占压倒性多数，但塔什干县和米尔扎楚尔县的两族人口数据则存在争议。乌兹别克代表强调塔什干市及周边县域中乌兹别克人均占多数。吉尔吉斯代表则单独强调两县中吉尔吉斯人的比例，由此省城两县应该归入吉尔吉斯自治区域。在此基础之上，因自治区域需要城市作为首府，塔什干作为区域内唯一的大城市，应该划入吉尔吉斯自治区域内，甚至成为与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合并之后、新的吉尔吉斯自治单位的首府。参见 Масов Р.М. Таджики: история с грифом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С.177-180.

提出的草案，显然只有乌兹别克分委会草案可以作为划界方案的基础。土库曼分委会草案仅关注土库曼人居住区利益，对中亚南部更广大地区的政治秩序缺乏构想。吉尔吉斯分委会草案则过于激进：这一方案不但不考虑乌兹别克族代表的谈判底线，要求划走当时中亚南部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塔什干市；而且试图否定民族划界工作的意义，提出改建中亚联邦。在1923年4月“苏丹-加利耶夫事件”^①之后，吉尔吉斯代表霍贾诺夫此提议无异于将自己与泛突厥主义思潮相联系，而且必然会遭到其他民族代表的抵制。

相比之下，乌兹别克分委会草案反映出该乌兹别克族代表的政治智慧。首先，利用俄共（布）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机遇，乌兹别克分委会草案将中亚南部几乎所有重要的农耕区（费尔干纳谷地、锡尔河中游塔什干地区、泽拉夫尚河流域、阿姆河流域）并入同一政治共同体中。这是16世纪初昔班尼汗父子征服河中各地以降，首次有单一政权能统合上述诸地区。中亚南部所有农耕区整合入单一政权之后，新的政治共同体自然会对周边地区形成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如俄共（布）中央持“分而治之”的立场，那更好的选择应该是保留独立的花刺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或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以限制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潜在权力。

其次，乌兹别克分委会草案主动让出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刺子模三地的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卡拉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居住区，支持他们成立自治单位。由此，土库曼族代表在基本立场上不会反对乌兹别克分委会草案。而吉尔吉斯族代表也失去了反对的基础：他们对于塔什干市归属权的争夺也显得过于自利。划界专门委员会上，尽管卡拉吉尔吉斯族代表仅有一位（阿卜杜拉赫曼诺夫），但在获得建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区的承诺之后，他在其他议题上的意见与乌兹别克族代表基本一致。此外，尽管专门委员会中没有塔吉克族代表，但乌兹别克分委会草案依然为此划设塔吉克自治州^②，

① 关于苏丹-加利耶夫事件，参见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193-195页；中央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39-342页。

② 尽管如此，最初的草案中，划给塔吉克自治州的领土范围仅限于东布哈拉山区和帕米尔地区，且拟建立的自治区仍隶属于即将组建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塔吉克斯坦科学院院长拉希姆·玛索夫认为此举是乌兹别克代表对塔吉克人的压制。关于中亚民族划界和共和国组建中的塔吉克问题，美国学者哈立德有较为新颖的论述，参见 Adecb Khalid,

由此预先封堵了其他代表对该方案的质疑角度。

再次，在陈述草案的过程中，乌兹别克族代表强调其草案“在布哈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撒马尔罕、费尔干纳和布哈拉的党委会上都通过”，而且“乌兹别克族干部的意见都已经统一”，“突厥斯坦和布哈拉的土库曼干部对此也没有异议。”^①会议发言和投票过程中，人数占相对多数的乌兹别克族干部的确在所有重大议题上保持了一致。因此，从俄共（布）中央和中亚局的角度来看，乌兹别克分委会草案是最为可行且民意基础最好的。6月4日会议草案与6月1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重要决定，除了在花刺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存废问题上有所出入外，其余要点基本一致。换言之，乌兹别克分委会草案成为1924年中亚南部民族划界的方案基础。

通过对专门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微观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俄共（布）中央在十月革命后民族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下，的确制定了以民族为原则建立自治行政单位的政策路线，但1924年民族划界进程中并不存在中央预先制定的划界方案。因此才有乌兹别克分委会、土库曼分委会和吉尔吉斯分委会各自拟定草案、争论票决的局面。先前学者在研究这一历史问题时，大多高估了俄共（布）中央对民族划界第一阶段（1924-1925年）的干预程度，而低估了地方精英对政治进程的塑造能力。

四、1925年之后中亚行政区划的调整与政治版图的形成

先前学者对中亚民族划界的研究中，持“分而治之论”的学者过度强调中央政府的能动性，而无视历史背景中莫斯科所面临的诸多客观限制条件；而“自下而上论”者则倾向于将1924年至1925年的划界工作等同于全部进程，忽略了1925年以后中亚行政区划的重要调整。笔者认为，1924年制定划界草案过程中，地方民族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划界方案。但1925年之后的调整，则更多有着中央干预的色彩。经过近半年的动员与调整，1924年6月中亚局起草的划界草案最终上升为10月2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

Making Uzbekistan: Nation, Empire, and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USS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92-315.

① Масов Р.М. Таджики: история с грифом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С.169.

决定，声明成立以下民族自治单位：

（1）成立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成立属于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吉克自治共和国^①；（3）成立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4）成立属于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②

该决定已经勾勒出当下中亚各国的行政区划格局，但与 1936 年以后固定下来的行政版图仍有较大差别。以当下中亚地缘政治中关注最多的费尔干纳盆地为例，1924 年末划界格局中，尽管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从原先的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划出，并入俄罗斯联邦，但新成立的乌兹别克共和国，除奥什、贾拉拉巴德和阿赖山北坡山前地区外，仍据有整个费尔干纳盆地。此外，塔吉克自治州尽管升格为塔吉克自治共和国，但依然隶属于乌兹别克共和国。形成今日费尔干纳盆地分属三国这一格局的关键历史事件，是 1929 年 6 月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及同年 10 月苦盏州（Ходжентский округ）^③从乌兹别克共和国划出、并入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此后，随着 1936 年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费尔干纳盆地最终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边界所分割，以致苏联解体后成为中亚安全的热点地区。因此，1924 年至 1925 年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的组建并不等于当下中亚政治格局的形成。

在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共和国成立之后，中亚南部政治格局最大的变动，当属 1929 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升格和原属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苦盏州划入其版图。关注到此事件历史意义的学者认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一决

① 1924 年 6 月中亚局草案中规定成立的是塔吉克自治州（Таджик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但 10 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将塔吉克自治州升格为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央决定以塔吉克自治州管辖相邻的帕米尔山区东部的巴达赫尚地区（官方名称为山地-巴达赫尚自治州，即 Горно-Бадахшан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故而升格其行政级别为自治共和国。参见 Каландаров И.К. Славный сын Таджи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Душанбе, 1999. С.19.

② 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州于 1930 年转隶于俄罗斯联邦；1932 年升格为自治共和国；1936 年 12 月 5 日以自治共和国级别转隶于乌兹别克共和国。因该民族自治单位的变更历史于本文叙事基本一致，其具体变动细节不在文中赘述。参见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 153 页。

③ 该地区大致对应今日塔吉克斯坦北部索格特州（Вилояти Суғд）。

定与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干部积极争取政治和文化权利有关，同时也受到当时伊朗和阿富汗政治形势的影响。

要讨论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党政干部对政治文化权利的争取，首先需要从1925年各共和国组建后中亚南部的政治格局开始谈起。1924年中亚局划界方案中，塔吉克自治州（以及1925年形成的自治共和国）不仅没有包含塔吉克人聚居的布哈拉、撒马尔罕两大城市，而且苦盏周边地区和费尔干纳盆地的一些村镇也不在其领属范围之内。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境内平原村镇较少，多为山区苦寒之地。在当时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干部看来，委派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任职无异于遭到流放。

1925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成立后，被委派到塔吉克斯坦任职的党政干部逐渐认识到在苏联民族政策框架下争取更多政治和文化权利的可能性。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上层精英遂不满于1925年的划界格局，认为以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苦盏为代表的操塔吉克语人群居住区均应该划入塔吉克自治共和国。而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中，塔吉克族干部认为其上级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党政官员利用调查人口族属的权力，强行将上述地区的塔吉克族居民登记为乌兹别克族，更改人口比例数据，进而消解塔吉克自治共和国领土声索的依据。乌兹别克共和国与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在分配领土、行政和教育资源等方面的矛盾由此长期积累。而塔吉克族高层干部则在1925年至1928年间不断向苏联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

据研究，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的关键事件，是1929年6月初塔吉克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霍吉巴耶夫（Абдурахим Ходжибаев）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的一次会面。霍吉巴耶夫受塔吉克族党政干部的委托，赴莫斯科游说联共高层领导同意塔吉克自治共和国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独立出来。斯大林接受了霍吉巴耶夫的会谈请求，并安排另一位乌兹别克族高级干部参与该会议。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讨论，斯大林同意支持“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独立加入苏联。”^①此次会面之后，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的工作在时任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基尔基日（К.О. Киркиж）和中亚局

^① Paul Bergne, *The Birth of Tajikist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I. B. Tauris, 2007, p.113; Каландаров И.К. Славный сын Таджи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Душанбе, 1999. С.39.

主席泽林斯基（И.А. Зеленский）的推动下迅速落实。两人主导的特别委员会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塔吉克共和国与乌兹别克共和国领土划分的草案。该草案在否决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两地并入塔吉克共和国的同时，批准了苦盏州加入该民族自治单位。^①该草案于1929年9月7日得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因此，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29年10月16日宣告成立，并于当年12月加入苏联。

另一方面，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可能受到当时苏联对阿富汗和伊朗的外交政策影响。20世纪20年代后期伊朗和阿富汗的政治变动，引起联共中央对塔吉克族政治地位的重视。1925年末，通过政变掌权的伊朗军官礼萨汗（Reza Shah Pahlavi）最终加冕，以民族主义为旗号推动现代化改革，并积极改善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而在1929年1月，阿富汗君主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退位，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阿富汗政局陷入动荡。10月，阿富汗原国防大臣纳第尔沙（Mohammed Nadir Shah）稳定了局势，但废除了一系列阿曼努拉汗时期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外交重点转向争取英国支持。在对苏联关系方面，纳第尔沙不仅将阿曼努拉汗时期邀请的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遣返，而且处死了原阿富汗驻苏联大使，并容忍巴斯马奇武装以阿富汗为基地袭击苏联的中亚南部。^②从外交角度来看，苏联中央1929年对塔吉克自治共和国的领土进行调整，并将其地位升格，一方面有利于安抚塔吉克族干部群众、稳定边疆局势，另一方面则可通过建设一个操伊朗语民族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向周边国家投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③

① 目前尚无档案或研究能解释中央否决塔吉克干部对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领土声索、而批准苦盏州并入的理由。英国学者伯尔纳（Paul Bergne）对苦盏州并入的解释是，首先苦盏州地理上与乌拉秋别（Ура-Тюбе，即今日塔吉克斯坦北部的伊斯塔拉夫尚地区）相连，便于经济整合；其次苦盏州党组织系统相对完善，可以为党政干部紧缺的塔吉克共和国提供相对充足的干部力量。但这两条理由同样适用于撒马尔罕地区，因此并不能作为得到充分证明的理由。本文并不试图强行解释此次领土变更的原因。但在行政地位升格的问题上，1929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一事，与联共中央高层干预之间的关系则有相对可靠的证明。参见 Paul Bergne, *The Birth of Tajikist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public*, p.109.

②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222、229页。

③ Arne Haugen,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Republic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New York:

1929年苦盞州行政隶属变更和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奠定了今日费尔干纳盆地一分为三、塔吉克斯坦扼守盆地西部出口的格局。这一地缘政治现象引起后世学者诸多地缘政治想象，成为论者强调中亚民族划界“分而治之”色彩的重要论据。重新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不同于1924年中亚南部划界时各族代表之间激烈的博弈，1929年塔吉克共和国的变动的确更多带有自上而下的命令色彩。而且，塔吉克族干部对于乌兹别克共和国政策的不满，一定程度上也坐实了后世研究者的“分而治之”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分而治之”的后见之明可以充分解释苏联中亚民族划界的整个进程。

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之后，中亚政治格局最大的变动，是1936年全联盟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将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1925年5月两国更名）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并接纳其加入苏联。与该事件同时期发生的是外高加索联邦的解散，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三国作为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由此，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数量增加到11个。^①此次变动始于1935年联共（布）中央提出的新宪法制定工作。新宪法的制定委员会由31人组成，包含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三方面的领导人，其中与中亚相关的委员，有时任土库曼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艾塔科夫、塔吉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拉希姆巴耶夫、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费·霍贾耶夫、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伊克拉莫夫。^②据考证，该宪法委员会成员提议修改苏联的自治单位级别，即“废除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升格为加盟共和国，还要求赋予哈萨克、吉尔吉斯、鞑靼、巴什基尔和布里亚特共和国以同样的地位，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163-164. 挪威学者豪根的著作提到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部分塔吉克边民支持阿富汗地方军阀，并同情阿富汗境内的塔吉克人，因此推测苏联1929年对塔吉克自治共和国进行的改革有稳定边疆的考虑。但遗憾的是，豪根并没有提供该论断的史料来源。

①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第157页。

② 艾塔科夫、拉希姆巴耶夫和费·霍贾耶夫均为1924年划界委员会成员。三人除担任各自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职务外，还兼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徐天新：《苏联史：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

而所有的自治州都升格为自治共和国。”^①最终定稿的1936年宪法中，仅批准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

最后，通过梳理档案文献，本研究尝试重新理解民族划界对于苏联中亚政治版图形成的意义。作为对“分而治之论”和“自下而上论”的回应，本文认为，中亚民族划界的两个阶段，体现的是俄共（布）中央在不同的内外环境下的务实政策选择。档案文献显示，1924年民族划界草案拟定的短暂过程中，各族干部相互角力，最终乌兹别克干部以更为娴熟的政治技巧，获得了在苏联民族政策框架下塑造中亚政治格局的权力。1924年划界，更多反映的是地方精英相互之间以及与中央代表之间的博弈互动，而非中央单向决定地方政治格局。1924年前后，俄共（布）中央当时更迫切的任务是在中亚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以推进更为重要的土地改革、文教革命、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建设等重大政治经济工程。但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斯大林在党内领导权力的巩固，1925年初次划界期间担任各民族自治单位党政高层领导的中亚各民族精英相继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如上所述，1929年塔吉克共和国的升格和苦盏州划入、1936年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升格，更多带有中央干预的色彩，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决策并不为过。

五、当代中亚南部的边界问题

1924-1936年中亚地区民族划界、民族自治单位行政隶属和行政级别的变更，形成了犬牙交错的边界。但如前文所述，这种结果是由复杂的历史进程造成的，既包括来自地方党内民族精英依据民族构成和经济整合因素推动的边界划分，又受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苏联中央自上而下的调整。在苏联时期，因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内政外交由苏联中央统辖，各国边界和费尔干纳盆地内交错嵌套的行政飞地，并不会对本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在苏联解体之后，边界和飞地便成为阻碍中亚各国之间外交

^① 左凤荣、刘显忠：《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遗憾的是，该作品并没有深究该事件的前因后果，且未列出上述论点的史料来源。

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有学者所言，涉及边界和飞地的议题是观察中亚“当事国之间关系的晴雨表”。^①

独立 20 多年来，目前中亚五国边界问题主要集中在乌、吉、塔三国之间。而争议主要在费尔干纳盆地中的边界划分和飞地归属问题。此前国内学界关于该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问题的危害在于以下三方面：（1）为宗教极端势力从事跨境恐怖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2）由飞地管辖权引起的边境摩擦事件损害了当事国之间的关系；（3）对飞地自然资源的争夺影响了本地族际间关系。^②为避免重复论述，在前文对苏联初期民族划界历史脉络研究的基础上，以下部分主要讨论当下费尔干纳盆地飞地问题的形成逻辑和 2016 年以来的最新动向。

如前文所述，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中亚民族划界并非一蹴而就。对于费尔干纳盆地而言，1924 年划界讨论中，农耕和游牧的生产方式区别是最初划分乌兹别克共和国和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边界的主要依据。在此基础上，为照顾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南部的经济发展，奥什和贾拉拉巴德两座城镇遂划归该自治单位。目前费尔干纳盆地中的八块飞地^③（参见表 2）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为乌兹别克族或塔吉克族农民定居地，因其农耕属性被划入乌兹别克共和国。而农耕区块周边山地为当时的卡拉吉尔吉斯游牧民活动地区，故划入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1929 年，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苦盏州并入之后，沃鲁赫等行政飞地随之成为塔吉克共和国的一部分。而 1936 年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之后，现在的飞地归属局面基本形成。至苏联解体后，原本仅为苏联内部的行政飞地一夜之间成为国家间的外交问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16 年，乌、吉、塔三国均尝试通过双边谈判解

① 杨进：“乌吉‘换地’开启中亚外交新篇章”，《世界知识》，2018 年第 19 期。

② 张娜、吴良全：“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问题——对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的反思”，《世界民族》，2013 年第 1 期，第 29-37 页；哈萨克斯坦学者拜扎科娃（Zhulduz Baizakova）更详细地论述了费尔干纳盆地边界问题引起的当事国之间历次边境冲突，参见 Zhulduz Baizakova, “Border Issues in Central Asia: Current Conflicts, Controversies and Compromises,” *Revista UNISCI*, 2017, Vol.45, pp.221-234.

③ 表 2 中的索赫和沙希马尔丹各包含两块一大一小的飞地，为索赫河与沙希马尔丹河上下游沿岸地区。因此研究文献一般称费尔干纳盆地内有八块飞地。

决边界问题。至 2012 年，乌吉两国之间 1375 公里共同边界中，已有 993 公里完成勘定。乌塔之间 1500 公里边界已有 85% 完成勘定。而吉塔之间的 970 公里边界已勘定 560 公里。剩余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费尔干纳盆地各块飞地的归属和边界划分。^①

表 2 费尔干纳盆地各飞地基本信息统计^②

飞地名称	所属国家和地区	所在国家和地区	人口	族群构成	面积(平方公里)
索赫 (Сох) ^③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索赫区	吉尔吉斯斯坦 巴特肯州	约 7 万	塔吉克族占 99.4%， 乌兹别克族占 0.2%	325
沙希马尔丹 (Шахимардан) ^④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费尔干纳区	吉尔吉斯斯坦 巴特肯州	约 2.5 万	乌兹别克族占 91%， 吉尔吉斯族占 9%	90
沃鲁赫 (Ворух)	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伊斯法拉区	吉尔吉斯斯坦 巴特肯州	约 4 万	塔吉克族占 95%， 吉尔吉斯族占 5%	130
萨尔瓦克 (Сарвак)	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阿什特区	乌兹别克斯坦 纳曼干州帕普区	约 250 人	乌兹别克族占 99%， 塔吉克族占 1%	8.4
巴拉克 (Барак)	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卡拉苏区	乌兹别克斯坦 安集延州库尔干秋别区	约 100 人	吉尔吉斯族占 60% 以上	4
西卡拉恰 (Зап. Калача)	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伊斯法拉区	吉尔吉斯斯坦 巴特肯州雷列克区	约 150 人	塔吉克族占 95%， 吉尔吉斯族占 5%	少于 1

① 张娜、吴良全：“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问题——对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的反思”，第 34 页。

② 本表由笔者在以下学术论文基础上整理形成：张娜、吴良全：“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问题——对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的反思”，第 29-37 页；Zhulduz Baizakova, “Border Issues in Central Asia: Current Conflicts, Controversies and Compromises”; Raikhan Tashtemkhanova and others, “Territorial and Border Issues in Central Asia: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Current State and Perspectives”, *The Anthropologist*, 2015, Vol.22, pp.518-525.

③ 索赫 (Сох) 飞地包含索赫河沿岸南北两块飞地。索赫河上游较大的飞地一般称为南索赫或上索赫，下游较小的飞地称为北索赫、下索赫或“冲嘎拉 (Чон-Гара)”。“索赫”一词来自波斯语动词 *sukhtan* 的词根，意为“燃烧”，可能是由北索赫地区存在地下油气资源衍生的地名。

④ 沙希马尔丹 (Шахимардан) 飞地包含沙希马尔丹河沿岸南北两块飞地。下游较小的飞地又称“贾尼艾依勒 (Жаны-Айыл)”，此前有学者译为“贾盖尔”。“沙希马尔丹”一词在波斯语和塔吉克语中指代伊斯兰教什叶派崇奉的圣人阿里。该地民间传说称，本地有阿里圣墓，为周边地区信徒朝觐地点。该圣墓在历史上多次遭地震摧毁，后经民间集资重建。苏联时期上述墓地被平毁，该地也被命名为“哈姆扎阿巴德 (Хамзаабад)”，以纪念生于该地区的近代乌兹别克作家哈姆扎·尼亚济 (Хамза Хакимзаде Ниязи)。1991 年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该地被重新更名为沙希马尔丹。

2016年12月，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А.Ш. Атамбаев）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后，双方边界划分和勘界部门重启了中止八年的边界划分协商工作，随后持续展开了十六轮边界划分磋商会议。2017年9月初，米尔济约耶夫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访问期间，两国总统签署了划分两国1170公里边界的协议。在乌塔边界问题上，2018年3月1日，乌兹别克斯坦宣布开放2001年开始被关闭的十个边境口岸。^①

2018年8月，乌吉边界谈判出现重要变化。乌吉边界委员会于8月14日公布了换地协议，即吉尔吉斯斯坦将嵌入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库尔干秋别区的巴拉克飞地（Барак）移交给乌国，而乌方则将靠近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卡拉苏区阿克-塔什（Ак-Таш）村的等值土地划给吉方。^②另一方面，巴拉克飞地与附近乌吉边境之间的通关手续已经得到简化。^③尽管乌吉边界委员会的方案尚待两国总统批准，但该协议的出台昭示着费尔干纳飞地问题的解决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巴拉克飞地协议首次将“换地”作为一种解决领土争议的方式付诸实践。对于费尔干纳盆地其他若干飞地而言，人口稀少、面积小于10平方公里的萨尔瓦克（Сарвак）和西卡拉恰（Западная Калача）可借鉴巴拉克飞地的解决方案。但面积较大的索赫、沙希马尔丹和沃鲁赫三大飞地则不太可能通过换地方式解决。这三块飞地均位于人口较为稠密的河谷农耕区，并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 and 相对单一的族群构成。索赫和沃鲁赫飞地均有前伊斯兰时代的历史遗迹。而沙希马尔丹在本地居民心目中是伊斯兰教圣人阿里的圣墓所在地。此外，索赫飞地更涉及其地下天然气资源的归属问题。因此，三地均有人口和领土之外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这为边界划定增添更多困难。为解

① 周明：“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与中亚地区一体化”，《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3期，第84-87页。

② 学者杨进的文章没有提到该方案目前仍处于委员会协议状态，尚未得到两国最高权力机关批准。因此巴拉克飞地的归属至本文截稿前尚无变动。参见Киргизия отдаст Узбекистану анклав Барак. 14.08.2018. <https://nuz.uz/politika/34875-kirgiziya-otdast-uzbek-istanu-anklav-barak.html>

③ На границ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а работа пропускного пункта. 27.12.2018. <https://www.xabar.uz/ru/jamiyat/ozbekiston-va-qirgiziston-chegaras>

决三大飞地的争议，乌兹别克斯坦曾于 2001 年向吉尔吉斯斯坦提出过建立过境走廊的方案。但由于过境走廊涉及吉国南部巴特肯州东西方向的交通线，该提议被吉方拒绝。

在乌兹别克斯坦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正式上任后，乌、吉、塔三国的外交关系明显升温。乌吉两国边界委员会的频繁磋商则反映出两国当局在解决飞地问题上的政治决心。2018 年 8 月巴拉克飞地的协议谈判成为后续以换地方式解决萨尔瓦克和西卡拉恰飞地问题开启先例。而索赫、沙希马尔丹和沃鲁赫三大飞地归属的争议，则有待乌、吉、塔三国以及各相关区域合作机制共同推动协商。

结语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苏联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划界并非简单的“分而治之”过程。前人研究大多将数十年的历史过程描述为静态的中央政策，而忽视实际政策从形成、执行、调整到最终定型过程中各方势力的动态博弈。档案研究表明，该历史事件应分为两阶段考察：1924 年至 1925 年的第一阶段，实际上由中亚南部本地各族党员干部提议、争论并协商解决。在这一阶段，俄共（布）中央并没有主动干预民族划界的细节。而乌兹别克族党政精英以较为娴熟的政治技巧主导了划界进程，获得了相对有利于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划界结果。

而在第二阶段，即 1929 至 1936 年，苏联中央把握政治机遇，通过调整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及卡拉卡尔帕克等族自治单位的行政级别、隶属关系和边界划分，重新平衡各共和国之间的权力。第二阶段的政策呈现更强的“分而治之”特征，不排除其中存在压制地方民族主义势力的考虑。两阶段政策叠加的结果，是苏联中央既借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整合了中亚南部地方精英，又通过对民族自治单位行政边界和地位的调整实现了各主要政治集团之间的平衡。但这一结果并非完全由早期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人预先设计。其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央地之间和地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和妥协。

上述民族划界进程的第二阶段中，塔吉克共和国从乌兹别克共和国中独

立并吸纳苦盏州、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两大事件，奠定了今日费尔干纳盆地复杂的边界和飞地隶属格局。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吉、塔之间的边界争议衍生出边界管控、反恐和跨境民族等问题。三国之间的关系为此多次陷入紧张状态。中亚南部地区的互联互通事业也因此长期停滞。近年来，随着地区安全形势逐步好转，各国领导人开始积极推动区域经济整合，边界和飞地问题也因此逐渐成为各国协商解决的优先事项。2018年8月，乌吉两国之间的巴拉克飞地谈判是该地区以领土交换方式解决争端的首次尝试。

【Abstract】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sia was mainly formulated by the Soviet National-Territorial Delimitation (NTD) in the 1920s and 1930s. Concerning its nature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s, scholars usually argue that, firstly of all, by means of the NTD, the Soviet Union resolved the problem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us consolidated the Soviet regime in Central Asia. Second, the new national republics created by the NTD deepened the ethnic divisions among various nationalities, thus reduced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s of pan-Islamism and pan-Turkism. Therefore, the NTD has been labelled an approach of “Divide and Rule” in previous scholarship. Based on the recent studies and archival sourc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divide the NTD in two historical phases: the initial delimitation in the 1924-1925, and the adjustments in 1929 and 1936. In the first phase, the delimitation draft was initiated, debated and decided primarily by the local native party cadre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The Soviet central government did not actively interven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this period. But in the second phase, since the late 1920s, Moscow repeatedly adjusted the administrative rank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affiliation of Tajik, Kyrgyz and Kazakh republics, which demonstrated the top-down political will. The historical repercussions of the NTD last until today. Since late 2016, the issue of Fergana enclaves, one of the byproducts of the Soviet NTD, has been pushed toward resolu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approchement among Uzbekista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 Key Words 】 Soviet Union, Central Asia, National-Territorial

Delimitation, Uzbekistan, “Divide and Rule”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ландшафт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основном был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 в 1920-х и 1930-х годах, когд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оводил Националь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размежевание (НТР).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его характеры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влияния, ученые обычно у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ССР решил проблему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я путем НТР,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укреп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режим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о-вторых, нов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озданные НТР, углубили этнические разделения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ями, и снизил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влияния панисламизма и пантюркизм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ТР был определен подходом «Разделяй и властвуй» в предыдущ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последн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и архивных источниках, в этой статье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разделить НТР на д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этапа: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е размежевание в 1924–1925 годах и коррективы в 1929 и 1936 годах. На первом этапе, проект размежевания был инициирован, обсужден и решён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местными партийными кадрами различны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групп. Советское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е активно вмешивалось в процессе решений на этом периоде. Но на втором этапе, с конца 1920-х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корректировала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е ранги и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Таджикской, Киргизской и Казах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 В Таки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маневрах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с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воля от цент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НТР продолжают до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С конца 2016 года, вопрос о Ферганских анклавах, являющихся одним из побочных продуктов НТР, двигался в сторону разрешения на фон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сближения между Узбекистаном, Кыргызстаном 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ом.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размежевание, Узбекистан, «Разделяй и властвуй»

(责任编辑 孙超)

中间地带的通道政治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国际行为 ——以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空军基地为例

王鸣野*

【内容提要】从“中间地带”理论的视角来看，“9·11”事件后，美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围绕着吉国玛纳斯空军基地所展开的“中间地带”通道政治博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该过程全面展示了与通道政治相关的利益的复杂性、微妙性和多向性，以及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中间地带国家”行为的多变性、短期性和低可预测性。由全球战略的冲突而产生的对通道政治认知的差异，是美俄在“中间地带”对抗的主因；而由大小不同所产生的利益认知差异，则是两大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产生种种矛盾纠结的根源。

【关键词】中间地带 通道政治 吉尔吉斯斯坦外交 俄美博弈

【中图分类号】D831.1;D50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3-0123-(34)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9·11”事件后美国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立即使中亚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玛纳斯空军基地，成为沟通美国和北约盟国军事力量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关键通道之一。从2001年到2014年，玛纳斯基地不但见证了美国和北约成千上万士兵的往返和巨量军事物资的运入，更为重要的是，围绕着玛纳斯基地所形成的“中间地带”通道政治，展现了大国之间及其与“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关系变化的错综复杂的因果联系。如今，虽然美国军队已经撤出了玛纳斯，但深入研究玛纳斯基地在美国阿富汗军事行动期间所发生的通道政治的方方面面，不但对了解一般“中间地带”和“中

* 王鸣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副教授。

间地带国家”各种事态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更深入地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覆盖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

一、“中间地带”理论与“中间地带国家”

国家间关系的基本状态、性质和格局，以及基于上述因素而形成的某一时期的国际体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从西方国家将人类社会带入现代进程以来所发生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所谓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力量凹陷地带（power-depressed areas）的争夺。这些地带，如东欧、高加索、朝鲜半岛、中亚和中东等地，在地理上处在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夹缝之中；或如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则在政治上处在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影响所搅起的重重漩涡之中。显然，所谓的力量凹陷地带，就是在政治、地理和国际战略等方面，处在大国和国家集团影响之下的“中间地带”（intermediate zones）。在欧洲列强主导国际事务的时期（这一时期大致从16世纪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走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前列的几个欧洲列强成为世界权力的高地，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则逐渐沦为它们争夺势力范围的“中间地带”。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间地带”发生了三大基本变化，一是从国际政治的无意识地带逐渐变成了国际政治的有意识地带^①，二是一些“中间地带”在意识觉醒的基础上消除了“中间地带”的典型特征，从而遏止了外部大国的消极性影响所造成的紊乱，这类国家中最典型的要数德国和中国。“中间地带”的第三大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目前这些地区和国家地缘政治以及地缘经济特征的固化。这一变化的基本含义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少数摆脱“中间地带”特征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越来越远地将大多数“中间地带”抛在后面。与此同时，“中间地带”在外部大国影响的冲击下，内部的种种问题却在不断发酵，造成无法摆脱的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社

^① “中间地带”的无意识时期，一般是指这些地区作为西方大国殖民地和附属国时期；有意识时期，主要指二战以后这些地带的国家摆脱殖民地和附属国地位而获得政治独立、形成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时期。

会困境。不难看出，一些“中间地带”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国际社会的难题。对主导国际事务的世界性大国而言，“中间地带”难题具有不同的含义，有的将“中间地带”视为遏制别的大国发展的前沿地带，想方设法地在这些地带挑动对附近大国的恐惧意识，以有利于其构建遏制性集团。在这类大国看来，国际政治与安全仍是传统的零和博弈，别的大国永远都是本国利益的主要威胁者。^①与这种零和博弈思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的大国力主大国之间以合作的精神、互利共赢的方式解决“中间地带”面临的种种困境。然而，秉持零和思维的大国，总把这种倡议视为更为隐蔽的利益博弈策略，而报之以深深的不信任。结果便是大国对“中间地带”的影响在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强度不等的对抗性：怀疑、制衡、拆台、扶植对立的力量、提出对抗性方案等，成为大国关系在“中间地带”的常态。由此可以看出，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纯粹的利益博弈取代了冷战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结果便是“中间地带”在各种关系进程中，能够获得的好处急剧减少或变得更加困难。

作为国家间力量凹陷地带的“中间地带”大体可以分为三类：“无人中间地带”，如南极、北极、竹岛（独岛）^②等；“单一性中间地带”，如朝鲜半岛、蒙古、尼泊尔等少数地区；“多元性中间地带”，如东欧、高加索、中亚、中东、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等。“多元性中间地带”构成了“中间地带”的普遍现象，是影响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全球性地缘政治因素。不管是“单一性中间地带”还是“多元性中间地带”，“元”的主体都是国家，

①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为代表的进攻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结果便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大国被迫最大化地扩充它们的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具体到中美关系，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书中指出，21 世纪早期，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米尔斯海默教授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自 2010 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政府及战略界与学界精英已经越来越以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论调来解读中国的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② 注：该岛现被韩国控制，虽有人常驻，但多为守岛志愿者和军人，生活物资依赖岛外供给，岛屿本身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故仍视其为“无人中间地带”。

笔者将这类国家称为“中间地带国家”。“多元性中间地带”的“中间地带国家”是群体性的存在，这些国家的存在方式及相互关系，与其说是由其内部的种种关系特征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外部的以大国为主导所塑造的种种关系特征决定的。大国对“中间地带国家”事务的主导以及主导企图，造成了这类国家长期处于时断时续、程度不等的低烈度紊乱而无法自拔。于是，在现当代的国际关系中，西方大国向“中间地带国家”输出各种影响和“中间地带国家”向西方大国输出各种问题，便成为一种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在冷战以后的全球化时代，无论是西方大国的影响还是“中间地带国家”的问题，都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和快速的传染性。因此，研究西方大国对“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和“中间地带国家”的反应，就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视野。

二、“中间地带”的通道政治（passage politics）

外部大国对“中间地带”和“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方式表现出多样性和绵密性，通道政治便是其中之一。所谓通道，是指那些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将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别的国家或地区连接起来的天然和人工媒介的总称。形形色色的通道是外部大国对“中间地带”输入影响以及“中间地带”接纳积极影响或阻止消极的外来影响的主要渠道。对通道主导权的掌控程度，体现着“中间地带”国家相对于大国的自主性程度。从形成的方式来看，“中间地带”的通道可以分为自然通道、人工通道和半人工通道。自然通道是天然形成的通道，如能够通航的大江大河；人工通道指由人力修建而成的通道，典型的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输油管道、输气管道、机场、跨国铁路和公路等；半人工通道是指在自然通道的基础上，经过人工改建而形成的能够承担更广泛通行职能的通道。从功能来看，“中间地带”的通道又可以分为商业贸易通道、资源通道、军事通道和综合型通道等类型。所谓通道政治，是指“中间地带”国家和大国围绕着上述各类通道的走向、利用、收益和主导权及其战略影响，所展开的国际国内政治博弈过程。^①

① 王鸣野：《“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

“中间地带”的通道和通道政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国主导的通道政治，第二个层次是中等国家主导的通道政治，第三个层次是在小型的“中间地带国家”产生的通道和通道政治。第一个层次的通道政治，又可分为单一大国主导的通道政治和两个或多个大国主导之下的通道政治。这种通道及通道政治的表现方式一般可分为三种，首先是**大国直接掌控的通道**。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被英国和美国直接控制，是第一种通道的典型范例，其所产生的通道政治，实际上就是英国和美国在特定时期对某一地区的“中间地带国家”之间、以及这类国家与这两个世界大国间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的垄断，这种垄断就是两国维持和强化其世界霸权的表现。其次是**大国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通道**。这类通道的典型有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马六甲海峡等。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巴拿马运河的管理权虽已交回巴拿马政府，但只要愿意，美国仍有对其施加直接影响的能力。长期以来，在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眼里，上述通道关乎自身的发展，是其不可让渡的核心利益区。这类通道所在的“中间地带国家”，由于无法理顺内部的种种利益关系，互相之间敌意根深蒂固，因此将外部大国对通道安全的保护，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身安全的连带保护，视为维持生存的重要途径。可以看出，这类通道所产生的通道政治，实质上就是某一大国与某一个或数个“中间地带国家”的结盟关系。第三是**大国能够间接施加影响的通道**。在冷战后时代，存在于“中间地带”的绝大部分通道都属于这类通道。由于是间接影响，大国对这类通道的运行无法实施长期垄断，导致通道所属地区的通道政治展现出多变性、博弈性、不可预测性和关联性（指一个“中间地带国家”的通道政治，很容易在相邻的“中间地带国家”产生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地区局势复杂化的通道政治现象）等复杂局面。值得指出的是，与大国直接掌控的通道和**大国能够直接施加影响的通道**不同，**大国能够间接施加影响的通道**，基本上都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世界性大国甚至地区大国竞相施加影响的情况。

中等国家（具有“中间地带国家”特征的地区性大国）主导的通道政治，基本上表现为多边性的地区国际政治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中等国家要么试图独享通道带来的各种利益，要么围绕通道形成多边性的地区集团，

目的就是要排除有关大国的利益诉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间地带”的通道多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通道，“全球性意义”主要指的是这些通道对全球性大国实现其地区和全球战略的意义。因此，从本质来看，虽然这些“中间地带”特征明显的地区性大国，在本地区的通道政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从一体化的现代世界出现以来，以及工业化的国际社会对物质资源的流动性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大国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间地带”通道政治的主导性角色。在大国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除少数例外（如曾经的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和可能出现的北极航道等），大多数通道政治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主导的双边或多边政治进程。

小型的“中间地带国家”^①基本上是指对“中间地带”的各种进程缺乏主导能力的国家。这类国家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即国土面积小、人口少、综合国力弱、资源稀少、内部各地区和各民族关系的一体化程度低、缺乏抵御和纾解外部大国影响的能力等。对这类国家而言，存在于其领土或管辖范围之内通道，无一例外都成为它们实现各种内外目标、甚至是领导人个人目标的有力工具。外部大国对这类“中间地带国家”的最初认知，往往陷入一厢情愿的施惠所可能带来的丰厚回报中，而低估其内部各种关系的复杂性，最终很可能在有意无意中走向大国博弈的怪圈，主动或被动地承担地区关系整合的沉重负担。具体而言，在这类“中间地带国家”，大国由于某一时期的战略需求而产生对处于其领土之上的通道的依赖，这种依赖付出的代价，是大国对小型“中间地带国家”提供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安全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但麻烦的是，由于通道政治的关联性，大国对一个小型、甚至是一般“中间地带国家”的支持，往往会招来别的“中间地带国家”的猜疑或者反对。其结果便是“中间地带”内部关系的复杂化，那些认为自己的利益因为域外大国对邻国的支持而受到损害的“中间地带国家”，总是要策略性地向另外一个域外大国靠拢，如此便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国与大国、大国与“中间地带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博弈局面。在这种博弈中，多数“中间地

① 需要指出的是，小型“中间地带国家”的通道政治，常常和中等国家的通道政治之间纠缠在一起或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小型“中间地带国家”是直接邻国或近邻，二是大国对这两类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影响的强弱不同。

带国家”都希望利用自己拥有的通道捆住域外大国的手脚，以此构建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但谁依赖谁更多的问题，使得这种博弈变得异常复杂：不可靠的承诺和妥协成为常态。^①然而，由于“中间地带国家”与域外大国关系的特殊性，相互间的妥协和依赖呈现出较强的暂时性和多变性。

三、玛纳斯空军基地通道政治的生成机理

根据“中间地带”理论，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一个典型的“中间地带”，而位于这个“中间地带”的吉尔吉斯斯坦，则是一个典型的小型“中间地带国家”。在原苏联时期，吉尔吉斯共和国处在中苏对抗的前沿地带，原苏联在该共和国建有多处军事基地，玛纳斯便是其中之一。该基地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附近，苏联解体以后逐渐被废弃。然而，2001年的9月11日，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向美国本土发动了大规模的恐怖袭击，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政府立即宣布发起全球反恐战争，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也很快表明立场，支持美国出兵阿富汗，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塔利班。^②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吉尔

① 俄战略文化基金会专家阿列克谢·沃洛金，2013年2月27日在俄罗斯军事观察网发表了一篇题为《吉尔吉斯斯坦准备成为关税同盟的第四个成员？》的文章，其中指出：“不久前这个国家试图在外交上四面出击，把与比什凯克接触的任何人都称作战略伙伴。与俄罗斯谈，莫斯科就成为战略伙伴和盟友，与美国谈，华盛顿就成了战略伙伴和盟友，与中国谈，北京也就变成战略伙伴和盟友。而且每个主要盟友都会得到吉方将推动实施关键的贸易和军事技术项目等许诺。当新的主要盟友出现时，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则忘记了过去的承诺。的确，对于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来说，脚踩多条船总是有好处的。在国内的抗议风暴中，前总统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相继在国外找到了安身之地”。参见 Володин Алексей. Киргизия готова стать четвёртым членом Таможенного союза: кто окажется в плюсе? 27 февраля 2013. <https://topwar.ru/24748-kirgiziya-gotova-stat-chetvertym-chlenom-tamozhennogo-soyuza-kto-okazhetsya-v-plyuse.html>

② 赵鸣文在2018年12月出版的《普京大外交》中指出，“9·11”事件发生后，俄总统普京不仅在第一时间与中亚五国领导人电话沟通，而且还亲自前往中亚了解这些国家对协助美国反恐的真实想法。同时，普京还相继派外交部长、国家安全秘书、国防部长、总参谋长等各路高级官员前往中亚督导反恐行动。正是在俄罗斯的积极协调下，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宣布吉国准备为美国发动反恐军事行动提供“空中走廊”并特别解释说，这是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领导人磋商后做出的决定。2001年11月28日，俄罗斯在莫斯科召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成员国外长会议，继续协调中亚国家协助美国的反恐行动问题。这说明“俄罗斯领导人已决定在华盛顿的反恐怖行动中扮演自己的角

吉斯斯坦由于其靠近阿富汗的优越地理位置，立即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反恐联军的青睐。加上俄罗斯的支持，美国军队及其设施很快就进入玛纳斯，承担起向阿富汗前线运送人员和物资的重任。关于玛纳斯基地的人员和物资运送量，2009年2月，根据当时五角大楼发言人布赖恩·惠特曼的说法，美国经玛纳斯空军基地每月向阿富汗运送大约1.5万人和500吨物资。在基地约有1000名军事人员，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还有少量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官兵。^①然而到2010年2月，根据白宫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的说法，当时每月有3.5万名士兵通过玛纳斯基地往返阿富汗。^②虽然缺乏可靠的数据，但玛纳斯空军基地对于美国和北约盟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通道政治形成之前，玛纳斯基地首先实现了由一个湮没无闻的前苏联空军基地，向一个旨在实现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目标的军事运输通道的转换。这一转换成功的原因，是美俄两个全球大国围绕着反对恐怖主义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中亚这个“中间地带”暂时达成了一致的立场。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美俄两大国的合作是主要方面：美国急于进军阿富汗剿灭“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俄罗斯则试图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强化双方的全球伙伴关系。至于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则希望通过通道的开放向本地区输入大国合作所形成的积极影响。不难看出，美俄围绕着玛纳斯和中亚其他通道所达成的谅解和合作，是玛纳斯通道政治形成的前提，同时也构成了玛纳斯通道政治形成机理的第一个方面。

“中间地带”理论认为，一个大国对某一“中间地带”或“中间地带国家”的影响，必然会招致与该类国家或地区有重要利害关系的另一个大国的反制，这种反制又会引起前一个大国的反反制，结果便是反制与反反制的循

色”。参见赵鸣文：《普京大外交：面向21世纪的俄罗斯对外战略（1999-2017）》，北京：人民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18年。

① Gordon Lubold, Howard LaFranchi, “Air base flap reflects tension over US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Retrieved from Nexis Uni., February 6, 2009.

② База США Манас останется в Киргизии до 2014 г//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1.11.25. <https://www.belvpo.com/4676.html/>; США не разрешили Киргизии закрыть базу «Манас». 2015.4.15. <https://www.liveinternet.ru/users/5150262/post359464976/>

环往复。^①上述理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中间地带”的通道政治产生机理的第二个方面，这便是美国和俄罗斯两大国关系的迅速演变所导致的各自对通道战略含义的不同解读。如前所述，“9·11”事件后，俄罗斯政府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总统普京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了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向美国和北约国家开放前往阿富汗的通道。然而，事实证明，俄罗斯政府对美国和北约军事行动的支持，绝不可能消除美俄两国国家利益之间的战略性冲突。就在阿富汗战事初定之后，美国政府便迅速从军事行动转向对“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的重构，其突破点则选在欧亚结合部的另一个“中间地带”，即外高加索地区的典型“中间地带国家”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自独立以来经历了严重的经济滑坡和内乱，后在原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领导下稍有起色，但对贪污腐败、政治和民族冲突仍是束手无策。由于格鲁吉亚地处黑海东岸，北接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地理位置对美国的欧亚战略的实现深具意义。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该国的支持力度相当大，而谢瓦尔德纳泽也是“美国政策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②。从苏联解体到2003年，美国向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小国提供了约10亿美元的援助，使之成为世界上人均获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③然而，谢瓦尔德纳泽深谙与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关系对格鲁吉亚的意义。因此，虽然美援滚滚而来，但格鲁吉亚对美国的靠拢和对俄罗斯的疏离都保持着一种理性稳健的步调。这种虚与委蛇、两头讨巧的做法，完全不符合美国希望格鲁吉亚这个“中间地带国家”在美国欧亚战略中扮演的角色。2002年4月，美国前驻阿塞拜疆和南斯拉夫大使理查德·迈尔斯成为新一任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此人号称“制造不稳定局势专家”，他一到任就同曾留学美国的格鲁吉亚政治反对派领袖萨卡什维利建立了密切联系，鼓动其大搞街头政治。两个月后，萨卡什维利便专程前往贝尔格莱德，参加关于如何把米洛舍维奇搞下台的“温和和革命”的学习班。^④2003年夏天，美国和北约盟国在阿富汗的战事，由于塔利班统治的垮台而大大缓解，而谢瓦尔德纳泽领导下的格鲁吉亚则被视为

① 王鸣野：“‘中间地带’：和谐世界的枢纽”，《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3期。

② 万成才：《新俄罗斯观察》，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

③ 潘志平：《新疆周边事态》，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68页

④ 万成才：《新俄罗斯观察》，第163页。

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美国遂做出了在即将到来的格鲁吉亚议会选举中更迭格政权的决定。^①这便是冷战之后在美国策动下在原苏联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开端。

“颜色革命”的核心目的，就是通过政权更迭的方式，将俄罗斯周边的原苏联国家变成亲美和亲西方政权，其本质仍然是大国在“中间地带”和“中间地带国家”的利益博弈。在格鲁吉亚围绕着谢瓦尔德纳泽去留的对峙中，双方经过短暂的僵持，以布尔贾纳泽、萨卡什维利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亲美政客，在2003年11月成为格鲁吉亚的执政者。自此以后，格鲁吉亚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坚定不移地加入欧盟和北约，一是坚定不移地疏远俄罗斯。这样一来，美国和北约就在外高加索这个紧邻俄罗斯的“中间地带”，找到了一个忠实的“中间地带国家”盟友。黑海东岸大片地带的地缘政治，开始向着不利于俄罗斯的方向迅速演变。

格鲁吉亚地理位置虽然重要，但毕竟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东南侧，其转向美国并没有对俄罗斯在黑海地区的战略地位形成立竿见影的影响。然而，紧接着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而来的乌克兰亲美政权上台，则进一步强化了玛纳斯通道政治的生成机理：俄罗斯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将自己作为平等的伙伴看待，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已经化为无法逆转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进程。美国媒体就此指出：“也许整个欧洲的帷幕不像过去那样牢不可破，但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心理上，俄罗斯仍在铁幕的另一边，这是无可争议的。”^②俄罗斯人也直言不讳地说：“俄罗斯仍置身于不断扩大的西方之外”^③。

“颜色革命”结束了“9·11”事件后美俄两国在原苏联地区短暂的合作局面，由此而造成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构成了“中间地带”的通道政治最为重要的外在生发机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美俄的地缘政治博弈在“中间地带国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却构成了通道政治的内在生发机理。

大国对抗在“中间地带”和“中间地带国家”造成的第一个政治后果，

① 《参考消息》，2003年11月27日。

② Steven Lee Myers, “Russia and the Rich Western Neighbors: a Cold Peace”, *The New York Times*, Dec.31, 2003, <http://www.nytimes.com>

③ Ibid.

是受这种对抗冲击的国家内部，都无一例外地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亲美和亲俄政治集团，双方之间几乎无法妥协，出现了“中间地带国家”无法掌控的政治紊乱局面，这就是“中间地带国家”的“中间地带化”。^①在格鲁吉亚，苏联解体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就因各种原因不承认格鲁吉亚中央政府的统治，谢瓦尔德纳泽政府虽然没能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格俄关系比较平稳，格鲁吉亚与两个闹分裂的地区的关系尚未恶化。“颜色革命”后，极端亲美的萨卡什维利政府一意孤行的反俄政策，导致格俄关系急转直下：格政府试图依靠美国和北约的帮助解决内部分裂，分裂地区反过来依靠俄罗斯的帮助制衡格鲁吉亚政府，俄罗斯则利用对分裂地区的保护，破坏格鲁吉亚政府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计划，美国从格鲁吉亚政府的反俄政策中坐收渔利。上述几种关系紧密勾连，紧张程度不断上升，如同一把锁把格鲁吉亚的内政外交困于难以腾挪的死地。乌克兰独立以来，历届政府一直奉行多向平衡、稍有偏向的稳健对外政策。但靠“颜色革命”上位的尤先科-季莫申科政府，立即将这一传统政策改为不留余地的亲美脱俄政策，结果使乌克兰的内部政治出现比格鲁吉亚还要极端的局面：第聂伯河以东地区的亲俄和西部地区的亲美都变成了无法转圜的死局。

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在“中间地带”造成的第二个政治后果，是“中间地带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出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表现是相互竞争的大国，都试图将“中间地带国家”拉向自己阵营一边，而多数“中间地带国家”（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这种极端亲美反俄的情况恰恰相反）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摇摆人”。“摇摆人”在政治摇摆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多向性”：有的向左，有的向右，有的左右不定。如此造成的结果便是，“中间地带国家”由于摇摆方向的相反而相互间产生地缘政治冲突，或由于左右摇摆不定而造成内政的动荡。“中间地带”的国家越多，上述现象表现得就越明显。

美俄在“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博弈造成的上述两种地缘政治后果，对

^① “中间地带”所具有的特征，在外部和内部种种因素刺激下产生的剧烈矛盾运动，是“中间地带”展示自身的特征和对国际政治发挥影响力的主要方式，而这种在大国博弈的环境下由不同的利益追求所驱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就是“中间地带”的“中间地带化”。

“中间地带”的通道政治的影响，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通道政治的对抗性非常明显。而在中亚地区，通道政治则表现得虚实难料、变化多端。

四、玛纳斯通道政治的前两个阶段及表现方式

如前所述，美俄之间在“中间地带”展开的地缘政治博弈，构成了“中间地带国家”吉尔吉斯斯坦通道政治发生机理中的核心环节，两大国关系转换的关键节点，是2002年4月理查德·迈尔斯就任驻格鲁吉亚大使。美方的这一举动传出的信息是，美国将在格鲁吉亚策动类似南斯拉夫那样的政权更迭，格鲁吉亚很可能成为美国向高加索地区输入影响，进而向俄罗斯的东南部施压的战略通道。这一通道一旦形成，美国在短期内可以立即在外高地区获得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在中长期内可以有条不紊地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将阿塞拜疆拖离俄罗斯的影响轨道，迫使亚美尼亚改善与土耳其的关系，最终实现联通黑海和里海，形成一条将中亚、外高地区和安纳托利亚半岛连为一体的宽阔通畅的“中间地带国家”走廊。如此一来，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传统影响将走向式微。这一重大的地缘政治发展趋势，当然不会逃过俄罗斯战略规划者的视野。

根据“中间地带”理论，一个大国一旦在“中间地带”展开引发通道政治的地缘政治博弈，感觉战略利益受到威胁的另外一个（或两个）大国的第一个反应，必然也是以通道对通道的方式构建反制体系。^①俄罗斯的反应基本如此，反制的起点就是玛纳斯。

2002年1月12日，俄罗斯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针对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基地表态称，俄罗斯不会同意美国在中亚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②这一立场在当年12月5日的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的新发展中体现出来。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与吉方签署了两国安全合

① 王鸣野：《“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第28页。

② Edward Helmore, “US in replay of the ‘Great Gam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ngagement in Central Asia begin to become clear”, *The Guardian*, 20 Jan. 200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2/jan/20/afghanistan.theobserver>

作协定和《比什凯克宣言》，俄罗斯与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通道政治博弈就此展开。根据协定，比什凯克东侧 20 公里的坎特军用机场将成为俄罗斯的空军基地。一家俄罗斯报纸的社论对双方的协定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俄罗斯终于认识到中亚应该处在独联体的影响范围之内，首先是俄罗斯的影响范围内。现在，比什凯克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前哨了。”^①2003 年 10 月 23 日，基地正式投入使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亲临剪彩。普京用一句话点明了坎特基地与玛纳斯基地的不同，即“美军的基地是暂时的，而俄罗斯的基地是永久的”^②。如果说坎特基地的设立是对驻玛纳斯基地的美军下的逐客令的话，那么《比什凯克宣言》则是对美国破坏国际秩序和违反国际法的批评。宣言强调俄吉两国忠实于“民主的多极世界秩序”，主张“加强由联合国主持的、根据联合国宪章进行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国际合作。”^③不难看出，这番言辞明显是指责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批评美国在国际反恐战争中违反国际法，暗指美国的反恐战争隐含着破坏国际秩序和遏制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目标。

坎特空军基地的设立，可以说是美俄两国围绕着玛纳斯空军基地展开的以通道对通道为主要方式的通道政治博弈的第一阶段的揭幕战。此后直到 2009 年 2 月 3 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在莫斯科公开宣布关闭玛纳斯空军基地的决定为止，这场博弈才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美俄之间的所谓伙伴关系呈现出渐行渐冷的黯淡前景，双方的博弈围绕着俄罗斯的民主问题和俄罗斯的能源政策，争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美国在积极巩固在黑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收获的同时，不断谋划建设新的通道，其中最要者莫过于绕过俄罗斯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油气资源输往欧洲的能源通道。^④由于彼此都以伙伴相称，美俄在第一阶段的博弈中都保持着一种相对克制（尤其是俄罗斯）的姿态。在这种大背景下，玛纳斯的通道政治第一阶段的前期（2002-2004 年），双方表现得都比较沉闷。然而，2005 年吉尔

① Igor Torbakov, “Moscow Aims to Restore Its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Dec 5, 2002, <https://eurasianet.org/moscow-aims-to-restore-its-influence-in-central-asia>

② 潘志平：《新疆周边国家事态》，第 60 页。

③ 同上。

④ 最重要的一条输油管道就是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管道。

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①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吉延事件，形成了一个新的刺激源，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都感到美国在“中间地带”又要有“颜色革命”的新动作了，于是在当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峰会的联合公报中，要求美国明确撤出玛纳斯空军基地的期限。^②与此同时，作为引发玛纳斯通道政治的直接当事国，吉尔吉斯斯坦在2006年一开始，就表现出一个“中间地带国家”在大国博弈的通道政治中既无奈又精明的算计：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就大幅度提高玛纳斯基地的租金，照会美国驻吉大使；然后就是吉国防部长伊萨科夫在比什凯克与到访的俄罗斯空军总司令米哈伊洛夫大将举行会谈，双方就俄罗斯使用坎特空军基地的问题达成了新协议；最后则是由巴基耶夫总统公开宣布，美国军事基地的年租金应从200万美元提高到2.07亿美元（一说2亿美元）^③，如果美国不同意，基地将被关闭。^④需要指出的是，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美国表现出的强硬态度相伴随的，是俄罗斯承诺的对吉巨大经济支持^⑤：2006年4月24日，巴基耶夫总统访问俄罗斯，双方达成了多项协议，除了重申两国加强军事合作和扩大坎特空军基地的承诺外，巴基耶夫还从俄统一电力公司老总丘拜斯、天然气工业集团总裁米勒等俄罗斯企业巨头那里得到了几十亿美元投资的承诺。^⑥

2007年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当

① 关于这场推翻了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第一位总统阿卡耶夫的所谓革命的原因，从“中间地带”通道政治的角度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哈密多夫在其论文《基地之争：美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中亚》（Alisher Khamidov, “The base of contention: Kyrgyzstan, Russia and the U.S. in Central Asia (2001-2010)”, Baltimore, Maryland, May 2011,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902627242>）中这样解释：“从2003年阿卡耶夫决心允许俄罗斯在坎特建立拥有完全权利的军事基地以来，他就清楚吉尔吉斯斯坦已经被列入了美国的‘待考察’名单。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温度也是从那时开始升温的”，“美国人从各种层面上都清楚表达了他们希望看到比什凯克政权更迭的愿望”。

②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斯塔纳，2005年7月4日。

③ K.Gajendra Singh, “Geopolitical battle in Kyrgyzstan over US military Lilypond in central Asia”, *MWC News*, 12 April 2010, <http://www.modernwriters.org/focus/analysis/1810-geopolitical-battle-in-kyrgyzstan-over-us-military-lilypond-in-central-asia.html>

④ 江奎霖：“俄强力反击北约东扩”，《环球时报》，2006年2月20日。

⑤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通道政治博弈中，小型“中间地带国家”不需要在这种博弈中实现大的战略目标，因此抓住各种机会对大国进行经济上的索取就成为主要目标。

⑥ 《环球时报》记者联合报道：“吉尔吉斯斯坦对俄美态度大不相同”，《环球时报》，2006年4月28日。

年年底，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在北约总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结果是：双方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无法取得共识。一家俄罗斯报纸对双方关系的这种状况作了一番总结：“布鲁塞尔会议实际上结束了俄罗斯与北约发展关系的时期。虽然存在着意见分歧，这种关系直到最近仍被习惯性地称为同盟关系，引人注目的是，莫斯科与布鲁塞尔的关系在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最好。然而，在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取代双方‘同盟关系’的是利益的冲突和全面的强硬对抗。这种情况越来越像冷战。”^①与两国关系的趋冷相对应，吉尔吉斯斯坦这个“中间地带国家”的通道政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年亲俄罗斯的吉国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标就是要结束美军对玛纳斯空军基地的使用。2007年8月，普京总统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向吉总统巴基耶夫表示，俄罗斯可以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2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②与此同时，在外高地区，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政府一心一意要加入北约，对内则对俄罗斯支持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个闹分裂的地区态度越来越强硬，终于在2008年8月8日因为试图以武力收复南奥塞梯而与俄罗斯大打出手。这场冲突时间短暂，格鲁吉亚军队全面溃败，但却造成了三个地缘政治后果：一是格鲁吉亚的领土统一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实现；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致认为俄格冲突是俄罗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中断了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三是美俄在“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对抗越来越激烈。^③如此一来，玛纳斯的通道政治也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始于2009年2月，终于2010年3月。这个阶段是玛纳斯所引发的“中间地带”通道政治进程全面发酵的时期：俄罗斯希望在这一进程中找到撬动美俄关系的“杠杆”，迫使美国承认俄罗斯在中亚的主导地位；美

① Сергей Строкань. Дан приказ ему на Восток//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27 от 08.12.2007. С.1.

② 赵鸣文：《普京大外交》，第276页。

③ 2008年8月14日，美国与波兰草签了美国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的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在波兰的拦截导弹基地的建设工程可能于2008年就开始，在2014或2016年完工。一周之后的8月20日，刚刚参加完北约成员国国外长紧急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赖斯从布鲁塞尔飞至波兰首都华沙，与该国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正式签署了在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议。

国奥巴马政府则一改前任小布什政府在阿富汗的地缘政治雄心，只是希望尽快摆脱阿富汗“泥潭”，因此在玛纳斯基地问题上非常实用的要求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能够配合美国的阿富汗“退出”战略。作为“中间地带国家”的吉尔吉斯斯坦巴基耶夫和阿坦巴耶夫政府，精明地看到美俄两国在这场博弈中的软肋，不失时机地准备从玛纳斯通道政治进程中榨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以服务于国内政治。

2009年2月3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在莫斯科与时任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巴基耶夫在会谈后宣布，由于美方没有满足吉提出的经济条件，以及美军基地在社会上引起的负面反响^①，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不久将关闭玛纳斯美国空军基地。梅德韦杰夫则回应说，尽管美国人将被赶走，但俄罗斯仍准备在阿富汗问题上继续合作。在这次访问中，巴基耶夫收获颇丰：俄罗斯将对比什凯克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17亿美元用于投建坎巴拉塔水电站和购买设备，还有3亿则用来扶持吉国的金融系统。贷款年利率只有0.75%，期限长达40年。此外，俄罗斯不仅免去了该国1.8亿美元的债务，还承诺让吉尔吉斯斯坦得到1.5亿美元反危机无偿援助。^②

可以说，巴基耶夫在俄罗斯宣布关闭玛纳斯基地，是该基地的通道政治进程第二阶段第一回合的开始。美国政府对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这一表态的解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关闭基地是俄罗斯政府的意思^③；第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需要更多的经济好处。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判断，美国政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美军暂时不会撤出玛纳斯基地，第二反应便是这个问题既要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谈，更要和俄罗斯政府谈。就在巴基耶夫宣布要关闭基地的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莫里尔在记者会上表示，为了确保能够继续使用玛纳斯基地，美国政府将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展开不懈的谈判。^④驻阿富汗美军司令部发言人格雷格·朱利

① 主要指2006年12月美军打死一名吉尔吉斯斯坦货车司机事件所引发的不满。

② Роман Баданин, Алия Самигулина, Илья Азар. Россия выселила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из Киргизии//Gazeta.ru.03.02.2009. https://www.gazeta.ru/politics/2009/02/03_a_2935354.shtml

③ РИА Новости. 25 мая 2012 года.

④ “Kyrgyzstan’s U-turn on Closure of Manas U.S Military Base”, <http://www.turkishweekly.net/op-ed/2533/kyrgyzstan%E2%80%99s-u-turn-on-closure-of-manas-u-s-military-base.html>

安也同时发声，称“我们签署了有效合同，他们(吉当局)赚取了大笔资金。近期内不会有任何关闭基地的计划”。^①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传达出的信息则是，如果美国发现马纳斯基地对于阿富汗行动不可或缺的话，它“可能会向吉尔吉斯斯坦提议增加基地租金”。当然，美国政府也不忘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施加压力，频繁放出风声，称美国正在寻找玛纳斯基地的替代者，欧洲和海湾国家的基地被纳入了考虑范围。^②更为重要的是，还有消息说美国正在和乌兹别克斯坦商谈重建军事合作的可能性^③，而且美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也说塔吉克斯坦总统准备允许北约国家和美国过境运输非军用物资到阿富汗。^④一位华盛顿的美国分析人士甚至威胁说，如果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以为美国会屈服于压力向其提供相当于俄罗斯提供的约 23 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及其他援助的话，那它就错了，因为美国“可以一走了之”。^⑤以上讯息，特别是美国政府官员愿意增加基地租金的信息，显然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产生了影响。2009 年 2 月 5 日，从比什凯克传来消息：原定于 5 日进行关于关闭美军马纳斯基地的审议表决工作被无限期推迟。据吉方透露，巴基耶夫总统故意暂缓履行对莫斯科的承诺，以等待美方提出新的建议。^⑥

然而，美国人却把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晾在一边，转头去和俄罗斯政府商谈。2009 年 2 月 11 日，奥巴马政府派遣以美国前驻莫斯科大使威廉·伯恩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目的是要听听“吉尔吉斯斯坦想要什么”，和俄罗斯人是否想用美国继续使用该基地来交换什么东西。^⑦看到美国人去了莫斯科，巴基耶夫总统马上就通过媒体喊话：“吉尔吉斯斯坦和美国在这方面不存在政治上的分歧，只存在经济方面的问题”。^⑧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仍然未予理睬。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只好再度施压。2009 年 2 月 19 日，吉尔

① ТАСС. Вашингтон. 3 февраля 2009 года.

② На авиабазу «Манас» не поднялись руки//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1 от 06.02.2009. С.8.

③ Gordon Lubold, Howard LaFranchi, “Air base flap reflects tension over US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④ 《参考消息》，2009 年 2 月 7 日。

⑤ Gordon Lubold, Howard LaFranchi, “Air base flap reflects tension over US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⑥ На авиабазу «Манас» не поднялись руки//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1 от 06.02.2009. С.8.

⑦ Nicholas Kravev, “Envoys Rush to Moscow to Save Key Base; Kyrgyz Issue Tests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Times*, February 12, 2009.

⑧ РИА Новости. 11 февраля 2009 года.

吉斯斯坦议会几乎全票通过了废除玛纳斯美国空军基地的法案，巴基耶夫总统在次日便签字生效。消息传出后，美国国际危机小组中亚代表处负责人立即回应说，现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等着美方采取行动，即便巴基耶夫总统签字以后，美国也有 180 天的时间劝说吉尔吉斯斯坦人再考虑考虑。而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曼则一如既往地声称：“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可以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提建议，可是我们不会不惜任何代价，我们会研究其他可行的方案”。然而，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却释放出了更加明确的信息：为了继续使用马纳斯基地，美国可以考虑提高租金。^①这正是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所期待的回复。3月4日，巴基耶夫总统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关于该基地的谈判“大门尚未关闭”。^②然而，直到3月27日，美吉在双方是否正在就解决基地使用问题举行谈判的说法上仍然相互矛盾。匿名的美国官员在莫斯科对记者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邀请下，我们已经同意就基地协定继续有效的可能性，与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商谈。”而吉外交部长卡德尔别克·萨尔巴耶夫的回应则是：“没有”。^③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双方的确在谈判。

需要指出的是，在观察玛纳斯通道政治进程第二阶段第一回合的发展时，必须同时注意中亚地区这个“中间地带”内部的关系演变，及这些国家与美俄关系的变化。具体而言，2009年上半年，乌兹别克斯坦拒绝参加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外长会议，并与俄罗斯就组建该组织快速反应部队问题出现严重分歧；乌兹别克斯坦强烈反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在上游修建大型水电枢纽^④；4月27日，塔吉克斯坦内务部和美国驻杜尚别使馆安全局组织了应对恐怖活动的演习；乌兹别克斯坦总统6月3日在塔什干会见美国大使诺兰时两国达成协议：利用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

① США продолжают попытки сохранить военную базу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Голос Америки. <https://www.golos-ameriki.ru/a/a-33-2009-04-28-voa18/642320.html>(VOA)

② Ann Scott Tyson, “Afghan Supply Chain a Weak Point; With Troop Buildup Coming, U.S. Is Challenged on the Ground and in the Air”,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Nexis Uni. March 6, 2009.

③ 《参考消息》，2009年3月28日。

④ Алексей Тимофеев. Узбекистан воюет на условиях Ташкент озвучил Москве четыр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для своего участия в единой армии. 4 июня 2009. <http://vz.ru/politics/2009/6/4/294118.html>

机场和交通运输系统向阿富汗转运“非战斗用”军事物资。^①上述情况表明，在美俄关系在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可能总体转暖的情况下，中亚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会趋好，而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大型“中间地带国家”则有脱俄靠美的迹象。这些情况对吉尔吉斯斯坦这个“中间地带国家”在玛纳斯通道政治进程中的决策有直接影响。

具体而言，这种影响是：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认为在美俄关系趋好、中亚邻国纷纷与美国接触的情况下，本国在玛纳斯基地问题上可以改变对俄罗斯的承诺。同时，美国奥巴马政府也开始认真地听取吉政府的意见了。2009年6月12日，巴基耶夫总统收到奥巴马总统的来信，信中表示美国不希望关闭马纳斯基地，打算派遣一个代表团赴吉就此问题展开商谈。^②6月19日，吉尔吉斯斯坦外长萨尔巴耶夫宣布，美吉两国在磋商巴基耶夫给奥巴马回信中的建议时达成了协议：允许北约取道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向阿富汗运送非军用物资。消息一出，就有专家指出，马纳斯可能会继续充当美国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办公厅的一位消息人士则向记者透露：“与美国人的第一轮谈判已经结束了。”他称吉方将拖延时间，首先要看美国人是否会履行承诺：不只是提供经济援助，还包括协助巴基耶夫谋取连任。至于谈判还要进行几轮的问题，这位消息人士则没有明确的回答。^③然而，上述情况表明，只要美国肯付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满意的价钱，玛纳斯基地就可以保留。事实的确如此，几天之后就传来了令“整个地区颇为震惊”^④的消息：美国 and 吉尔吉斯斯坦就玛纳斯基地达成了协议，同意基地延期一年。不过，不同的是，基地的名字由北约联军军事转运中心变成了“美国过境运输中心”。^⑤

至此，围绕着玛纳斯空军基地所展开的“中间地带”通道政治第二阶段的第一回合就算落幕了。在这一回合，美俄两个通道政治的博弈主角出台亮

① Андрей Арешев. Россия и её партнеры перед лицом наступления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2.06.2009. <http://otechestvovua.org/main/20096/1241.htm>

② Виктория Панфилова. США оценили «Манас» в миллиард долларов//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2.06.2009.

③ Там же.

④ Ellen Barry, “Russia’s neighbors Resist Wooing and Bullying”,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3, 2009, <http://www.nytimes.com>

⑤ Ibid.

相的频率并不高，反倒是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小型“中间地带国家”频频发声，然其所求者仍是经济利益。表面上看，吉尔吉斯斯坦确实达到了目的：俄罗斯2月份承诺的首笔资金1.5亿美元的紧急赠款以及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已于4月到账，吉政府可以支付工资和养老金。美吉协议签署后，基地的年租金从1740万美元提高到了6000万美元。^①巴基耶夫之子马克西姆一手接管了马纳斯机场的管辖权，收获了与机场相关的经济利益。^②

“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由于地位、实力的显著差异而造成的在国家利益方面与世界大国的认知鸿沟，“中间地带国家”（尤其是小型“中间地带国家”）在国际道德观上表现出比较突出的相对性、多变性和模糊性。^③这一特征使这类国家在与世界大国交往时，喜欢使用投机性手段，过于注重眼前利益而缺乏顾及长远利益的意愿和能力：鉴于严峻的经济问题，吉尔吉斯斯坦的巴基耶夫总统最迫切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美俄的援助稳住国内社会，为自己在2009年7月的总统选举中争取连任打好基础。然而，如此一来，外部大国将其作为棋子利用完毕后，随手抛弃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正如有专家谈到俄罗斯人面对中亚国家时所言：“根本没有什么忠诚可言。对手是在不断变化的。他们必须要参与到游戏中去竞争。”来自美国的专家也坦言，巴基耶夫总统“先是作弄了俄罗斯人，然后又来跟我们玩。这都是为了大捞一笔”。然而，正如俄罗斯的民间智库政治新闻研究中心主任阿列克谢·穆欣所指出的：“用钱买来的爱情不会持久”。^④吉尔吉斯斯坦在通道政治第二阶段第一回合中的所作所为的负面作用，很快在通道政治的第二个回合中体现出来。

美吉关于玛纳斯基地的新协议宣布后，俄罗斯外交部就称，莫斯科将做出“相应的回应”。^⑤2009年7月7日，俄副总理谢钦和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对比什凯克进行了一次未向外界公布的短暂访问。访问期间，俄方代表与

① Ellen Barry, “Russia’s neighbors Resist Wooing and Bullying”.

② Deirdre Tynan, “Kyrgyzstan: Manas Brouhaha has Troublesome Implications for Afghan Supply Initiative”,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manas-brouhaha-has-troublesome-implications-for-afghan-supply-initiative>

③ 王鸣野：《“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第17页。

④ Ellen Barry, “Russia’s neighbors Resist Wooing and Bullying”.

⑤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Бек Орозалиев. Россия повела в киргизском счете. В городе Ош будет открыта вторая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24 от 11.07.2009. С.1.

吉总统巴基耶夫讨论了扩大俄坎特基地或在吉南部开设新军事基地的可能性。7月10日，吉总统办公厅消息人士证实，俄方的兴趣是开设新基地。对此，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并没有否认。他说：“我们希望与吉尔吉斯斯坦保持长期的战略性伙伴关系。我们都是集安组织成员。这一条约同北约成立条约一样有一些专门的条款，因此我们应加强彼此的安全。”俄国家杜马独联体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康斯坦丁·扎图林的表态则更为明确，他说：“俄罗斯决定在吉建立第二个基地是有政治理由的，这是应该的，以免有人说吉拿了钱却对俄没有任何回报。保留美国的马纳斯军事基地也同俄进行过协商，莫斯科决定，现在我们应该有第二个基地，这将进一步表明，谁是一家之主。”^①2009年8月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畔乔尔蓬阿塔举行集体安全组织非正式峰会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签署了建立隶属集安组织集体快速反应部队的军事训练中心的备忘录。然而，在训练中心的选址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俄罗斯希望建在奥什，吉尔吉斯斯坦则希望选择巴特肯。^②双方计划在当年10月达成最终协议。巴特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交界地区，双方经常发生摩擦，吉尔吉斯斯坦试图借助俄罗斯的军事基地，对乌兹别克斯坦起到震慑作用。同时，俄罗斯一位军事专家伊万·萨夫兰丘克指出，乌方不排除武力解决与邻国众多问题的可能性。塔什干在与邻国关系中有武力解决问题的因素。乌头面人物普遍存在为水而战的情绪。俄在吉乌交界地区建军事基地就会使乌方的军力优势化为乌有。因此，乌兹别克人特别希望俄罗斯与邻国的军事合作最小化。^③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吉俄协议一公布就遭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强烈反对，认为俄罗斯在巴特肯建立军事基地，将严重扰乱中亚的国家间关系，使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④考虑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反对，俄罗斯暂时搁置了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Бек Орозалиев. Россия повела в киргизском счете...С.1.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Кабай Карабеков.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подождет мирного времен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учебный центр на юге Киргизии создадут не раньше 2011 год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13 от 28.06.2010. С.5.

③ Эксперты комментируют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й демарш Ташкента. 05.08.2009. <https://www.fergananews.com/news/12622>

④ “Uzbekistan: Tashkent Throws Temper Tantrum over New Russian Base in Kyrgyzstan”, <https://eurasianet.org/uzbekistan-tashkent-throws-temper-tantrum-over-new-russian-base-in-kyrgyzstan>

这一计划。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尼古拉·博尔久扎对记者说：“目前，基地的地点、数量都未定，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对具体部署做出安排”。^①

可以看出，以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协议在吉设立第二个军事基地为标志而开始的玛纳斯通道政治第二阶段的第二个回合，产生了四个地缘政治结果：第一，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间关系出现危机；第二，乌兹别克斯坦和美国关系出现回暖的势头^②；第三，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本来就不睦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第四，美国对俄罗斯在中亚强化影响的做法，虽然没有立即做出针对性的回应，但却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地缘政治目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美国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认为，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第二个军事基地的目的有四个：加强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控制，特别是加强对奥什地区的控制；加强对整个费尔干纳盆地、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控制；同时，这一举措还针对前不久塔吉克斯坦流露出的疏俄苗头；最后，新基地是未来俄罗斯图谋阿富汗的前哨站。^③

五、玛纳斯通道政治的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始于2010年3月，终于2014年美国撤出玛纳斯基地。这个阶段的三方博弈过程由三个回合构成，即关于美国在吉新基地的博弈、吉内部的四月革命和玛纳斯基地的最终关闭。

（一）美国的新基地计划与俄罗斯的反应

如前所述，在玛纳斯通道政治第二阶段的第二回合，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未将美国基地赶走，致使俄罗斯要求以建立第二个军事基地作为补偿，但却引发了中亚这个“中间地带”内部关系的复杂化和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的危机，俄罗斯不得不搁置其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第二个军事基地的要

① “Uzbekistan: Tashkent Throws Temper Tantrum over New Russian Base in Kyrgyzstan”.

② Ibid.

③ Мавлон Шукурзод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эксперты 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базе..... 08.08.2009. <https://ia-centr.ru/experts/5458/>

求。然而，俄罗斯计划的搁置却给另外一个大国提供了机会。2010年3月15日，俄罗斯《新闻时报》根据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旗下的《欧亚每日观察》网站同年3月11日的一篇文章爆料，美国同意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应对其南部边界的潜在威胁，办法就是拨款550万美元在巴特肯建立指挥训练中心。^①《欧亚每日观察》的文章指出，2010年3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在比什凯克会见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会谈时，吉总统称本国的主要威胁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然而，该文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吉尔吉斯斯坦军官的话说：“根据已掌握的资料推测，几位重要的军事领导人都认为，即将建立的巴特肯反恐中心的作用，是应对乌兹别克斯坦可能发动的军事侵略。”因为吉国军官普遍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正在发展军力，旨在夺取吉国水库和保护奥什州和巴特肯州的乌兹别克人。文章强调，新的训练中心是应吉国领导层的要求建立的，培训的是名为“蝎子”的特种营人员。^②

如此一来，玛纳斯通道政治的第三个阶段就开始了。

针对上述消息，俄罗斯政府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不满，但俄罗斯媒体立即展开了分析和抨击，具体观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美吉在巴特肯的新安全合作计划，是俄罗斯领衔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中亚战略遭到失败的新证据。^③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中亚问题观察家亚历山大·舒斯托夫指出，两国早在2008年8月就开始进行有关建设新基地的谈判，即使是玛纳斯基地的去留问题也没能影响到这场谈判。也许要求美国撤出玛纳斯基地一开始就是骗取俄罗斯贷款的把戏，比什凯克在这一点上早与美国达成了一致^④；

（2）继2009年在玛纳斯基地问题上欺骗俄罗斯后，“比什凯克官方再次决定触动莫斯科的神经。可以说，这也触动了北京的神经，而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还天真地认为，吉中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此，北京只是明智地笑笑”。

① Deirdre Tynan, “Kyrgyzstan: US Intends to Construct Military Training Center in Batken”,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us-intends-to-construct-military-training-center-in-batken>

② Аркадий Дубнов. США защитят Киргизию от «узбекской угрозы»// Время новостей. 15.03.2010.

③ Аркадий Дубнов. США защитят Киргизию от «узбекской угрозы».

④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Управляемый хаос» дл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21.03.2010 <https://www.fondsk.ru/news/2010/03/21/10067-10067.html>

因此，“严格说来，这种‘外交’行动未必符合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健康思维。俄罗斯和中国不一定公开做出回避和反应，但却难以预料，两国政策不会总是给吉国变成大量财富”；（3）美国在中亚的行动方针具有精心策划的反俄、反华和反伊朗性质。^①根据政治学副博士、《真理报》驻比什凯克记者谢尔盖·科热米亚金的说法，美国削弱伊朗的第一步将是围绕伊核问题的制裁和发动伊朗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②，在这方面，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基地起了“不体面”的作用。^③华盛顿将吉作为控制亚洲的重要战略基地，有了它的帮助，美国将能够维持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同时在极有可能形成的德黑兰和北京军事政治联盟中挑拨离间”^④；（4）美国在中亚制造“可操控的乱局”。由于在卡穆巴拉金和罗贡水电站的修建问题上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产生对抗，乌兹别克斯坦利用停止供应天然气、大幅提高关税、实行禁运和设置过境障碍等手段，向两国施压，而美国在这些问题不持立场，却同时要加强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合作，实际上就是制造“可操控的乱局”以渔利。^⑤

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也采取若干措施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施压。首先，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反对派媒体，加强了有关巴基耶夫政府贪污腐败、涉嫌犯罪的宣传。吉政府封锁了相关网站，没收了两家报社已经印好的报纸。对此，俄罗斯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立即发表声明指出，“已听到一大批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公民说，他们难以进入俄罗斯的互联网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Князев. «Многовекто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пособна привести Кыргызстан к «многовекторным» конфликтам. 10-16 марта 2010. <https://ia-centr.ru/experts/7436/>

② Сергей Кожемякин. Вашингтон готовит плацдрм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18.03.2010. <https://ia-centr.ru/experts/7491/>

③ 谢尔盖·科热米亚金(Сергей Кожемякин)在自己的文章中称，2010年2月底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伊朗城市阿巴斯港迫降。伊朗特工机关在机上逮捕了恐怖组织“真主旅”的头目阿卜杜勒·马利克·里吉。该组织在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和军事资助下活动，目的是让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脱离伊朗。在审讯里吉时查明，他本打算飞往玛纳斯空军基地会见美国高官。更有趣的是，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人在玛纳斯基地培训派往伊朗的武装分子。伊朗还向吉当局发表声明说，这种行为是干涉伊朗内政，并要求查明情况。

④ Сергей Кожемякин. Вашингтон готовит плацдрм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⑤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Управляемый хаос» дл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站，因为网站被封了”，称俄罗斯政府“关注”网络审查制度问题。^①其次，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在2010年3月29日签署一项政令，取消对吉尔吉斯斯坦及其他未加入新关税联盟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汽油出口补贴。该令4月1日生效后，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燃料运输就中断了。吉国的油价在数日之内开始上涨，造成通货膨胀。^②

（二）吉尔吉斯斯坦四月革命与美俄的反应

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腐败和治理无能，也得到了国际危机研究组织的证实。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巴基耶夫家族“一手遮天、腐败泛滥、独享经济和政治领域重要职位”，认为这些因素是引发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内部冲突的导火索^③。不出其所料，2010年4月7日，在反对派领导下，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大范围的反政府骚乱，巴基耶夫政府一开始强力镇压，造成75人死亡和大量人员受伤的惨剧。然而，武力镇压很快失败，巴基耶夫迅速逃离首都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后的又一次政变获得成功。

从“中间地带”理论的角度出发，观察此次政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即：大国对政变的态度，大国在政变中的作用，以及大国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变后发展的期望。

大国对政变的态度，主要涉及的是俄罗斯和美国对吉尔吉斯斯坦此次事态发展的看法。2010年4月8日，即政变发生的次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就迅速承认了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他主动给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打电话，双方讨论了俄罗斯援助新政府的问题。奥通巴耶娃告诉普京，吉国需要经济支持，普京回应说：“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俄罗斯一直都向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今后仍将这样做”。双方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吉临时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阿坦巴耶夫，很快前往莫斯科商谈援助问题。负责财政问题的副总理萨利耶夫指出，双方“可能不仅谈人道

① Andrew E. Kramer, “Before Kyrgyz Uprising, a dose of Russian Soft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Apr.19, 2010, <http://www.nytimes.com>

② Philip P. Pan, “Russia is said to have fueled Kyrgyz unrest; Media campaign, economic measures cited as catalysts”,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Nexis Uni. April 12, 2010.

③ Dilip Hiro, “Kyrgyzstan's second tulip revolution”, *The Guardian*, April 8, 201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0/apr/08/kyrgyzstan-second-tulip-revolution>

主义援助问题，还可能谈财政问题。这指的是经济援助，因为前政府采取的不受欢迎的措施使我们的资金所剩不多。”^①

从俄罗斯政府迅速承认政变后所建立的临时政府的外交举措可以看出，俄罗斯政府不仅不反对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推翻巴基耶夫政府，而且迅速予以承认，表明俄罗斯政府对 2009 年 2 月以来巴基耶夫政府在围绕玛纳斯空军基地所发生的通道政治中的所作所为，已经深为不满，对其垮台不表丝毫惋惜和同情。同时也表明，俄罗斯政府对新出现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权的亲俄态度是有信心的。

与俄罗斯迅速承认新政权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到 2010 年 4 月 8 日晚还没有承认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白宫发言人就此解释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研究当地局势，因为到现在仍很难弄清楚谁在掌权。是否与新政府建立接触将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方针。我们希望恢复符合宪法的民主体制”。^②从以上表态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事态发展没有任何预判，以致事到临头无法决断；通过几年来的折冲樽俎，美国政府知道巴基耶夫总统想要什么^③，因此还是愿意和旧政府打交道。至于新政府，美国政府要么不熟悉，要么认为其亲俄，不愿立即对其表明立场，甚至委婉地称其不符合宪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需要玛纳斯通道连通阿富汗，一旦发现巴基耶夫无力回天，也只能接受现实。这一点从美国对俄罗斯在这次政变中的作用的官方表态中就可反映出来。

如前所述，经济和腐败问题是此次事变的导火索，但在谁点燃了导火索这个问题上，各方的说法却很微妙：巴基耶夫认为是“外部力量”唆使人推

① Роман Баданин, Илья Азар, Ольга Болотова, Алия Самигуллина. За кого Киргизия// Gazeta.ru. 08.04.2010.

② Там же.

③ 美国提高玛纳斯基地的租金后，巴基耶夫家族与该基地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巴基耶夫被推翻后，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巴基耶夫还在美国华盛顿访问。德尔德里·吐纳恩 (Deirdre Tynan) 在《美国政府可能在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基地遭遇重大外交灾难》的评论中指出：“为了获得玛纳斯转运中心的使用权，美国政府与巴基耶夫及其家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然而，比什凯克的局势突然反转，这可能给美国在中亚和阿富汗的战略利益造成近在眼前的灾难”。“Kyrgyzstan: Possible Diplomatic Debacle Looms for US Government over Manas Base”,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possible-diplomatic-debacle-ooms-for-us-government-over-manas-base>

翻了他，认为“如果没有外部力量，根本不可能搞出如此协调一致的行动”。然而，巴基耶夫很聪明地强调，“我不会指出具体的国家”。^①从“中间地带”理论的角度看，最值得玩味的是俄罗斯和美国两大国的想法。政变一旦发生，俄罗斯总理普京就立即否认俄罗斯在其中发挥过任何作用。他说：“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官员们，都与这些事件没有任何瓜葛”。^②对此，美国政府不仅未予反对，反而立即同意。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华盛顿不认为政变是莫斯科资助的。^③从大国在“中间地带”博弈的一般逻辑来看，即使美国同意普京的说法，也没必要明确无误地说出来。笔者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对俄罗斯政府随声附和，原因还在于美国政府对发生于吉尔吉斯斯坦这个“中间地带国家”的通道政治的基本判断：首先，美国奥巴马政府认为，在美俄围绕吉尔吉斯斯坦的博弈中，美国处于被动地位；其次，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非常需要玛纳斯这个空中军事通道；第三，一旦美国对吉尔吉斯斯坦新政权形成中的俄罗斯作用提出异议，就会将美俄两国置于对抗境地。如此一来，俄罗斯很可能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新政权取消美国使用玛纳斯通道的权利，从而给美国的阿富汗退出战略造成麻烦。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白宫发言人在表示同意普京的说法时还不忘指出，美国“也不认为政变的矛头针对美国的利益”。^④

在当时的美国政府看来，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利益就是保持玛纳斯通道的畅通，而通道的钥匙却握在俄罗斯的手里。由于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变中俄罗斯的作用问题上没有冒犯俄罗斯，围绕着玛纳斯的通道政治也未出现剧烈的变化。先是俄罗斯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在布拉格美俄峰会期间表示，“在吉尔吉斯斯坦，应该只有一个基地，那就是俄罗斯基地”，并称俄罗斯会敦促吉尔吉斯斯坦新领导人关闭美国基地。同时，吉尔吉斯斯坦新政府的一位官员也说，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空军基地存在的时间很可能

① Роман Баданин, Илья Азар, Ольга Болотова, Алия Самигуллина. За кого Киргизия.

② Dilip Hiro, “Kyrgyzstan's second tulip revolution”.

③ Роман Баданин, Илья Азар, Ольга Болотова, Алия Самигуллина. За кого Киргизия.

④ Там же.

缩短。^①然而，这只是俄罗斯释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目的就是迫使美国政府就吉国的事态发展表明态度，当白宫发言人公开否认俄罗斯参与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变后，吉俄两国的态度都开始转变：在美国表明态度的次日，吉国临时政府领导人奥通巴耶娃就告诉美联社记者，在玛纳斯美军基地问题上，“我们将履行我们在国际协议中做出的承诺”。^②几天之后在美国华盛顿，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就奥通巴耶娃关于玛纳斯基地问题的表态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俄罗斯不会反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决定。^③由此不难看出，只要美国承认俄罗斯主导中亚这个“中间地带”秩序的权力，俄罗斯并不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反恐，因为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同样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

巴基耶夫政府垮台后，分析人士立即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事态发展对俄罗斯有利。吉尔吉斯斯坦一位名叫马尔斯·萨利耶夫的独立分析家说：“吉尔吉斯斯坦的变动非常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地位都在增强。实际上，俄罗斯已经获得了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绝对指挥权。”^④美国政府也承认这一点。2010年5月27日，美国负责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乔治·克罗尔在莫斯科时再次强调，吉国发生的事件是若干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外国势力策划百姓集会。他称，美国不但没有与俄罗斯或其他国家争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力，而且双方一直就当前局势保持着联系和合作，认为双方应当继续努力以便营造一种让人们在表面上也感觉不到俄美竞争的关系氛围。克罗尔还特别指出，两国要特别警惕吉国内部势力以及别的国家试图挑拨双方关系的企图。谈到俄美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克罗尔更是语出惊人，称在吉国本来就只有俄罗斯一个空军基地，玛纳斯只是国际转运中心，而且一旦阿富汗的局势稳定下来，美国以

① Deirdre Tynan, “Possible Diplomatic Debacle Looms for US Government over Manas Base”,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possible-diplomatic-debacle-looms-for-us-government-over-manas-base>

② Deirdre Tynan, “Bishkek Plans No Immediate Changes in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US, Russia”,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bishkek-plans-no-immediate-changes-in-strategic-cooperation-with-us-russia>

③ Алия Самигуллина. У Бакиева результат налицо// Gazeta.ru. 14.04.2010.

④ “Kyrgyzstan: Washington Reaches Out to Bishkek”, <https://eurasianet.org/kyrgyzstan-washington-reaches-out-to-bishkek>

及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在中亚存在的必要性就不复存在了。^①

就在克罗尔发表这番谈话之后不久，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的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对此深表关心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立即建议欧安组织前往调查，美国也表示支持。然而，此举却遭到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华盛顿和塔什干的阴谋，目的是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乌兹别克分离主义。同时，美国支持欧安组织展开国际调查的立场也激怒了吉国的安全部门，认为这是美国企图羞辱和搞垮他们。上述情况给吉尔吉斯斯坦的通道政治增添了新的因素，使得俄美博弈继续向着对美国不利的方向发展。2010年8月25日，美国国防部突然撤销了投资额1000万美元的奥什新美国军事中心项目。分析认为，这是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迫于民族主义者的压力做出的决定。^②

（三）通道政治的最后一轮博弈——玛纳斯通道政治的终结

2010年1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与吉国政府签署协议，将玛纳斯转运中心的使用期延长至2014年。2014年之后该基地的命运则未予决断。2011年11月2日，新当选的吉国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宣布，2014年以后玛纳斯基地将关闭，吉国将不再与美国续约。他说：“我们的机场是民用的，应该搞民用航空运输。军用飞机在机场停靠会引起不好的联想。”^③

必须指出的是，吉国新领导人的上述讲话，不是给围绕着玛纳斯基地所发生的通道政治画的句号，而是新一轮通道政治博弈的开始。阿坦巴耶夫总统讲话的次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和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利特尔就做出了反应。纽兰称“我们期待与新政府就2014年后的续约问题展开磋商，他们明确暗示我们希望进行这种讨论”，利特尔说他的领导“将研究阿坦巴耶夫的声明，分析可能的后果”。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基于如下判断，即“阿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Мы не стараемся построить трубу в обход России»---Джордж Крол о политике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8.05.2010.

② “OSCE Police Mission for Kyrgyzstan Stalls”, <https://eurasianet.org/osce-police-mission-for-kyrgyzstan-stalls>.

③ Александр Артемьев, Екатерина Савина. Манас не будет воевать// Gazeta.ru. 01.11.2011.

坦巴耶夫提出撤除基地，一方面是试图讨好莫斯科，另一方面是想迫使华盛顿为续约提高租金。如果美国愿意，它将提出比什凯克无法拒绝的建议，届时基地将会保留。美国来到中亚不是为了就此离开。”^①然而，阿坦巴耶夫的亲俄倾向和俄罗斯对他的支持都具体而明确：前者要得到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后者则要求实实在在的地缘战略酬劳。双方对彼此的要价从以下六个方面体现出来：（1）阿坦巴耶夫承诺关闭玛纳斯空军基地；（2）俄罗斯减免吉尔吉斯斯坦 1.8 亿美元债务，吉国则承诺向俄方转让位于比什凯克的商务代表处大楼和达斯坦鱼雷制造厂 48% 的股份；（3）俄罗斯获准将其在吉国的所有军事设施整合为一个基地，使用期限为 49 年，到期后自动延期 25 年；（4）在吉国南部建立吉政府曾于 2009 年承诺的集安组织训练中心；（5）吉方向俄罗斯国有公司出售吉尔吉斯斯坦石油公司和吉尔吉斯斯坦天然气公司 75% 的股权；（6）吉方计划与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共同建造坎巴拉金斯克 1 号和 2 号水电站，并与俄罗斯水电公司在纳伦河上游兴建四座水电站。作为交换，俄罗斯承诺向吉方提供 3000 万美元优惠贷款，同时从欧亚经济共同体反危机基金中为吉方争取到 1.06 亿美元。^②

从以上协议可以看出，吉尔吉斯斯坦为了给其经济注入资金做出的让步不可谓不大。然而，阿坦巴耶夫 2012 年 2 月的莫斯科之行并没有得到期望的 1.06 亿美元贷款。大为不满的他立即在 2 月 25 日表示，比什凯克正在研究关闭俄罗斯坎特空军基地的可能性。他说：“坎特空军基地只满足了俄罗斯将帅的自尊心，但他们既不支付租金，也不履行相关义务。那我们还要它干吗？”^③对此，俄罗斯反应是：“俄方重申愿意于近期支付租金和使用吉方基础设施的费用。但吉尔吉斯斯坦偿还俄罗斯 4.93 亿美元贷款的问题则更为复杂。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的态度。”^④不难看出，吉方实际上是谋求利用通道政治撬动经济杠杆，而俄方则不愿过多放弃经济利益。于是，吉方再度施压。2012 年 4 月底，美

① 《参考消息》，2011 年 11 月 4 日。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База только тешит самолюб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итета». Президент Киргизии о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Россией// Коммерсантъ. №.34 от 27.02.2012. С.8.

③ Там же.

④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База только тешит самолюб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итета».

国专家小组前往比什凯克与吉方讨论玛纳斯基地的未来。5月4日，阿坦巴耶夫发表谈话，称玛纳斯的未来将视本国和伙伴的战略利益而定。不过，这次吉方的策略并没有让俄罗斯紧张，原因是吉方已经允许玛纳斯基地运行到2014年，无论是希望基地撤除的俄罗斯还是希冀留下的美国，都觉得在时间上仍然有回旋的余地，因此双方都不急于向吉方出价。美国早在2009年巴基耶夫时期就声称，不会不惜一切代价满足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要求，这次更不可能随着吉方的脚步起舞。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美国的反复博弈，俄罗斯已经确认，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无法威胁到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地位。反观吉尔吉斯斯坦，经过2010年的两次大的政治动荡，新上台的阿坦巴耶夫面临着大量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如不迅速缓解则很可能面临民众的再度抗议。正如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问题专家列昂尼德·邦达列茨所言，经济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如今对该国来说十分尖锐。阿坦巴耶夫正在考虑获得金援以投资经济的一切途径”。^①因此，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放话说2014年后可能保留美军基地，与其说是向俄罗斯要价，还不如说是内心焦虑的表现。明乎此，俄罗斯对阿坦巴耶夫的谈话的反应仍然是不温不火。俄外交部发言人亚历山大·卢卡舍维奇表示：“我们积极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关于2014年后不再与美国续约，并将该设施转变为没有任何军事色彩的国际民用运输中心的声明。”^②

在围绕玛纳斯空军基地的最后一轮通道政治博弈进程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该计划旨在从经济和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将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连为一体，成为美国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替代战略。这一战略明显欲将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排除在外。计划出笼后，希拉里就在印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大力宣传，一时引起各方关注。可以说，“新丝绸之路计划”也构成了推动俄罗斯继续关注中亚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新因素，进一步促使俄罗斯加快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谈判的速度。2012年9月20日，再次担任俄总统的普京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两国政府就以下问题达成协议：关于军事基地问题，相关协议将

① Андрей Резчиков. Деньги на базу, Киргизия может сохрани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центр «Манас» после 2014 года// Взгляд. 4 мая 2012.

② Там же.

于 2017 年生效，有效期为 15 年；关于吉方所欠债务问题，协议规定俄罗斯免除吉方 4.89 亿美元的债务^①；关于能源问题，协议规定俄罗斯要帮助吉方修建坎巴拉塔 1 号水电站和纳伦河上游梯级水电站^②；关于玛纳斯基地问题，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称，2014 年后美国基地将不复存在。上述协议使双方都感到满意。阿坦巴耶夫说，吉尔吉斯斯坦的未来就在于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普京说，俄罗斯军事基地将在北约撤出阿富汗后确保中亚地区的稳定。俄罗斯战略思想界和媒体对两国的协议也多持支持态度，莫斯科大学学者阿列克谢·弗拉索夫认为，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协议表明，莫斯科准备对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做出相应的回应。^③还有分析家指出，吉俄协议意味着中亚地区第二大重要玩家美国势力的式微，表明俄罗斯正在势头强劲地重返中亚，它“怀揣雄心勃勃的计划且目标笃定”^④；这将使俄罗斯今后几十年，在世界上这个地缘政治敏感区域的势力范围得以维系。^⑤

在获知吉俄可能签署军事基地协议后，美国负责中亚地区合作与发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突然取消了自己中亚之行中的阿拉木图和比什凯克两站，直接飞抵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此举表明，美国已承认吉尔吉斯斯坦无法挽回，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有矛盾的乌兹别克斯坦身上。然而，事实证明，乌兹别克斯坦也没有允许美国在自己领土上建立军事通道。

结论

从 2001 年到 2014 年，玛纳斯空军基地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中间地带”通道政治的所有内容：大国从谅解合作到猜疑对抗，大国对“中间地带国家”内政的影响，“中间地带国家”不断变化的立场与行为给大国的“中间地带”战略和政策造成的冲击等等，所有这些内容无不展示出“中间地带”的通道

① Сергей Смирнов. Российские базы н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м «пути». Россия договорилась о создании военной базы в Киргизии// Gazeta.ru. 20.09.2012.

② Антон Барбашин. РФ и США делят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4.09.2012.

③ Сергей Смирнов. Российские базы н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м «пути»...

④ Антон Барбашин. РФ и США делят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⑤ Александр Шустов.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оенные останутся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7.10.2012. <https://oko-planet.su/politik/politikrus/142136-rossiyskie-voennye-ostanutsya-v-tadzhikistane.html>

政治的复杂和微妙。如果从“中间地带”理论的视角去解读的话，以下几点应该是大国之间、大国与“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在处理“中间地带”的通道政治时，应该予以充分思考的问题：

首先，玛纳斯通道的通道政治，是两个对通道所在的吉尔吉斯斯坦有着极为不同的战略思考的大国之间展开的。俄罗斯将吉国视为自己的近邻和势力范围，任何大国在该国施加战略性影响都会引发其对称性或不对称性的反应。美国对吉国在自己地区战略中的作用，看法是不确定的，时而认为其是进入中亚的跳板，时而只将其视作进入阿富汗的通道。正是这种不确定给俄美双方的关系带来困扰，主要表现为彼此无论是在合作还是对抗方面都举棋不定，最后必然有一方在认为自己有完全把握时将对方赶走了事。

其次，大国要充分认识到通道所在国家（尤其是小型“中间地带国家”）内部政治的复杂性，这类国家一般都缺乏制定和实施长远国家发展规划的意愿和能力，所注重者多是可见未来的实际收益最大化。因此，一旦涉及通道建设，大国一定要充分了解通道所在的“中间地带国家”内部政治的变化特点和发展趋势，制定出因应各种变化的策略。

第三，小型“中间地带国家”的领导集团（包括其亲属集团），不同程度上都将想利用通道的大国看作求索的对象。这种求索是正常的也是不正常的，前者是因为通道是小型“中间地带国家”的战略性资产，利用这种资产获取收益实属正常；后者则是因为通道所获收益所产生的影响：一般而言，由于这种收益来得轻而易举，由此而产生类似“资源诅咒”的问题，表现为掌权者及其亲朋集团围绕着通道收益所产生的贪腐行为，引发大范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小型“中间地带国家”内部产生的政治对立，很可能逐渐演变为各找一个大国做靠山的代理人政治。如此一来，大国之间的博弈和“中间地带国家”内部的紊乱，都会变成难以扭转的地缘政治博弈进程。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concerning “intermediate zones”,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whole process of games in passage politics among the U.S, Russia and Kyrgyzstan in the wake of 9.11 attacks. Actually, through the process, the author notices the complexity, tenderness and multi-dimensions of passage

politics when involved with various interests, which resulted in easily-changeable, short-sighted and low-predictable characteristics in Kyrgyzstan's international behaviors.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S. and Russia in their conflicting global strategies have constituted the major cause of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powers in intermediate zones, while conflicting views between these two powers and Kyrgyzstan in each other's interest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various contradictions. Due to the above-mentioned factor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scholars on OBOR initiativ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assage politics.

【Key Words】 Intermediate Zones, Passage Politics, Diplomacy of Kyrgyzstan, Game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S.

【Аннотац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ори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х зон», посл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актов 9 сентября Соединё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Россия и Кыргызстан развернули полный процесс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гры прохождения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й зоны», образованной авиабазой «Манас» в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Да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всесторонне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сложность, тонкость и разно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преимущест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политикой прохождения, а также изменчивость,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сть и низкую 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ь поведения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ных с ней «стран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й зоны». Разница в понимании политики прохождения, вызванная конфликтом глобальных стратегий,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ой причин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между США и Россией в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й зоне», а разница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интересов, вызванная разницей в размерах стран, является источником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основ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и Кыргызстаном. Ввиду вышеперечисленных факторов следует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тако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явление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й зоны», как политика прохождения, должна быть в центр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экспертов и учёных, изучающих инициативу «Пояс и путь».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е зоны, политика прохожд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игр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责任编辑 王海燕)

俄罗斯商人与东正教**莫斯科商人文化赞助活动内在动因探析**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

赵小华**

【内容提要】纵观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群星璀璨、熠熠生辉。然而文化的繁荣和兴盛，文化价值的传承，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杰出的文学家 and 艺术家，默默支持他们创作的文化赞助人同样功不可没。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这一历史时期里，莫斯科商人慈善家和文化赞助人在促进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方面功用显著。莫斯科商人成为这一时期俄罗斯科学文化发展重要推动力的前提，是其所拥有的雄厚经济实力。但与此同时，个人的内在精神动因则更为重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根深蒂固的东正教信仰；赢得社会尊重，提升社会地位的心理需求；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正是这三方面因素共同激励着富有的莫斯科商人企业家们广泛开展各种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莫斯科商人 俄罗斯文化赞助人

【中图分类号】F27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3-0157(23)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堪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推动该时期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则是向来不为俄罗斯上层社会所认可的莫斯科商人阶层，尤其是包

* 本文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自主创新科研计划项目《帝俄时期（18-19世纪）东正教会慈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7CX04047B）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赵小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俄语系讲师。

括特列季亚科夫、巴赫鲁申、马蒙托夫以及莫洛佐夫等在内的“莫斯科美第奇家族”^①。当时，在长期欧化的文化背景下，俄罗斯社会对本民族文化成就缺乏自信，评价相对不高。杰出文化赞助人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亚科夫（Павел Михайлович Третьяков，1832-1898）在1865年给艺术家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利兹措尼（Риццини Александр Антонович，1836-1902）的信中曾写道：“很多人不愿积极去相信俄罗斯艺术的美好前途，他们确信，如果我们的哪位艺术家能够创作出不错的东西，那纯属偶然，而之后他创作的必将是一堆平庸的作品。您知道吗，我不这样想，否则我也不会去搜集俄罗斯艺术家的画作了；任何成就，任何进步对于我而言都异常珍贵，终有一日我们会迎来‘俄罗斯绘画艺术的节日’。”^②很多才能杰出的俄国青年艺术家因得不到社会的有力支持，生活和创作常常陷入困顿。而经济实力雄厚的莫斯科商人企业家们不仅为他们的创作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还凭借自身的社会影响力，积极帮助他们获得或是提升社会知名度。

整体而言，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莫斯科商人企业家的文化赞助活动不仅范围广、规模大，而且影响深远。从俄国戏剧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各类博物馆的创建，到杰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再到不同层次启蒙教育机构的运行，以及俄国芭蕾等艺术走向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有的时候则完全都是由莫斯科商人慈善家和文化赞助者所支持和资助的。据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亚·尼·博哈诺夫统计，仅1885至1904年短短20年间，莫斯科市政当局收到的文化赞助方面的捐赠就高达3000万卢布。其中大部分为莫斯科商人所捐赠，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贵族的捐款尚不足10万卢布。^③关于莫斯科商人的慈善和文化艺术赞助活动，20世纪初的一本民间出版物这样描述道：

俄罗斯的任何城市，甚至是首都圣彼得堡，都不曾像莫斯科那样拥有如此之多的私人慈善机构，莫斯科商人每年出资几十万卢布从事慈善

① 美第奇家族为13至18世纪意大利弗洛伦萨的名门望族和商业巨头。与此同时，该家族长期为文人和艺术家提供庇护和资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艺术赞助者，并因此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教父”。由此，美第奇家族也成为杰出文化赞助人的代名词。

② Федорец А.И. Павел Третьяков. М.: Вече, 2011. <http://litlife.club/br/?b=204075&p=73>

③ Боханов А.Н. Коллекционеры и меценаты в России. М.: Наука, 1989. С.165.

活动，莫斯科的诊所、医院、养老院和收容所逐年增多。知名企业家叶尔马科夫用于慈善活动的资金达 500 多万卢布；博耶夫、巴赫鲁申、莫洛佐夫家族……他们的名字永远镶嵌在其出资建造的各种楼堂馆所等设施上。^①

由此，我们不禁会问，在俄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哪些因素促使莫斯科商人、企业家们大规模从事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毫无疑问，莫斯科商人企业家们所拥有的雄厚资本，是其广泛开展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的经济基础和前提。19 世纪下半叶大改革时期，在亚历山大二世取消农奴制的背景下，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仅 1877-1898 年的 20 年间，工业生产总额就由 5.41 亿卢布增长至 18.16 亿卢布，几乎是翻了两番。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农奴制改革前就已开始经商的俄罗斯著名商业家族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雄踞各工商领域。例如，特列季亚科夫、莫洛佐夫和里亚布申斯基家族均来自纺织业，巴赫鲁申家族来自皮革生产领域，马蒙托夫家族则是铁路建设行业的巨头。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只是莫斯科商人企业家们从事文化赞助活动的前提，而决定其活动广度和深度的重要因素则是个人的内在动机。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慈善是人们自觉自愿的奉献行为，慈善的动机和价值观念则是慈善行为的发动机和导航仪。下面我们将对莫斯科商人企业家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的主要内在动因进行详细论述和分析。

一、根深蒂固的东正教信仰

别尔嘉耶夫曾指出：“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为东正教所造就，它获得了纯粹的宗教体系……俄罗斯灵魂的宗教体系培育出某些根深蒂固的个性：教条主义、禁欲主义、为信仰而忍受任何痛苦与牺牲的能力，以及对超验事物的追求。这种超验事物或者是关于永恒和彼岸世界的，或者是关于未来和此在

^① 摘自《19 到 20 世纪俄罗斯社会生活、艺术、文学与科学、贸易、工业》，敖德萨，1901 年，第 49 页，转引自[俄]格奥尔吉耶娃：《文化与信仰：俄罗斯文化与东正教》，焦东建、董茉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年，第 286-287 页。

世界的。俄罗斯灵魂的宗教力量具有一种转向或趋向已经不是宗教目标而是社会目标的能力。”^①俄罗斯人对待金钱和财富的态度也不例外，深受东正教的影响。福音书为东正教徒提供了对待外部世界的明确原则：只有那些服从于精神，首先是良心和爱之律法的尘世价值对人才是有益的。所以，在东正教那里，财富的精神层面是高于物质层面的。所有世俗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在内，都是从其精神和道德层面来进行评价的。关于这一点，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也曾指出，在俄罗斯，经济要素是与道德目标联系在一起并由其所决定的。^②因此，对于财富和发财的欲望，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持有鄙夷的态度，为了积聚财富去赚钱的想法也是为他们所深深排斥的。这种关于财富的生活哲学也体现在了俄语谚语和俗语中，如“多余的钱——额外的操劳”、“无钱睡觉香”、“不知穷困者，便是富有之人”、“若不想下地狱，就不要积蓄财富”、“攒啊，攒啊，攒到的是魔鬼”等等。东正教更看重的是人内在的精神生活，因为内心才是神秘的精神空间所在，是上帝与人进行神秘对话的场所。^③

此外，东正教学说认为，财富不是劳动的成果，而是上帝的祝福和恩赐。早在 16 世纪，《治家格言》中就有讲道：“看到你的善行和慈悲，对所有的人的爱和虔诚之心，上帝会施与你恩惠，并让你尽享丰收之喜悦。”^④而上帝赐予某人以财富也不是为了让他保存或积累财富，而是应将其用于取悦神意和有益的事情上。无论是何种活动，它首先应该有着崇高的精神目标，应该是为心灵救赎，而不是为物质利益服务的。正如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体验》中所言，物质的重负来源于精神的错误指向。主要的对立不是精神与物质的对立，而是自由与奴役的对立。^⑤因此，任何经济活动努力和人最为善意的动机，如果不是以完善信徒自己的精神世界，

①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吴学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2-3 页。

② Соловьёв В.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 с нравствен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правдание добра/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1. М.: Мысль, 1988, Глава шестнадцатая. <http://go.mail.ru/>

③ Коваль Т.Б.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тика труда// Мир России. 1994. No.2. С.60.

④ Домострой. СПб.: Наука, 1994. С.168.

⑤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体验》，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年，第 295 页。

不是以遵循对上帝和对邻人的爱的训诫为出发点的话，都将是无益的。所以，在东正教看来，财富本身并不是罪恶，罪恶的是贪财。圣经诗篇教导说：当财富增加时，不要过于贪恋它(诗篇 61: 11)。^①不是金钱和财富本身，而是人对于财富的态度和依赖程度才是其通往天国道路上的障碍。关于这一点，拜占庭著名神学家金嘴约翰（св. 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 约 347-407）也曾讲道，基督所谴责的不是财富，而是那些嗜钱如命的人。^②

与此同时，美德和笃信不一定总是会得到财富和成功的奖励，财富也绝不是获得救赎的保证。正相反的是，经济活动，尤其是企业经营活动，恰好是一种“危险地带”。在那里，尘世的荣华富贵、对利益的追逐，很容易使人们忘记真正的美德。任何经济行为既可能是恩惠，也可能是罪恶，这主要取决于“实施该行为的内在动机是什么？”^③因此，东正教并不否定以正当手段去获得财富，但与天主教有所不同的是，天主教承认可以通过自身财富发财，变富有，而在东正教看来，财富是上帝指定用于做善事的恩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财富才是被允许存在的，其他情况下，则是被否定的价值。对于这一问题，布尔加科夫曾写道：“要努力不完全沉浸在财产中，不要让本能战胜自己，而是要尽可能地摆脱财富的‘束缚’，使其服从于宗教伦理规范。财富本身并不是目标和享受生活的资本，而首先是行善和为社会服务的手段。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的经济活动都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而是应该受到高级的、超经济动机的调节。”^④

在上述宗教伦理和财富观的影响下，虔诚的莫斯科商人、企业家们，往往从道德视角来审视自身所从事的工商业活动。他们不仅关注经商所带来的财富，还同样关注着上帝交给自己的任务和使命，即用上帝所恩赐的财富去做有益的事，去帮助他人。财富意味着责任，上帝给了就是让用的，还要求

① Псалтирь. <https://azbyka.ru/biblia/?Ps.61>

② Еп. Аверкий (Таушев).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 изучению Священного Писания Нового Завета. Ч. 1. Четвероевангелие. М.: ПСТБИ, 1993. С.223. 转引自 Сизов В.С. 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к деньгам// Вопросы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2013. №3. С.94.

③ Коваль Т.Б.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этика труда// Мир России. 1994. No.2. С.66.

④ Булгаков С.Н.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Основные мотивы философии хозяйства в платонизме и раннем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Понимание в христианстве вопроса 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http://ivashek.com/de/texts/economics-texts/766-istoriya-ekonomicheskoy-mysli>

就此向上帝汇报。^①而在实践中，他们则谨遵福音书的教诲：让赤身者有衣穿，给饥者食，探望囚犯……。^②因此，正是在商人阶层中，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开展得最为广泛和发达。例如，普罗霍洛夫家族是莫斯科著名的商业世家。该家族代表季莫费·瓦西里耶维奇·普罗霍洛夫曾撰写《论致富》、《论贫穷》两篇论文，来解读福音书对致富和贫穷问题的论述。不仅如此，恪守父亲的临终教诲——“生活不是为了财富，而是为了上帝，不应生活在奢华之中，而应生活在谦恭顺从中”，^③普罗霍洛夫兄弟及其后代在大改革时期，为自己企业的工人提供了多项法律规定之外的福利。该家族所属工厂不仅建有企业医院、产科医院、学校、手工技校，还有幼儿园及廉价房等。

当然，并不是所有商人企业家都是慈善家，都从事文化赞助活动，但东正教的经济伦理和道德规范，对于大部分俄罗斯慈善家和文化赞助人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莫斯科旧礼仪派教徒。19世纪下半叶，莫斯科旧礼仪派教徒通过艰苦劳作、禁欲生活，不仅生存了下来，还成为促进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俄国著名历史学家格·弗·维尔纳茨基曾指出：“在莫斯科最富有的四十位商人中，有三十位是旧礼仪派教徒，并且几乎整个俄罗斯，尤其是其东部地区（扎沃尔日耶、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经济主要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上。”^④的确如此，当时，莫斯科几乎所有大的贸易公司和工厂都掌握在旧礼仪派教徒的手上：莫洛佐夫家族、古奇科夫家族、拉赫马诺夫家族、舍拉普京家族、里亚布申斯基家族、库兹涅佐夫家族、戈尔布诺夫家族，以及其他多位莫斯科百万富翁，都是旧礼仪派教徒。关于旧礼仪派教徒的经商能力，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在其著作《俄罗斯的旧政权》中也讲道：“俄罗斯旧礼仪派在工商业界展示了其最为显耀的经

① [俄]布雷什金：《莫斯科商人秘史》，谷兴亚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62页。

② Хорькова В.П.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и меценат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М.: ПРИОР, 1998. С.451.

③ Ульянова Г.Н.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 тип личности, духовный облик, образ жизни//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Кн. 2.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в.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449.

④ Зеньковский С.А. Рус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 М.: Ин-т ДИ-ДИК, 2006. С.356.

商能力，并享有俄罗斯最诚实商人的名声。”^①

另一方面，古老俄罗斯商人世家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家族创始人的宗教信仰十分虔诚。^②莫斯科维什尼亚科夫家族的彼·伊·维什尼亚科夫就是一位虔诚旧礼仪派教徒的典范：他既不去剧院，也不纵情狂欢、饮酒作乐，所有的休息就是每逢节日时去教堂礼拜。关于父亲的信仰，其儿子曾说：“这种虔诚信仰构成了父亲世界观的基础，具有巨大的道德力量。”^③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信仰的虔诚和坚定，对邻人的爱的教诲和对穷困者实施帮助的传统在旧礼仪派中保存得最为持久。处于长期遭受迫害的境地，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的教会社团原则让旧礼仪派教徒认识到，个人不仅对自身命运，而且还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对社团的命运，负有重要的责任。

此外，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对于旧礼仪派教徒的世界观是异化的。旧礼仪派教徒认为森林、水、土地、鸟兽等一切自然赐福都是上帝的造物，所以它不可能属于某个具体的人，因此也就不存在私有财产关系。旧礼仪派教徒企业家认为自己只是上帝的管理员，钱不属于自己，并且应该将其用到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上。对于他们而言，财产是劳动的权利，而不是资本。集聚资本是为了启蒙和进行新的生产，而不是为了发财。^④而在成功致富后，他们认为无权独自享用上帝所施与的福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莫斯科商人季莫菲伊·叶弗列莫维奇·索科洛夫。他曾于 1845 年向其所在的费多谢耶夫派社团捐赠 300 万卢布，并给社团的一千位成员每人发放了一件皮袄。^⑤正是由于教徒之间的相互扶持和帮助，长期处于沙皇政权和官方东正教会迫害的条件下，旧礼仪派不但没有走向灭亡，反而在俄罗斯社会

① Пайпс Р. Россия при старом режиме.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 М.: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 1993. С. 312.

② Кожурин К.Я.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тарообрядцев.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4. <https://proflib.net/chtenie/24405/kirill-kozhurin-povsednevnaaya-zhizn-staroobryadtsev-92.php>

③ Вишняков Н. Сведения о купеческом роде Вишняковых (1762---1847 гг.). Часть II. М.: тип. Г. Лисснера и А. Гешеля, 1905. С.81.

④ Чилингир Е.Ю. Культурно-эт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до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Личность. Культура. Общество, 2010. С.332.

⑤ Титов А.А. Дневные запис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го дозора о московских раскольниках// Чтения 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истории и древностей Российских. 1885, Кн. 4(7 декабря 1885 г.) С.83. 转引自 Расков Д.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ституты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а. СПб.: 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ур. ун-та, 2012. С.145.

上保持着长久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旧礼仪派教徒的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并不只局限于其所属宗教社团的内部。旧礼仪派教徒认为，在罪恶的世界里他所代表的是社团，而对社团之外的人行善，则是在荣耀上帝和宣传真正的信仰。^①为此，旧礼仪派商人企业家们积极出资修建收容所、医院，并支持文化艺术和教育的发展。根据 1910 年 3 月全俄社会救济活动家大会的数据，俄当时有 4762 家慈善协会和 6278 家慈善机构，其中 75% 的慈善机构的经费源自私人捐赠。^②而私人慈善家大部分则为旧礼仪派教徒。阿·阿·阿洛诺夫在其著作《文化赞助的黄金时代》中也曾确信地指出，若要对莫斯科，或是整个俄罗斯的文化赞助活动史进行研究，则无须走出罗戈日旧礼仪派教徒公墓（Рогожское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ое кладбище）便可完成……墓碑上的名字直观地向我们揭示了旧礼仪派的社会基础。那里安息着大资产阶级的所有代表：舍拉普京家族、拉赫马诺夫家族、普戈夫金家族、布吉科夫、库兹涅佐夫、里亚布申斯基家族、莫洛佐夫家族……^③

与此同时，也不应过分理想化莫斯科商人企业家们的慈善和文化赞助激情。不可否认的是，在商人群体中，还有不少人从事慈善或是文化赞助活动并非出于对邻人的爱，而是为自己在商界的残酷行为“赎罪”，为财富正名或是为其所曾犯下或是将会犯下的罪恶求得谅解。^④关于这种借慈善和施舍来弥补道德缺陷的做法，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借其小说主人公之口说道：“没有任何办法能治你，因为，无论是市长还是小书吏都会拉着你

① Керов В.В. Конфессионально-этические факторы 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ког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VII — XIX вв.: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д-ра истор. наук. М., 2004. 转引自 Коллектив авторов Центра проблем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ого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я.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М.: Научный эксперт, 2013. С.19.

② Никитина С.К.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М.: ЗА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ономика, 2001. С.288.

③ Аронов А.А. Золотой век русского меценатства.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 (МГУКИ), 1995. С.5.

④ Голицын Ю.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прошлого: какими они были// Русский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 2002. No.1. <http://ruspred.ru/arh/00/14rr.html>

的手的。资本就是那样积累起来的，而到晚年时再祈求宽恕罪恶。”^①

二、赢得社会尊重，提升社会地位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分层包括三个基本维度，即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三种地位具有独立性，但并不分立，而是交织在一起的，且彼此间也不是单向度的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关系。并非任何权力都能带来声望，赤裸裸的金钱权力也绝对不是被人们认可的社会声望的基础。相反，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却常常可以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基础。^②这一点在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的莫斯科商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很多莫斯科商人企业家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社会声望和地位却相对不高。于是，他们中的不少代表不得不拿出大量财力，通过从事大规模的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来获得社会荣誉，从而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声望和地位。

1861 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工业迅速发展。仅到 70 年代末，俄国就已有工业企业将近 28000 家。商人企业家这一新兴资产阶级阶层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成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然而由于严格的社会阶层限制^③等方面的原因，与在经济生活中如鱼得水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第三阶层的莫斯科商人企业家们在政治生活中依旧是“卑微的旁观者”。贵族阶层虽日渐式微，却仍是沙皇专制统治的支柱。

不仅如此，新兴资产阶级在当时的俄罗斯社会上也是备受争议的。整个俄罗斯社会对待商人阶层的态度几乎都是否定的，尤其是其所代表的社会价值取向。在当时俄罗斯大众的意识中，从事商贸活动本身比从事农耕要更为低级。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著名学者格尔申宗曾确证说：“毫无

①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Е. Собр. соч. в 20 тт. Т.2. https://rvb.ru/saltykovshchedrin/01text/vol_02/01text/0043.htm

② 转引自李强：《社会分层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32 页。

③ 根据帝俄法律，只有得到沙皇当局的允许，他们才能转为其他等级、变更职业或居住地，或因办事而暂时离开城市，否则将被视作犯罪，并受到处罚。参见[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下册）》，张广翔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84 页。

疑问，几乎整个十九世纪企业经营活动都被认为是极为羞耻的行当。与农民不同，企业家仍旧是贵族和知识分子所蔑视的对象。”^①俄罗斯经济学家、教授伊·赫·奥杰罗夫也曾不无讽刺地说道：“离工业远一点——这是不干净的行当，也不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行当！坐下来玩玩牌，喝喝酒，与此同时，再骂骂政府，这才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事情。”^②

与此同时，尽管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主流报纸却很少对商业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不但如此，当时报纸杂志一个不变的主题，便是揭露商人的发财欲望、欺骗和造假行为。如报纸《雷宾斯基小报》（«Рыбинский листок»）上曾写道：“遗憾的是，我们应该说，整个欧洲，没有哪个商界，像我们俄国商人一样，将欺骗、造假的恶习发展得如此‘淋漓尽致’！”^③还有不少文章和报道，仅从其标题便可窥见作者的立场。如《新闻和股票交易报》（Новости и биржевая газета）的一篇文章，题为《“富农”骄傲起来了》（«Чумазы» возгордились）。而且，随着商人经济地位的日益加强，贵族和政府官僚的日益失势，类似的批判性文章的数量也随之与日俱增。所有这些都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俄罗斯社会对商人企业家这一社会群体不认可和不接受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也曾讲道，俄罗斯缺乏资产阶级美德，即西欧重视的那些美德。俄罗斯却有资产阶级的恶习，即那种被意识到的恶习。在俄罗斯，“资产者”、“资产阶级的”这些词具有谴责性，尽管这些词在西方意味着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④的确如此，西方早已习以为常的词汇在俄罗斯被披上了一层蔑视的情感表达色彩。因此，对于 19 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新兴资产阶级来说，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和政治地位之间明显失衡。尽管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社

① Рукописный отде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уб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им М.Е.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 (РО ГПБ). Ф.541. Оп 1. Д.4. Л.4. 转引自 Боханов А.Н. Деловая элита России 1914 г. Москва, 1994 г. <https://e-libra.ru/read/326357-delovaya-elita-rossii-1914-g.html>

② Боханов А.Н., Горинов М.М., Дмитренко В.П.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Изд. ООО «АСТ», 2001. <https://www.litmir.me/br/?b=155144&p=4>

③ Брянцев М.В. Русское купечество: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й аспект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VIII – начале XX в. дис. ... д-ра истор. наук., Москва, 2000. С.202.

④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93页。

会进步的动力，但若要赢得社会声誉，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却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是纯粹的剥削者的条件下。

另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帝俄政府无力为俄罗斯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但与此同时，也认为有必要积极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于是便采取各种鼓励措施，吸引物质基础雄厚的商人企业家积极参与到国家慈善和文化事业的建设上来。根据帝俄法律汇编第551条规定，对祖国做出特别贡献，且信仰为基督教的商业阶层人士，凭借沙皇的赏识可封赠各类奖章和勋章，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享受与其所获奖章相对应的特权。^①这一鼓励措施对于商人阶层可以说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因为，各种封赠奖励不仅是沙皇恩惠的标志，还是对商人企业家为祖国所做贡献的承认。同时，各种官衔和勋章也给商人阶层打开了通往享有崇高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的贵族阶层的大门。^②所以，莫斯科商圈十分看重官衔和各种勋章奖励等，将其看作和资本一样。

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形成鲜明反差的莫斯科商人企业家们便不得不另辟蹊径，力求通过慈善活动和文化艺术赞助活动来克服阶层限制，获得各种勋章或是荣誉公民称号，并由此晋升到具有良好声誉的社会阶层，尤其是享有各种特权的贵族阶层。^③

米·德·普利谢尔科夫在其随笔《18-20世纪商人的生活肖像》中曾指出，为了抹去过去的印记和记忆，以及卑微的出身，改革前时期，商人阶层

① Алла Тимофеева.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Раздел III, Эволюция хозяйства и развитие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Правовые основы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М.: Флинта, 2016. <https://profilib.net/chtenie/133631/alla-timofeeva-istoriya-predprinimatelstva-v-rossii-khrestomatiya-25.php>

② 实际上，这种鼓励个人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建设的实践并非19世纪才开始，而是源于彼得一世时期。当时，各种社会活动，从在城市和地方自治会任职到给予学校、收容所和博物馆以庇护，都被认为是“国事”。政府也会通过颁布官衔和各种奖励来予以鼓励。

③ 与农民、僧侣和商人等社会阶层相比，贵族拥有多项特权，如免除人头税和劳役、贵族尊严不可侵犯、在担任文职和武职以及晋升时享有优先权等等。因此，社会上普遍认为，贵族是选民阶层，是特权阶层，与俄罗斯社会的其他阶层不一样。参见《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下册)》，第395-399页。

十分渴望能够晋升到贵族阶层。^①关于这一点，亚·尼·博哈诺夫也曾指出：“慈善常常是莫斯科企业家们获得那些通过其他途径几乎无法得到的官衔、称号以及特权的唯一途径”。^②且官衔和勋章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商人阶层提升社会阶层地位的重要砝码。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莫斯科企业家拉·索·博利亚科夫(Л.С. Поляков, 1842-1914)的经历。他因向鲁缅采夫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捐赠巨资而荣获弗拉基米尔三级勋章和斯坦尼斯拉夫一级勋章，并基于此获得了世袭贵族的称号。

莫斯科商人的这种境遇可以说是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的境遇如出一辙。当时意大利的商人和银行家也是经济地位优越，社会地位卑下。而慈善和文化艺术赞助则为他们获得社会承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如阿尔贝托所言，那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为富商们提供了使他们经常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保护人和促进者的机会。^③俄国学者拉斯金(Давид Иосифович Раскин)在其著作《19世纪-20世纪初俄罗斯人典型人生发展路径》中也曾指出：“如果没有贵族身份、获得勋章亦或至少是荣誉称号，例如商业咨议的话，财富本身不能完全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而通过财富获得社会承认的主要方法便是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④毫无疑问，商人们的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即便不能够完全打破俄罗斯社会数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对商人认识的负面思维定式，实实在在地提升商人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但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人们对这一社会阶层的敌意。

也正是因为如此，19世纪的莫斯科商人阶层内部有一个比较复杂和独特的谱系排行。在这个排行中，排行在前的并不都是富甲一方的家族，而通常是那些既能够世代相传在工商界保持影响力，又能够广泛从事社会慈善活

① Приселков М.Д. Купеческий бытовой портрет XVIII—XX вв. (Первая отчетная выставка историко-бытового отдела Русского музея по работе над экспозицией “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 Л., 1925, С.24, 26. 转引自 Ульянова Г. Н.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 тип личности, духовный облик, образ жизни//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Кн. 2.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в.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441.

② Боханов А.Н. Савва Морозов// Былое. 1992. №3. С.3.

③ 转引自周丽馨：《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25页。

④ Раскин Д.И. Сослов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типовые сценарии жизненного пути россиян в конце XIX-начале XX вв// Английская набережная, 4: ежегодник. СПб., 2001. С.228.

动，支持国家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家族。其中，莫洛佐夫、巴赫鲁申、奈焦诺夫、特列季亚科夫、普罗霍洛夫、阿列克耶夫、舍拉普京、库马宁、索尔达琴科、亚昆奇科夫等二十五个家族被排在了商人阶层等级的最上层。^①这一排序，可以说完全印证了美国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社会分层理论中价值观决定社会地位高低的观点。帕森斯认为，地位的区分与价值观的区分是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提供了有的人地位高、有的人地位低的原因，为这种地位差异的合法、合理性做出辩护。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首先是因为被社会认可的精神道德的高地位，是在社会中受到尊敬和尊重，是社会给予的肯定。反之，另一个人地位低，是因为社会对这种地位的否定，造成的结果是该社会地位没有尊严，不受尊重。^②

在国家的积极支持和鼓励下，渴望提升社会地位的莫斯科商人企业家们展开了十分广泛的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这使得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通过从事慈善和文化赞助等方式来获得奖励和荣誉称号的现象，在莫斯科商人中间非常普遍。根据帝俄沙皇办公厅奖励委员会（Наградной комитет пр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канцелярии）的统计，20世纪初，60%的奖励为非公职行为奖励，而这其中的40%以上是奖励给了企业家，尤其是从事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的企业家。^③在各种奖励中，封赠较多的有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圣安娜勋章、圣弗拉基米尔勋章，以及实业咨议、商业咨议、名誉公民和贵族等。尽管特列季亚科夫兄弟、阿·阿·巴赫鲁申、萨·伊·马蒙托夫等从事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并非是为了提升社会地位，沙皇也一一给予了他们各种奖励。其中，1880年，根据亚历山大二世的命令，帕·米·特列季亚科夫因“其成就和付出的努力”被授予商业咨议的称号，^④而1897年1月23日，因创建杰出的画廊，特列季亚科夫又被授予荣誉公民的称号。^⑤萨瓦·伊凡诺维奇·马蒙托夫（Савва Иванович Мамонтов，1841-1918）则先后于1896

① [俄]布雷什金：《莫斯科商人秘史》，第68-69页。

②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62-163。

③ Боханов А.Н. Крупная буржуазия России конец XIX в. – 1914 г. М.: Наука, 1992. С. 63.

④ Боткина А.П. Павел Михайлович Третьяков в жизни и искусств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ретьяковской галереи, 1951. С.245.

⑤ Боханов А.Н. Коллекционеры и меценаты в России. М.: Наука, 1989. С.75.

年、1897 年被授予实业咨议称号和圣弗拉基米尔四级勋章。^①阿·阿·巴赫鲁申(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хрушин, 1865–1929)也因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先后被授予圣弗拉基米尔四级勋章、世袭贵族和荣誉公民称号、以及四等文官职位。

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商人渴望获得社会声誉、提升社会地位的虚荣心也滋生了不少钱权交易行为。一些文化赞助人以捐款来“订购”各种勋章和荣誉称号。例如,1903年莫斯科音乐爱好者协会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其经理人在申请书上详细列出了哪位捐赠者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奖励。还有一个例子是,莫斯科银行家文捷尔费利德曾与谢斯特罗列茨克商业专科学校校长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中规定,前者愿向学校捐赠2万卢布,但前提是必须能够获得商业咨议的称号。如不能获得所要求的称号,协议则自动作废。而1912年,出身于中等商人阶层的莫斯科商人米·德·奥尔洛夫主动要求将其位于阿尔巴特大街上的№12号住宅(当时市值近20万卢布)赠予莫斯科商人协会,以使用售房所得资金来修建养老院,但前提是沙皇本人必须了解到他高尚的行为。这些商人的类似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宗教动机。因为圣经上有明确的教训,“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马太福音6:1)

三、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在俄罗斯,“商人”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公元九、十世纪。当时所谓的“商人”并不是专门从事买卖生意的职业商人,而是兼职负责为大公索贡巡行所得到的毛皮、蜂蜡、蜂蜜等贡物寻找销路的武士。到公元十一世纪,作为社会群体的职业商人在古罗斯才最终出现。^②然而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里,在封建农奴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加上宗教信仰以及村社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商人及其所从事的商贸活动的社会地位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① Боханов А.Н. Савва Мамонт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0. №.11.

② Перхавко В.Г. Исток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Руси//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Кн. 1. От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13, 14, 17.

到 18 世纪，彼得大帝欧化改革之后，随着自身活动影响力和社会角色的提升，商人对其所从事的职业变得日益自信。与此同时，他们也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对社会和国家的有用性，社会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当时普遍认为，“一个完美的俄罗斯商人”不仅应该精通经商的学问，具备善良、诚信、勤劳等优良品质，还应对社会发展有益，在致富的同时也应让国家富起来。^①不仅如此，启蒙时期，《公民》（гражданин）一词也从大革命后的法国传入俄罗斯并开始被广泛使用。拉季舍夫关于公民的解读——有意识地去履行自己职责的社会成员——对先进的商人阶层代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俄罗斯先进商人通常都是从这一角度来进行自我评价的。

19 世纪初的俄罗斯大部分工商企业家都出身于农民，他们本身所受教育水平不高，但阅读和接受教育的热情却十分高涨。尼·米·卡拉姆津曾指出，我们的第三阶层不仅擅长做生意，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在各种社会报道中与贵族进行辩论。我们当中有谁不曾对他们的刨根问底、理性和爱国思想所感到惊奇？^②商人们所阅读的书籍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宗教、启蒙、历史类书籍和文学读物，还涉及法律、经济、地理等众多领域。他们积极到富有学识和才能的知识分子中间寻找同路人和朋友。他们还着迷于文学、科学和艺术创作，并花费很多时间与文人墨客和艺术家们谈天说地，排练和观看戏剧演出等。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富有进取心的商人奔赴国外拓展学识，接受教育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关于这一时期莫斯科商人的精神文化面貌，著名艺术批评家弗·瓦·斯塔索夫曾证实说，19 世纪上半叶，另一类型商人阶层代表成长起来，他们有着别样的追求，他们不愿意在“打猎和宴会”中虚度一生，而是对精神生活有着极大的需求。^③这一点对他们的子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由于深知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商人家族尤为重视子女的教育。

① Козлова Н.В. Некоторые черты личностного образа купца XVIII века. (К вопросу о менталитет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упечества)// Менталитет и культура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России XVII-ХТХ в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ИРИ РАН, 1996. С.50-51.

② Карамзин Н.М.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Т.2.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4. С. 272.

③ Нилова О.Е.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й обл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упца-мануфактуриста//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От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я до середины 19 века. М.: РОССПЭН, 2000. С.371.

文学家、回忆录作者叶·阿·巴尔蒙特曾写道：“作为父母的商人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非常强烈。为了教育，他们不惜花费任何物力和财力，认为‘他们所最为缺少和感到不足的教育对于人生是极为重要的’。”^①这一思想他们从小就灌输给子女，并不惜重金聘请家庭老师来教授俄语、德语、法语和历史，以及钢琴和体操等。由于在家接受过良好的初级教育，商人子弟通常都能够成功通过著名中学的考试，并在那里继续学业。发展到第三代，商人子弟可以说是具有了更多的知识分子特质。他们不仅富有，还很有学识，经常游历欧洲，但他们不愿像很多贵族一样虚度一生：讲着法语，信仰也不真诚，没有民族认同感。

另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世俗文化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绘画、戏剧和文学等文化艺术的传播和普及，还促进了其本身在俄罗斯社会上地位的提升，以及对个体社会面貌和心理意识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当时较为流行的文学艺术和社会政治类出版物，如《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1880-1917）、《俄罗斯公报》（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56-1906）、《俄罗斯财富》（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 1876-1918）、《祖国手记》（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839-1884）等，对当时先进商人代表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以及艺术品位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使得大改革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商人代表不仅学识和文化修养良好，还具有敏锐的社会直觉和洞察力，能够快速察觉和捕捉到社会的精神生活需求。对于他们而言，商业利润已不再是人生首要目标，更高水平的精神和道德生活才是其所追求和渴望的。他们深谙个人财富与社会福利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对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财富来支持文化艺术创作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保护俄罗斯文化价值，促进俄罗斯文化艺术的传承和繁荣，让艺术真正“人道主义化”，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和期望，并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这在帕·米·特列季亚科夫、阿·阿·巴赫鲁申、萨·伊·马蒙托夫等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标志性的文

^① Ульянова Г.Н.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 тип личности, духовный облик, образ жизни//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Кн. 2.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в.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441-466;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Книга 2.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19 – начало 20 века. М.: РОССПЭН, 1999. С.443.

化赞助人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

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帕·米·特列季亚科夫的文化艺术赞助活动，在俄罗斯文化发展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特列季亚科夫创建民族艺术画廊的想法，最初也是源于当时莫斯科商界所流行的搜集绘画作品的潮流，后来他慢慢地意识到了艺术的社会价值，以及自己作为俄罗斯公民保存和增加藏品的责任。因此，他将自己所经营的亚麻纺织厂首先看作是从事文化艺术赞助活动的资金来源。在给女儿的信中，特列季亚科夫曾写道：“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意识到，我积累财富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某一有益机构将其最终再回报给社会。在我这一生中，该想法始终伴随着我。”^①而1892年，在将毕生藏品赠予莫斯科市时，特列季亚科夫曾写下这样的遗愿：“希望能够促进我所热爱的城市的有益机构的建设，促进俄罗斯艺术的繁荣，与此同时，让我的藏品能够流芳百世。”^②如果说收藏家从事收藏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喜好，那么文化艺术赞助人的收藏活动，则是面向社会的，并且他们深刻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在特列季亚科夫那里，先前很多莫斯科商人公私目的相间的收藏活动，彻底过渡到了纯粹的、完全为公的收藏。

阿·阿·巴赫鲁申是莫斯科著名商人世家巴赫鲁申家族的杰出代表。巴赫鲁申家族不仅商业实力雄厚，还广泛从事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在莫斯科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据统计，该家族用于慈善目的的总支出超过了500万卢布。人们也因此将其称为无私的“职业慈善家”。出于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着迷于戏剧的阿·阿·巴赫鲁申认为，有必要为俄罗斯创建一座戏剧博物馆。1894年10月20日，他的戏剧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这座博物馆是俄罗斯首家私人戏剧博物馆。它可以说是巴赫鲁申毕生的事业，其中不仅倾注了其巨大的精力和对戏剧无尽的爱，还有规模巨大的资金。在这里，几乎可以找到有关俄罗斯戏剧的任何东西：从古老的乐器、乐谱、演员、作家和戏剧家的签名和手稿，到基普连斯基、特罗皮宁、戈洛温、瓦斯涅佐夫兄弟、列宾、弗鲁别利等人的肖像、画作和戏剧草图，再到观剧用的望远

① Боткина А.П. Павел Михайлович Третьяков в жизни и искусств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ретьяковской галереи, 1951. С.236.

② Анисов Л.М. Третьяков.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4. 20.07.2018. <http://www.rulit.me/books/tretyakov-read-290284-138.html>

镜、扇子，以及演员的个人用品、戏剧用品等。苏联大百科全书将其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戏剧博物馆。而在 1913 年 11 月 25 日将藏品赠予俄罗斯科学院的仪式上，对自己的决定进行总结时，阿·阿·巴赫鲁申说：“我的收藏达到一定规模，自认为已经无权去支配它们时，我开始思考自己作为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之子，是不是有义务将藏品贡献给这个人民。”^①巴赫鲁申对戏剧珍宝的搜集，充分展现了俄罗斯商人的执着和刚毅的品质，以及崇高的爱国主义之情。正是由于他所搜集的藏品，俄罗斯大众戏剧和精英戏剧的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重现。

萨·伊·马蒙托夫出身于莫斯科著名商人世家马蒙托夫家族，当代人将其称为“莫斯科的美第奇”、“杰出的萨瓦”。他可谓是才华卓越，集工业企业家、铁路建造者、音乐家、导演、作家、肖像雕塑家多种角色于一身。但其最重要的角色，也是其“扮演”得最好的角色，则是“寻找英才”。对此，苏联著名画家、艺术学家伊·格拉巴里曾回忆说：“与沉着冷静、睿智的特列季亚科夫相比，马蒙托夫是青年天才的‘狂热’搜寻者。”^②即使在其他文化艺术赞助者中，马蒙托夫也可以说是位置独特。他不仅积极支持艺术发展，还亲自参与艺术的创作，推动其前进。他善于用自身的激情和热情去感染周围的人，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并全力以赴去开展艺术创作。

马蒙托夫对艺术的热爱和无私奉献，也让阿布拉姆采沃庄园从 1870 年至 19 世纪末，成为俄罗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艺术中心。为社会谋利的渴望和对启蒙思想的热爱，在阿布拉姆采沃庄园的生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那里，马蒙托夫不仅为艺术家们提供良好的进行创作的物质条件，更以其独特的艺术品位和敏锐的艺术判断力，以及无私大度的性情，倾力挖掘像弗鲁贝利和舍利亚宾等当时尚未被俄罗斯社会所认识或是承认的艺术天才。也正是因为如此，1900 年复活节前夕，阿布拉姆采沃小组的艺术家们集体给当时正处于人生低谷的马蒙托夫写了一封信，给予他精神支持和鼓励。信中写道：“您敏感的创作心灵对我们的创作激情总是有求必应。我们

^① Бахрушин Ю.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ГЦТМ им. А.А. Бахрушина, 2012. С.10.

^② Грабаль И.Э. Вале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р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1980. С.37-38. 转引自 Аронов А.А. Золотой век русского меценатства.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 (МГУКИ), 1995. С.22.

无需言语便可明白对方，工作也很愉快，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创作。您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志，您的家庭是我们创作路上的避风港，在那里，我们休息，积蓄力量。在您家的这些‘休息’，对于我们来说是真正的节日。我们小组计划并完成了多少的艺术任务，种类又是怎样的丰富：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和舞台艺术交替轮换……”^①

俄罗斯国学大师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利哈乔夫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具备下述特征：对精神价值的敏感性、对知识的渴求、对历史的兴趣、审美能力、辨别优秀作品的能力、欣赏自然美的能力、辨别他人性格和个性的能力、换位思考并借此了解他人的能力、对粗鲁、冷漠、幸灾乐祸、嫉妒的免疫力，拥有教养等。^② 特列季亚科夫、巴赫鲁申、马蒙托夫等莫斯科商界杰出文化赞助人的个人素质、精神追求、受教育程度都表明，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对社会的重视、对人民的热爱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四、结语

整体而言，莫斯科商人企业家从事慈善和文化艺术赞助活动的动机，可谓复杂多样，不存在统一的思想意识基础。在大多数情况下，利己和利他动机是并存的：既有对社会地位提升的需求，也有对科学和艺术以及祖国人民的热爱，而在一些情况下，则可以说是一种源于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的甘心行为。但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其结果最终都是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价值的保存和传承，唤起了俄罗斯人的文化自省与文化自尊。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努力，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罗斯科学文化的各个领域：音乐、戏剧、绘画、建筑、科学、教育，未必能够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仅如此，俄罗斯民族文化艺术还成功走向国门，享誉世界。关于莫斯科商人对俄罗斯文化发展的贡献，俄罗斯著名戏剧活动

① Копшицер М.И. Савва Мамонтов.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72. С.219.

② Лихачев Д.С. Человек должен быть интеллигентным// Письма о добром и прекрасном. <http://капканы-егэ.рф/index.php/knizhnaya-polka/662-d-s-likhachev-pisma-o-dobrom-i-prekrasnom?showall=&start=13>

家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еев-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1863-1938）曾写道：“我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在艺术、科学、美学等领域都已经开始呈现出活跃气象的时代。大家知道，当时首次踏上俄罗斯生活舞台的莫斯科青年商人阶层，在这方面是颇有一番贡献的，他们除了搞好自己的工商业以外，对艺术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怀。”^①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在苏维埃国家体制下，私有财产被消灭，教育、卫生、文化以及各种补贴和奖金的发放等所有社会性支出，均由苏维埃国家独自承担。苏联官方虽未明确禁止公民从事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但却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认为其目的在于分散人民大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注意力，俄罗斯文化赞助的传统遭到中断。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国家对文化稳定且相对充足的财政支持也随之成为过去。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时期形成的文化机构体系因改革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早已习惯国家财政支持的它们无法积极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现实，不少文化机构因此而处于灭亡的边缘，不得不自谋生路，进行自发性的改革。在旧有的中央集权统一管理的领域，包括工会在内，开始出现各种团体、协会、股份公司……有的专为国家文化机关所管理，有的则重组为依靠非财政拨款资金生存的各种文化中心或是被关闭，而其场所和设备则被变卖。^②由此，俄罗斯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对慈善家和文化赞助人的需求也愈加凸显，这使得这一宝贵传统开始逐渐得到复兴和发展。

当代俄罗斯最早出现的慈善人士和组织主要为外国文化赞助人和慈善基金会，其中包括“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英国慈善救助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主要是对个别的社会、文化和科研项目进行资助。^③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之初，由俄罗斯商人和艺术家等建立的俄罗斯本土慈善和文化赞助基金会开始陆续出现。^④这些基金会活跃于教育、科学、艺术、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诸

① [俄]布雷什金著：《莫斯科商人秘史》，第66页。

② Воробьев А.К. Условия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меценатства. <https://cyberpedia.su/9x1292.html>

③ Меценаты мира. Кто они? <http://m.forbes.ru/article.php?id=247568>

④ Портал о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меценатстве «ВСЕБЛАГОДЕТЕЛИ». <http://vseblagotvoriteli.ru/>

多领域，为促进当代俄罗斯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众多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中，发展势头较为良好、也较为有效的是由商界，包括公司和企业家代表组织的各种慈善和文化赞助项目。

弗拉基米尔·奥列戈维奇·波塔宁（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Потанин）是当代俄罗斯首屈一指的慈善家和文化赞助人。早在 1998 年，波塔宁就曾出资从即将破产的英科姆银行（Инкомбанк）那里购买了马列维奇的名画《黑方块》，并将其转交给俄罗斯文化部。而 1999 年，他又全权出资成立了“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基金会”。该基金会是俄罗斯最早出现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之一，也是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成立十几年来，波塔宁基金会实施了众多慈善和文化赞助项目。其中不仅包括鼓励和支持俄罗斯顶级高校优秀年轻教师的奖助学金项目，还包括积极支持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发展的合作项目，以及不少社会福利和环保类工程项目。2010 年初，波塔宁还对外宣布，将在死后捐出数十亿美元家产，而这在俄罗斯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鲍里斯·伊里伊奇·布洛奇尼科（Борис Ильич Булочник）是当代俄罗斯的另一位著名文化赞助人。他是著名企业家、银行家和社会活动家。2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经济改革初期开始经商，并于 1992 年 12 月创建了“大师银行”。20 世纪 90 年代后至今的 20 余年里，一直支持着没有任何官方资金来源的廖利赫公共博物馆和廖利赫国际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其中，廖利赫博物馆的大部分藏品，也都是由布洛奇尼科出资购买的。^①正是由于他的慷慨资助，廖利赫公共博物馆发展成了多领域的科研文化中心，其文化启蒙活动在俄罗斯国内外都享有盛誉。这对于保存和发展廖利赫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正是得益于他的赞助，莫斯科市中心 17-19 世纪的历史文化古迹—洛普欣庄园（Усадьба Лопухиных）历史原貌的修复和重建工作，在没有任何政府拨款的情况下得以顺利完成。

奥·德里帕斯卡（Олег Дерипаска）是俄罗斯最具影响力和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他建立了“自由的事”（Вольное дело）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支持的项目超过了 400 个。其中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和体育领域的慈善活

^① Алексеев З. Что не отдал — потерял. Как Борис Булочник помог создать и сохрани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имени Н. К. Рерих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 5845(172). 30 июля 2012.

动，以及给埃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众多剧院、修道院提供帮助和支持。据统计，仅“俄罗斯教堂”（Храмы России）这一项目，该基金会的年资助金额就高达 700 万美元。^①此外，奥·德里帕斯卡还与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和亚历山大·玛木特一起，在 2002 年联合成立了“俄罗斯表演艺术基金会”。每年拨款 100 万美元用于支持富有才能的青年音乐家的创作和发展。

还需特别提及的是 VimpelCom 通信公司（«Вымпел-Коммуникации»）的创始人德米特里·鲍里索维奇·济明（Дмит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Зимин）。德米特里·济明在其公司 2001 年开始盈利后，便主动隐退投入到慈善和文化赞助事业中。他创立了“教育者”奖金（«Просветитель»）和“王朝基金会”（фонд «Династия»），并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资产无偿投入到慈善和文化赞助事业中，以支持俄罗斯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7 年年底，俄罗斯境内共有 9600 余家慈善基金会以及 1700 家左右的慈善机构。^②所有这些表明，虽然由于多方面原因，当代俄罗斯的个人慈善和文化赞助活动很难再现十月革命前的历史辉煌，但随着俄罗斯公民社会建设进程的加快、大众媒体积极和广泛的宣传，以及国家相关鼓励和激励机制的完善，慈善和文化赞助这一传统在俄罗斯将会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将会在俄罗斯社会和文化的繁荣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Abstract】Throughout the long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and art, many prominent writers, artists and musicians have appeared. Nevertheless, the prosperity of culture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values depend not only on eminent writers and artists, but also on generous patrons who silently support their creation. Especially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Moscow merchant-patrons made a great

① Буянова С.М, Коробанова Ж.В.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социальн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бизнесмена (на примере биографий известных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ей)//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сихологи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теория, практика: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Выпуск второй// Отв. ред. д. п. с. н. А.Н. Лебедев.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путник», 2014. С.23.

② 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шкина. Мы не стали богаче, но стали добрее. <http://www.profile.ru/obsch/item/125159-my-ne-stali-bogache-no-stali-dobre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Russian culture and art. Ye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ner motivation of individuals played an even more important role, including their innate Orthodox faith, their demands for more social respect, higher social status, and patriotism to serve the people. It is just these three factors that jointly encourage wealthy Moscow merchants and entrepreneurs to conduct various charitable and patronage event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Russian culture.

【Key Words】 Russian Orthodoxy, Moscow Merchants, Russian Patrons of Culture and Art

【 Аннотация 】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появились много выдающихся писателей, художников и музыкантов и т.д. Однако процветание культуры и наследование культурных ценностей зависят не только от выдающихся писателей и художников, но и от щедрых меценатов, которые молча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их творчество. Особенно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с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19-го до начала 20-го века, московские купцы-меценаты внесли огромный вклад в развитие и процветание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больш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мощь являлась предпосылкой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я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й и мецена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осковских купцов-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нутренняя мотивация личности играла более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ключающая в себя три аспекта: глубо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вера,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потребность в завоевани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уважения и повышени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ие чувства. Именно эти три фактора побуждали состоятельных московских купцов-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проводить различные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ые и меценатски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которы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развитию и наследованию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московские купцы-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русские меценаты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基里尔任牧首十年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发展研究——传承、转型与挑战*

王 帅**

【内容提要】1988年，俄罗斯受洗千年之际，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的序幕徐徐拉开。历经30余年的发展，东正教如今已成为俄罗斯社会一股重要的精神文化力量。30年间，俄罗斯东正教会历经三位牧首——皮缅、阿列克西二世和基里尔。本文拟以基里尔2009年就任牧首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开展的工作为考察对象，理清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教会内部建设、与世俗领域互动和与基督宗教其他派别的对话等方面工作的传承，解读俄罗斯东正教会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式发展模式的转型，剖析俄罗斯东正教会所面临的“非世俗化”与“世俗化”的张力、教会统一的威胁，以及教会快速增长扩张所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会 牧首基里尔 俄罗斯东正教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B976.2;K512.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3-0180-(30)

20世纪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命运跌宕起伏，兴衰无常：1917年十月革命后，东正教丧失国教地位；苏维埃时期，东正教会步履维艰；1985年，戈尔巴乔夫（М.С. Горбачев）上台后，在推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在宗教方面也开始实行宽容、开放的政策，为东正教的复兴埋下了伏笔；1988年，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俄罗斯东正教圣徒传统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研究”（项目批准号：15CZJ009）的阶段性成果。

** 王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罗斯受洗千年之际，俄罗斯东正教会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并得到了政府的首肯与一定的支持，由此拉开了东正教复兴的大幕。历经 30 年的发展，东正教如今已成为俄罗斯社会一股重要的精神文化力量。本文拟以基里尔（Кирилл，1946-）2009 年 2 月 1 日就任牧首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开展的工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俄罗斯东正教会对既往工作的传承，在传承基础上所呈现出的转型趋向，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展开本文的论述之前，笔者拟对 30 年来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作一分期。对于此问题已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界定，如以西涅丽娜（Ю.Ю. Синелина，1972-2013）为代表的宗教社会学家，从俄罗斯国民宗教信仰的角度，对俄罗斯东正教的发展阶段进行过划分。^①本文则从东正教会自身的发展方向着眼，将俄罗斯东正教这 30 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立足时期（1988-1997 年）。罗斯受洗千年的纪念活动之后，东正教得到迅猛发展：信徒急剧增加，修复和兴建教堂，恢复自身的神职体系……但对东正教会而言，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其合法权利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1993 年，俄罗斯通过了现行宪法。宪法规定俄罗斯是一个世俗国家，任何宗教都不应该成为国教，各宗教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②宪法保障公民“信仰自由，包括个人或与其他人共同信仰某个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自由选择和传播宗教和其他信仰的权利，以及据此信仰行事的权利”^③。1997 年，联邦宗教法《关于信仰自由和关于宗教团体》^④出台，这一法律重申了 1990 年苏联颁布的《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⑤法和 1990 年叶利钦（Б.Н. Ельцин，1931-2007）签署的俄罗斯联邦苏维埃

① 参见 Синелина Ю.Ю.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2013. №.1. 西涅丽娜将俄罗斯东正教在 1989-2012 年间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9 年至 90 年代中期（1993-1995），信徒人数急剧增长期。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至 2004 年，信徒人数增速放缓。第三个阶段，2004-2005 年，信教人数基本停止增长。第四个阶段，2006-2012 年，信教人数进一步增长。

② 俄联邦宪法第 1 章第 14 款。

③ 俄联邦宪法第 2 章第 28 款。

④ 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о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ях. 1997.09.26. N125-ФЗ. 2016 年 7 月 6 日修订。

⑤ 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关于信仰自由》法^①中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则，同时进一步肯定了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俄罗斯精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并为宗教的进一步发展及与世俗领域的互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俄罗斯宪法和宗教法《关于信仰自由和关于宗教团体》，为东正教会在俄罗斯社会立足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第二个阶段，全面复兴发展期（1997年11-12月主教大会至2008年底）。在这十年间，基本奠定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政教关系、神学校教育、世俗的宗教教育、传教、社会服务、信息出版、与基督教其他宗派、其他宗教间的关系等各个领域发展的方向与政策。

第三个阶段，革新与转型期（2009年2月至2019年1月底），即基里尔任牧首主持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的第一个十年。基里尔就任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后，在延续牧首阿列克西二世（Алексий II，1929-2008；1990年6月10日-2008年12月5日任牧首）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对俄罗斯东正教会进行革新，逐步实现东正教的发展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转型，并谋求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东正教世界的发言权。这一阶段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发展与变化，是本文所要考察的重点。

一、传承中求发展

阿列克西二世任牧首期间，基本奠定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内部发展、与世俗社会之间的互动、与基督教其他宗派及其他宗教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基调，基里尔任职后在很多方面都延续了原有的方针和政策，但同时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绩。

（一）东正教会内部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主教区、堂区、修道院、各级神职人员的数量稳步增长。与1988年到2008年期间教会力量的快速崛起相比，基里尔任期的第一个十年是教会力量平稳增长的十年。教堂数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新法律的出

① О свободе вероисповеданий.

台。2010年12月,《关于将国家和市政所有的宗教用途财产归还宗教组织》的法律^①生效,加大了归还东正教会教产的力度。主教区数量的大幅增长与基里尔所提倡的教会组织结构的调整有密切关系。关于这一点,将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发展中呈现转型”中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表1^②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组基本数据,可以更为直观地观察其30年间的发展情况。

此外,俄罗斯东正教会加快了在远邻国家^③的发展步伐,一方面积极恢复在欧洲的影响,一方面加强在亚洲和阿拉伯地区的传播。在欧洲,位于法国尼斯的圣尼古拉大教堂归还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巴黎修建了俄罗斯东正教

① О передаче религиозным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 имущества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находящегося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ил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② 图表中的数据来源: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在历次主教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牧首基里尔在2018年莫斯科主教区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1) Алексей II(Ридигер) Церковь и духов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России. Т.1. Слова, речи, послания, обращения, 1990-1998. М., 1999.

2) Доклад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Алексия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1997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421718.html>

3) Доклад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Алексия II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2000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421863.html>

4) Доклад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Алексия II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3 октября 2004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420130.html>

5) Доклад Местоблюстителя Патриаршего Престола митрополита Смоленского и 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Кирилла на Поместн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Москва, 27-29 января 2009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41724.html>

6) Доклад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Кирилла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2 февраля 2011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1402889.html>

7) Доклад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2 февраля 2013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2770923.html>

8) Доклад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2 февраля 2016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4366063.html>

9) Доклад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29 ноября - 2 декабря 2017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072994.html>

10) Доклад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Епархиаль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г. Москвы(21 декабря 2018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327228.html>

③ “远邻国家”(даль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这一概念产生于苏联解体之后,一般用于指称不属于独联体的国家。

文化中心和主教教堂圣三一大教堂；意大利巴里的牧首会馆（подворье）^①归还俄罗斯东正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维也纳主教区得到奥地利政府的认可；在西班牙马德里修建了隶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基督诞生教堂……亚洲和阿拉伯地区，在泰国继续修建新的教堂和修道院，在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开放了新的堂区；在阿联酋的沙迦完成了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时期开启的第一座俄罗斯东正教堂圣菲利教堂的建设，并于 2012 年开始了牧养工作……由此可见，基里尔领导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已不满足于传统的传教区域，开始深入到其他宗教，如天主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占优势的地区。

表 1 俄罗斯东正教基本数据

年度	都主教区	主教区	堂区	修道院	主教	司祭	辅祭
1988		67/76 ^②	6800	21/22 ^③	74	6674	723
1992				143			
1994		114	15985	281	136	12841	1402
1997		124	18000	390	146		
2000		130	19417	545	153		
2004			26590	652	173		
2008 年底		157	29263	804	203	27216	3454
2011		164	30675	805	217	29324	3850
2013	33	247	33489 ^④		290	30430	3765
2016	57	293	34764		354	35171	4816
2017	60	303	36878	944	377	34774	4640
2018		304			381		

其次，规范对新殉教士和认信者的崇拜。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任职期间的一个重要贡献，即是封圣新殉教士和认信者^⑤，1988 年到 2008 年间共封圣

① 会馆，一般隶属于某个修道院，位于城市的修道院会馆多用于帮助修道院募集奉献款、接待朝圣者。

② 1994 年主教大会上的数据为 67，2009 年地方宗教会议上的数据为 76。

③ 2000 年主教大会上的数据为 21，2009 年地方宗教会议上的数据位 22。

④ 此年及此后的统计方法有变，改为计算举行事奉圣礼的教堂。

⑤ 俄罗斯的新殉教士和认信者指 20 世纪以来因政治、战争等因素而牺牲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神职人员与平信徒。

2700 多位圣徒。^①封圣新殉教士和认信者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是改变现代俄罗斯教会生活最重要的宗教创举之一”^②。这一举措不仅促成了俄罗斯海外东正教会与母教会的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对 20 世纪的俄罗斯历史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知。经历了世纪之交的大规模封圣之后，基里尔将工作重点转向处理封圣的后续事宜，进一步规范了对新殉教士和认信者的崇拜，如制定礼拜仪式仪轨、编写传记和赞美诗等^③，避免出现敬拜未经封圣的新殉教士和认信者的现象。与此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还积极向社会宣传新殉教士和认信者的功绩，举办相关的文学竞赛，出版各种书籍。这既是对新殉教士和认信者崇拜的一种推广，同时也折射出俄罗斯东正教会对过去的 20 世纪这段历史的一种态度。

最后，巩固俄罗斯东正教会统一的事业。牧首基里尔在 2009 年的地方宗教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的一大功绩即是加强了教会的统一。在其任上，俄罗斯海外东正教会于 2007 年回归母教会。^④维护东正教会的统一也是基里尔任内的一个重要任务。基里尔强调，要加强原苏联领土上的东正教会，如中亚五国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东正教会与俄罗斯母教会之间的联系，并继续着手解决爱沙尼亚、摩尔多瓦东正教会，以及由来已久的乌克兰东正教会问题。在爱沙尼亚东正教会^⑤的问题上，基里尔继续为捍

① Доклад Местоблюстителя Патриаршего Престола митрополита Смоленского и 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Кирилла на Поместн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Москва, 27-29 января 2009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41724.html>

② Георгий Митрофанов (прогонере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1900-1927. СПб., 2002. С.3.

③ 此外，还规定已纳入新殉教士和认信者集体纪念日的圣徒不能再被追封为地方圣徒。新殉教士和认信者集体纪念日的日期不固定，如果 1 月 25 日（旧历）这一天是主日，则在这一天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如果 1 月 25 日是星期一到星期三，则在 25 日之前的主日庆祝；如果 1 月 25 日是星期四到星期六，则在 25 日之后的主日庆祝。

④ 俄罗斯海外东正教会（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за границей, РПЦЗ），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主要由因 1917 年革命和国内战争而流亡国外的侨民组成。1927 年，时任都主教的谢尔吉（Сергий，1867-1943）发表了《声明》（Декларация），号召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和解，俄罗斯海外东正教会对此表示不赞同，遂与母教会分裂。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会为教会的统一做了一系列的努力，2007 年 5 月 17 日，在莫斯科救主大教堂举行了礼拜仪式，并签署文件，确认了俄罗斯海外东正教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不可分割的一个自主管理教会。

⑤ 俄罗斯东正教会将爱沙尼亚视为自己的教规领土，1920 年，成立了隶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爱沙尼亚自管教会。1923 年，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在爱沙尼亚成立了隶属于自

卫爱沙尼亚领土上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权利与爱沙尼亚政府进行对话，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进行沟通，虽仍未达到对俄罗斯东正教会而言理想的结果，但其发展已基本趋于稳定。在摩尔多瓦教会^①问题上，由于“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的出现导致教会的分裂，加深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与罗马尼亚东正教会的矛盾。面对教会分裂的局面，以及摩尔多瓦国家领导人对摩尔多瓦东正教会地位的不满^②，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修复和加强东正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2010年摩尔多瓦新一届政府产生后，东正教会与摩尔多瓦政府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在世俗教育领域教授宗教课程、推行随军神职人员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乌克兰一直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关注的重点，基里尔为团结乌克兰东正教会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如增强乌克兰东正教会在天主教会发言权的发言权、积极与罗马天主教会对话解决东仪天主教问题等。

此外，在传播和出版事业方面，近十年来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取得了长足

己的爱沙尼亚自治教会；1978年，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宣布1923年成立爱沙尼亚自治教会的文件无效；1996年2月，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宣布恢复1923年的文件，在爱沙尼亚成立了隶属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自治教会，这一行为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看来是对自己教规领土权利的侵犯。从信徒人数上看，爱沙尼亚东正教会（莫斯科牧首区）的信徒比爱沙尼亚自治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信徒多8-10倍（参见2011年牧首基里尔在主教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但是隶属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爱沙尼亚自治教会和路德教会得到了政府更大的支持，导致俄罗斯东正教会所辖堂区的发展受到限制。

注：教规领土（каноническая территория），这是因与基督教其他宗派的关系问题而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个概念，指地方东正教会根据教会法典从事活动的特定区域。教会法中并无此概念，为了树立这一概念的权威性和正统性，俄罗斯东正教会将这一概念追溯到使徒时代，并指出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教会活动原则。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其所辖的教规领土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东正教徒。参见Иларион (Алфеев). Принцип «канониче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в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традиции. <https://azbyka.ru/kanonicheskaya-territoriya>

① 摩尔多瓦东正教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自管教会，下辖摩尔多瓦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2007年10月底，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决定成立七个新的主教区，其中包括在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恢复三个主教区。罗马尼亚东正教会指出，1944年以前比萨拉比亚都主教区就包括这三个主教区。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在摩尔多瓦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主教区是不合法的，破坏了摩尔多瓦的主权。

② 2010年9月，代总统米哈伊·金普（Михай Гимпу）指出，摩尔多瓦东正教会不是独立自主的教会，只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部”。参见Доклад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Кирилла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2 февраля 2011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1402889.html>

的进展，出版物数量迅猛增加，种类繁多，内容日益丰富，以吸引更多广泛的读者群体；教会网络发展迅速，各大教区、大的教堂基本都开设了自己的网页，俄罗斯东正教会还在 Facebook 和 ВКонтакте 上面创建了账号，以更加快速和便捷的方式与世俗群体展开互动。此外，俄罗斯东正教会还积极与世俗的新闻媒体加强合作与联系，以加强教会对外宣传的力度。

（二）东正教会与世俗领域的互动

阿列克西二世任牧首期间，积极推动东正教会与政权的合作，向世俗的教育领域引进东正教文化课程，加强宣教工作、社会服务和文化交流，奠定了东正教会与世俗领域互动的良好基础，基里尔就任牧首以来，延续了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所做的工作，并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了东正教会与世俗领域的合作，努力让东正教的精神嵌入到世俗生活更深的层面。

1. 政教关系

在政教关系层面，俄罗斯东正教会继续宣称保持教会的非政治性，同时加强与各级政府部门的良好合作关系，并积极参与一些联邦法律的修订工作，为东正教会的发展谋求更大的空间。如 2015 年 11 月通过了联邦法律《关于对联邦法律〈关于信仰自由和关于宗教团体〉及其他一些联邦法令进行修订》^①，该法律改变了司法机关对宗教组织活动的监督程序，使宗教组织不再受联邦法律《关于非商业组织》^②一系列规定的限制，赋予了宗教组织从事商业活动更大的自由空间。此外，东正教会与军队和监狱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早在 1994 年，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就已开始推动神职人员到军队中开展牧养士兵的工作，并鼓励神职人员到监狱为服刑人员服务。牧首基里尔继续推进这一工作，使其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2009 年 7 月 21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通过了恢复俄罗斯武装力量中随军神职人员制度的决议，此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着手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2017 年 6 月 1 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编制中共设置 266 个指挥员助手职位，处理信徒士兵的工作，其

①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о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ях» и и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341-ФЗ.

② О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中东正教会的代表 259 位。^①2011 年，主教大会通过了建立编制内监狱神职人员制度的构想。此后，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世俗政权达成协议，在每一个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地方监狱管理局设置负责人助手的职位，协助处理有信仰的服刑人员的事务。国家机构编制内神职人员制度的推行，一方面显示出政府和东正教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东正教在俄罗斯日益增长的社会影响力。

2. 介入世俗教育

基里尔任牧首以来对阿列克西二世任职期间所开展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推进体现在世俗教育领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东正教文化基础》课进入中小学课堂。^②俄罗斯东正教会向中小学引入“东正教文化”相关课程的愿望由来已久，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任职期间，曾多次请求国家立法机构赋予东正教会在世俗学校中讲授宗教课（选修）的权利。1997 年，俄罗斯联邦宗教法《关于信仰自由和关于宗教团体》的颁布，为宗教教育进入世俗教育领域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规定：“应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请求，经儿童本人同意，允许宗教组织对国立和市立教育机构的在读儿童进行普通教育大纲以外的宗教教育。”^③因此，自 1997 年起，东正教会与一些地区（如斯摩棱斯克州）合作，将东正教文化课程以选修课的形式引入中小学。2006 年 9 月 1 日起，在别尔哥罗德、卡卢加、布良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州，《东正教文化基础》课被列入世俗中小学的必修课。据统计，2006-2007 年，在俄罗斯世俗国立和市立学校学习东正教文化课程的

① Доклад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29 ноября -- 2 декабря 2017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072994.html>

② 帝俄时期，《神学课》（Закон божий）曾是中小学的必修课。苏维埃时期，国家“在一切讲授普通科目的国立、市立和私立学校中，禁止讲授宗教教义”。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 年 1 月 23 日）第 9 条。参见乐峰：《东正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15 页。

③ 俄罗斯联邦宗教法《关于信仰自由和关于宗教团体》第 1 章第 5 条第 4 款。参见乐峰主编：《俄国国教史》（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219 页。

学生达 50-60 万人。^①但此时,《东正教文化基础》仍只是在俄罗斯部分州的中小学进行教授。

牧首基里尔上任以来,《东正教文化基础》课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9 年 10 月 6 日,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出台了联邦初等普通教育国家标准,《俄罗斯各民族精神道德文化基础》^②课作为必修课被纳入教学计划,2010 年 4 月 1 日起在俄罗斯 19 个联邦主体的世俗中小学开始试行,该课程的一个模块即是《东正教文化基础》。2012 年 1 月 28 日,俄罗斯政府颁布了《关于 2012-2013 学年在俄罗斯联邦所有主体普通教育机构推广<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课程的措施计划》^③,根据这一计划,2012 年 9 月 1 日起,《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在俄罗斯所有联邦主体的世俗学校作为必修课全面启动。该课程包括六个模块:“世俗伦理基础”、“世界宗教文化基础”、“东正教文化基础”、“伊斯兰教文化基础”、“佛教文化基础”、“犹太教文化基础”,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之一进行学习。据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调研,2012/2013 学年-2016/2017 学年,选修《东正教文化基础》课的人数在大多数主教区都有所增加。此外,为了提升《东正教文化基础》这一课程的授课质量,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世俗学校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举办各种主题讲座、培训班、讨论班等;为了提高选课率,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还积极加入到家长协会组织,举办公开的普及《东正教文化基础》的文化启蒙项目。

第二,神学成为国家认可的“学术”专业。20 世纪 90 年代,神学作为一个方向或专业已经进入世俗高等教育的本科和硕士培养目录,如 1992 年底,在民主改革的浪潮之下,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将神学方向(направление)

① Комисс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толерантности и свободы сове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ала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мониторинга соблюдения принципов свободы совести и вероисповедания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учебных курсов по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е религий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ях в регион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oprf.ru/structure/comissions2006/11/materials/1896>

② 2012 年 12 月 18 日,《俄罗斯各民族精神道德文化基础》课更名为《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

③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 Плане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введению с 2012/13 учебного года во всех субъект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учебного курса для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Основы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культур и светской этики” от 28 января 2012г. <http://www.pravo.gov.ru/laws/acts/8/5652451088.html>

列入国家教育方向和专业类别，并制定了相应的标准。1994年起，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倡议将神学专业（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添加到国家教育方向和专业分类目录中，并从宗教世界观的立场制定相应的国家标准。1999年2月1日，教育部将神学方向列入硕士培养方向分类目录，同年3月2日，神学专业被添加到分类目录中。2001年和2002年，教育部先后批准了神学方向（本科和硕士）和神学专业的培养标准。然而，神学一直未能作为一门学术专业（научная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得到世俗教育体系的承认。围绕神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能否成为学术专业的争论一直到2015年才画上句号。2015年，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下属高等评估委员会（ВАК）批准神学成为新的学术专业，专业代码为26.00.01。2016年，成立了神学专业的副博士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2017年，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副博士进行了答辩。至此，神学作为一门科学得到了世俗教育体系的认可。

第三，完善主日学校。2000年的主教大会上，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提出，未来要完善主日学校体系，称其是复兴堂区生活的关键。基里尔就任牧首后，延续了这一工作。2012年，出台了主日学校教学培养活动标准，并于2017年进行了修订，制定这一标准的主要目的是使主日学校的教学活动体系化，提升教育质量。《标准》对主日学校进行了划分，10人以下为主日小组，10人以上为主日学校。2012年的《标准》将主日学校的学生分为三个等级：学前儿童（5-6岁）、初级阶段（7-11岁）和主要阶段（12-16岁），2017年新修订的《标准》将主日学校的学生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5-7岁）、第二阶段（8-10岁）、第三阶段（11-13岁）、第四阶段（14-17岁），并将之前三个阶段的学习内容压缩在5-13岁这三个阶段，对14-17岁这个年龄段少年的宗教教育工作《标准》暂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俄罗斯东正教会表示将会另行成文进行规定，可见东正教会对此一阶段少年教育的慎重。两份《标准》，特别是2017年修订的《标准》，对各个阶段的课程内容、时长、讲授方式和目的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规定，并给出范例，摆脱了传统的学院式传输知识的授课方式，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采取适合他们接受知识的方式，以实现使其了解和参与到教会生活之中的目的。主日学校教育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弥补了东正教会无法将《神学课》纳入国立、市立世俗教

育体系的“遗憾”，并与国立、市立世俗教育体系中的《东正教文化基础》课遥相呼应。

东正教强势介入世俗教育领域，其道德伦理思想有助于国家精神道德体系的建构，这是其积极的一面。然而，世俗正规教育体系中东正教相关课程所使用的教材难以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信仰倾向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破坏了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也引起了一些民众的不满。

3. 宣教工作

吸引更多的民众了解东正教、信仰东正教，一直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个主要工作。30年间，东正教会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20世纪90年代就十分关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以及民族地区的传教工作，2004年的主教大会又重申了在这些地区传教的重要性。牧首基里尔任职以来，延续这一政策，并提出了一些深化的方案，如吸引那些已经受洗，但鲜少进教堂的信徒参与到教会的生活中来；制定有效的奖励机制，鼓励神职人员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传教工作；强调对哥萨克群体的传教等。加强对哥萨克群体的传教是基里尔任牧首以来传教工作的一大发展。虽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东正教会就已与总统下属的哥萨克事务委员会开展了合作，但牧首基里尔着重指出了对哥萨克群体传教的重要性，并提出这一工作的目标是努力复兴真正的、忠于教会、服务祖国的哥萨克群体。历史上，哥萨克是一个骁勇善战，不羁的群体，是俄罗斯国家，以及东正教会强有力的护卫力量，但同时也是较少参与教会生活的一个群体。20世纪末以来，出现了哥萨克复兴运动，随着哥萨克复兴运动的壮大，其独立意识一度膨胀。俄罗斯东正教会强调对哥萨克群体传教的重要性，一方面，适应了哥萨克群体壮大、复兴的趋势；另一方面，顺应了国家的需要，借助信仰的力量以弱化哥萨克群体的分离倾向。

此外，在社会服务与文化等方面，俄罗斯东正教会在牧首基里尔任期的第一个十年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东正教会不断发展慈善事业，如建立孤儿院、养老院、戒酒、戒毒中心、护理中心、慈善食堂，与残疾人团体合作，与失业现象斗争，给予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争灾难的人们以咨询和物质救助等。在文化领域，2010年，成立了专门的牧首文化委员会；继续开展全国

规模和地方性的东正教文化活动，如举办开创于 1992 年的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座谈会；设立各种文学奖项和举办文学竞赛，如与使徒齐名的圣基里尔和梅福季牧首文学奖，什梅廖夫《神的禧年》国际青少年儿童文学竞赛；庆祝东正教图书日；组织各种展览，比较有影响力的如 2013—2016 年的“东正教罗斯。我的故事”系列展览；与博物馆团体合作，加强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等等……

（三）与基督教其他宗派的关系

基里尔上任后延续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对外交流方面的政策，以对话和合作交流为宗旨，与东方教会，如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埃塞俄比亚教会继续保持友好沟通，积极发展与其他地方东正教会的关系，并与绝大多数地方东正教会保持了良好的互动。

俄罗斯东正教会加强了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对话，双方的关系由紧张逐渐趋向缓和。20 世纪 80—90 年代，以及 21 世纪初，因乌克兰西部东仪天主教引发的天主教在俄罗斯东正教“教规领土”上传教^①的问题，俄罗斯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与此同时，双方也就保护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建设性对话。21 世纪 10 年代以来，双方拓展了对话的空间，特别是中东地区基督徒处境的恶化，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增进了双方合作的可能，缓和了两者之间的矛盾。2012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波兰天主教主教团的首脑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告俄罗斯和波兰人民联合书^②，号召两国人民加强对话，争取和解，展望未来，共同面对新的挑战。2016 年 2 月 12 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基里尔与罗马教皇方济各（Франциск，1936—，2013 年 3 月 19 日就任教皇）在哈瓦那（古

① 2002 年，罗马天主教会将俄罗斯的 4 个天主教宗座署理区升格为教区，并任命新的总主教，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 2 个教区，在乌克兰传统上属于东正教的区域建立了两个主教座堂。俄罗斯东正教会认为，罗马天主教会此举破坏了教规法，实际上是在俄罗斯的教规领土上建立了平行的地方教会，而罗马天主教会否认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指控，认为将俄罗斯的 4 个宗座署理区升格为教区只是程序问题。

② Совместное послание народам России и Польши Предстоятел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Кирилла 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Епископ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льши Архиепископа Юзефа Михалика,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Перемышльского.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2411498.html>

巴)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①,号召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尽可能地终止在中东地区的暴力行为,并指出东仪天主教不是实现教会统一的途径。2017年,备受俄罗斯人民崇敬的显圣者圣尼古拉(Николай Чудотворец,约270-约345)的部分圣骨从意大利的巴里迎请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供信徒朝拜,这是930年来圣尼古拉的圣骨首次离开巴里。2018年5月和10月,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外联络部部长伊拉里昂(Иларион, Алфеев)与罗马教皇方济各两次会面,面对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问题,方济各一再强调罗马天主教会不干涉东正教会的内部事务,并就双方的文化合作展开了进一步的磋商。对话、合作、面对共同的挑战,构成了近十年来俄罗斯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两者关系的主要宗旨。

在新教问题上,基里尔任牧首以来与德国的福音教会,芬兰的福音路德教会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其他一些新教派别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规领土”上传教,以及对一些传统价值观的认知上。特别是后者,俄罗斯东正教会秉承比较传统的价值观,对西方一些新教团体出现的祝福同性婚姻、按立同性恋者为神职的行为表示不满,因此与美国圣公会、瑞典教会、挪威教会暂时中断了联系,这也体现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守护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问题上的一致性。

二、发展中呈现转型

自1988年东正教在俄复兴以来至2008年,经过20年的发展,俄罗斯东正教会无论从信徒的人数,还是从堂区和神职人员的数量来看,其数字均非常可观,这一阶段东正教会虽然也在不断强调“质”的提升,但“量”、“基数”的增长,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状况。及至基里尔任牧首后,在之前“量变”的基础之上,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发展方向主要转向了“质”的提升,这是新阶段俄东正教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种“质”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 Совместное заявление Папы Римского Франциска и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4372074>

（一）东正教会机构改革：提升管理质量

纵观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任职期间在几次主教大会上的报告，可以看出，主教区与圣主教公会之间，即地方机构与中央机构之间的沟通协作并不顺畅。一方面，圣主教公会的命令在一些地方主教区执行不力，另一方面，圣主教公会在一些主教区无法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以便制定更合理的政策。基里尔就任牧首以来，一个重要的工作即是深化东正教会的机构、教区规划和人事方面的改革。

在中央层面，成立新的机构，对圣主教公会各部门进行调整或改组，并制定部门的章程或条例，以实现部门管理的规范化。新成立的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宗教会议间机构（Межсоборн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和最高教会委员会（Высший Церковный Совет）。宗教会议间机构于2010年正式成立，属于莫斯科牧首区的协商机构，主要负责研究地方宗教会议和主教大会将要讨论的问题，就这些问题给出提案。该机构的主席为牧首，成员由主教公会从主教、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中遴选，每届任期四年。最高教会委员会并不是全新的机构。它最早成立于1917年^①，1922年5月9日牧首吉洪（Тихон，1865-1925，1917年12月4日-1925年4月7日任牧首）被捕后便中止了活动，2011年，重新恢复。该委员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执行机构，由牧首主持，由主教公会各部门的负责人构成，旨在协调主教公会各部门和全教会机构之间的工作等。这两个机构，前者的成立为主教大会更加有效地推进和缩短主教大会的间隔周期提供了保证；而后者的恢复，既保证了主教公会各部门的相互配合，协同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对圣主教公会（9个常任代表，5个临时代表）的分权。部门调整和改组主要针对的是圣主教公会所辖各职能机关。首先，根据东正教会工作的需要成立新的部门，例如哥萨克协调委员会，牧首文化委员会，恢复财经局等；其次，对一些部门进行改组，如将监狱事务部从与武装力量和执法机构合作部中分离出来，将2009年成立的教会与社会相互关系部和信息部改组为教会与社会及大众媒体相互关系部，将主教公会神学委员会改组为主教公会圣经-神学委员会，将修

^① 20世纪初的最高教会委员会由牧首、3位主教公会的主教、1位修士，5位白神品神职人员和6位平信徒构成。

道院事务委员会改组为修道院与修道事务部等，这种改组考虑到了分工的细化，以及工作的相关性，使各部门可以更为有效地运作；最后，为一些部门制定章程和条例，使之更加规范地发展，如莫斯科牧首公署事务局、学术委员会、宗教教育和宣教部、传教部、青年事务部、教会与社会及大众媒体相互关系部等，陆续通过了自己的章程或条例。

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来看，俄罗斯东正教会建立了三级管理模式：牧首区—都主教区—主教区，为此成立了新的都主教区，重新规划主教区。2011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圣主教公会批准了《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区的条例》^①，这一决定既是对基督教传统的传承，也是对1917-1918年地方宗教会议上所通过但未能实际执行的《关于教会区划》（О церковных округах）决议的延续。俄罗斯幅员辽阔，各地民族、文化、风俗各异，面对数量众多、需求各异的主教区，东正教会中央机构对其进行直接管理的难度较大，工作量繁重。通过将一个联邦主体内的主教区整合为一个都主教区，一方面，都主教区的区划与行政区划吻合，便于东正教会与政府间的合作与沟通；另一方面，教会中央管理机构通过都主教区形成了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式管理体系，层层问责，可以更好地对主教区施加影响。在主教区层面，将一些大的主教区规模缩小，分成几个主教区；大城市的主教区，因不能继续划分，则设立了副主教区。主教区的改革，增加了管理职位，便于安排、培养和锻炼较为年轻的神职人员，同时也避免了主教区势力过大、不服从管理的弊端。

在人事安排方面，增加了监督司祭和堂长的助手一职，这些助手负责协助处理宗教教育、宣教、青年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这一职务的引入，不仅分担了监督司祭和堂长的工作，同时也得以让接受过一定专业培训的人员从事相关的工作，使得工作更富有效率。

牧首基里尔所进行的机构改革，一方面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另一方面体现出专业化、细化的特点，这是其优势。与此同时，这一改革也造成了俄

^① Положение о Митрополиях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от 5-6 октября 2011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1639871.html>. 至此，都主教区（митрополия）和都主教大区（митрополичий округ）的概念产生了差异，都主教大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其最高管理机构是都主教大区首脑主持的主教公会，都主教区的管理机构是主教委员会。目前俄罗斯东正教会有两个都主教大区：哈萨克斯坦都主教大区和中亚都主教大区。

罗斯东正教会管理机构的臃肿和领导队伍的庞大，潜藏着官僚化的隐患。

（二）神学校教育改革：与世俗教育接轨，提升教学质量

阿列克西二世任牧首期间已意识到神职人员的素质对教会发展的重要性，曾改组中等神学校（духовная семинария）为5年制的高等学校，提升神学校的研究水平。牧首基里尔就任后，面对新的形势，指出：“提升教学和培养水平的迫切性，是推动我们神学校教育体系改革的主要动机。神学校教育体系应当成为无论对俄罗斯的世俗教育体系而言，还是对国外的神学校教育体系而言，都是值得推崇和享有威望的体系。”^①基于此目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对神学校教育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即加入博洛尼亚进程（Болонский процесс）^②，推进神学校教育与俄罗斯世俗高等教育和欧洲教育体系的接轨。

首先，实行与世俗教育类似的三级教育体系。2010年起，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神学校开始实行本科、硕士和研究生的三级培养体系。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提供高等神学教育，只有接受了本科教育和专门培训的毕业生才可能被授予司祭圣职。硕士，学制两年，主要培养研究工作者、教师和教会行政机构的工作者。研究生，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包括副博士（кандидат）和博士两个级别，副博士等同于国际上通行的博士，而博士与俄罗斯世俗教育体系中的博士相对应，目前可以在圣基里尔和梅福季全教会研究生和博士生研究院攻读神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取消了初等神学校（духовное училище）。2013年，圣主教公会责令培养神职人员的初等神学校在三年内或是改组为中等神学校，或是改组为培养堂区传教和宣教、青年和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士的教育中心。截至2017年11月底，初等神学校体系已经成为过去。

其次，统一教学大纲。为了规范和提升神学校的教学质量，2015年9

① Доклад Патриарх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 всея Руси Кирилла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вещании 2 февраля 2010 года. <http://pda.patriarchia.ru/db/text/1061403.html>

② 1999年，29个欧洲国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提出了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该计划旨在整合欧洲的教育资源，打破教育的国别限制，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2003年，俄罗斯加入了博洛尼亚进程。

月起，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神学校逐步转向按照统一的本科教学计划进行教学，2017-2018 学年，有 4176 名大学生依据新的教学大纲进行学习，占俄罗斯神学校本科生总数的 74%^①，2018-2019 年度将完成这一转型。这一工作完成后，将继续制定统一的两年制硕士培养大纲。此外，俄罗斯东正教会还考虑在俄罗斯东正教会“教规领土”上建立统一的神学校教育体系。

最后，神学校获得国家认可，这是神学校教育与俄罗斯世俗高等教育接轨的重要标志。2008 年 2 月，俄罗斯通过了对联邦《教育法》、《关于高等和大学之后的专业教育》、《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团体》等法律的修订^②，引入了关于批准和认可专业的宗教教育机构的条款，为神学校教育和世俗教育的接轨提供了法律基础。利用这一历史契机，俄罗斯东正教会着手对神学校教育体系进行深化改革，使其在教育结构、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师资力量等方面逐渐向国家高等教育标准靠拢，逐步实现神学校可以为自己培养的毕业生颁发国家标准证书（仅无俄罗斯国徽）的目标。目前，俄罗斯境内有各类神学校和神学大学共 43 所^③，其中有 6 所^④获得国家承认。可见，神学校获得国家认可的道路还很漫长。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博洛尼亚进程，一方面，借鉴世俗教育体系刺激并提升了神学校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东正教神学校教育与世俗教育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此外，东正教神学校与世俗学校教育的接轨，也进一步增强了东正教神学校在教育领域的竞争力，因为并非所有神学校的毕业

① Доклад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29 ноября---2 декабря 2017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5072994.html>

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8 февраля 2008 г. N 14-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части лицензирования и аккредитации учреждений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религиоз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духовны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https://legalacts.ru/doc/federalnyi-zakon-ot-28022008-n-14-fz-o/>

③ Учебный комитет РПЦ. Учебные заведения РПЦ: обновленный список. <http://www.uchkom.info/uchebnyy-komitet/uchebnye-zavedeniya/>

④ 莫斯科神学院（莫斯科州谢尔吉镇），圣彼得堡神学院（圣彼得堡），圣吉洪东正教人文大学（莫斯科），奥伦堡中等神学校（奥伦堡），奔萨中等神学校（奔萨），斯列坚斯基中等神学校（莫斯科）。数据来源 Реестр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и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о имеющ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аккредитацию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м программам. <http://isga.obrnadzor.gov.ru/accredreestr/>

生都会选择做神职人员，而拥有为国家所认可的高等教育毕业证书可以帮助其在更广的领域就业。

（三）东正教会发展考量指标的变化：量到质的转变

随着俄罗斯东正教会将发展定位于“质”的提升，考察东正教会发展情况的一些指标也发生了变化。

从堂区的统计标准来看，在注重量的增长的同时强化了质的标准。2011年的主教大会提出：争取在俄罗斯东正教会“教规领土”上的每一个有东正教信徒生活的居民点都开放至少一座教堂、小教堂或祈祷空间。与此同时，从2012年起，采取了新的堂区统计标准——以教堂或祈祷所是否举行礼拜仪式为统计标准。因此，2012年底俄罗斯东正教会所得到的堂区统计数据如下：每周举行一次以上事奉圣礼的教堂^①有11731座，一周一次的有12644座，一周不足一次、但一个月不少于一次的有9114座，合计至少一个月举行一次事奉圣礼的教堂有33489座。^②正因为俄罗斯东正教会对礼拜仪式的重视，故而对教堂的建筑要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俄罗斯东正教会不再过分强调建筑的外在形制和规模，而建议在一些条件不允许的地区修建简易的小教堂。

从信徒的增长点来看，从对“东正教徒”（православный）增长的关注转向对“进堂信徒”（воцерковный）的关注。1989年，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ВЦИОМ）的数据显示，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占国民总数的20%^③；2008年，社会观点基金会（ФОМ）和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院（ИСПИ РАН）的数据分别是63%^④和65%–69%^⑤；2012年，列瓦达中心（Левада-центр）、社会观点基金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院的数据分别是

① 此处的教堂指举行礼拜仪式的各种类型的场所。

② Доклад Святейшего Патриарха Кирилла на Архиерейском Соборе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2 февраля 2013 года. <http://www.patriarchia.ru/db/text/2770923.html>

③ Чеснокова В.Ф. Тесным путем: процесс воцерковле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X века. 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5. С.8.

④ 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ост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Индекс 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ости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мониторинг. 03 Июля 2014. <http://fom.ru/TSennosti/11587>

⑤ Синелина Ю.Ю. Динамика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Россиян (1989-2012). <http://religious.life/2014/09/sinelina-dina-mika-religioznosti-rossiyan-1989-2012/>

74%^①，64%-72%^②和82%^③。可见，东正教信徒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进堂信徒”的比例并无明显变化。“进堂”（воцерковление）本是古代教会礼拜仪式中的一种特殊仪式，于婴儿出生第40天举行。俄罗斯社会学家切斯诺科娃（В.Ф. Чеснокова，1934-2010）将此概念借用过来以衡量信徒的虔诚度，指一个人通过让自己接受教会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自愿承认教会的影响，^④为衡量一个人的进堂程度。切斯诺科娃提出了五项指标：光顾教堂、忏悔和领圣餐、阅读福音书、祈祷、遵守斋戒。针对这五项指标，社会观点基金会（2000-2014）^⑤和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院（2004，2006，2011）^⑥近些年进行了持续关注。其调研结果显示，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进堂信徒”，即每个月至少光顾一次教堂、一年领1-2次圣餐、诵读教会祈祷文、定期阅读福音书、遵守一些大的斋期的信徒比例并没有显著增长，基本维持在11-13%。也就是说，虽然宣称自己是东正教信徒的人数不断增长，但真正定期参加礼拜仪式、参与教会生活的人数并没有显著提高。

面对信徒数量已基本达到饱和，而“进堂信徒”的数量并无实质进展的情况，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到如何增加“进堂信徒”的比例上来。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不断提升神职人员的素质和传教水平，加强《东正教文化基础》课在世俗教育体系中的传播，改变主日学校的授课方式，组织各种类型的东正教文化活动等。在这些措施中的一个重点，是针对青年的工作。阿列克西二世任牧首期间就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及至21世纪10年代，俄罗斯东正教会明确提出将吸引青年一代“进堂”作为教会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并提出了新的工作任务：培养人才，特别是青年领袖人才；探索开展青年工作的多种方法。提升青年的“进堂信徒”比例，意味着培养

① В России 74%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и 7% мусульман. 17.12.2012. <http://www.levada.ru/2012/12/17/v-rossii-74-pravoslavnyh-i-7-musulman/>

② 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ост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Индекс 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ости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мониторинг. 03 Июля 2014. <http://fom.ru/TSennosti/11587>

③ Синелина Ю.Ю. Динамика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Россиян (1989-2012).

④ Чеснокова В.Ф. Тесным путем: процесс воцерковле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X века. 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5. С.18.

⑤ 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ость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Индекс воцерковленности православных: мониторинг. 03 Июля 2014. <http://fom.ru/TSennosti/11587>

⑥ Синелина Ю.Ю. Динамика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и Россиян (1989-2012).

未来国家对东正教的虔诚度，为东正教会未来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保障。

三、转型中面临挑战

俄罗斯东正教会经过 30 年的复兴和发展，在“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俄罗斯东正教会在立足、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或是源于自身谋求发展而造成的与世俗社会的张力，或是与复杂的民族、国际政治局势息息相关，或是来自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不断壮大、扩张而埋下的隐患。

（一）非世俗化与世俗化的张力

著名的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 1929-2017）在 1967 年的《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一书中构建了宗教世俗化的理论。伯格将世俗化定义为“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脱离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①的过程，在社会和制度层面上，表现为教会从曾经主导的领域撤出；在文化层面上，表现为宗教内容的衰落；在意识层面上，表现为非宗教意识的日益增长。然而，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伯格重新审视自己的“世俗化”理论，于 1997 年发表了文章“世界的非世俗化：一个全球的概观”（*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overview*），批评了世俗化理论的谬误，转向了“非世俗化”的立场。伯格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现代社会宗教“非世俗化”现象的一个代表是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在此，笔者不想就伯格的世俗化和非世俗化理论进行分析，而是想要借用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来探讨今天俄罗斯东正教会所面临的“非世俗化”与“世俗化”之间的张力问题。

诚如伯格所言，20 世纪末，俄罗斯出现了宗教“非世俗化”的趋势，东正教复兴，蓬勃发展，信徒人数急剧增长，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东正教向世俗教育、文化领域渗透与扩展，的确是一派“欣欣向荣”的“非世俗

^① [美]彼得·贝尔格：《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28 页。

化”景象，然而，在这幅图景之后表现出来的却是“世俗化”的倾向与势头。

首先，从信徒对信仰的认识来看俄罗斯东正教发展的“非世俗化”。虽然俄罗斯绝大多数人称自己信仰东正教，但是这种信仰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宗教认同，更多的是一种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列瓦达中心的负责人、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Лев Гудков）就曾如此断言：东正教更多的是民族宗教符号，而非宗教认同。^①俄罗斯宗教学家奥夫西延科（Ф.Г. Овсиенко，1939–2007）和特罗菲姆秋克（Н.А. Трофимчук，1942–2002）也写道：东正教不可能成为全民的意识形态，原因在于绝大部分认同自己是东正教信徒的俄罗斯人其宗教性并不深刻。^②列瓦达中心 2017 年的调研显示，在东正教信徒中，相信上帝存在的人的比例为 58%，13% 的东正教信徒或是完全不相信上帝，或是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16% 的“正统派”不相信死后的生活，17% 的信徒不相信存在地狱和魔鬼，然而有三分之一的无神论者相信天国。^③这组数据表明，信仰与东正教教义、世界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前文也已提及，几十年间“进堂信徒”的比例并没有显著提升。可见，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在信徒增长方面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所体现的恰恰是“世俗化”的倾向，这主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国家政权对东正教意识的引导。自 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以来，国家便致力于改善与东正教会的关系。国家赋予一些东正教节日以国家节日的地位，在国事水平上举行一些宗教活动……国家对东正教的借助，甚或扶持，并非是要恢复其曾经的国教地位，而是强调其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和道德的力量，作为一种民族之魂，作为一个团结绝大部分俄罗斯人的纽带，可以用来填补苏联解体后的信仰真空，重铸俄罗斯的大国梦。

其二，东正教自身的特点使然。东正教以“仪式”宗教著称，其礼拜仪式冗长、仪轨繁复、节日众多、斋戒严格，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徒

① Символ вер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атеиста. 16.11.2017. <https://www.levada.ru/2017/11/16/simvol-very-pravoslavnogo-ateista/>

② Овсиенко Ф.Г., Трофимчук Н.А.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азвития федеративных и 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елиг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Реф. сб. М.: ИНИОН РАН, 2000. С.107.

③ Символ веры православного атеиста. 16.11.2017.

对东正教的深入了解和对教会生活的参与,使得一部分人对东正教信仰更多地报以取其“名”、弃其“实践”的态度。

其三,宗教观念的转化。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是俄罗斯东正教信徒迅猛增长的时期,这时选择信仰宗教,特别是信仰东正教,诚如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通讯部主任阿列克谢·菲尔索夫(Алексей Фирсов)所言,是一种潮流和时尚,与摆脱了政治桎梏密切相关。^①随着东正教的不断复兴和发展,东正教与教会这两个概念逐渐分离开来,于教会而言,东正教是其伟大的事业,教会是其化身;于国家而言,东正教是民族的精神,国家的软实力;于个人而言,东正教只是个人精神生活的选择和慰藉。菲尔索夫指出,宗教失去了制度化的阵地,日益成为个人的私事,^②而这恰恰是宗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私人化了的宗教是个人或核心家庭之‘选择’或者‘爱好’的问题,它事实上缺乏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性质”。^③

其次,从教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来看俄罗斯东正教发展的“非世俗化”。2000年的主教大会批准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文件《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构想基础》^④,其中指出,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是某种“介于分离和国家教会意识的中间”^⑤状态,目前这种政教关系虽貌似稳定,但也日益受到民众的诟病。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15年的调研表明,2007年到2015年,要求保持宪法关于世俗国家规定的比例显著增加,从54%增长到64%。47%的俄罗斯人认为,教会应当影响社会的精神生活,而不要干涉政治。^⑥列瓦达中心2017年所进行的调研显示,虽然39%的俄罗斯人满意现在的政教互动关系,但这个比例比2016年降低了17%。^⑦可见,在意识领域宗教日益“世俗化”的趋势影响下,在社会和制度层面,对宗教世俗化的呼声也

① Религия: за и против. 27 июля 2015.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89>

② Там же.

③ [美]彼得·伯格:《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

④ Основы социаль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⑤ Добрускин М.Е.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Философ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2016. №.3.

⑥ Церковь и общество: вместе или порознь? 24 июня 2015.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61>

⑦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 18.07.2017. <https://www.levada.ru/2017/07/18/religioznost/>

会日益高涨，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政府之间的“蜜月期”也将画上句号。

最后，从东正教教育向世俗领域扩展和神学校教育向世俗教育接轨来看俄罗斯东正教发展的“非世俗化”。俄罗斯东正教会成功地将《东正教文化基础》纳入中小学教育大纲，可以看作是“非世俗化”的一种成功，然而，面对国家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选修《东正教文化基础》，东正教会难免要进行一些宣传方法上的调整，特别是在教材方面，也不得不对此前过于宗教性的教材进行一番修订，做出一定的“世俗化”让步。俄罗斯东正教会为了提升自身水平而进行的加入博洛尼亚进程的神学校教育改革，也是主动与世俗教育接轨。国家认可神学校的文凭势必会在神学校教育体系中引入一定的世俗教育课程和标准，虽然这种改革对于东正教会不无裨益，但同时东正教会的神学校教育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的管控，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世俗化的过程。

由此可见，尽管从表象上看，俄罗斯正经历着宗教（东正教）“非世俗化”的过程，但在这一进程的推进过程中也必然面临着“世俗化”的问题。无论是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而言，还是于国家而言，如何找到“非世俗化”与“世俗化”之间的平衡，是双方面临的共同任务和挑战。俄东正教会过分依赖于政权而实现其“非世俗化”的进程，将会面临着其主体性丧失的可能。

（二）教会统一

教会统一一直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所要应对的一项艰巨任务。17 世纪，尼康改革导致俄罗斯东正教会分裂，形成了旧礼仪派；20 世纪 20 年代，革命、新政权的建立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俄罗斯海外东正教会与母教会的分裂；苏联解体后，原苏联空间下部分东正教会的离心倾向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面临的巨大挑战。2018 年 12 月 15 日，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分裂使得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统一面临愈加严峻的威胁。^①

^① 2018 年 12 月 15 日，在基辅召开了统一大会，会议选举都主教叶皮凡尼（杜缅科）（Епифаний, Думенко）为新的乌克兰东正教会首脑，乌克兰东正教会（基辅牧首区）（1992-2018）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1920-2018）宣布解散。2019 年 1 月 5 日，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牧首巴多罗买（Варфоломей）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了赋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地位的文件——托马斯（томос），并于 2019 年 1 月 6 日递交给都主教叶皮凡尼。

历史上，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乌克兰东正教会几经分合，15 世纪的分裂，到 17 世纪乌克兰并入俄罗斯国土而促成东正教会统一，到 21 世纪的再度分裂。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分裂给俄罗斯东正教会敲响了“教会-国家-民族”三位一体的警钟。早期基督教会的主教区、都主教区、以及牧首区，基本上与城市、国家的边界相吻合，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版图发生变化，两者之间的边界不再一致，特别是在 20 世纪，由于苏联的建立、两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解体等，两者边界的差异日益加剧。虽然教会与国家的边界并不必然一致，但是当今世界仍然出现了向教会与国家边界一致、与民族同一性相契合发展的倾向，乌克兰东正教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建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原隶属于莫斯科牧首区的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处境问题。随着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的继续高涨，新成立的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受到政府的扶植发展壮大，很可能导致世界各地（包括俄罗斯本土和中亚等地区）隶属于莫斯科牧首区的乌克兰族东正教信徒的离心倾向日益增长，从而引发俄罗斯东正教会所辖的一些主教区内出现不稳定因素。

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分裂对白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刺激。目前白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母教会之间的关系良好，但有了乌克兰东正教会的“榜样”，不能不考虑到白俄罗斯东正教会潜在的独立可能性。首先，东正教是白俄罗斯的优势宗教，白俄罗斯社会学中心“镜子-信息”（ЗЕРКАЛО-ИНФО）于 2013 年 3-4 月进行的调研数据表明，东正教信徒约占人口总数的 68%^①；其次，白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信徒以白俄罗斯族为主；最后，白俄罗斯东正教会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备的教阶体系，1989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赋予白俄罗斯东正教会以督主教区（эксархат）的地位，其成立的原则即是民族宗教原则，拥有较高的自主权。督主教区内的最高立法、执法和司法权隶属于以督主教为首的主教公会，但督主教区的主教公会日志需递交圣主教公会，并由莫斯科及全俄牧首批准。督主教由莫斯科牧首区圣主教公会选出，并由牧首任命，地位仅次于牧首。在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之后，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也有所抬头，如对白俄罗斯语的强化，对国名

① Михайчиков Леонид. Опрос: лишь 4% белорусов считают себя атеистами. 20 мая 2013. <https://news.tut.by/society/349182.html?crnd=9106>

的中文译名（白俄罗斯&白罗斯）的讨论等。此外，自称的“白俄罗斯自主东正教会”二战后一直在积极活动，并视曾经自称的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为母教会，虽然其势力与实力相对弱小，但其周围团结了一部分侨居海外的白俄罗斯人。因此，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后续走向、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国家关系、以及国际势力的介入，都会影响到未来白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离心倾向。

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分裂，对俄罗斯东正教会处理与中亚五国的关系问题也不失为一个警醒。目前中亚五国隶属于莫斯科牧首区的东正教会离心倾向相对较弱，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在这几个国家东正教均为当地的非主要宗教，属于非优势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更需要依附于比较有实力的母教会；二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的关系相对良好，且当地的东正教会与政权积极进行沟通与对话。然而，在全球民族意识崛起的浪潮下，随着中亚五国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希望摆脱俄罗斯影响的意愿日益加强，特别是中亚五国中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哈萨克斯坦，处理好东正教会与当地政权、主体民族、主体信仰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旦国家间、民族间、东正教与伊斯兰教间的关系恶化，东正教会作为小众群体，其境遇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很可能助长其离心的倾向：或是脱离东正教信仰皈依其他宗教，或是转而加入其他母教会。此外，虽然五个国家各自的东正教会势力均比较弱小，但也不排除在统一的伊斯兰教空间之下产生建立以中亚为大区划的独立、联合的东正教会的意识。

综上所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统一并非是单纯的教会内部事务，与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息息相关。俄罗斯宪法规定俄罗斯是一个世俗国家，东正教会为了维护统一不可过多地干涉国家事务，过分地涉足世俗领域，这一方面会导致前面第一点所谈到的宗教的世俗化，另一方面也会打破政教关系脆弱的平衡，从而造成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本土的挫败。

（三）俄罗斯东正教会快速增长、扩张的隐患

俄罗斯东正教会经过几十年的复兴，如今是所有地方东正教会中信徒人数最多的一个教会，牧首基里尔宣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信徒有一亿八千万^①。

①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прихожанами РПЦ являются около 180 млн человек. 28 окт. 2017. <https://tass.ru/obschestvo/4684885>

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斯境内的燎原之势，在原苏联领土上的稳步发展，在海外流散群体中的日益复兴，对其他东正教会，以及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文化及信仰形态均构成了一定的挑战，首当其冲的便是在东正教世界居首位的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近年来，两者之间的龃龉不断，矛盾日益升级。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之间矛盾的形成与其各自的历史、现实和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从俄罗斯方面来看，随着俄罗斯东正教会力量的不断壮大，开始谋求在东正教世界更大的话语权，一个比较突出的体现即是神圣东正教大会（Святой и Великий Собор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的筹备和召开。1948年，恰逢俄罗斯东正教会获得自主地位500周年之际，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始积极参与神圣东正教大会的倡议和筹备工作。1996年，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试图让爱沙尼亚自治东正教会（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成为落实神圣东正教大会筹备工作的全体东正教预备会议的正式成员，以期提升爱沙尼亚自治东正教会的地位，遭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坚决反对，并得到了其他一些地方东正教会的支持。2016年6月，神圣东正教大会在克里特召开，但在大会召开前夕，俄罗斯东正教会拒绝出席此次会议，原因之一是此次会议没有充分考虑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意见，忽视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东正教会与其他基督教世界的关系》^①这一文件所提出的修改建议。从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倡议、筹划神圣东正教大会的过程，以及拒绝出席此次会议的理由，可以看出俄罗斯东正教会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思想基础。早在16世纪，甚或更早，普斯科夫叶列扎罗夫修道院的长老菲洛费伊（Филофей Псковский，1465-1542）在给大公瓦西里三世（Василий III Иоаннович，1505-1533）的信中就提出了“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思想，君士坦丁堡是第二罗马，也是新耶路撒冷，其陷落后，俄罗斯继承拜占庭的衣钵成为第三罗马，是新新耶路撒冷，此后将不再有第四罗马。第三罗马的俄罗斯东正教会，自然也将取代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领导地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这种使命思想，加上如今强大的实力，必然会促使其在东正教世界，乃至基督教世界谋求更大的话语权，并因此造成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矛盾。

①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с остальным христианским миром.

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方面来看，君士坦丁堡教会在第四次大公会议上奠定了自己在东部教会的首席地位；1453年，拜占庭陷落，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实力锐减；19世纪，希腊教会从君士坦丁堡教会分离出来；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解体，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因此丧失了大部分信徒，其信徒目前只有525.5万人。^①无论从信徒的数量、教会的财力、还是影响力来看，君士坦丁堡教会在东正教世界的声音日益衰微。为了保住自己的历史地位，获取信众，在20世纪20年代，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宣称对所有的“流散群体”享有牧养权，与有着众多流散族群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发生了利益冲突。此外，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还在一些地区恢复或是建立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教区，如在美国建立了君士坦丁堡辖区，不承认美国东正教会的自主地位^②；在爱沙尼亚成立隶属于自己的自治东正教会；2008年，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擅自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纳入香港和东南亚都主教区的范围。2019年1月6日，君士坦丁堡牧首授予乌克兰教会自主教会的托马斯文件，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统一事业给予重击。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一系列举动，既有政治、经济等利益的因素驱使，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其对自身东正教世界首席历史地位的危机感，而这种危机主要来自于曾经是自己子教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一哥”之争短期内难见高下，东正教是一种相对保守，讲究传统的宗教，想要撼动历史，特别是七次大公会议的一些既定传统和事实，并不容易。而俄罗斯东正教会强烈的“使命”意识又会驱使其充当东正教世界拯救者的角色，因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此外，东正教在俄罗斯国内的绝对优势和特殊待遇，也不断引起其他一些传统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代表的不满。俄罗斯东正教在非传统东正教区域的扩张，如在以天主教为主体的欧洲和拉美地区、以佛教信仰为主的东南亚地区、以无神论为主的中国和朝鲜等地的发展和传播，也潜藏着许多隐患：来自当地主体民族、主体信仰的敌意，受到当地主体文化的冲

^① 数据来源：世界基督教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Ecumenical Patriarchate”，<https://www.oikoumene.org/en/member-churches/ecumenical-patriarchate>

^② 1970年，俄罗斯东正教会授予美国东正教会以自主教会的托马斯文件。

击和熔炼，为适应当地文化而做出挑战东正教传统的改变……等等。

基里尔任牧首的第一个十年，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发展历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十年。这十年间东正教会既做到了对传统模式的传承与发扬，同时为了应对现实的需要也不失时机地进行着必要的转型。随着东正教会力量的日益壮大，来自国内外政治、宗教、社会、文化层面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了解俄罗斯东正教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剖析其中潜藏的问题与隐患，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知当代俄罗斯人的精神面貌、政教关系和外交特点，对我们发展健康良性的中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Abstract】 In 1988, it has been a thousand years when the Rus was baptized, the prelude to the revival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slowly started. After 30-odd years' development, the Orthodox Church has now become an important spiritual and cultural force for Russian society. In the past 30 years, three patriarchs, namely, Pimen I, Alexy II and Kirill I have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work carried out by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since Kirill I's appointment as the patriarch in 2009, clarifying the inheritance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in their internal construction, interaction with secular domains, and dialogues with other Christian factions. Meanwhile, it analyzes the transition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from growth in "quantity" to upgrade in "quality", pointing out the tensions between "non-secular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faced by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the threat of church unity, and challenges of the rapid growth of churches.

【Key Words】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Patriarch Kirill I, Transition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Аннотация】 В 1988 году, через тысячу лет после крещения Руси, стали медленно складываться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для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После более чем 30-летн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стала важной духовной и культурной силой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30 лет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ережила трёх патриархов, Пимена, Алексея II и Кирилла.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изучается работа, проводима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овью с момента назначения Кирилла Патриархом в 2009 году, и проясняется наследие работы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церкв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о с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ью и диалоге с другими христиански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 Проводитс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от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го» роста к модели «качественного» укрепл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а также анализ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между «несекуляризацией» и «секуляризацией», с которой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угрозы церков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и быстрого роста церкв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атриарх Кирилл,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